

屈原与《离骚》

詹安泰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屈原与《离骚》/詹安泰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10

ISBN 7 - 81079 - 136 - 2

I. 屈... II. 詹... III. ①屈原(约前 340 ~ 约前 278) — 文学研究②楚辞 — 文学研究③楚辞 — 注释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9221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编辑部 (8620) 85225277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0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625

字 数:240 千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1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纪念詹安泰教授诞生一百周年

本书承蒙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席

陈伟南先生

赞助出版

特此 鸣谢

[出版说明]

詹安泰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家，他在文学史的编纂，诗词的研究和创作，以及《诗经》、屈原的研究上都有极高的造诣。兹值詹安泰教授一百周年诞辰之际，为纪念这位在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特将其《屈原》（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与《离骚笺疏》（198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两部著作重排刊行，合为《屈原与 离骚》，以飨读者。

詹安泰教授的生平与学术成就述略

詹伯慧

詹安泰，字祝南，号无庵，原中山大学教授。1902年11月23日生于广东省饶平新丰镇，1967年4月6日病逝于广州中山大学，享年65岁。

詹安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尤精于诗词的创作和研究，兼擅书法艺术。他的诗词作品及词学论著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被誉为当代十大词家之一；他的书法别具风格，兼长几种不同的书体，无论是秀逸飘洒的行书，或是凝重典雅的碑体，写来都炉火纯青，独具风韵，深得海内外书道行家的赞赏，被视为珍贵墨宝。

詹安泰先生出身在一个老中医的家庭。父亲詹挥琮一生悬壶济世，乐善好施。詹先生自幼酷爱古典诗词，6岁进小学，10岁学写诗，13岁学填词。1916年考进潮州市金山中学，1921年至1926年负扈于广东高等师范和广东大学中国文学系。大学毕业后詹先生回到潮州市任教于广东韩山师范，并兼任金山中学教师。

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是韩山师范的前身。它由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在潮州修建的“韩山书院”沿革而来，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校风。詹先生在韩师任教12年，讲授文史、文化史、文学史、文字学和美术等课程，讲课博大精深，抉微入理，深受学生欢迎、敬仰。他在此期间，除授课外，致力于古典诗词的研究，并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曹湘蘅主编的《国闻周报·采风录》和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青鹤杂志》等，

经常发表詹先生的作品。193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词集《无庵词》，得到了词学界的很高评价，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先生一再称赞詹先生“词学甚深”；词曲家吴梅教授赞赏詹先生的词“取径一石（姜白石）二窗（吴梦窗、周草窗）而卓有成就者”。在作词的同时，詹先生还创作了大量的诗，特别是在1935年以后，他诗兴大发，写了《韩山韩水歌寄邵潭秋》、《听歌舞团陈翠宝唱大鼓词卒成长句》、《游别峰八十六韵》、《琴香馆夜听王泽如琵琶、郑祝三箏、吴轩孙胡弦合奏》诸首，尤见气韵沉雄，情意深切。诗人陈沅老先生读后推崇备至，曹湘蘅亦评论其诗“曲而能直”。詹先生经常与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陈蒙庵、曹湘蘅、陈竺同、卢冀野等名家酬唱论词，切磋诗词艺术，成为知己益友。詹先生的早逝（年65岁卒）使词学大师夏承焘、唐圭璋深为悲痛，20世纪80年代初詹先生遗稿《无庵词·鹤鹑巢诗合集》影印面世，夏老与唐老各赋《浣溪沙》一首以表达他们间的真挚情谊。夏老词云：“酬唱当年雨又风，西湖南海记吟踪，几番后约荔枝红。修阻青山书一纸，萧骚白发酒千钟，交期剩有梦魂通。”唐老词云：“国土南中世尽知，频传彩笔慰相思，依稀话雨夜窗时。执手钟山迎翠色，摧心四化失文期，黄垆一顾不胜悲。”

1938年10月，詹先生由他在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读书时的老师陈钟凡教授（解放后为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政协主席）推荐，以名士身份，被中山大学破格聘为中文系教授。当时日寇侵入广州，中大西迁云南澄江。际此硝烟弥漫、兵荒马乱期间，虽然学校教学、教研、生活条件甚差，詹先生仍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克服困难，悉心教学，还多方筹划，使弦歌不辍，振奋精神，努力创作，他陆续撰写了《花外集笺注》、《碧山词笺证》、《姜词笺释》、《宋人词题选录》等著述，并在1939年刊印了《滇南挂瓢集》，这部诗集流传甚广，成为士林争读的佳作。詹先生的诗词家地位，即由《无庵词》和《滇南挂瓢集》而奠

定。詹先生把满腔忧国忧民之情托之毫索，正如他在《齐天乐》一词中所题：“国难日深，客愁如织，孤愤酸情，盖有长言之而犹不足者。”当代诗词评论家曾敏之先生在《读詹安泰诗词感赋》中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风骨峻嶒别有情，韬光养晦念斯民，诤言讽世凭肝胆，不待千秋有定评”；“转徙西南慷慨多，寄怀家国几悲歌，先生去后遗篇在，沾溉文林永不磨”。

1940年秋，中山大学由澄江迁回粤北乐昌的坪石镇，文学院就在镇东头小山岗铁岭上借用原铁路局的一些房子作教室。詹先生于附近租得濒临武水江边的数椽湫隘泥屋，总共只有十多平方米，用泥砖隔成前厅后房。在这十分简陋的小屋里，詹先生借着昏暗的油灯，写成了他的扛鼎之作《词学研究》。此稿是他多年研究词学的心血结晶，从声韵、音律、调谱、章句、意格、修辞、境界、寄托、起源、派别、批评、编纂等十二个方面全面阐述词学上的问题，内容丰富精湛，甚多独到见解。可惜在十年动乱期间，原稿毁失过半，今仅存其中七章，已载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詹安泰词学论稿》一书中。

1944年秋，日敌进犯粤北，企图打通粤汉铁路。坪石告急，中大被迫再度搬迁，文学院迁到粤东梅县。就在这颠沛流离的环境下，詹先生依然孜孜不倦写出了一篇重要的词学研究论文《论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发表于1945年1月《文史杂志》五卷一、二期合刊上。这篇论文提出并论证了“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不但是对词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鼓励了“学词而专以填词为目的的人”，发扬光大了中华词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词学研究论文集》，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0多年间全国报刊杂志发表的约600篇词学研究文章中精选出22篇重要的论文来，詹先生这篇文章便入选其中。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中大各学院陆续迁回广州石牌。

詹先生继续主讲“诗选”、“词选”两门课程。解放前夕，詹先生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此时广州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949年7月23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中大一批进步教授和学生，詹先生极为激愤，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师生。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中山大学开始了新的一页，詹先生的教学和生活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解放后中大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造工作，詹先生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他热情奋发，曾立下“三年不读线装书”的决心，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新文艺理论，力图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用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一个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学者，能够适应潮流，勇于探索，跟上时代，实在难能可贵。

1953年3月，詹先生写出了《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一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被誉为是解放后第一篇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学术论文。这篇文章可说是詹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里程碑。这年春季开始，詹先生主编了《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此书共11章，除个别章节由容庚、吴重翰教授执笔外，统由詹先生编写完成。此书1957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大学教材公开出版，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书中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各种文学现象，强调劳动创造文学，强调民间创作促进了秦汉时代文学的发展，注意劳动人民在历史上包括在文学发展上的作用，这些都是这部文学史教科书的特色。正因为詹先生具有深厚的文学根底，在掌握大量史料、透彻地理解作品的基础上，能以正确的观点来分析先秦两汉的文学现象，因而，这部文学史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在编写先秦两汉文学史的同时，詹先生花了很大的力气研究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他对屈原的时代、家世和出身、生平、思想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认为屈

原是“中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古典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文学作品兼有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有的优秀传统，而他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则是可以作为一个优秀文学作家的楷模”。詹先生研究屈原的成果反映在1956年他在全校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长篇论文《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以及随后于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屈原》一书中。他还结合教学，写了《离骚笺疏》一稿，汇集从王逸以来历代专家对《离骚》的注解，爬梳剔抉，从中阐明他自己的见解，并对《离骚》文意逐段加以详细串解，对《离骚》的思想艺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加以阐述。这本稿子于1981年出版，1984年再版，印数近2万册。詹先生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深受学术界的赞誉。到了20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姜亮夫还由衷地称赞：“我比较欣赏詹安泰写的《屈原》，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很细心，而且材料掌握与分析都表现一种客观的负责的态度。”（见《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

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就南唐后主李煜词的评价问题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詹先生对李煜的词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对李煜的生平及南唐政治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将李煜的词加以分类剖析，认为李煜词所表现的爱情固然不能等同于一般封建帝王的荒淫生活的表现，但也不能等同于人民的真正爱情生活的表现，人们欣赏这些词不在于其中的具体内容，而在于李煜的大量真实的描写和描写艺术的较高的成就。由于李煜作品中所表现的愁恨，正是人们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最易感受到的愁恨，最易引为同调的愁恨，人们在读这些作品时，自然就会受其感染，以赞叹其作品中表现的愁恨一样的眼光来赞赏这些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普遍把人的阶级属性夸大到绝对的地位，不承认不同阶级的人也“具有共同的好恶的时候，詹先生却认为李煜词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意义和

体现人所共有的特征，能够感动不同时代的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他的这些精辟的论断，不为时见所囿，显得独具卓识，难能可贵。詹先生的这些见解集中反映在他的学术论文《李煜和他的词》和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注的《李璟李煜词》一书中。《李璟李煜词》1958年初版4万多册，1982年再版重印，累计印数13万多册，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詹安泰先生一生的学术业绩，最突出的表现在于词学的研究。除了上述关于李煜的研究外，他对词的起源，对宋词的评价，对宋词发展的社会意义，对唐宋词人的风格、流派，以及对词作的艺术分析等等，都曾作过深入的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其中《詹安泰词学论稿》一书系统表现了詹先生词学理论研究中的精辟见解；《宋词散论》一书则是散见海内外报刊上论述唐五代南北宋词文章的结集，这两本专著充分显示出了他在词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在词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宋词散论》首版1.3万多册（1980年），一年多以后，又再版印了近3万册，成为词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

詹安泰先生为人正直谦虚随和，学风严谨，受过他教育的人都有如沐春风之感。他一生兢兢业业，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为祖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解放后党和人民给过他很高的荣誉，评他为二级教授。可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由于他作为省政协委员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竟被打成右派分子，蒙受了許多凌辱。但他并不为此意气消沉，他仍然坚信党会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仍然怀着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对学术事业高度的责任心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1961年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组织上要他招收宋词研究生，他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的工作，编写了《宋词研究》的讲义，并且撰写了大量有关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词家及其作品的文章发表。收录在《宋词

散论》中的一些论文如《温词管窥》、《冯延巳词的艺术风格》、《简论晏欧词的艺术风格》、《宋词风格流派略谈》等，就都是1962年以后写的。1967年詹先生因患癌症病逝中山大学。当时正值“十年动乱”时期，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学术事业陷入“万马齐喑”的境地，一个曾被扣过右派帽子的著名学者就这样寂然无闻地离开了人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被响亮地提出来，詹安泰教授的学术业绩再次得到全社会的公认。人民文学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出版或再版了他的一些专著，他所写的词学以外的古典文学论文，亦于1984年汇编为《古典文学论集》一书出版。詹安泰教授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积存下来的诗词手稿数百首，连同他的书法手迹，也于1982年在香港作为至乐楼丛书第25种《无庵词·鹤鹑巢诗合集》合集影印问世。从这本诗词集中，读者可以看到詹先生辛酸苦辣的经历，坎坷曲折的道路，醇厚多情的性格以及洒脱安命的处世态度，还可以从中领略其淳朴古劲的诗风和秀逸凝重的书体。至此，詹安泰教授的遗稿已陆续刊行的近10种，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珍贵遗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等一些人物专书都收入詹安泰的小传。1987年，在詹安泰教授逝世20周年之际，为了纪念这位“岭南词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詹安泰纪念文集》一书，收入海内外著名学者王力、陈钟凡、夏承焘、唐圭璋、方孝岳、饶宗颐（香港）、清水茂（日本）、罗倬汉、程千帆、黄海章、王季思、罗忼烈（香港）、曾敏之（香港）、陈湛铨（香港）、余阳（香港）、秦牧、赖少其等以及詹教授的弟子汤擎民、郑孟彤、邱世友、黄天骥、蔡起贤、周伟民、余论有等所写的纪念文章及诗词作品，并选录詹安泰教授的几篇论文和他的部分诗词佳作。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和中山大学还举行了“纪念詹

安泰先生逝世 20 周年，诞生 85 周年座谈会”，高度评价了詹安泰教授的学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正如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同志为《纪念集》所题的“岭海芳型垂永久，诗人风范在人间”，如今詹教授亲手培育的英才业已逐渐成长，桃李芬芳，在建设“四化”中发挥作用；詹安泰教授一生孜孜不倦，严谨治学的精神，以及他为祖国文化宝库增添的珍贵遗产，将永远活在后来学者的心中。

目 录

詹安泰教授的生平与学术成就述略 詹伯慧(1)

屈 原

- 一、伟大的爱国诗人 (2)
- 二、时代 (19)
- 三、家世和出身 (30)
- 四、生平 (42)
- 五、思想 (68)
- 六、辉煌的艺术成就 (81)
- 七、九歌 (97)
- 八、离骚 (118)
- 九、天问、九章及其他 (138)
 - (一)天问 (138)
 - (二)九章 (140)
 - 1 橘颂 (144)
 - 2 惜诵 (145)

3	抽思	(146)
4	思美人	(150)
5	悲回风	(151)
6	涉江	(152)
7	哀郢	(154)
8	怀沙	(156)
9	惜往日	(159)
	(三)招魂	(162)
	(四)远游、卜居、渔父	(166)
	十、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	(170)
	后记	(179)

离 骚

· 上编 ·	
《离骚》笺疏	(183)
· 下编 ·	
《离骚》通论	(278)

附录	
詹安泰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	黄天骥(317)
詹安泰教授已刊著述年表	(327)

屈 原

一 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是我国两千多年前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由于他把全生命的血液都倾泻在他的诗篇里，而他的诗篇还有不少被保存下来，因此，他作为我国古代一个最伟大的爱国诗人活在人们的心里。

我们知道，爱国主义的精神，在我们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里一直是贯串着的。在屈原以前的《诗经》里面，就有不少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最突出的例子，是作于公元前7世纪的许穆夫人的《载驰》^①。许穆夫人为什么要写《载驰》这一诗篇呢？这故事是值得在这里介绍一下的。原来许穆夫人的祖国是春秋时候的卫国，她是卫国领主卫懿公姬赤的女儿，嫁给许国的领主。卫懿公是一个奢侈淫乐的领主。他好鹤成癖，养了许多鹤。他把鹤和政府的官吏一律看待，给予一定的俸禄，套上华丽的衣服，出门还要用车子载它们。这种荒谬的举动当然是要引起卫国人民的反对的。因此，当公元前660年狄人攻卫的时候，久怀不满的卫人都说：“你喜欢鹤，就叫鹤上前线作战好了！”失了人民的支持，卫懿公战败被杀，卫国就被狄人占领。许穆夫人向来是关心祖国的安危的，当卫国灭亡的时候，她悲痛极了，就向当时第一个大国——齐国求援。齐国答应她，一方面派3000人去保护卫国的难民（当时都结集在卫国边境一个叫漕的小地方

^① 《左传·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杜预注：“《载驰》，《诗·卫风》也。”今见《诗经·邶风》。本段解说，根据冯沅君《前七世纪的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见《文艺报》3卷10期。

——今河南滑县白马城——去逃避狄人)，另一方面率领着一个诸侯群打击狄人，并且在楚邱（今河南滑县东 60 里）给卫国建造新城，恢复卫国。许穆夫人的诗，据说共有三篇，《载驰》以外，还有《泉水》（见《邶风》）和《竹竿》（见《卫风》），但标志着她热烈的感情和坚强的意志，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就只有《载驰》这一篇——共五章。像许穆夫人这样出色的女诗人，在 2600 年前就出现在我们的祖国里，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是我们祖国的文化在当时已有相当高度发达的一种表征。可是，在悠长的中国文学历史上，把一生为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他的历史任务而奋斗的过程，写成了不朽的诗篇，作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出现的，屈原却是第一个。

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贵族中一个最进步的分子，他热爱祖国，关心人民，忠实于自己的正直的主张，以忘我的精神和一切恶势力斗争到底，最后，他投入长沙东边的汨罗江，以身殉国。相传屈原是在旧历五月初五日投江自杀的，广大人民就在这一天以十分热烈的心情用各种式样来纪念他，最流行的是划龙船（竞渡）^①和缚粽子。划龙船的意义，是要打捞他的尸首；缚粽子的意义，是要把粽子当祭品投入水里给他吃。这种纪念的方式，一直流传到现在。这说明了广大人民对于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多么热烈地爱戴！像这样长久受广大人民热烈爱戴的诗人，不但在我们的国度里不多，在全世界上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人物。因此，在 1953 年屈原就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决定纪念的世界

① 晋·宗攸《荆楚岁时记》：“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四大文化名人之一^①。现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对我们祖国古代这位伟大的诗人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的了解，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全国人民骄傲的事情！

屈原为什么会赢得广大人民这么热烈的爱戴呢？这是与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大众生活的关心、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他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个人的利益、自始至终与国内的媚外集团和国外派进来的间谍作坚强不屈的斗争这种深厚的人民性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分不开的。伯林斯基曾这样说过：“爱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说，要渴望祖国能成为人类理想底体现，并尽自己的力量来促进这点。”^②屈原的爱国主张，就正是当时人民理想的体现，他为实现这理想而尽了一切的努力。列宁曾这样说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它应该唤醒他们中间的艺术家和发 展他们。”^③屈原作品之所以有永久性，就正因为他最爱好民间文艺，最善于吸取民间文艺，把民间文艺提高到文学史上很高的地位，同时，他又能够歌唱出人民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对他们起感染、鼓舞的作用。

①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除我国的屈原外，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的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

② 见加里宁《论我国人民底道德面貌》，原载1945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一期。中译文载加里宁《共产主义教育》，时代出版社1955年版，225页。

③ 蔡特金：《列宁回忆录》，中译文载《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解放社版，206~207页。

由于屈原是历来人民共同爱戴的人物，于是就产生了不少关于屈原的传说：说他当楚国大饥荒的时候，在田里号泣，泪落的地方，就产生了像玉粒般的白米；说他写完了《山鬼》那篇歌辞的时候，周围的山里都有鬼叫的声音，啾啾的鬼声，十里外都听得到，所有的草木都枯萎掉；说他在楚国的先王、先公的祠庙里“呵壁问天”的时候，天惨地愁，白昼里像黑夜一般，一连三天都是这样。^① 这是把他看成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了不起的人物了。还有一些传说把他简直看成是神仙中人：说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年间（公元25年至55年），长沙区回（一作区曲）忽然看见一个人，自称是三闾大夫，对他这么说：“听说你要祭我，很好；可是往年祭我的东西，都给蛟龙吃掉了，现在如果要祭我，请把楝树叶塞在上面，并用五色丝缚住，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蛟龙所忌惮的。”区回就照他的话做。后来缚粽子的风气，就是这种做法的沿袭。^② 又说禁简文帝（司马昱）咸安年间（公元371年至372年），吴人颜珉坐船停泊在汨罗江边，在一个月夜里，听见有人吟唱着：“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系屈原《哀郢》里的句子。）颜珉觉得很奇怪，就前去问那唱诗的人说：“你是三闾大夫吗？”那人忽然不见了^③。像这样的传说，当然不是事实，是人民所创造，通过纪录和口传而流布出来的。但从这里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人民总不愿意他们所爱戴的人物活得太平凡，人民总不愿意他们所爱戴的人物死去了就白白地化为粪土的。于是就给他创造出许多灵异的事迹，从灵异中表现他的突出；使他成为神仙，给他以持久的生命力，永生于天地间。传说的本身虽不等于历史的事实，然而它代表着人民对传

① 见沈亚之《屈原外传》。

② 见吴均《续齐谐记》。

③ 见沈亚之《屈原外传》。

说中人物的看法和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爱戴屈原的心情出发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描绘、塑造他的形象，或者把他的作品作为描绘、塑造的题材。描绘、塑造他的形象的，如赵孟頫、张渥、顾洛的《屈原像》，陈洪绶、张若霏的《屈子行吟图》，吴伟的《屈原问渡图》、萧云从的《三闾大夫》、《卜居》、《渔父合图》等等。把他的作品作为绘描、塑造的题材的，如李公麟、赵孟頫、钱选、张渥、文征明、仇英、陆冶、陈洪绶的《九歌图》，萧云从、门应兆的《离骚图》（包括《九歌》、《天问》等）等等^①。这些美术上的制作，虽然出自封建文人之手，甚至有的还是奉统治帝王的命令制作出来的（如门应兆的《离骚图》），但既然把屈原及其作品作为制作的对象，就必然对屈原及其作品先有爱慕之心，同时也必然不能完全离开屈原这一人物性格去凭空结撰；在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更形象地体现着屈原的精神实质的美术制作的流行，因而也就加深了人民对于屈原这一伟大人物的爱念。其中最成功的作品如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尤其深刻地体现着屈原的思想感情及其为祖国为人民的无比忠贞的伟大人格，因而直至今尚为广大人民所爱好，不少的民间艺人按照这一类型塑造屈原的肖像。

此外，还有把屈原的故事写成剧本的，最早的是睢景臣的《屈原投江》，可惜已经失传。之后，像郑瑜的《汨罗江》，尤侗的《读离骚》，都或多或少体现着屈原的思想感情。至于像周文泉的《纫兰佩》，叙述屈原投江为仙人所救，赴赵国乞兵破秦，楚怀王回国，以屈原为令尹，张仪、靳尚都得到应有的下场。这虽然不是当时的事实，而是出自文人的创造，但是已经能够把作者和广大人民对屈原的同情和爱戴的心愿深刻地体现出来了。

^① 参看阿英《屈原及其诗篇在美术上的反映》，载《文艺报》1953年第10号。

值得广大人民爱戴的人物，他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必然是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大致相符合的。为了实现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主张而努力，即使是失败牺牲了，人民对他还是同情的。否则，虽然在当时受到他的主子的爱宠，取得高官厚禄，但人民很快地就把他的名字从历史上抹掉了，不抹掉，也只有让他的臭名流传下去，作为激励自己斗争情绪的一种丑恶形象。

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考察一下屈原的主张是否符合于当时的国家人民的利益。屈原的主张，在内政上主要是变法，在外交上主要是抗秦。现在就从这两方面来考察：旧贵族（暂用这名称以区别于当时比较进步的贵族分子）的特权应该加以限制，分裂的局面应该统一，这就当时的历史事实看，是人民大众一致的要求和愿望，屈原就正是一个主张变法——首先是限制旧贵族特权，主张统一天下的人。他在《惜往日》的诗篇中很明显地说出他曾经和楚怀王密谋变法以及遭受谗人反对的经过。变法的具体内容，他自己虽没有明白说出，其他的史籍也没有详细记载，据我的考察，是和他主张接受楚国先代的优秀传统与外国的良好经验分不开的（前者指楚悼王用吴起变法、楚威王好法制术数意图变法事；后者指魏文侯用李悝、秦孝公用商鞅、韩昭侯用申不害事）。战国时代的一般变法，都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关系适应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先把国家内部整顿改革，朝向富强的路子走。在楚、秦两国的先例，则是从限制旧贵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享有的特权入手。因为这种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时的生产关系从而逐渐解放生产力。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屈原制“宪令”遭受到旧贵族（上官大夫是旧贵族派系的人物）的强烈反对这一事件看来，屈原的主张，在从限制旧贵族特权入手这一点上，是和吴起、商鞅一样的。这一点如果行得通，楚国人民当然可以得到好处。不过，屈原还有更符合于广大人民的愿望的更远的理想，他还要进一步完成统一天

下的伟大事业。这理想也在他的伟大诗篇《离骚》里充分表现出来。他所称道的“前王”、“前圣”如尧、舜、汤、禹都是前代的统一帝王，如挚、咎繇、傅说、吕望都是前代的“王佐”；如齐桓、宁戚，也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的完成者及其辅佐者，威力所及，也不限于一个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屈原主张的起点是变法，限制旧贵族的特权（当然，其中还要配合着正确的外交政策和良好的政治措施），而最终的目的是统一天下。这种主张，和当时人民大众的要求和愿望是一致的。从变法到统一天下，秦国的具体做法虽然不同，但它也还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在当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①，秦楚一样有统一六国的可能（楚国在当时无论人口、兵额和地域，都居七国中第一位，经济力量也很充实），结果楚国灭亡、秦国统一了六国，其原因虽多，而秦的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多大的矛盾，和秦的君主能够把变法的主张贯彻到底，实为主要原因之一。秦自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行之20年左右，已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②，后来旧贵族虽然感到不便，但他们已成强弩之末，不能发生什么阻力，新兴力量又逐渐成长，因之新法也就容易推行。楚

① 刘向《战国策·目录序》。

② 《战国策·秦策》一：“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韩非子·和氏篇》：“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王先慎注：“疑八上夺十字。”）《史记·商君列传》：“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考《秦本纪》载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用商鞅，行变法之令，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孝公卒云云，则实为二十一年，《国策》之说近是。

国的实际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楚悼王用吴起变法，虽然在秦之先^①，但时期很短^②，基础十分薄弱；楚威王有变法的意图而见

① 吴起变法在公元前 382 年（楚悼王二十年），商鞅开始变法在公元前 359 年（秦孝公三年），相距 23 年。

② 黄式三《周季编略》考定吴起入楚，在楚悼王十七年（公元前 385 年）。郭沫若《述吴起》说吴起入楚当在楚悼王十八年（见《青铜时代》）。考刘向《说苑·指武篇》：“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居一年，王以为令尹。”又《韩非子·和氏篇》：“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疑当作才减——裁减，形近而讹）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则吴起入楚，先为苑守，问屈宜臼后再过一年，才做令尹，实行变法时，已在楚悼王二十年（公元前 382 年），到第二年楚悼王死，吴起也就给贵族们射杀支解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作射杀。《墨子·亲士篇》：“吴起之裂其事也。”《韩非子·问田篇》：“吴起支解，商君车裂。”《淮南子·主术训》：“吴起张仪[疑是商鞅之误]，车裂支解。”《缪称训》：“吴起刻削而车裂。”《韩诗外传》：“吴起削刑而车裂。”都作车裂枝解）。期间是很短的。

阻于昭釐^①。到了楚怀王这一代，正应该急起直追，大力改革，因为这对楚国的兴衰存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是，这时旧贵族的势力仍然很大，他们敌视屈原的主张，拼命攻击屈原，楚怀王受到了旧势力的挟制、包围，又不能始终信任屈原（当然，楚怀王的浮夸急躁、举棋不定、徒具统一天下的野心而无实际办法的主观因素，也是不容否认的）；同时，秦国在楚国的间谍活动很厉害，除张仪与楚国的内奸像昭睢、靳尚等一向互相勾结之外，秦国还暗中派人到楚国做密探^②。这就使得屈原的主张遭到莫大的打击而不能顺利推行，其结果，不能不归于失败。但是事情很明白，失败的原因，不在主张的本身，而在于一切的阻力。我们是不能因为他这主张由于旧贵族的反对，又由于旧贵族的反动力量的强大和外国间谍的阴谋而没有实现，就否定这一主张——能使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生产力的主张——本身的进步意义的。

当然，从楚国的客观情况说，如果吴起的变法能够一直贯彻下去，及早压制旧贵族的势趋，或者屈原的主张能够在若干年前

① 《吕氏春秋·去宥篇》：“荆（楚）威王学书于沈尹华。昭釐恶之。威王好制（高诱注：制、术数也）。有中谢佐制者，为昭釐谓威王曰：‘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注：中谢、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王不说（悦），因疏沈尹华。中谢，细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之术，文学之士不得进，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细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从这里可以看出楚威王是好法制术数的。法制术数是当时主张法治和变法的一贯的指标。

② 《韩非子·内储说·下》：“秦侏儒善于荆（楚）王，而阴有（又）善荆王左右，而内重于（秦）惠文君，荆适有谋，侏儒常先闻之，以告惠文君。”

提出来并且顺利推行，楚国就不至于受制于秦国，楚国统一天下的意图的实现，也就能得到较有力的保证。即使在屈原时代能够实行屈原的政策，也还是可以挽救楚国的危机的。我们从外交情况看，在屈原时代，楚齐联盟是足以制秦的，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以前，秦国就不敢加兵于楚（五国击秦不胜，主动的是五国，不是秦）；直到楚怀王死后，楚屈署以东国为和于齐，秦昭王听见还是很害怕的^①。我们从楚国的人民和士卒的力量看，在楚怀王以后，即是在屈原的政治主张失败了若干年以后，在秦昭王二十七年（楚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曾一度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境），但不久即被楚人所光复；秦昭王三十年（楚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蜀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但第二年楚人反江南时，黔中郡又归楚^②；楚襄王二十一年（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郢都（今湖北江陵县一带）为秦白起攻陷，楚国君臣都逃到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江南发生了几次抗秦战争，主要都是人民的力量；过了两年，楚襄王收东地兵得十余万，便夺取秦所占领的江旁十五邑以拒秦^③；直至秦始皇时楚国快要灭亡的前夕，秦使李信和蒙恬伐楚，两人要会师城父（今河南宝丰县东40里）的时候，楚人袭击他们，三日三夜不“顿舍”（停留），大破李信等，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败走^④；到了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王翦带了60万兵攻打楚国，还经过许

① 见《战国策·楚策》“顷襄王”。

② 《史记·秦本纪》：秦昭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楚人反我江南。”张守节《正义》：“黔中郡反归楚。”

③ 见《史记·楚世家》。

④ 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多周折才把楚国打败^①。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楚怀王时候的楚国的局势，还不是不可挽救的，如果实行屈原的主张，还是有效的。这情况，屈原在《离骚》里也曾提及，《离骚》里假托巫咸的说法，有“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的句子，就是说当时屈原的年纪还未很老，楚国的时势也还未衰弱。当然，事实已证明了，屈原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情况是有莫大的矛盾的，这矛盾使他的一切主张都归于失败。但事实也证明了，正因为不能实现他的主张来改变客观情况，楚国的危机才不能得到挽救，过了几十年才不得不为秦所灭。屈原在政治上虽然遭受到失败，但屈原的主张，在当时说来还是正确的。

秦国的统一六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可以肯定的。但秦的暴力统一的政策，与广大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要求和平生活的意愿相违背，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秦是“虎狼之国”，乃是当时很普遍的说法^②，这说法不是偶然发生的。秦在占领某些地方的时候，把当时的人民都驱逐出

① 同上。

② 《战国策·西周策》游腾说楚王，《魏策》苏子说魏王，《楚策》楚威王答苏秦，都有这种说法。

去^①；在战胜的时候，很残酷地杀戮士卒^②：这一类的事实，都

① 《史记·秦本纪》惠文王前十三年（公元前325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又：“昭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司马）错攻魏河南，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又：“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82年）拔赵二城。……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樗里子甘茂列传》：“秦惠王八年（公元前317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

② 《史记·秦本纪》：“惠文君（王）七年（公元前331年）公子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后）七年（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后）十一年（公元前314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败韩岸门，斩首万。（后）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武王……三年（公元前308年）……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十四年（公元前293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三十二年（公元前275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六国年表》列入后一年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阬杀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走）流死河二万人。……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将军嫪毐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

足以证明它的“虎狼”的称号是广大人民给它加上的。黄药眠同志说：“据我个人的估计，秦之所以要这样大量地坑杀降卒，可能是因为当时人民有反抗的行动。而且它认为把这些俘虏带回秦国去，它没有这样多土地给他们耕种。送回原来的交战国去，则又觉得会有益于敌国，所以不如把他们杀死以减少其劳动力，削弱其兵源。”^①这虽是个人推测之辞，但是有部分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叙赵括军四十万人降白起时有这样一段记载：

武安君（白起）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

从这段话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秦所以驱逐占领区的人民和所以杀戮战败的士卒的原因，是因为别国的人民不愿作秦民同时又害怕降卒的反抗。秦国这样凶狠地侵略六国，这样残暴地对待六国的人民，六国的人民虽然有厌恶战争希望统一的心愿，也不会甘心情愿作秦国的人民，由秦国来统一的。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屈原就主张联合齐国（其实就是合纵的阵线，主要是齐国而已）来抵抗暴秦的侵略，企图由楚国用另一种方法来统一天下（据郭沫若《屈原研究》中的意见，“他是想以德政来让楚国统一中国”）。事实也证明了，统一是人民所渴望的，秦本其优越的条件一时就统一了六国；然而暴力侵略的政策毕竟是人民所反对的，因此秦统一六国后不久，秦朝便被推翻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为了推翻秦的统治权而起义的第一个农民领袖——陈涉所建立的王国即号称“张楚”，以楚国为号召；而起义的楚兵集团特

^① 黄药眠：《论屈原作品之思想性和艺术性》，见《沉思集》。

别多^①。项羽、刘邦等之为楚产更不用说。这就说明了屈原的伟大的思想力量深入人心，他当时主张抵抗暴秦，也是人民所同意，符合人民的要求的。

有人认为屈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是不及时的，有人认为屈原主张联齐抗秦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这些论点，我不敢同意。很明显，照这论点推演下去，那就无异乎认为：屈原应该放弃他一生忠于祖国同情人民的战斗任务，应该放弃他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一切措施，应该以消极的态度对待那祸国殃民的旧贵族当权派，应该以妥协的精神和那与楚国敌对的暴秦合作了。这么一来，对当时的旧贵族当权派又将给以怎样的评价？这就很可能使人误认为正义方面是属于他们。这对读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历史，同时也是楚国历史的悲剧。我们就古代的历史文献看，就近年来发掘出来的楚国文物看，就《楚辞》里所描写的楚国帝王、贵族们的豪奢生活看，都可以说明楚国在当时已有相当高度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以这样的国家，配合上面所说过的人口、兵源、财力、领域种种优越条件，完成全中国的政治上的统一事业是大有可能的，也是楚国人民所渴望的。可是，和楚国对抗的，恰恰是一个具有新兴力量的秦国，而楚国能完成统一全中国事业的时机，又恰恰是在楚怀王、楚顷襄王这两代。屈原生在这个时代里，看清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以无比高度的热忱来争取楚国事业的胜利，然而屈原的政治理想终于破灭了。屈原政治理想的破灭，决定了整个楚国的前途，因而也就是楚国历史的悲剧。有些人看到屈原作品里面包含着许多感伤的情绪，就认为他只是消极地抒写自己的身世之感，而不知他这种富有感伤情绪的作品，是从坚强斗争中产生出

^① 见《史记·陈涉世家》。

来的，是具有生活实践的真实内容的，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牢骚的发泄，主要的是他对国家人民的事业具有无比忠诚与热爱的表现，是他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个人利益的表现。如果认为他的作品里的感伤情绪只像一般文人的“怀才不遇”的抒发一样，那就是沿袭着过去的封建士大夫纯由个人出发的观点来理解屈原，那就是大大地削弱了屈原作品的伟大意义。很明显，这是不正确的。

当然，屈原是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点的：他虽然清楚地看到祖国的危机，看到自己阶级中人的胡作非为，他也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但是由于阶级立场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只能看到人民的智慧（他爱好和吸取民间文艺是最具体的表现），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不可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在当时的人民群众，尽管爱戴屈原，爱护祖国，当然也不可能自动自觉地和屈原合作。）这样，就使得他嫉恶如仇不肯和自己阶级中人同流合污的孤高耿介的性格一直发展下去，成为“孤军作战”的战士，使得他不得不陷于“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见《惜诵》）的境地。就现存的历史材料看，屈原除一度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外，找不到他跟任何人合作过的记载。有人认为陈轸、昭睢是和他同派的人物，照我看这是不很妥当的。陈轸是游说之士，无一定主张，楚柱国昭阳破魏襄陵后移兵攻齐时，陈轸就替齐王说服昭睢，使他退兵，分明为齐不为楚，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九）中已指出其阴合秦，阳绝齐，和亡地于秦，取偿于齐之说的乖谬不义。昭睢也是无一定主张的人物，虽曾主张过“深善齐、韩”，也曾到齐国弄回太子横，但他和张仪勾结，曾经是叛楚通秦的主要人物，鲍彪在《战国策·楚策》的注中已经指出了。像这类人怎么会和屈原合作？屈原既然找不到有力的合作

者，后来连他自己辛勤培养出来的青年也根本变了质^①。以这样的人来干那必须通过尖锐复杂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的伟大事业，是注定要走上艰苦、沉痛、悲愤、抑郁的生活道路的，何况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朝秦暮楚”、巧诈谲伪成为一般社会活动者的风气的时候，他的政敌们又正在扩大他们的恶势力和恶影响^②，并与“虎狼之秦”不断地互相勾结！

屈原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屈原并不因为这种种困难的环境而削弱了他的斗争的意志，并不因为没有与广大人民合作而减低了他对祖国人民的热爱。恰恰相反，他在这种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越发鲜明地扯开他的斗争的旗帜，越发高度地发挥他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他象征着我们民族热爱祖国、坚持真理、反抗暴力侵略、争取自由幸福的光荣传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成为教育和鼓舞后代的巨大力量。

今天，全世界人民都在纪念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的屈原，珍视他创作的诗篇，把他的精神作为保卫和平事业的鼓舞力量，我们尤其应该继承并发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持久和平而努力！

① 《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亩）。”是说屈原自己曾培养过不少的青年；“何昔日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是叹惜自己培养的青年走向敌对方面去。

② 《离骚》：“户服艾以盈腰兮，谓幽兰其不可佩。”是说那些“党人”喜欢一切做坏事的人，妒忌一切做好事的人，正在扩大他们的恶势力和恶影响。

二 时代

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后期兼并战争最剧烈的时代。

我国历史，从公元前 453 年（周定王十六年，楚惠王三十六年，秦厉共公二十四年）魏（桓子）韩（康子）赵（襄子）灭知伯三分其地起，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止，号称战国时代^①。战国时代，有七个独立的强国——秦、楚、齐、燕、韩、赵、魏，叫战国七雄。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转变剧烈的时期，而记载战国时代的专著《战国策》，又多纵横家言，只求耸动视听，说服对方，不尽是历史事实；《史记》中关于战国部分历史的叙述，也相当紊乱。因此，要简单而明确地来说明当时的历史背景还是有困难的。这里，我只想讲一些和屈原时代的楚国有关的国际情势和外交政策。

^① 战国起于何时，历来的说法不一：《史记·六国年表》起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 476 年，或作 475 年）。司马光《资治通鉴》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命魏斯（文侯）韩虔（景侯）赵籍（烈侯）为诸侯。吕祖谦《大事记》起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林春溥《战国纪年》、黄式三《周季编略》均起于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 468 年）。近人大都依据司马光说。惟许立群《中国史话》附录《中国历史大事表》和杨宽《战国史》从魏、韩、赵三家瓜分知氏的领地实际上已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面这时候数起。我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

七国之中，秦最西，北至今陕西北部，南至今四川成都、重庆一带，东有黄河与函谷关，地势险固，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楚最大，占有现今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的全部及河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各一部分的地方。齐据有现今山东的一大部分及河北的一小部分地方。燕在今河北、辽宁、内蒙古自治区一带。韩大部分在今河南，小部分在今山西。赵大部分在今河北，一部分在今山西、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方。魏据有今山西、河南以及陕西的一部分。由于楚、齐、燕、韩、赵、魏六国都在秦的东边，就叫做“山东六国”。

在战国七雄中，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本来都是比较落后的。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由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原各国进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的影响以及他自己有比较远大的眼光^①，他就“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②，下令求贤。过了两年，就采用商鞅的主张，实行变法，不久又任用商鞅为左庶长。变法后，在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改革，行了20年的光景，秦国便飞跃地发展起来，奠定了后来秦灭六国的物质基础。孝公以后，惠文王、武王、昭王、襄王都在这个富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屈原就正是在秦惠文王后期到秦昭王前期为了祖国和人民跟秦国作坚强斗争的一个主要的人物。

在屈原时代，山东各国之间的情况已有所改变了：韩、赵、魏三国的力量已大为削弱，燕本是一个较小的国家，又僻处在东北，无大作用；有力量可以和秦对抗的国家，主要是北方的齐国

① 《史记·秦本纪》在“献公卒，子孝公立”的下面说“年二十一矣”，以后接着叙述他怎样认识“山东诸国”和励精图治的情况，似乎有意表明他一即位就具有远大的眼光，对秦的前途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样子。

② 《史记·秦本纪》。

和南方的楚国。而就当时的情势看，山东各国都或多或少感受到秦的威胁，秦国侵略山东各国的野心也日趋明朗化。西方的秦和山东六国对抗的局面已经形成。和秦有利还是抗秦有利的问题，就成为山东各国所认真考虑的核心问题。与这相适应的外交政策也就展开了两条阵线——合纵运动与连横运动的斗争。

“合纵”和“连横”这名称的产生也和“山东六国”的名称一样，是从当时七国的位置得来的。就六国本身来说，只是南北的区别，把南北联合起来抵抗西方的秦国，是纵的方面联合，所以叫“合纵”。就秦对“山东六国”来说，使六国各自和西方的秦国妥协或附顺，是横的方面的串连，所以叫做“连横”。（但也有复杂交错的情况，例如公元前284年秦和楚、魏、韩、赵、燕就会六国合纵攻打齐国。）一般说，为合纵阵线服务的人有公孙衍、苏秦、李兑等；为连横阵线服务的人有张仪、魏冉等^①。

六国有联合抗秦的必要，秦也有拆散六国联合抵抗的必要，这是事实，因而在外交上两条阵线的斗争也就或明或暗地相当长期存在着。但是由于六国之间的情势前后不同，秦国的对策也跟着转移其重点。初时，六国中间，魏最得势。魏国当文侯魏斯的时候，师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重用李悝（一作李克）、西门豹、乐羊及吴起，是北方一个最强的国家，在诸侯中声望为最高；到魏惠王（魏罃）时，惠王还对孟子夸说：“晋国天下莫强焉”，这是秦国清楚看到的。魏国又和秦国毗连，魏国强大，当然对秦的向东发展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此，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后，首先就用全力对付魏。当魏惠王专力攻击兄弟之国赵与韩，对西面的秦国不加防备的时候，秦就乘虚而入，夺取了魏国

^① 杨宽《战国史》第八章《合纵、连横的封建战争的变化》有较详细的记载。

河西的地方 700 里，继续向魏胁迫，使魏不得不由原来的国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安邑县）而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县），把霸业让给东海之滨的齐国。齐国和秦距离很远，不会直接妨碍秦国向东发展的路径。从此，秦国就在攻韩、攻赵方面打下了一条通路。到了惠文王、武王以后，除在北方向魏、韩、赵继续进攻外，更用全力对付南方的楚国，一方面灭掉巴蜀，控制楚国的上游，一方面拆散齐楚的联盟，杜绝楚国的外援。因为在这个时候，“山东诸侯”中最强大的只有北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楚、齐联盟，固然足以制秦；而其他各国要抗秦，也不能不通过这两大强国，以这两大强国为领导。我们看山东各国两次大联合攻秦，一次以楚国为首（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公元前 318 年），一次以齐国为首（秦昭襄王十一年，公元前 296 年），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可是，齐国毕竟和秦距离很远，秦国劳师远征，不易为力，只可先用政治、外交的手腕来应付。楚国还有一部分土地和秦相毗连，而且它的地域很广，实力还相当大，秦国如果打垮楚国，进而图齐，也就容易为力了，因此，便集中力量攻楚，同时在外交政策上极力破坏楚齐的联盟。

战国时代，特别在屈原所处的战国中、后期时代的一般情势是如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屈原时代，秦攻楚是必然的趋势，秦、楚决无讲和妥协的余地；而楚、齐的联盟，在秦、楚斗争的胜负上更具有极其巨大的作用。

秦、楚势不两立的问题，在前些时已经提出了。苏秦为赵合纵说楚威王时就曾经这么说过：“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①张仪对楚怀王也曾这么说过：“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

^① 《战国策·楚策》一。

争，其势不两立。”^① 楚国的君臣应该是很明白的。

齐国继魏称霸，是当时北方第一强国。齐威王、宣王时，声威远出秦上。从孟子告齐宣王“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这种说法，和齐宣王对孟子“求大欲”的问话笑而不答^②的神气，可以看出齐国在当时是有相当强大的基础的。张仪为秦说齐王时也这么说：“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③ 齐大夫国子说齐王时更明确地说出齐国在当时的重要性：“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④ 公元前 317 年（怀王十二年，齐王七年，秦惠文王后元八年）齐王击败赵、魏军，秦也打败韩国的军队，和齐“争长”^⑤，这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如果楚和齐联合起来，那力量就可以压过秦。这层，楚国的君臣也应该是明白的。

可是，楚怀王却是一个浮夸急躁、反覆无常的君主，他虽有统一天下的野心^⑥，领导韩、魏、赵、燕、齐共六国的军队攻打

① 同上。

② 见《孟子·梁惠王》上。

③ 《战国策·齐策》一。

④ 《战国策·齐策》三。

⑤ 见《史记·楚世家》。

⑥ 黄式三《周季编略》引《贾子春秋》说：“楚王心矜好高人，欲有霸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王，会大国之王编而先马，魏王御，宋王骖乘，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之君皆象使随而趋。诸侯闻之怒。齐人袭之。楚师溃，怀王入秦。”据黄式三推定这是怀王二十九年的事。这是 he 已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图，藉这极其狂妄可笑的事来聊以自慰的。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夸大轻率的心理活动。

过秦（结果是打了败仗），但没有一贯的主张，容易激动，容易受人包围和欺骗，敌我的观念很模糊，有时联合友邦抗击敌人，有时又认敌作友。他这种性格，和他的父亲楚威王（熊商）倒有点类似。据《吕氏春秋·去宥篇》所载，中谢佐制为昭釐对威王说：“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威王就不高兴，疏了沈尹华。又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上官大夫在楚怀王面前谗譖屈原：“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就发恼，疏了屈平。我们把上述这两件事比照来看，就可知道楚怀王和楚威王是同一类型的人。张丑说田婴（齐孟尝君田文的父亲）不该接纳魏王朝齐的要求时，曾经说到楚威王“好用兵，而甚务名”^①，拿这些话和楚怀王一生的行径——如责备西周君敬重秦客樗里疾^②；如使一将军到秦国接受商于之地六百里而张仪称病不出时，就使勇士宋遗辱骂齐王；如囚了张仪，又放还张仪^③，等等——比照来看，也可以说他们父子俩是同一个类型的人物。虽然如此，但在楚威王时至楚怀王初期，楚国还是一个向上发展的国家，贵族集团的腐化堕落也没有显著的迹象表露出来，在统治者之间也还不会因为对外交政策的意见分歧而形成对立的现象，因而楚威王尽管有些好的意图未能实现（如变法），也有若干缺点，甚至还攻打齐国^④，但楚国在这时候仍不失其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楚威王对楚国的前途还不会发生若何巨大的影响。在楚

① 见《战国策·魏策》二；这是公元前333年，即楚威王七年的事，张丑所指的楚王当系楚威王。

② 见《战国策·西周策》。

③ 均见《史记·楚世家》。

④ 《史记·楚世家》：“威王……七年，齐孟尝君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

怀王时，尤其是在楚怀王领导的一个巨大兵团——六国兵马击秦和楚怀王任用屈原为左徒主张变法并联合抗秦以后，秦、楚对抗斗争的局势达到更加剧烈和尖锐的境地；与此相应的楚国内部贵族集团的矛盾冲突也更加深刻化，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这样，就必须有坚定而正确的外交政策，才不至于陷国家于危急存亡的境地，就再不容许以浮夸急躁、反覆无常的态度来对待这严重的外交问题了。

就当时的历史事实看，楚国处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的外交政策，恰恰是反覆无常的：有时联齐，有时和秦，联齐的时间反而比和秦的时间更少。坚决主张联齐的只有屈原，而主张和秦妥协的，旧贵族当权派和怀王左右的亲信都是。不但如此，自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派张仪入楚运用行骗、贿赂和勾结内奸种种手段后，楚国的外交政策几乎大部分是由秦国掌握的，绝齐固然是中了秦国的暗算^①，和秦也还有部分是由秦国主动的^②。楚国的外交政策既然这样摇摆不定，于是秦就更进一步用

① 张仪欺骗楚怀王，说是秦国愿割商于六百里的地方作为楚绝齐的交换条件。楚绝齐固然是中了秦国暗算的最突出的例子，但是除此以外，楚国内部反对联齐的旧贵族当权派和怀王的左右亲信，并不是真的有明确的外交主张，也还是受秦利用的。

② 如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楚和秦战于丹阳（司马贞《史记索隐》：此丹阳在汉中），大败，战于蓝田，又大败；第二年，秦怕楚齐联盟因此巩固起来，便遣使者约与楚亲，愿分还汉中一半的地方和楚讲和，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一说《国策·楚策》一所载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说楚王即指此事）。

财宝引诱楚，并和怀王结为姻亲了^①，和怀王结下盟约了^②。可是，在有口可借或有机可乘时，秦是不肯放过的。公元前302年（秦昭王五年，楚怀王二十七年）入质于秦的楚国太子（即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因和秦大夫私斗而杀死了他，逃回楚国，秦就借这件事在第二年带领齐、韩、魏三国共同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楚重丘的地方；再过一年，秦又攻楚，楚军战死的有2万人，楚将景缺被杀。楚既连续受到重大的损失，当然会再走上联齐的路上去。怀王就使太子入质于齐，和齐重订邦交。但这时的秦国，在对楚国已经进行过利诱、联姻、结盟和威胁之后，手腕的运用越发纯熟，越发厉害了。就在怀王和齐重修旧好的后一年（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国双管齐下地一面起兵伐楚，取了八城；一面更约楚怀王到武关（在今陕西商县东）相会^③。楚怀王这时就完全陷入秦国的圈套，入武关后就不得返回楚国，三年后竟“客死于秦”了。

怀王入秦，秦要胁他割地，怀王不许；楚国另立太子横为顷襄王，表示抗拒秦国的要胁。秦昭王很生气，发兵出武关攻打楚国，楚军大败，死了五万人，又失去了十六个城^④。自怀王被秦诈骗了去，囚死了，楚人很悲痛，秦楚就断绝了关系。到顷襄王六年（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伐韩于伊阙（今河南洛阳县

① 《史记·楚世家》：“怀王……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

② 《史记·楚世家》：“（怀王）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

③ 均见《史记·楚世家》。

④ 《史记·楚世家》：“取析十五城而去。”《集解》：“徐广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駉案《地理志》：弘农有析县。”析县在今河南内乡县西北。

南)，斩首 24 万，秦乘胜韩的威势，就写一封恐吓信给顷襄王说：楚国背了秦国，与秦断绝关系，秦国将要带领诸侯群和你决胜负，请你整饬部队痛痛快快地大战一场。顷襄王受不过威胁，又与秦国讲和，到第二年，还做了秦王的女婿。从此以后，虽然楚国的地域在顷襄王时还更扩展了数千里，楚将庄蹻率兵入滇，直至滇池（今云南昆明市）以外（顷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 280 年秦伐楚，楚割上庸汉北地予秦，庄蹻在滇建国，不复归楚），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而且顷襄王受了爱国者的鼓动^①，在公元前 281 年（顷襄王十八年）也遣使于诸侯，从事“合纵”，欲与齐、韩连和以伐秦，并想图周，楚国的实力和士气也还相当旺盛^②；可是，楚国的外交情势越来越坏，不但忘记了楚、齐联盟的好处，并且在公元前 284 年（顷襄王十五年）曾跟随着秦国和韩、赵、魏、燕共同攻打齐国^③。可以说，直到秦将白起破郢都，烧夷陵，顷襄王东北保于陈城的时候，楚国都受到秦国的挟制。

我们从上面一连串的事实看来，整个屈原时代，除掉在楚怀王信任屈原那一段短短的期间内，由于屈原的坚持，楚国有明确的外交政策外，从楚怀王十六年张仪入楚进行破坏楚、齐联盟的阴谋活动起，楚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在反覆无常的状态中，卒至于受秦人的挟制。秦国呢？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后，惠文、武、昭、襄至秦始皇都有计划有步骤地图谋统一六国。继承孝公

①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微加归雁之上者对楚顷襄王说了许多激动顷襄王复仇的话，事见《楚世家》。“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苏秦说楚威王时已有此语。

② 详见上章《伟大的爱国诗人》。

③ 《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

的几个君主——惠文王、武王、昭王、庄襄王都在孝公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首先从攻魏入手，以次及韩、赵，与齐国争霸中原；然后用全力对付南方的楚，主要是拆散楚齐的联盟，截断楚国的后路，使楚国逐渐受它的挟制，挟制楚国同时也就孤立齐国；后来逐个击破，逐个吞灭，终于完成统一六国的任务。秦国这种计划和步骤，是很精密的；它为了实行这种计划、步骤而定出的外交政策——“连横”和“远交近攻”，也配合得很好；同时，自孝公变法以后，秦国的旧贵族势力基本上已经打垮，新兴阶级的力量逐渐高涨，国内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严重，新兴力量占上风，一切的政策容易推行。这一切，都是秦国的优越条件，因而能够按照步骤完成计划。

总的来说，秦的成功和楚国的失败，其关键性的问题有二：一个是变法问题，另一个是外交问题。变法问题是根本问题，但和外交问题也是息息相关的。在当时，旧贵族的统治已呈露出腐朽无能的本质，继之以起的必然是新兴力量，不厉行变法，则腐朽力量不易排除而新兴力量不易上升（听从旧力量自然消灭由新力量替代起来，时间当然要拖长）。变法就能够使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新发展的生产力，使新兴力量逐步上升。秦国的变法是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在当时，不只是秦国有了新兴力量的萌芽，“山东六国”一样是存在着的。可是，秦国自孝公变法以后就一贯地倚靠新兴的力量执行对付“山东六国”的外交政策，“山东六国”呢，虽然也有新兴力量的萌芽，但是由于旧贵族的势力还比较顽强，首先就没有进行变法或者变法不能获得成功，不能使新兴力量逐步上升，所有统治权仍然掌握在腐朽的旧贵族的手里，内部的矛盾斗争相当复杂；自己国内已然是矛盾重重，给敌人以利用、破坏的机会，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也必随之而起。这样，当然不可能依靠较有远见的新兴力量（一切新兴阶级都比较有远见）定出正确的外交政策——“山东六国”团结

一致以对抗秦国侵略的外交政策，而任由秦国逐个击破，卒至同归于尽。就当时各国情势看，变法问题和外交问题都是有关连性的作用的。而楚国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因为楚国本来是和秦国一样有统一天下的条件的，楚国以前曾一度变法，屈原和楚怀王又密谋变法，屈原也主张联齐，楚怀王还做过“纵长”；只因当时的变法不能成功，联齐进而团结六国的正确的外交政策不能彻底执行，所以不得不归于失败。

屈原的伟大，就在这些方面也可以明确看出来。他主张变法，他主张抗秦联齐，在他的时代里，为楚国乃至为山东其他各国计，都是完全正确的。

三 家世和出身

屈原的家世，因为史料缺乏，不易考见。但他自己在《离骚》里却有一种有关他的世系的说法。《离骚》一开首就说：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毫无疑义，他的远祖是高阳。高阳是什么人呢？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他就是颛顼帝的名字，昌意的儿子，黄帝的孙儿。司马迁在《楚世家》里说楚的先祖，也是出自帝颛顼高阳。因此，楚的远祖和屈原的远祖是同源的。

可是，仅仅是同源，是不能够说明特别亲密的关系的。譬如，在屈原时代，秦国和楚国分明是两个敌对的国家，而秦的远祖也是帝颛顼^①，却和楚国同源。屈原和楚王关系的密切，还因为他们是同姓。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楚国创业始封的君主是熊绎^②，后代都是姓熊。楚王姓熊，屈原姓屈，为什么说是同姓呢？原来屈家的始祖屈瑕，是楚武王熊达

①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

② 《左传》昭公十二年：“右尹子革对楚子云：‘昔我先王熊绎，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的儿子^①，有一块封地在屈的地方，后来便把这地名作为自己这一支派的姓氏^②。严格地说，熊和屈都应该是氏而不是姓，他们都是姓芈（读若米，羊叫的声音）。《史记·楚世家》在叙述楚的世系时，先从高阳叙起，自高阳传到陆终，陆终有六个儿子，第六个名叫季连，芈姓，楚国就是他的后裔^③。后来叙到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时，又提到“姓芈氏”。由此看来，统治楚国的是姓芈。《楚世家》又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其子曰熊丽。”姓熊的最先在这里见到。这是从鬻熊里刺取了一个“熊”字来做姓氏的。是“以名为氏”，和屈家的“以邑为氏”的来源不同。氏的来源有很多

① 楚武王名熊达，今本《史记·楚世家》作熊通，恐误。《左传》文公十六年、宣公十二年、昭公十六年的孔颖达《正义》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楚世家》都作“熊达”；《淮南子·主术训》、《汉书·地理志》注也都作“熊达”。参看梁玉绳《史记志疑》二十二。

② 王逸《离骚》注：“其后熊绎事周成王，封为楚子，居于丹阳。周幽王时，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汉。其孙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林宝《元和姓纂》“屈”字下：“楚公族，芈姓之后，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因氏焉。屈重、屈建、屈到、三闾大夫屈平字原，屈正并其后也。”

③ 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系本》说：“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季连者，楚是也。”又引宋忠说：“季连，名也，芈姓，诸楚所出。”

种，人名可以做氏，邑名也可以做氏^①。司马迁在这里说屈原和楚同姓，指的是姓芈——是姓不是氏。他在《史记》另一篇——《高祖本纪》里这么说：

（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于）关中。

这里分明称屈做氏，和上面说“楚之同姓”有显著的区别。到东汉王逸在《离骚章句》的小序里才把昭、屈、景叫做“王族三姓”。王逸把司马迁所说的“贵族”叫做“王族”，范围紧缩了，意义可能更加明显；把司马迁所说的“氏”叫做“姓”，那就容易使人和“楚之同姓”的“姓”蒙混起来。其实，这只是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王逸所谓“姓”是等于司马迁所谓“氏”的。《吕氏春秋·异宝篇》有这样一段记载：

五（伍）员……如吴，过于荆（楚），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绝（过）江。问其名族（注：族姓），则不肯告。

不说问其名姓，而说问其名族，可见当时对姓和氏族的称谓还是不能混同的。到了汉代的人，就往往把姓来代替氏族了。顾炎武《日知录·氏族》条曾这么说：

战国之人，大抵犹称氏族（原注：《战国策》甘茂曰：“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之。”不言姓而言族，可见当时未尝以氏为姓也），汉人则通谓之姓。然氏族之称，犹有存者。

战国时叫“氏族”的，汉人一般叫它做“姓”。这就说明了司马

^① 郑樵《通志·氏族略》把氏的来源分“以国为氏”、“以郡国为氏”、“以邑为氏”、“以卿为氏”、“以亭为氏”、“以地为氏”等类。屈氏归入“以邑为氏”类，熊氏归入“以名为氏”类。

迂叫“氏”是沿袭战国时代的旧称，王逸叫“姓”是改用汉人的通称，实际上还是一样的。

春秋时代，屈氏人物在楚国非常显赫。屈氏的开创者屈瑕就做了楚国的“尊官”。《左传》（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记载着这一桩事实：

楚屈瑕将盟贰、轸（二国名，在今湖北应山县境）。郢（国名，今湖北安陆县）人军于蒲骚（驻扎在蒲骚的地方，蒲骚在今湖北应城县北），将与随（今湖北随县）、绞（今湖北郢县西北）、州（今湖北监利县东）、蓼（今河南唐河县南90里）伐楚师。莫敖（指屈瑕）患之。

屈瑕在当时做了楚国的莫敖，号屈侯^①。莫敖是什么等级的官职呢？晋杜预注《左传》只说是官名，没有解释；唐孔颖达《正义》因之就说“官名临时所作，莫敖之徒，并不可解。”^②宋孙逢吉《职官分记》根据齐《职仪》认为莫敖等于司空；明董说《七国考》因之就说“楚改司空为莫敖。”清顾栋高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在其所著《春秋列国官制表》里面，列国互有之官一栏内有“司空”，而楚国独缺；楚国独有之官一栏内有“莫敖”，并不注明系司空的改制。但他在另一篇——《春秋楚令尹表序》中有这样的话：

楚自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武王侵随，始见《左传》。其时斗伯比当国，主谋议不著官称。十一年莫敖屈瑕盟贰、轸，败郢师于蒲骚，时则莫敖为尊官，亦未有令尹之号。至于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武王伐随，卒于捩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嗟，营军临随，令尹与莫敖并称，亦不知尊卑何别也。嗣后莫敖之官，或设或不设，间与司马并列令尹

① 罗泌：《路史·国名纪》。

② 《左传》襄公十五年孔颖达《正义》。

之下。

这种从官制的演变来说明莫敖的位置，最为明确。按照顾氏的说法，未有令尹以前，楚以莫敖为“尊官”了。

自屈瑕以下，在春秋时代，屈氏人物可考的有：屈重、屈完（屈倪）^①、屈御寇、屈朱、屈荡、屈到、屈建、屈生、屈巫（后奔晋，即申公巫臣）、屈狐庸^②、屈荡^③、屈申、屈罢、屈春、屈庐、屈子阎、屈子荡、屈弗忌等^④。其间屈瑕、屈重、屈到、屈建、屈荡、屈生都曾做过莫敖。这就可见屈氏人物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一个诸侯群伐楚，屈完奉楚成王的命令在召陵（今河南鄆城县东南）的地方讲和，齐桓公要用兵力威胁他，他用和平团结胜过武力、并指出武力不能制胜楚国的种种说法说服了齐桓公，完成了在历史上一件有名的外交故事叫“盟召陵”。这又可见屈氏人物在楚国的外交上也有卓越的贡献。

战国时代，屈氏在政治上活动的人物大不如前了，但屈宜臼以楚大夫而居魏，又以筑高门不利于国家人民事说韩昭侯，吴起

① 庾信《拟连珠》：“是以屈倪参乘，诸侯解方城之围。”倪璠注：“屈倪，屈完也。”

② 明·陈士元《姓觚》引《姓源》作屈孤庸。屈巫的儿子，仕晋。

③ 是屈建同时人，和上举屈建的祖父屈荡有别。

④ 陈厚耀《春秋世族谱》、顾栋高《世系表》均无屈朱。程公说《春秋分记》说屈御寇的儿子屈朱；马骥《绎史》中的《楚世系》也有屈朱的名字，现补入。又据《说苑》补入屈春，据《新序》补入屈庐。《楚世家》里有屈固，梁玉绳《史记志疑》谓系蕞固之误，缺疑，不列入。屈子阎以下都是屈巫之族。

为苑守和为令尹时都曾请教过他^①；屈盖以楚臣而出相于秦^②；屈匄（丐）曾为大将军，他和同他一起打仗的裨将军通侯执圭等七十余人，都被秦国掳去^③；屈原本身也做过左徒和三闾大夫，在政治上仍然是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由于《离骚》上有“郑皇考曰伯庸”句，自王逸以下，一般都认为屈原的父亲名叫伯庸。但也有认为伯庸是屈原的远祖的，也有认为伯庸是屈原的曾祖的^④。我觉得伯庸的事迹已不可考，是或不是屈原父亲的名字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没有争论的必要，值得研究的还是屈原的出身问题。

根据上面所举司马迁在《高帝本纪》里的说法，屈氏在公元前198年（汉高祖九年）还是贵族；历来注《楚辞》的人也认为屈原是贵族出身。可是，近来却有人怀疑屈原出身贵族的说法，我想这问题还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

首先，我们从“王族三姓”的设官管教看：

设官管教，与一般的教育情况不同，是统治主为了把持和巩

① 屈宜臼说韩昭侯作高门事见《史记·韩世家》。劝吴起事见《说苑·指武编》。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汉许慎说：“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说苑·权谋》篇记此事作屈宜咎。又《姓觚》引《千家姓》云：“临海族，《史记》韩有屈宜臼。”

② 见《战国策·秦策》二。

③ 见《史记·楚世家》、《张仪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

④ 吉城（见陈进宦《楚辞拾遗》引）、王闳运《楚辞释》，闻一多《离骚解诂》和饶宗颐《伯庸考》都认为伯庸是屈原的远祖。这主要是依据刘向《九欢逢纷》篇有“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的说法。陈进宦《楚辞拾遗》据《祭法》认为伯庸是屈原的曾祖。

固统治权、使统治权掌握在自己人手里的特有的措施。因此，这种机构不一定要设立，如果设立了这种机构，其管教的对象必然是与统治主有比较亲密的关系的子弟。就春秋战国的历史事实看，“楚之同姓”是很多的，如斗氏、蘧（茆）氏、白氏、成氏、潘氏、班氏、孙氏、伍氏、包氏、若敖氏、伯比氏等等，都是半姓，楚之公族^①。有些虽然在楚怀王时已经分化或没落了，如蘧氏、若敖氏等；有些在当时乃至后来都是大族，如潘氏、伍氏等；有些分明在楚怀王时还有人担任大夫的官职，如伯比仲华等。“楚之同姓”既然这么多，为什么当时只设置三闾大夫掌王族昭、屈、景三氏呢？^②这就说明了这三氏在当时是最突出的公族，和楚王本族熊氏有密切的关系，才值得楚王这么重视。公族固然不完全可以保持贵族的地位，贵族也不完全出于公族，但像这样在许多公族中最为突出、获得王室重视的公族，就应该还是贵族的地位。

也许有人以为我这说法太含糊，屈氏和昭、景二氏应当分别看待，屈氏中的屈原和其他人物又当分别看待。这是对的。屈氏虽极盛于春秋，但在战国时代，尤其是自楚宣王时昭奚恤为相和景舍为大司马以后^③，昭、景二氏在政治上活动的人物很多，权

① 均见郑樵《通志氏族略》。班固《汉书叙传》自言班氏所自出。王引之《经义述闻》虽否定其说，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现仍从班说，把班氏列入“楚之同姓”。

② 三闾指昭、屈、景三氏，自王逸以下，一般都这么看法。钱穆《楚辞地名考》中《释三闾大夫》，据《氏族略》以三闾为邑名，不确。饶宗颐《三闾辨》已加以驳正。

③ 见《战国策·楚策》一、《渚宫旧事》三、《通鉴》二。

势很大^①，屈氏的力量已比不上昭、景二氏。这是贵族内部矛盾斗争的问题。贵族内部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有斗争（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有斗争，自然就有较得势的，有较失势的，在力量对比上就不能无差别。可是，凡是参加贵族内部斗争阵营的人，应该是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不能认为力量较差的就失却了他的贵族的身份和地位。

其次，就屈原做三闾大夫这个官职来看。

三闾大夫这名称，最初见于《渔父》里。从《渔父》问屈原“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这种语气看，这是一个相当高贵（不等于显赫）的官职。三闾大夫这一官职，是楚国当时特别设置的，楚国以外的国家都没有，就是楚国本国里在这以前和以后也没有看到。解释三闾大夫的职守的，始见于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序》——“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土。”照这段话看来，这是一个负责管教同姓宗亲（昭、屈、景）、贵族子弟的官职。管教得好坏，对这些人将来掌握统治权，处理国家大事，有决定性的作用，照理，是不会交给一个贵族的“破落户”即没落贵族出身的人来负责的。这类的官职，虽谈不上有多大的权势，在地位上应该是很高贵的。做这类官的人，我想，不仅要有才能，还必须讲究出身。那些专凭三寸不烂之舌的纵横游说之士，即使有很大的本领，可以做大官乃至封爵拜相，但要担任这样的职务，怕也不会获得王室的允许的。

^① 昭氏人物，如昭奚恤、昭鼠、昭常、昭过、昭应、昭翦、昭鱼（《史记魏世家》：“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索隐》：“昭鱼，昭奚恤也。”未知是否，现并列出）、昭献、昭忌、昭盖、昭阳、昭睢等，景氏人物，如景舍、景翠、景阳、景缺、景鲤等，都是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的人物。

三闾大夫所管教的具体内容究竟怎样？要具备哪些条件的人才配做这种官？王逸说得很简略，我们不易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但从另一个时候的某些和它类似的情况——春秋时代晋国的公族大夫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来。宋程公说《春秋分记·公族大夫》条有这样的话：

宣（公）二年传：自骊姬之乱，晋无公族。成公即位，宦卿之适（嫡）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亦治余子之政），其庶子为公行^①。赵盾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杜预注：皆官名。又成（公）十八年传：荀家、荀会、栾黶、韩无忌皆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恭）俭孝弟。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凡卿之适（嫡）子属焉。《晋语》云：栾伯请公族（大夫）。悼公曰：荀家惇惠，荀会文敏，黶也果敢，无忌慎靖^②，使之（兹）四人者为之。膏粱之性难正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导）之，果敢者念（韦昭注：告也，告得失也）之，慎靖者修之。使兹四人者为公族大夫，是公族（大夫）专主教诲也。襄（公）十六年传：晋平公使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说者谓奚去中军尉而为公族（大夫），去剧职，就闲官。

这里所说的是一般公族大夫的职守，管教的范围广些，且不限于某些姓氏的子弟，和掌“王族三姓”的三闾大夫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未必完全相同。但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当时的君主对

① 《左传》杜预注：“余子，嫡子之母弟也；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

② 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监本、毛本慎作镇，下同。按明道本《国语》作镇静。韦昭注：镇、重也，静、安也。”涵芬楼影印明金李刊本《国语》，荀会作荀衿，慎靖作镇静。

于做这类官的人选是多么的慎重！就晋国的公族大夫说，所选出的人物都是姬姓，晋之公族，其中如栾氏、荀氏、祁氏的来历都是以邑为氏的^①，这和屈氏的来历也正相吻合（虽然这以邑为氏不是必要的条件）。如果结合得更紧密些，把“宗正”或“宗令”之类来看待三闾大夫，那就更要讲究出身问题了。当然，一切的说明，都应该“从客观的事实出发，从具体的情况出发”，三闾大夫不等同于公族大夫^②，屈原并不就是荀家、祁奚等，彼此的地点、时间也不同，这样的说明，未必切合实际。不过，我个人的意见，衡量三闾大夫的标准，是应该比衡量公族大夫的标准更加严格的。如果把衡量三闾大夫的标准来衡量公族大夫，就可能把标准提得太高；现在把衡量公族大夫的标准来衡量三闾大夫，那还是较低的标准，是可以作为说明屈原出身的一种论据的。

此外，屈原最伟大的诗篇——《离骚》里自传的部分很多，从他开始介绍自己的远祖和郑重地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来源起，以后所有涉及自己身份的地方，都以很高贵的姿态出现，这也足以证明他的出身是贵族。

至于《惜诵》里的“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虽然也有“贱贫”的字样，但我们从和它相连属的上文“一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亲君而无他兮，有招祸之道也”看，从和它相连属的下文“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看，又从通篇的主要内容——通过具体的事状来表现亲近既然见谗、远离又觉难堪的极端矛盾的心情看，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处理国家

① 见《通志氏族略》。

② 全祖望认为三闾大夫“盖公族大夫之职。”怕也是一种类似的说法。如果要找出一种官职和三闾大夫等同的来说明三闾大夫的职守，那除王逸所说的以外，根本就无从说明。

大事和楚王的亲疏远近是有关系的，和自己的阶级出身，特别是和阶级出身的贫富方面，就很难说有关系。我认为这里的“忽忘身之贱贫”的意义，是说忽然忘记了自己曾陷于贱贫的境地，和上文的“不可保”、“招祸”，下文的“迷不知宠之门”意思是一贯的；和《涉江》里的“固将愁苦而终穷”、“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语意相近。郭沫若先生在他所著的《屈原的身世及其作品》里，引此文说“屈原是自称为贱贫的人”，又在《屈原赋今译》的《后记》里，说“决不是自甘‘贱贫’的屈原的身份所宜有”。说屈原“自称”或“自甘”贱贫是对的，不能认为这就是屈原出身贱贫的证据。

由于屈原是参加贵族内部斗争的一员，由于屈氏虽是“楚之疆宗”，但在情势上已处于下降期，不断感到昭、景二氏的压力，又由于当时掌握大权的昭、景二氏中人的骄恣腐化，无政治远见，胡作非为，陷楚国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因而更易加强屈原的斗争性，更易促使屈原成为贵族阶级中一个最进步的分子，接受当时的先进思想而主张变法。我们从屈原的作品中看他特别愤恨那班排斥异己、包围楚王和勾搭间谍的贵族当权派，特别关心楚怀王，特别关心楚国的人民和楚国的前途，这和昭、景、屈三氏消长的客观现实，和屈原出身阶级的主观优越感，都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因此，照我的看法，司马迁对屈氏和屈原出身的说明虽很简单但却是最正确的——屈原是“楚之同姓”，屈氏到汉高祖九年还是“贵族”。

屈原的家世和出身可考见的大约如此。

最后，有一点在这里要附带一提的，就是关于女媭的问题。王逸注《离骚》里的“女媭”说：“屈原姊也。”后来因附会秭归县有女媭庙、捣衣石。这是不可信的。洪兴祖补注已引贾侍中说“楚人谓女曰媭”。《汉书广陵厉王胥传》：“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颜师古注：“女须者巫之名也。”我们看《离骚》

里所提出的，如灵氛、巫咸、女嬃之属，正系同一类型的人物，女巫之说可信，不能认为屈原的姊姊^①。

^① 周拱辰《离骚拾细》：“女嬃之申申，以女嬃为原姊旧矣。按《归妹》三爻曰‘归妹以须。’注：‘须女之贱者。’似因其不爱原以大道，徒为申申之詈而贱称之，未必原姊也。杂说，秭归乡有女须庙，捣衣石犹存，大属附会。后人因搀入《水经注》，更可笑。按《汉书广陵王胥传》：‘胥迎李巫女须，使下神祝诅。’则须乃女巫之称，与灵氛之詹卜，同一流人，以为原姊，缪矣。”（卷之十）郭沫若先生也反对女嬃是屈原的姊或妹的说法，他认为女嬃可以解为屈原的侍女，又认为解作天上的星名“须女”也可通。（见《历史人物》，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重印本14页）

四 生 平

屈原本来名屈平，“原”是他的表字^①。《离骚》里“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有人认为是解释他的名字的意义^②，也有人认为他的小名叫“正则”，小字叫“灵均”^③。

屈原的出生年月日，他自己在《离骚》曾说过：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这是最可靠的记载。可是，由于历法推算的不同，就引起了不少

① 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② 见洪兴祖《楚辞补注》和朱熹《楚辞集注》。

③ 见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屈原的化名。（见《历史人物》，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重印本第11页）

的争论^①。除个别的说法距离的时间较远外，一般都集中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到楚威王元年（公元前 343 年至 339 年）这四年之间提出不同的意见。究竟哪一说最对，虽还不易下个结论，但问题总算不大，在整个屈原时代的活动中，不至于发生很大的影响。现在姑从浦江清先生的考定，在楚威王元年，即公元前 339 年。

屈原究竟是那里人？也有多种的说法：一说在秭归县北的乐

^① 邹汉勋《屈子生卒年月日考》，用殷历推算，定为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343 年）戊寅正月二十一日。陈瑒《屈子生卒年月考》，用周历推算，定为同年三月二十二日。刘师培《古历管窥》用夏历推算，结果和邹汉勋说完全相同。曹耀湘《屈子编年》定为楚宣王十五年（公元前 355 年）丙寅。游国恩《楚辞概论·屈原传略》定为楚宣王二十七年正月寅日生，《屈原·诗人的降生》还是戊寅年的主张。郭沫若《屈原身世及其作品》据《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岁在涪滩”句，再用太岁超辰法推算，定为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 340 年）正月初七日。林庚《屈原生卒年考》定为楚威王五年（公元前 335 年）正月初七日。最近浦江清在《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一文中考定是楚威王元年（公元前 339 年）正月十四日。

平里^①；一说在巴陵县（今湖南岳阳县）东太平寺^②；一说在湘阴县北玉笥山^③；一说在归州（今湖北秭归县）三间乡^④；一说在归州东屈沱^⑤；一说在夔州（今四川奉节县）^⑥。郭沫若、游国恩两先生均从秭归之说^⑦。浦江清先生另有新的意见，认为屈

① 《艺文类聚·居处部》引庾仲雍《荆州记》：“秭归县有屈原田宅，女须庙，捣衣石犹存。”《后汉书·郡国志》：“秭归本归国。”李贤注：“杜预曰：‘夔国。’《荆州记》曰：‘县北一百里，有屈平故宅，方七顷，累石为屋基。今其地名乐平，宅东北六十里有女须庙。’”酈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崧（山松）《宜都山川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又引袁山崧说：“（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靡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嬃庙，捣衣石犹存。”王茂元《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按《史记》本传及《图经》，先生秭归人也。……元和十五年，余刺建平之载（再）岁也，考验图籍，则州之东偏十里而近，先生旧宅之址存焉。”

② 见《一统志》。

③ 周圣楷《楚宝文苑部》引甄烈《湘中记》：“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之放，栖于此山而作《九歌》焉。”又见《湘阴县志》。

④ 见《楚胜迹志》。

⑤ 见《归州志》。

⑥ 见杜甫《最能行》。

⑦ 见郭沫若《屈原研究·屈原身世及其作品》、游国恩《屈原·诗人的降生》。

原的出生地点是楚国的都城——郢。我觉得上面几种说法虽不同，如果从屈原曾住过的地方说，可能都是有根据的，但说到他原来的老家，还是秭归一说比较可靠。

关于屈原幼年的生活，联系到他的出身是贵族子弟来看，应该是相当舒适的。他的作品里，也充分表露着贵族的气氛。他在《涉江》里曾说：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①之崔嵬，被明月（珠）兮珮宝璐（玉）。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

这里的“长铗”、“切云”、“明月”、“宝璐”都是贵族的服饰。他在《离骚》中也有同样的说法：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

这说明了佩长剑，戴高冠，是他惯常的装束。他的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
的描写，固然也象征着自己品质的芳洁，但这么华丽的形象，和带着明珠和美玉配合起来看，即使是他联想出来的假象，也是他喜欢穿着漂亮的服色的标志。

他幼年在哪个地方受过教育，教他的老师姓甚名谁，现在无从考见。但他有好的资质，好的教养，却可以从他的作品里看出来：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怀质抱情，独无匹兮。（《怀沙》）

这虽是后来所写的东西，但所谓“美”，所谓“质”，还可以从他的资质去理解的。他在《橘颂》里有一段赞美橘树的话：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缜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① 是当时一种高帽子的名称。

这也是自己的写照。里面“纷纭宜修，媠而不丑”的说法，尤其着重指出本质上的特征。他在作品中运用了许多历史上的故事传说、神话和他在文学语言上的卓越的成就，都可以说明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很好的教养。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里说他“博闻强志”，是取得楚怀王信任的原因之一。这也说明他在未任职以前已经有了很丰富的文化知识。

在屈原自己的作品中没有具体写出自己擅长什么，只有上面所举《离骚》里“又重之以修能”句的“修能”两字，是说明自己有好的品质并加上有办事的“长才”。究竟是哪些方面的“长才”呢？这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才明确说出来，即是：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这里面就包括了三种“长才”：第一是懂得的东西很多，记忆力强；第二是了解古今的政治情况并且能够掌握怎么就治怎样就乱的政治原则；第三是长于文学修辞和交际语言。以一个贵族出身的人，又具备了这样的杰出的本领，因此，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官——左徒。

屈原在任左徒以前，有没有做过其他什么官，史无明文，无从考见。可考见的从他任左徒起。

左徒究竟是一个什么等级的官职呢？自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左徒为“盖今在左右拾遗之类”以后，一般都不很重视它。其实唐代的左右拾遗，不过“从八品上阶”的官职^①，地

^① 《新唐书》四十七《百官志》中《门下省》条：“左补阙六人，从七品上；左拾遗六人，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注：“武后垂拱元年置补阙、拾遗各二员。”又《中书省》条：“右散骑常侍二人，右谏议大夫四人，右补阙六人，右拾遗六人，掌如‘门下省’。”

位是低的，虽然也可以接近皇帝，只是做些拾遗补缺的工作而已，不能起多大作用的。张守节把左徒比做这类的官，可能只就屈原得接近楚王这一小点看，而忽略了他在当时政治上所担负的重大的任务和这一官职的重要的位置。显而易见，这是不妥当的。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再考查楚国令尹的职权和要什么等级的官职才有资格可以升任令尹^①，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因此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里就很明确地指出屈原任左徒时的具体任务：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接着更提出楚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的事情。屈原一方面参议国家大事，发号施令；一方面接待宾客，应付外交事件；同时还草拟宪令，具体掌握国家的政策方针。这样，可以说在当时楚国的内政外交上，他都是一个主要的负责人了。

屈原任左徒的期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屈原的主张并联系楚国当时的事实来加以考察，可能在楚怀王十年（公元前319年）至十六年（公元前313年）之间。

① 左徒是楚国特有的官职，位置很高，仅次于令尹。楚国的令尹，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等于后来的宰相的职位。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春申君列传》：“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证实。考楚国的令尹，除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如楚文王任用彭仲爽、楚威王任用高固之类以外，一般地说，是由司马、莫敖这一类的尊官升任起来的，如蘧子冯由司马升为令尹，屈原由莫敖升为令尹之类。因为令尹的好坏，对国家的兴衰存亡有很大的关系。令尹既然是楚国最高的官职，而左徒是可以升任令尹的，是仅次于令尹的官职，屈原在当时做了左徒，这就可见他的政治地位了。

这时候最突出的事件，外交方面是楚怀王为纵长击秦和楚、齐的联盟，内政方面是屈原的起草宪令和上官大夫的夺稿。

六国（从《楚世家》，《楚策》、《六国年表》均作五国）击秦事在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怀王为纵长。其时是齐王六年。考《齐世家》齐王四年（公元前320年）“迎妇于秦”（《年表》同）。这说明在击秦事件发生不久前，齐和秦还是交好的。为什么楚怀王为纵长时齐就会参加击秦呢？即使这次击秦如《楚策》和《六国表》的记载，齐国没有参加，但是对于在张仪入楚之前，秦欲伐齐，为了楚和齐从亲，有所顾忌，才派张仪入楚破坏楚、齐联盟，则没有不同的记载^①，这是可以肯定是事实。张仪入秦，据《楚世家》所载，是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的事，上距齐迎妇于秦也不过7年的时间。在这7年期间内，齐国由亲秦转而和楚联盟，中间秦打败韩，齐打败赵、魏，两家争霸中原^②，引起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固然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屈原的外交政策，并为实现这一政策而亲自使齐，应该说，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刘向《新序·节士篇》有这样一段记载：

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这里虽然没有说什么时候，但从这里可推定楚、齐联盟的期间，

①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史记》卷四十《楚世家》：“（怀王）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刘向《新序·节士篇》：“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

② 事在于公元前317年，即秦惠王后元八年，齐王七年。

从而看出屈原出任左徒的年限。照当时的历史事实看，齐国自威王、宣王以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楚怀王要为纵长以对付秦国，如果齐国正和秦国交好，这一关是不易通得过的，因为一方面要顾到齐国的威望，一方面也要提防齐国抄后路。我们看司马迁记击秦事说“秦出兵击六国，六国皆引而归，齐独后”^①，隐然还有齐国不甘示弱的表现。所以我认为楚怀王为纵长之先，应打好了楚、齐的外交关系，屈原使齐就可能在这个时候。齐国既参加会盟，进一步便和秦国争长中原，发展的过程也很自然。到了齐国和秦争霸中原，那齐、楚的联盟也就更加巩固了，秦要伐齐，便不能不从破坏楚、齐联盟入手。我们知道，张仪入楚破坏楚、齐联盟的阴谋得遂的时候，就是屈原的联齐政策失败的时候，也即是屈原失却了怀王的信任，已经解除了左徒的职务的时候。那末，在这以前逆数至屈原东使于齐的时候，正是他的外交政策起作用的时候，也就可能是楚怀王任用他为左徒得以掌握外交政策的期间。当然，这期间内，楚国贵族内部还存在着剧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动摇了，张仪乃得入相于楚，否则，屈原是必然要谏怀王不容许他在楚国阴谋活动的。因此，说屈原任左徒在这个期间，并不是说这期间的全部时间都是屈原任左徒的时间，而是指在这个期间之内，可能在怀王十六年，也可能稍前一些时候屈原就已经解了职。这可以从屈原草宪令而上官大夫夺稿这事件来说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

上官大夫与之（指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原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②

① 见《史记·楚世家》。

② 《群书治要》录《史记》“非我”上无“以为”二字。

楚怀王叫屈原草宪令，应该是屈原还任左徒的时候，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在于：屈原做着左徒那样的高官，受了怀王这样隆重的委托，上官大夫为什么敢于要夺他的稿子看？怀王为什么受上官大夫一挑拨，就改变了他和屈原的关系，疏远了屈原？这里面可能有复杂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怕还是在于宪令的本身。上面说过，屈原是主张变法的，变法的第一步，就是限制旧贵族的特权，这是对旧贵族很不利的，宪令当然是把一些损害旧贵族的利益的最具体的办法列上去的。上官大夫是属于旧贵族系统的人物，平日就是和屈原处于对抗的地位的，当怀王信任屈原、他还可以周旋的时候，他就只有“心害其能”，但当屈原和楚怀王密谋变法的计划要明文规定、著为法令的时候，这是旧贵族生死的关头，他就不能不扯开面幕，挺身而出，蛮干一下了。他明知道是国家的机密，屈原必不肯给他看；他也明知楚怀王主持这机密是不容许屈原给外人知道的。因此，他夺稿不遂，谗譖屈原时，首先就针对怀王最忌惮别人知道的心理说“屈原为令，众莫不知”，来引起怀王的愤怒；进一步更针对怀王的“好胜”的性格说屈原自伐其功，蔑视怀王，来彻底摧毁怀王的“自尊心”。这么一来，怀王就怒不可遏了。在怀王怒不可遏的情况之下，上官大夫再加油加炭，煽动他的怒火，使他从信任屈原转而疏远屈原，这是十分可能的。上官大夫这种举动和说话，在他所属的旧贵族集团和屈原斗争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他们阴谋破坏变法主张的一种很毒辣的做法，并不是偶然碰上的一回事。司马迁记叙这件事情，虽然用很简短的篇幅，我们如果仔细研究起来，那还是可以说明问题的。这一次的斗争，对屈原一生在政治上的成功和失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屈原在作品中念念不忘。《惜往日》说：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媿）。秘密事之载心

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庞（老实忠诚）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激（澄）其然否。

《抽思》说：

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它志。

《离骚》说：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讟怒。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这些句子，都是那一事变的回忆。从这些句子中，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屈原的变法，是获得楚怀王的同意，而且是在秘密中进行的；第二、变法的目的，是在于使国家富强；第三、这是上代的优良传统，已经有成效可睹。变法的详细情形，虽没有明白说出，我们就吴起、商鞅变法的先例看，就楚威王意图变法而受阻于昭釐、屈原这次主张变法而遭到旧贵族的反击看，可知变法首先是要限制旧贵族的特权，反对他们的结党营私、胡作非为、贪污堕落、祸国殃民的恶劣作风和腐烂生活，这是可以肯定的。屈原在作品中对那班旧贵族的丑恶形象也不断加以揭露，表示着不可容忍的态度。例如：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冯不厌乎求索。（同上）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同上）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

鼯佳冶之芬芳兮，鼯母姁而自好。（《惜往日》）

诸如此类，都应该是屈原所要首先改革的对象。如果这类现象还强固地存在着，那新政是无法推行的。可是，对当时的楚国来说，要清除这种现象还有很大的困难，这层不但屈原估计到，我想，楚怀王也应该是明白的。因此，不能不采取特别慎审的态度来对待这问题，要“秘密”，要“不泄”。

屈原任左徒的期间，曾和楚怀王密谋变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变法的主张有没有认真执行过呢？因为材料太缺乏了，我们无从判定。如果单就上面所举的屈原的诗句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那一段文字来考察，恐怕还未认真执行过，至少变法的明令还未曾公布。因为如果认为执行过变法，就无所谓“秘密”，也就不怕人家泄漏，“宪令”也就不是什么很神秘的东西，不必演出“夺稿”这一场怪剧了。可是，《惜往日》里分明有“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这些说法，又将怎样解释呢？照我粗浅的看法，这几句话，是说明他变法的来源和依据，是晓喻臣民（“受命诏以昭时”）时必须着重提出的要点，或者是变法时必须明确的方向，是怀王和屈原密商后，怀王吩咐屈原应该这样做的，并不是说当时实行变法后已有的效果。“奉先功以照下”几句，紧接在“受命诏以昭时”的下面，不会是指楚怀王的事，可能是指楚悼王的事。从下面“秘密事之载心”看，尤其明显可以看出这是未曾认真执行而藏在心里的事件。当然，所谓“未曾认真执行”，是就整套的变法主张说，在明令宣布“宪令”之先，应该是有计划、有步骤，逐渐准备好一切条件的。在准备这些条件的过程中，必然有个明显的倾向，必然有许多不利于旧贵族集团的措施，以致引起旧贵族集团的不满，或明或暗地和他作斗争。由于楚怀王信任屈原，而整套的“宪令”还没有草拟，内部的斗争虽很尖锐，却还未达到表象化，不至于爆发起来。但那班旧贵族集团和屈原的矛盾斗争的因素是较长的时间存在着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变法的“宪令”还未宣布而屈原就遭到敌党的反击，解除了左徒的职务，从而就断定屈原在左徒任内完全没有变法的措施。

楚怀王叫屈原起草宪令时，屈原还任左徒的官职；上官大夫夺稿不遂后，屈原就解除左徒的官职。这事实很明显，因而解职

的时间和夺稿的时间也必然是接近的。但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件，仍未有明确的记载可以依据。照我的推测，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能和张仪入楚距离不远，即在楚怀王十六年或稍前些时。理由是：楚国旧贵族集团中和屈原对抗的主要人物如昭睢、景鲤都是和秦有联系的。景鲤在怀王初年曾使秦，为楚王所甚爱^①；昭睢在张仪相秦时曾互通声气，密切勾结^②。在屈原任左徒的期间，所以不能使秦、楚交好者，只因屈原得怀王的信任并坚持联齐的政策缘故。一旦屈原见疏，他们胜利，他们就进行和秦的活动，在情势上是很可能的；而这种活动，就给张仪入楚准备了很好的条件。如果屈原任左徒，张仪要入楚进行破坏楚、齐的联盟，那是断然不能做到的。因此，上官大夫的夺稿和张仪的入楚，事件性质虽然不同，打击的对象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要搞坏屈原和怀王的关系，使屈原的政策无实现的可能。这么一来，屈原的内外敌人——楚国的旧贵族集团和秦国就联成一气，先夺稿诬陷屈原，使变法主张无从实现；再使张仪相楚，欺骗怀王，以遂其破坏楚、齐联盟的阴谋。屈原任左徒时做了两件有关楚国盛衰存亡的大事：在内政上主张变法；在外交上主张联齐。而这两种主张，前者主要虽是打击楚国的旧贵族集团，而秦国因此失却勾结的对象，同时感到楚国新兴力量的高涨，对于它不利（秦国应该有这种认识的）；后者主要虽是抵抗秦国的侵略，而楚国的旧贵族集团为要接受秦国的贿赂和其他的好处，也曾感到于己不便。这么一来，由于屈原在内政上和外交上的主张是紧密联系着的缘故，因此和他对抗的国内的和国外的敌人也紧密地联系着，就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变法是一种进步思想的表现，是一种政治改良运动。它是代

① 见《战国策·秦策》四。

② 见《战国策·秦策》一。

表新兴力量的一种标志。在战国时代，旧贵族领主已腐朽不堪，走向没落，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使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这是很有必要的。变法运动，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政治改良运动。屈原虽然有其更伟大的政治思想，而这时候的主张变法，实是他企图奠定达成远大政治理想的基石。这基石不奠定，是不可能进一步来完成统一天下的伟大事业的。旧贵族阶级虽然注定了要走向没落的命运，但他们是不甘心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的，不但不甘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他们垂死的挣扎，最后的斗争必然更其疯狂和剧烈。因此，要进行变法，是很不容易的，首先那决定改变政策的人就应该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就应该取得很高的职权作为斗争的武器，才有切实施行的可能；而同意变法的君主，也必然要把很大的政权交给他掌握，使得便宜从事，扫除一切障碍。战国时代那些由于变法而取得显著成绩的国家，其间主张变法的人和同意变法的君主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是毫无例外的。如李悝是魏文侯的相（《汉书·艺文志》）或师（《晋书·刑法志》），吴起是楚悼王的相，商鞅是秦孝公的相，申不害是韩昭侯的相，都是明显的例证。屈原所任的左徒的官职，不等于令尹，不是楚国最高的官职，要他执行必须令尹才办得通的战斗任务，本来就特别困难了，何况楚怀王轻信谗言，“中道回畔”，不能彻底支持他？因此，屈原在内政上最重要同时也是最进步的主张——变法，也就跟他任左徒的命运一样葬送在他的敌党的手里，怀王十六年以后，就再没有实现的可能。余下一个为屈原所坚持也还起过作用的就是他外交上的主张——联齐抗秦的政策。

公元前313年，屈原26岁，秦惠王派张仪到楚国来，一方面勾结楚国的内奸们——和屈原对抗的楚怀王的亲信，也就是属于旧贵族系统的人物，进行更加厉害地谗譖屈原的活动；一方面进行破坏楚、齐的联合防御政策。张仪告诉怀王说：“秦国最憎

恨的是齐国，而楚国现在却和齐国联盟。如果你能够和齐国断绝外交关系，秦王愿把商于（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六百里的地方奉送给你。”^①当时楚国的内奸们都极力赞成，向怀王道贺。但这是骗局，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出的，陈轸就是用吊丧的态度来表示反对的一个人。他说：

秦之所为（以）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

可是，楚怀王是个贪心的人，对陈轸这种意见全不采纳，听信张仪的说话和内奸们的怂恿，立刻和齐绝交。和齐绝交，是屈原最反对的，只因被怀王疏远了，没有参与政事，也就无从提出抗议。

楚怀王既然和齐绝交，就派人到秦国向张仪要那六百里地。张仪称病不出，耽搁了三个月的期间，地不可得。怀王还不知道是受他欺骗，反而责备自己，以为是张仪嫌他和齐绝交不很坚决，又使一个勇士到齐国辱骂齐王，毁掉和约，和秦建立邦交。这个时候，张仪看到一切都做妥贴了，才对楚怀王派来的人交代六里地给他。楚使回国报告怀王。怀王才知道是受骗，气愤极

^① 见《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秦惠王……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悦）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愿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于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

了，就派大将军屈匄（丐）带大兵攻打秦国。秦国也使庶长魏章带兵出击。公元前312年（怀王十七年）春天，秦、楚大战于丹阳（在汉中，今陕西南郑县东），楚兵大败，大将军屈匄和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都被俘虏，士兵损失了八万多人。秦占领汉中，得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怀王越发气愤，更调了全国的军队，再去攻秦，深入到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去。秦、楚两军正在剧战胜负未分的时候，魏国知道楚国空虚，起兵攻袭楚国的后方；齐国恨楚怀王和他绝交，不派兵来救。怀王恐怕国内有失，就赶快把前方的兵调回来，又吃了大亏^①。怀王经过这次损兵折将、丧失土地的经验教训，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上了秦国的大当，便再叫屈原出来，出使到齐国去重修旧好。这大约是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的事情，屈原28岁。

秦国最怕的是楚、齐联盟。秦惠王听到这个消息，就派人到楚国讲和，愿把汉中一半的地方归还楚国。这时候，楚怀王的怒气未消，就对秦使说：“不要什么地方，只要把欺骗我的张仪送来治罪！”张仪是心中有数，他就到楚国来，串通旧贵族集团上官大夫之属，并送了很多财物，通过怀王的宠臣靳尚勾搭怀王的爱姬郑袖。怀王听到张仪来到楚国，就把他囚楚起来，准备杀他。靳尚对怀王说了一些杀张仪对楚国不利的話之后，还对郑袖游说一番：如果不释放张仪，秦王就要把上庸（今湖北竹山县东南）六县的地方和美丽而善歌的爱女赎回张仪，将来就会和

^① 据《史记·楚世家、秦本纪》和《屈原贾生列传》。关于蓝田之役，《屈原贾生列传》说：“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楚世家》说：“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楚兵是否给秦兵打败，不易确断，吃了大亏，那是可以肯定的。

她争宠；如果释放了张仪，和秦交好，将来她的儿子就可以做楚国的太子，继承怀王的王位。这些话打动了郑袖的心，就去劝说怀王释放张仪。怀王果然听信这班坏蛋的话，就轻易地把张仪释放了，并且进一步和秦国交好，约为婚姻。张仪走了不久，屈原恰从齐国回来，得知此事，连忙对怀王说：“为什么不杀掉张仪呢？”怀王后悔，派人追赶张仪，已经来不及了^①。

从此以后，楚国的政权完全落在旧贵族手里，极为混乱，外交上简直没有什么政策，时而联齐，时而亲秦，摇摆不定。（这时屈原可能被怀王安置做一个管教王族子弟的三闾大夫，平时不参与政事，有必要时才召他回来。）自怀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305年至303年）这三年间就完全和秦国交好了；怀王二十四年和秦国互为婚姻^②；二十五年和秦昭王在黄棘（即棘阳，在今河南新野县东北）订立盟约；二十六年使太子横入质于秦。屈原是坚决主张联齐抗秦的，在这种情势之下，当然非常难过。他当时的处境怎样，各书都没有记载，但在他的作品里有些是反映他在这时的情况的。如：

惩热羹而吹𦉳兮（𦉳音赓，是醢酱之类，意思是说受过热羹烫伤的人，看见冷𦉳也要吹一吹），何不变此志也？欲释阶而登天兮，犹有曩之态也。众骇遽以离心兮，又何以为此伴也？同极而异路兮，又何以为此援也？（《惜诵》）

这种借“厉神”的话来责备自己，是叙述在前次斗争失败后，再次斗争更陷于孤主，从前跟他一起的人都骇遽离心的情况。从

① 见《战国策·楚策》二、《史记·楚世家》和《新序》七。

② 《史记·楚世家》作“楚往（秦）迎妇”，《六国表》作“秦来（楚）迎妇”。黄式三《周季编略》：“楚迎妇于秦，秦迎妇于楚。”

这里仿佛可以看出他在这几年内并不是没有谏说怀王，可是没有什么效果。因此，

欲齟齬以干僚兮（要徘徊等待机会向君王陈说），恐重患而离尤（遭受罪咎）。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女（汝）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盖坚志而不忍。背膺鬻（后背和前胸分裂）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同上）

要等待机会发言，怕遭受更大的祸害；要远走高飞，又怕怀王怪责他；要乱跑乱搞，又不忍违背自己一贯的主张：这就使得自己的心情非常悲苦。在这里充分表露出他谏说怀王不被采纳后的矛盾斗争的心理。照我看，这可能是体现这期间的心情的作品。因为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可以谏说的可能性比较大，不会是放逐后的情况；一方面，“君罔谓汝何之”的“君”，应该是指曾一度信任他而较有亲密关系的怀王，不会是指顷襄王。

到怀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02年）有个秦大夫和楚太子决斗，楚太子杀死了他逃回楚国。秦国就趁这个机会在第二年（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与齐、韩、魏联合攻打楚国。怀王派昭睢带领重兵抗敌，命昭睢速击秦军。昭睢按兵不动^①，卒使在前线苦战的唐昧（蔑）将军牺牲了。秦国夺取了楚国的

^① 见《战国策·楚策》二。

重丘（《秦本纪》作方城，在今湖北竹山县东南30里）^①。怀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秦复攻楚，杀楚将军景缺。这时候，怀王才又认识到亲秦的危险性很大，有必要和齐联盟，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和。可是，秦国越来越厉害，第二年（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一方面攻打楚国，取八城；一方面写信给怀王，约他到武关（今陕西商县东185里，《新序》作蓝田）相会，准备骗他到秦国来要胁割地。当时屈原劝怀王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②可是怀王惧怕秦，却听信他的

① 《史记·楚世家》作“重丘”，《秦本纪》作“方城”。《荀子·议兵篇》：“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吕氏春秋·处方篇》：“齐令章子（《周季编略》作匡章）将而与韩魏攻荆（楚），荆令唐蔑将而应之，军相当，六月而不战……夹鬲水而军。章子……因练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杀唐蔑。”按《春秋经传》，如卫·孙蒯田於曹队，饮马于重丘（《左传》襄公十七年）；诸侯同盟于重丘（《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的重丘，都在山东境，这里的重丘，是楚地，当然不是同一个地方。《秦本纪》作“方城”，可能是同地异名。《舆地记胜》：“方城，又名望楚山。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与齐、韩、魏共发兵攻楚方城，秦军登山以望楚国，故名。”《荀子》里的垂沙，《吕氏春秋》里的鬲水，系指唐昧战死的地方。《战国策·楚策》三也有“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数”的记载。

② 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新序·节士篇》。《史记·楚世家》作“昭睢”。司马贞《史记索隐》：“盖二人同谏王，故彼此随录之也。”

最小的儿子子兰和一班亲秦的旧贵族的怂恿^①，竟答应了秦昭王的约会。果然，一到武关，就给秦将扣留起来，把他送到咸阳去，像对待“蕃臣”一样，不和他行相见礼，并要胁他割地。一向妄自尊大的楚怀王，当然是不能忍受这种要胁的，因此就想办法逃到赵国。不料赵国怕秦，不敢收留他。他走投无路，又给秦兵拦住，带回秦国去。过了三年（公元前296年）就死在秦国。当时楚国已立他的儿子熊横继承了王位，是顷襄王三年。怀王最小的儿子子兰已经做了楚国最高的官职——令尹。

楚怀王死于秦，是楚国头等重大的事情，当时山东各国对秦国这种行为也很为不满，这就激动了楚国人民的公愤，都怨恨子兰和亲秦派不该劝怀王赴秦约到武关去。这种心情，在屈原当然表现得更突出。子兰等已无法遏止楚国人民的愤怒，向来又和屈原死对头，因而就把恼羞成怒的一股大气都向屈原发泄，并促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跟前专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听信他们的说话，也恼怒屈原，“迁”他到别的地方去。这里“迁”的情况，史无明文。后人多认为这就是屈原被“放逐”。郭沫若先生根据《楚世家》认为“他的遭放逐应该在襄王七年或其后的二一年中，楚怀王被秦人诈骗了去，囚死了，是在襄王三年。其后三年之间秦楚断绝了关系。到襄王六年秦将白起伐韩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秦人乘胜来威胁楚国，要与楚国决一雌雄，襄王受不过威胁又才和秦人讲和，到第二年更做了秦王的女婿。屈原始终是主张绝秦的人，他在生涯中所受的彻底的打击，就应该在这前后

^① 《史记·楚世家》、《屈原贾生列传》均说是子兰劝怀王赴秦约。《新序·节士篇》：“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怀王遂会。”

的几年内。”^① 郭先生从秦楚的关系来说明屈原的遭遇，这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但也不能忽略他和敌党们的尖锐斗争和顷襄王继位后的新环境。我觉得自怀王死后，屈原敌对方面对屈原的迫害，是比怀王时候更厉害的。因为楚怀王毕竟是信任过屈原共同密谋变法的人；在屈原卸了左徒之后，又曾再起用他出使齐国；即在不给他参预内政或外交时，也还给他一个闲官——三闾大夫做^②，管教“王族三姓”（昭、屈、景）的子弟；这时候，旧贵族尽管谗譖屈原，也应该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我不同意在怀王时屈原被放逐的看法）。到了顷襄王时情势就不同了：子兰已为令尹，昭、景二氏继续专政，旧贵族的势焰更张。顷襄王本来就是和他们一起的人，楚怀王入秦后，又加深了两重关系：第一，当时顷襄王是太子，还在齐国，有人主张在郢都的子兰继承王位，子兰并没有表示争夺王位的野心，对顷襄王来说，应该算是有恩情的；第二，昭睢亲自到齐国把楚太子（即顷襄王）弄回来继承王位，齐国要求放还楚太子的报酬时，昭常、景鲤又都参与这件事，有功劳。这样，顷襄王和他们的关系就必然愈加密切

① 郭沫若：《历史人物》，新文艺出版社 1953 年版，69 页。

② 三闾大夫是一个负责管教楚王的同姓宗亲——昭、屈、景三氏的子弟的官职，是不参预国家政事的。性质略同春秋时代晋国的公族大夫。《左传》襄公十六年，晋平公使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杜预注：“祁奚去中军尉为公族大夫，去剧职，就闲官。”三闾大夫虽然是一个高贵的官职，虽然管教出来的子弟，对将来掌握统治政权、处理国家大事，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就这一官职的本身看，还是一个“闲官”。

起来^①。从另一方面看，怀王囚死于秦，举国的人在非常痛恨子兰一派系的人物的同时，对屈原劝阻怀王必然表示特别好感；而屈原呢，由于听到怀王之死极端悲愤，也可能对一班敌党作尤其强烈的斗争（至少也表现在言论上）。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许多年来子兰、昭睢等和屈原之间的政治斗争就会达到更加深刻化和尖锐化的境地，子兰、昭睢等就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进一步彻底打击屈原，把他放逐出去。有些事实也可以帮助说明这一点，我们看，到齐国接太子横回来的任务，轮不到屈原；即使在举国怨恨秦国、楚秦断绝关系的时候，也并没有听到什么联齐抗秦的声响。可见一贯主张联齐抗秦的屈原，在新的环境中已完全起不了作用了，已完全被看成是一个眼中钉了，并不像在怀王的时候，怀王有时觉得有联齐的必要，只要和秦绝交时就会想起他乃至起用他。楚怀王囚死于秦时，屈原已经是43岁了。

屈原的政治生活到这时就完全结束了，离开亲爱的楚都而走向江南去了。（被放逐前，可能还有一个期间在汉北。）那时江南的地方很广，至少包括湖北南部和湖南一个大部分的地方。他在江南流落了相当长久的时间。他带着悲郁沉痛的心情，走着曲折艰苦的路程，看到人民极其痛苦的生活，回想那奸党误国的情况，面对着祖国非常危险的前途，真难堪极了，他不能不倾吐出来。因此，他在这时期写了许多不朽的诗篇。

他经过的地方，从他的作品中大略可以看到。写的最明显的是《涉江》和《哀郢》两篇。《涉江》说：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顛（音哀，叹声）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鸱船余上沅兮，齐吴榜（桨、楫）而击汰（水波）。……朝发枉

^① 见《战国策·齐策》三、《楚策》二和《史记·楚世家》。参照黄式三《周季编略》卷八上。

躡（一作枉渚，疑即汪水，源出湖南常德县）兮，夕宿辰阳。
……入溁浦余颺颺兮，迷不知吾所知。

从这里所记的地点来看他的行程，是过江后先到鄂渚（今湖北武昌县境）。再行了一段陆路^①，然后溯沅水，到辰阳（今湖南辰溪县西）。更由辰阳向东行，入溁浦（今湖南有溁浦县）。这条路线，是自东北向西南走的。《哀郢》说：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发郢都而去閻兮，惴荒忽其焉极！……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这里所记的行程，是由郢都沿着水路向东走的。出郢都后首先过夏首^②，回顾龙门就看不见了。龙门就是郢城的东门^③。由夏首再入洞庭口走下长江。这时背着夏浦而哀念郢都，便一天远似一天了。

屈原放逐后，一次自东北向西南走，一次自西向东走，我们自《涉江》和《哀郢》两篇可以看得相当清楚。问题在这两次行程，哪一次在先呢？各人的看法不同。我个人的看法，似乎《涉江》所说的在先，《哀郢》所说的在后。《涉江》说：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

① “邸余车兮方林”的“方林”，旧注是地名。从上句“步余马兮山皋”看，这“方林”和“山皋”对称，恐系广阔的山林的通称（方字有广字的意义），不是专指地名。

② 《汉书·地理志》南郡华容注：“夏水首受江，东入沔行五百里。”王逸注：“夏首，夏水口也。”在今湖北江陵县东南。

③ 洪兴祖《补注》“《水经》云：龙门即郢城之东门。”又伍端休《江陵记》云：“南关二（原作三）门，其一名龙门。”

将愁苦而终穷。……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绝不犹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照这段说话看，情意并不很激切，屈原到了溆浦以后，好像是不愿意再走的样子，这离自杀的期间，可能是较远些。《哀郢》里所表现的情意就很激切了，一开首就是“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以后如“哀见君而不再得！”“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直至“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等，对国家、人民和自身都刻志着无限的悲痛，很可能是国都沦陷，痛不欲生的时候写的。郢都沦陷是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他的自杀是在郢都东南方的汨罗江。王夫之认为他自杀是在襄王二十一年郢都为秦将白起所据的时候^①，我们如果同意王氏这种看法，写《涉江》就应该在写《哀郢》之先。因为在顷襄王二十一年的“仲春”向东走，接着“滔滔孟夏”时写《怀沙》（怀长沙），再过些时，就投入汨罗江，时间地点都比较衔接得到。如果既然同意王氏的看法，肯定《哀郢》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写的，又认为写《涉江》是在写《哀郢》之后，那路程未免太曲折了。他既然仓皇东走了，干吗又要走向西南去？时间也不很衔接，《哀郢》所记是“仲春”，而《涉江》所记已是“秋冬”，到了“《怀沙》”又是“孟夏”，那就不是同一年的事了。就当时的情势说，秦国攻打楚国，是自西向东进兵的，郢都陷落，楚国君臣都仓皇向东出走，屈原既然东走了，又折向西南，也很难理解。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涉江》后于《哀郢》时，应当像戴震的看法，首先肯定《哀郢》是在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怀王入秦不返，秦发兵攻打楚国，“取析十五城而去”时写的^②。这种看法，当

① 见王夫之《楚辞通释》。

② 见戴震《屈原·赋音义》“东迁”注。

然也可以成立，那就是把《哀郢》里面的“哀见君而不再得”的“君”字看成是楚怀王；把里面的“至今九年而不复”的“九年”照实数计算；把里面的“冀一反之何时”的“一反”解作等待楚王复用他。他这些句子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的：“君”固然不一定是专指怀王；“九年”也可以是指很长的时间；“一反”在“曼目流观”之后，“鸟飞反故乡，狐死必首丘”之前，解作不得回返郢都似乎更为妥帖。因此，我们从《哀郢》一篇总的表现看，还是同意王夫之的看法，即是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写的。

照我初步的看法，《涉江》里所记的是屈原放逐时的行程。据《涉江》里的描写，溁浦一带是很荒凉的：“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齋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正是“逐客”居处的地方。这在当时是属于楚国的黔中郡，是楚国西面的边境，和秦国的占领地蜀国相毗邻。屈原被放逐到这个地方来，虽然也一度勉抑自己的雄心，说“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同时还起了达观的念头，说“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想要在这里住下去。可是，当那虎狼之秦正在侵略楚国的时候，这和秦国毗邻的地方，不用说，是要受到秦国的威胁的，是不容许一个楚国的爱国老臣安定住下去的，有许多事情也可能使屈原报国的雄心敛抑不住，于是他就离开溁浦，再向东北走，想找一个离故乡不远比较安定的地方留下（这是一段空白，但空白的的时间可能是很短）。不料喘息未定，在顷襄王二十一年春，秦将白起带领了大兵攻陷楚国的京城——郢都，取洞庭、五湖、江南等地，连楚王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县）的祖坟都给挖掘烧毁掉，楚国君

臣仓皇出走，东北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①。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他眼看到祖国的危机日逼，人民的苦难日深，连自己也有做敌国的俘虏的可能，他悲痛极了，再也不能设想有什么地方可以宁居了。因此在“仲春”的时候就被迫向东走，“遵江夏以流亡”；到了“孟夏”，就再向长沙进发；终于在端节前后，走到长沙东边的汨罗江，投入江中自杀。照这样的一个生活过程看，应该是《涉江》先写，次《哀郢》，次《怀沙》。至于“不毕辞以赴渊”的《惜往日》，当然是屈原最后之作。

屈原生于楚威王元年，死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39年至278年），共61岁^②。相传屈原是在五月五日（夏历）投汨

① 见《史记·秦本纪》、《楚世家》和《韩非子·初见秦篇》。

② 郭沫若（《屈原研究》）、郑振铎（《屈原传》，见《新建设》1953年第6期）、文怀沙（《屈原集前言》，见《新建设》1953年第6期，又见《屈原离骚今译代序》）等主张屈原在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自杀；游国恩（《屈原》）主张在顷襄王二十二年，孙作云（《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见《历史教学》1954年第1期）主张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前后；浦江清（《屈原》，见《祖国十二诗人》）主张在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主张在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陆侃如（《屈原的生平》，见《屈原与宋玉》）主张在顷襄王十年以前（公元前290年左右）。

罗江自杀的^①，人民就在这一天划龙船和做粽子纪念他，二千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纪念他。

屈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① 屈原死日的传说不一：有的说是在三月三日，见王绩《三月三日赋》及沈齋期《独坐欢州》诗（《旧唐书·敬宗纪》只说三月）；有的说是在五月望（十五）日，见《隋书·地理志》；有的说是在九日，见《旧唐书·穆宗纪》；更有的说是在元夕，见文天祥《元夕》诗。而流传最普遍的是《荆楚岁时记》及《续齐谐记》等的五月五日的说法。

五 思 想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起着一个很大的变革的时代。它已由青铜器时代进到铁器时代。铁制的工具已广泛使用，人口大增，劳动力比前增强了许多，生产力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就农业方面说，耕种技术已逐步提高。有许多地区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四川灌县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在当时的农业灌溉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牛耕法的被采用，在节省劳动力，提高生产量上也有显著的成绩。就手工业方面说，不仅扩大了一般手工业的分工，提高了手工技术，有大匠、良工、拙工、贱工等等的分别，由于交换关系的发展，更使手工业的分工逐渐走向专业化，当时已有了陶工、铁工、车工、木工、缝工、纺织工、造兵工、皮革工、冶炼工、油漆工等等专业部门。这类手工业在当时也得到普遍的重视，楚攻鲁的时候，鲁献木工、缝工、铁工各百人求和，是很明显的例证。就商业方面说，商业和高利贷资本已相当发展，孟尝君放债于薛是一个很突出的事例^①。除官府商业外，私人商业也很发达，经商致富成为一般人追求的目标，有不少巨富的商人，拥有大量的土地，参加统治集团，甚至可与封建领主分庭抗礼，如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吕不韦在秦庄襄王时就做了秦国的丞相，封文信侯，秦始皇时做相国，号“仲父”^②。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工商业的发达，城市更加繁荣起来，当时的大都邑如临淄（今山东省境）、邯郸（今河北省境）、大梁（今河南开封县）、洛阳（今河南省境）

① 详见《史记·货殖列传》和《孟尝君列传》。

② 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等都是著名的大商业城市。

跟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土地所有的关系的改变。这具体表现在土地兼并战争的频繁、剧烈和土地的得以自由买卖。韩非所谓“上下一日百战，”（《扬蠹篇》）虽可能是夸大之辞，但当时战争频繁的情况是可以肯定的。关于战争剧烈的程度，孟子曾经这样叙述过：“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战争的人力、物力都出自农民身上，这是不消说的。在当时，除战争掠夺外，土地所有权的取得，主要已是用买卖的形式。这一方面因为商业经济的活跃，货币的使用，统治者征收实物地租逐渐转变为货币地租，农民要把谷物卖出换取货币，往往被迫廉价卖出，无力负担时，就连土地也出卖了；一方面因为富有的商人或地主采取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方式，迫使农民不得不出卖所有的土地。农村中的劳动人民在封建领主和新兴地主这样的高度剥削压迫之下，逃向城市充当店伙、小贩、小手工业者、家庭杂役、乃至成为流浪分子或倡优，就成为很普遍的现象。生产力提高，生产关系不能适应，土地、人口等等都起了剧烈的变化，就必然加深了旧贵族领主中间的矛盾，加速了旧贵族领主的崩溃，同时也促成了新兴地主的抬头；而对立阶级的矛盾也逐步深化和恶化。

由于生产力提高，土地所有关系和社会经济在变化中，旧贵族领主面向没落，新兴地主逐渐得势，形成了各种矛盾复杂交织的局势，于是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这种思想学说，是当时正在变化着的土地所有关系和社会经济的反映，当时具有代表性和积极意义的思想学说，都是可以反转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土地所有关系和社会经济的改变，适应提高了的生产力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就先秦“诸子百家”中提出六家来

加以论列^①，这六家就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大约他是认为这六家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这六家虽然不能完全包括周秦诸子的思想学说，但这六家在当时是主要的家数，历来学者一般都是承认的。在这六家中，除了墨家和名家以外，其余四家都有人说和屈原思想有关系。

有人认为，屈原的思想来源是阴阳家和道家。游国恩先生在《屈赋考源》里提出屈原四种观念——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和历史观念，认为这四种观念都受阴阳家、道家的影响。他从屈原的家世，屈原作品中有关天文、地理的叙述，屈原作品中，尤其是他认为是屈原作的《远游》这篇作品中有关神仙的句子，来证明屈原的神仙思想就是出世思想，这思想是从阴阳家邹衍和道家老子得来。游先生说：“屈原的思想既与邹衍同，而道家的鼻祖老子又是他的同乡；所以我说屈子的出世观念一方面与道家有关，一方面又与阴阳家有关。”^②此外，方孝岳先生的《关于屈原天问》也承认屈原在作品中运用阴阳家和神仙家的资料，但结论则和游先生相反，说“屈原是引用这些材料又加以否定的，表示他自己的思想是不能为他们所范围的，在他们的思想中，找不到自己的出路的。”^③

有人认为，屈原的思想，很明显地带有儒家的风貌。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里分析屈原的思想是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很明显地带有儒家的风貌。郭先生并指出刘安、王逸、戴震早已有这样的看法，同时，从屈原的作品中举出许多例子证明他和孔子、孟子是同一个脚步的。郭先生更很扼要地说：“周秦诸子同

① 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见游国恩《楚辞论文集》，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29页。

③ 见《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119页。

是主张大一统的，但大别也可以分为两派，主张德政的人例如儒家则大抵反对秦国，而主张刑政的人例如法家杂家之流，则每每不择手段，而倾向于维护秦国。”又说：“总之，屈原的思想是前进的，他是一位南方的儒者。儒家思想，在当时，由奴隶制蜕变为封建制的当时，是前进的，我们不好由现代的观点来指斥为反动，更不好因而说屈原也是思想反动。”^①

有人认为，屈原主张法治，他是具有法家思想的杰出的人物。李长之先生《中国文学史略稿》说：“屈原在政治方面主张法治，也就是沿了吴起在楚所实行的改革走。”又说：“像吴起、李悝、商鞅所有着开端的，像荀子也吸取着的，后来又由韩非发展到完整程度上的法家思想，是当时进步学派，而屈原也就恰代表这一个线索上的杰出人物。”^②

上面各种说法，都是有根据的，有例证的。究竟哪一种观点最正确呢？我认为如果从相互影响说，上面各种说法都可以成立；如果就整个思想体系看，说屈原完全是属于某一思想系的人物，那就很难说。因为就屈原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来考察，他的思想是相当复杂的而且是有矛盾的。它和阴阳家、道家、儒家、法家的思想都有含有不合。合的地方，上列各种说法中已各有具体的例子说明了，这里不拟再加申说。现在只举一些不合的例子看看：

阴阳家喜欢谈天文、地理及阴阳消息、五德终始、迂怪齟祥

① 见《屈原研究》。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曾提到候外庐先生说屈原“本质上反动的”，所以这里有“我们不好由现代的观点来指斥为反动，更不好因而说屈原也是思想反动”的说法。

② 见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第一卷第五章。

等等^①，他们是超越尘世的神仙方士之流的祖师，他们的思想是当社会急剧变化时，企图逃避现实、超政治、超历史而幻想到另一个世界去，并且即以这种幻想作为对现实的反抗乃至对现实的要求的世界观的表现。阴阳家虽也汲取了儒家的思想，讲“尚德”，讲“施及黎庶”，讲“仁义节俭”、“君臣上下”，但他们的总的倾向是讲阴阳推演，神仙怪诞之说，具有很浓厚的神秘色彩，因而就产生了“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赞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天为之下霜”^②和邹子吹律，能够转变气候，滋生禾黍的怪诞的故事^③。这和屈原作品所表现的，如“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哀郢》）这类怀疑占卜，面对现实，热爱祖国忠心耿耿的思想情况，似乎是不能相持并论的。

道家的主张，和屈原思想也有许多矛盾的地方。道家主张“大器晚成，大音希声”^④，屈原却主张及时努力，呼吁陈辞，“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余闻”（《惜诵》）。道家主张无为不争，“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

①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封禅书、历书和孟子荀卿列传》。

② 见《后汉书·刘瑜传》。

③ 《列子·汤问篇》：“邹子之吹律。”张湛注：“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齏之，而禾黍滋也。”

④ 《老子道德经》四十一章。

教”，“夫惟不争，故无尤”^①；屈原却始终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坚持斗争的意志，“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弗能舍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怀沙》）。道家主张顺乎自然，自适其适，忠谏不听，只求远祸，“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而不能入也”^②，“忠谏不听，蹲循勿争。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③；屈原却要凭自己的愿力来改造环境，推进社会，至死不悔，“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齿颌亦何伤！”“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悲回风》）诸如此类，要把屈原说成道家系统的人物，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儒家的主张，一般说，是屈原最赞同的，但也有不少互相抵触的地方：儒家的孔子，照孟子说是“圣之时”的人物，而屈原所仰慕的却是孟子所谓“圣之清”的伯夷，“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橘颂》），“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悲回风》）。儒家的孔子，周游列国，“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也是从邹国到齐国、梁国、宋国，一直走到老才回国著书立说；屈原却是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绝不愿意在外国做官，“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女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盖坚志而不忍”（《惜诵》），“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儒家讲求中庸之道，肯定“仁者不忧”；屈原却极其偏激，很多忧虑，“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怀沙》），“心不怡之长久

① 《老子道德经》第八章。

② 《庄子·养生主》。

③ 《庄子·至乐》。

兮，忧与忧其相接”（《哀郢》）。更值得注意的，儒家最主要的人物是周公、孔子；屈原对周公、孔子却一字没有提到。这样，要说他完全是儒家体系的人物，也还有些值得考虑的地方。

法家的主张，就其整个体系看，分明有部分屈原所接受的。如他所说的“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惜往日》），和为楚怀王草过宪令（制宪令是法家最重要的一种措施）^①，都可以说明屈原是接受过法家思想的，至少前期的法家思想他是接受过的。不过，如果认为屈原完全是法家体系的人物，那也是不妥当的。法家完整的体系有三：“法”、“术”和“势”（权力），韩非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认为是不可分离的东西。他在《定法篇》批判了“申不害言术，公孙鞅（商鞅）为法”的偏废情况；在《难势篇》肯定地指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很明显，屈原虽重视法治，主张变法，但对“术”和“势”是没有充分注意到，“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离骚》），“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也；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讎也”（《惜诵》）。他根本就没有固结君主之术，也不懂得“君无术则弊于上”^②的道理。“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离骚》）“众骇遽以离心兮，又何以为此伴也？同极而异路兮，又何以为此援也？”（《惜诵》），他对于如何培养干部，运用权力，也毫无办法；他对于“势者，胜众之资也”^③这一点，是没有什么认识的。此外，屈原思想本身存在着极其矛盾的

① 《韩非子·定法篇》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又说：“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

② 见《韩非子·定法篇》。

③ 见《韩非子·难势篇》。

地方：他一方面极端愤恨旧贵族集团，“固时俗之工巧兮，乱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而主张“明法度之嫌疑”，使“国富强而法立”，这是从限制旧贵族的特权入手。虽然具体内容无从考见，但就这一点说，分明是从吴起、商鞅那里吸收经验的，和吴起的“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①，商鞅的“以强国之术说君”，一开首就引起了秦国的贵族甘龙、杜挚的争论^②这类的做法，可以说是一致的。可是，他另一方面又抬出尧舜仁义的招牌来，“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这就和法家思想有很大的距离。商鞅是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③的；韩非更坦率指出：“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④。这也说明了屈原不能完全算是法家体系的人物。当然，在这里，吴起是不是完全法家体系的人物，屈原是不是和吴起的思想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是另一个问题，但屈原的思想和法家思想有不合的地方是可以肯定的。

因此，把屈原思想派入在某一家的思想体系去，是不容易得出完全正确的结论的。但是，如果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则各家的思想学说，都或多或少对屈原有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在某一个时代里，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该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因之，各种思想都可能起着相互联系的作用。不过，各种思想体系一经建立之后，在其发展中是有相对的独立性

① 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② 见《史记·商君列传》。

③ 见《史记·商君列传》。

④ 见《韩非子·五蠹篇》。

的；同时，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又决定着思想改变的方向，而某一特定条件的传统性和继承性，在某种思想的发展进程中也发生着一定的影响。这样，我们要说明屈原的思想本质，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郭沫若先生说：“屈原完全承继了这一体系（指儒家）的思想，也正充分地表现着他的革命的、前进的精神，他主张德政，主张选贤举能，主张大一统，他根本没有拘泥于楚国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传统，那是更不能说他是迷恋‘旧时代的魂’的。”又说：“他决不是因为是一个三闾大夫，对于没落的公族制，反而寄着衷心的同情感，……企图改善当时公族专政的制度。”^①这从屈原思想总的倾向说，我认为是对的。屈原的思想，基本上是接受了当时的进步的儒家思想。而具体表现和儒家有某些不同的原因，我觉得是可以从他的阶级出身、生活实践和楚国自己的传统这些方面来加以探索的。由于他的阶级出身是楚国的贵族，而他要打击的对象，正是当时极其腐朽而又相当强大的楚国贵族集团，他为要达到他的目的，就不得不挺身而出，矢死靡它，他一生都和敌党作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使得他表现出特别坚强的政治态度和非常高度的战斗精神，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他只有以饿死的伯夷和溺死的彭咸作为最高人格的标准，以提高自己的坚持不懈的信心，不用说，什么中庸之道在这里是谈不上的了。他为什么要和贵族集团作斗争呢？主要是他爱人民和爱君国，而这都是从他面对着人民的苦难和楚国的危机出发的，正如郭先生所说的他“念念不忘民生的思想，和他念念不忘君国的思想实在

① 见《屈原研究》。郭先生这篇文章，是对侯外庐先生的《屈原思想的秘密》提出不同的意见的，里面的引文，当系侯先生的原作。

是分不开的”^①。因而他的爱国思想，尤其是他最终的中国大统一的政治理想，固然是和人民的利益不相违背，即就较狭义的观点来看，就他已经从具体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来看，他是很明显地在他自己身上打上了自己阶级的叛逆者的烙印的，我们不能把他说成是为当时正在走向没落的贵族阶级即他自己的出身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他的政治思想，照我看，是深受吴起思想的影响的。他变法的主张，虽然也借鉴了外国的变法的措施，而主要的是楚国的优良传统。他所以采取吴起的办法的原因，我想，他即使仅仅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对于一个国家的优良传统值得特别重视这一点，也应该是很明白的，何况他又是一个“明于治乱”的人？他对吴起当日变法的具体内容，是可能有更深的体会的。吴起变法的细节，我们虽然无从考见，但就《韩非子·和氏篇》、《吕氏春秋·贵卒篇》、《战国策·秦策》、《淮南子·道应训》、《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以及《说苑·指武篇》里面有关吴起变法的记载，可以明显地看出有几种主张：一、限制贵族特权；二、强迫贵族疏散；三、充裕人民生活；四、执行统一的法令；五、抚养战斗的士卒；六、摒除纵横的说客。而这几种主张，我们在屈原作品中几乎完全可以看到。（抚养战士这一项，屈原作品中虽没有强调指出，而《国殇》的歌颂战斗英雄和《惜往日》“国富强而法立”的说法，也是他重视战士的表现。）这说明了屈原的思想和吴起的思想是有特别密切的关系的。吴起的思想，据郭沫若先生说：“吴起尽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质是儒。”^②郭先生并说“吴起在楚的一段生活……那际遇和作风很和商鞅日

① 郭沫若：《屈原研究》。

② 郭沫若《述吴起》，见《青铜时代》。

后在秦孝公下边所干的相同，但有不同的是吴起更要爱民一点。”^①又吴起对魏武侯所说的“在德不在险”这一段故事^②，也是历来封建文人所津津乐道的。这“爱民”和“德”的思想为屈原所接受，那就更不消说了。吴起虽然不被列入法家，但历来的人都把他和商鞅对称，“吴起支解，商君车裂”、“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③这类的说法，已普遍流行，并且两人都得到君主的信任而主张变法，变法又都从抑制贵族的权势入手，都有富强的成效，后来又都遭受到悲惨的结局；即在变法的主张上，郭先生在条列吴起变法的项目后，也说“这些倾向差不多也就是后来商鞅所行于秦的办法。”^④这么一来，就很难把吴起排出法家体系之外。所以一般地都把他和商鞅看成前期的法家。我认为，吴起思想的渊源是儒家，本质上是儒家，这是事实；他在政治上的主张给法家商鞅做开路先锋，也是事实；就他的用兵说，还是一个很杰出的军事家。但和单纯是一个法家的商鞅的思想，就不能一律看待。屈原本质上是儒家，而思想具有法家的色彩，这和吴起的思想，是一致的，仍然可以看成接受了吴起思想的传统。因此，如果不加区别地把吴起的变法等同于商鞅的变法，又因商鞅的思想不同于屈原，便作出屈原并没有变法或者没有变新法的结论，这是不很妥当的。

屈原是“博闻强记”的人，他对阴阳家、道家乃至其他各家的学说都应该是通晓的，因而对各家的材料也可以尽量使用。我们知道，他是我国古代一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家，他作品中运用了许多奇异的人物故事和超妙的境界，显示着

① 同上。

② 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③ 均见《韩非子·问田篇》。

④ 郭沫若《述吴起》，见《青铜时代》。

他具有惊人的想像力。他这种惊人的想像力，我们不能单纯从他的天生的聪明这方面去理解，这是和他的深厚的修养分不开的。他的“博闻强记”并且爱好民间文艺，是使他的作品在这方面获得惊人的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可不能因为他吸取了这些东西即认为这些东西在他的思想上起了主导的作用。思想的本质是应该从当时的时代精神和他对那时代所采取的态度以及他一生的生活实践这些方面来加以发掘。换句话说，即应该从他的世界观的总倾向来认识他的思想本质。屈原主张变法，和恶势力奋斗了一生而卒至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这种入世的积极的态度行为是无可掩饰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该从和这相反的超世消极这些方面去理解他的思想本质的。

屈原的思想是革命的，前进的，他继承了吴起的思想而更发挥了“爱民”这一点，所以他在限制了贵族的利益的同时，更关心到人民的利益。他反对腐败贵族们的特权，反对暴秦的侵略战争，以及他企图统一天下，这种种都是基本上符合人民的要求的。他的思想既然基本上符合人民的要求，也就必然对人民有一定的影响。楚南公所说的当时流行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①，以及后来陈涉、吴广等的领导革命，项梁、项羽等的组织民众力量以及其他许多楚国的起义集团，促使秦国不能不归于覆灭。这都可以说明屈原的思想一直在人民中间起作用。

屈原的进步思想也表现在他的文学的创作方法上。我们知道，自《诗经》以后，直到屈原的作品出来，诗歌才在自己的领域上放出光芒万丈的异采。这并不是偶然的成就，这是在屈原的革命的、前进的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屈原的创作方法和他的世界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他接受了时代精神，继承了祖国的优良传统，并吸取了各国的先进思想来确定他自己的

^① 见《史记·项羽本纪》。

进步的世界观，这进步的世界观通过艺术形象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使他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的面貌和本质。

可是，屈原的思想上的局限性，也是应该指出的。由于他出身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熟悉统治阶级内部种种不合理的情况，同时他又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要求着一些广大群众的、有组织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与集团和阶级底狭隘的目的敌对着的。”^①这就使他在思想上感情上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固然能够加强他的斗争的力量，促使他违反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具有更长远更广阔的眼光，逐渐朝着和自己阶级利益相反的方向走，即是超越自己阶级利益的限度而具有革命的、前进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也由于阶级性质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看到人民的力量，跟人民群众一起来干那具有进步意义然而必须通过大力的坚决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的事业；事业进行不顺利，处处碰壁，跟着就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乃至自杀。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二千几百年前的屈原一定能够组织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和贵族统治作斗争，在斗争失败中还具有乐观主义的精神；但他在这方面的局限性还是应该指出的。这种局限性是使他的进步事业不能获致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対这点没有明确的认识，那么，为什么他那符合于人民要求的主张而不能在他坚强斗争中压倒贵族当权派并取得胜利，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①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

六 辉煌的艺术成就

屈原的时代、家世和出身，生平和思想，我在上面已经约略介绍过了，以后，我想再介绍屈原的作品。

现在，先从总的方面谈谈他的艺术成就。

屈原，不但是一个忠实于自己为祖国、为人民的正直的主张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忠实于艺术创作的人。他，以他的杰出的才华，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把一生中的具体实践、斗争经验以及理想境界等等都通过了艺术的手法，写成了不朽的诗篇，从诗篇中深刻而明朗地揭露出当时统治集团的丑恶面相，表露出自己时刻不忘楚国，时刻不忘楚国的君主，意图通过君主来实现热爱祖国（包括人民，有时也直接提到人民）的主张，来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像这样地忠实于艺术的制作，就很自然地使自己的作品多彩多样地、有血有肉地、十分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吸引人的艺术力量，给人们以历久不忘的印象而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两千年来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们，或其他曾经接触过屈原的作品的人们，无论对屈原这一人物的评价如何，而对他在艺术上的辉煌的成就，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否定的意见。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曾这样说过：“古典艺术作品，不论它表现出哪一阶级的世界观，它本身总蕴藏着一种人类共有的东西，蕴藏着涉及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人们并激动着这些人们的東西。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有那春光明媚的爱情的欢乐，那孤独无慰的母亲的悲哀，情谊，友爱，为反对不公正和阴险狡诈的恶行而进行的斗争，英雄气概，大胆敢为，畏怯以及背叛等等，——这些东西都完美地表现在绘画、雕塑、音乐、诗歌中，它们也不能不激动下一时代的人们，

不能不引发后代人的赞美或愤怒、欢乐或悲哀的情感。”^①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文学和艺术的许多典型现象具有着人所共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切时代都激动着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② 我想，把这些说法来说明屈原的诗篇中所蕴藏的艺术力量，是相当合适的。

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概括地说，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第一，具有强烈的斗争性。接触到屈原作品的人，谁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它充满了悲愤的情调。其实，这悲愤的情调，都是从矛盾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从社会发展史上看，封建贵族的统治，比之奴隶社会的奴隶主，虽有其进步的意义，但这意义很快就消失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条件的刺激，他们的享乐的欲望也会逐步扩大，以至成为“无穷的欲壑”，因而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压迫的程度也必然是逐步加甚。这就不但会引起被剥削被压迫者不断的反抗；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比较有理想或者能够看到人民的疾苦的分子，也必然会感到不满而引起阶级感情的分裂，如果这些人具有进步的思想要革除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的话，那矛盾斗争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面对着不合理的社会会产生心情上的矛盾而要向产生不合理现象的统治力量作斗争；我们更不能设想，当那统治力量还在占上风的社会里，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和他们作斗争，会不陷于失败的结局。矛盾斗争而至于失败，表现在作品里的当然就是悲愤的情调。这情调，标志着这作品具有强烈的斗争性，也即是这作品具有和人民一同呼吸的人民性的表现。屈原作品之所以赢得人们的同情和热爱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它所以具

① 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500 页。

② 中译文载《文艺报》1956 年第三期。

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种有力的说明。

第二，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产生，同战国时代的社会基础以及和这基础相适应的先秦诸子的发扬蹈厉、放言高论的思想作风，都是有机地联系着的。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正如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样，这时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是一个飞跃的进步时期。作品中的这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它一方面是作者作为对抗现实社会的锐不可当的思想武器而出现的；而另一方面又是作者在现实斗争的基础上所结撰出来的理想的高境。作者既运用了典型的塑造、适当的夸张和丰富的想像等使丑恶的现实暴露得更加鲜明而突出，以加强人们对这现实的憎恨的情绪和反抗的意志，同时也展示了远大的美好的图景，以促进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强固人们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它永远站在现实的高处来揭露现实，批判现实，并表示出对未来的合理社会的憧憬，美好生活的渴望。屈原在这方面的成就是惊人的。不但在作为祀神用的《九歌》中，在对灵魂说话的《招魂》中，显示出他的卓越的天才；即在政治性很强烈的诗篇中，如《离骚》、《抽思》、《涉江》、《惜往日》之类，也创造了一些美丽动人的形象，渗透着不少幻想的描写，放射出积极浪漫主义的光芒：这就使得全部作品都到达了美学的顶峰而具有无比巨大的吸引力。

第三，人物性格的描写。人物性格的描写，在屈原作品是一个很突出的表现。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深入生活，了解生活，能捉住各种人物的个性，从矛盾冲突中观察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体现出现实社会中的错综复杂及其矛盾斗争的关系，藉以反映各种不同人物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实质，使每一个人物性格的发展更加鲜明而突出。我们从屈原作品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两种互相对抗的人物性格：一种是卑污龌龊的、自私自利的、互相勾结以蒙蔽君王、贼害善良的；一种是高洁清白的，热爱祖国、同情人

民的，坚持真理要引导君王走向美好光明的途径的。而这两种对抗的人物性格，都通过了具体的活动，都通过了个人的矛盾斗争或者对抗的矛盾斗争中显示出来。现在就从屈原的最伟大的诗篇《离骚》举例来说，如：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齿颌（憔悴黄瘦的样子）亦何伤！擘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𦉳𦉳。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洁美）以鞿鞫（给人系累）兮，謇朝諝（谏）而夕替（废）。既替余以蕙𦉳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种是贪污钻营，追求个人的利益，原谅自己，猜疑别人，勾心斗角，互相嫉妒；一种是美洁自好，坚贞不易，学习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为，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而热情奔赴，贡献意见，虽受尽挫折和打击，还坚持不懈，直至交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改变初衷。从具体行为和内心活动中来刻画出两种互相对抗的人物性格，而这两种人物性格，又是在矛盾冲突中显现出来，不是各自孤立绝缘的。这就使得这两种人物性格中都刻志着各自的利益关系和思想实质，从而引起人们的爱憎的情感。又如：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𦉳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𦉳郁邑余𦉳𦉳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𦉳（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由于妒忌屈原的才能，而不惜巧诈伪谗、颠倒是非，千方百计来

陷害他，这是当时的旧贵族当权派的做法；明知和旧贵族当权派不能相容，而坚持正直的主张，忍尤攘诟，奋斗到底，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认为是死得光荣，这是屈原的做法。这虽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勾画，但在矛盾冲突的具体情况两相对比之下，两种不同的人物性格是多么鲜明突出地展示出来。

这里不过在《离骚》里举些例子来说明，其实屈原的作品中像这类的写法是很多的。如《哀郢》里的：

外承欢之韶约兮，谿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尧舜之抗行兮，齡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怵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齡蹠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齟齬。

尤其概括集中地描写了当时的权奸们的无耻的丑态、自己的高亢坚定的意志和楚王的昏庸轻躁的行径。从这种素朴的描写中也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出参加现场活动的各种人物的性格。屈原对这方面的描写是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成就的。但这种高度的艺术成就，是有其坚实的生活基础的，不能光从艺术技巧方面去理解它。

第四，丰富的想像力。屈原的想像力是非常丰富的。屈原想像力所以非常丰富的原因，当然和他卓越的天才有关，但是，和他爱好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和他在主张遭受打击陷于极度苦闷的时候对于事物真理的探究，对于精神解放的追求，都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知道，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绝大部分是标志着人民的意欲愿望的东西，绝大部分是从人民不满现实，反抗现实或向往未来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他们因为不满现实，就不能不创造出想像中的美好的事物来符合自己的要求。我们更知道，一个人没有力量对抗重重的打击而又坚信自己的主张的时候，自己有许多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事实上又不容许你去解决的时候，就往往会把超现实的即想像的境界作为精神解放的温床，来探究一切事物的真理。屈原正是有这样的文学修养和这样的生活实践的

人，因而对他的想像力的成长和壮大也就成为相当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们还是不能丝毫低估他的卓越的天才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的。

屈原想像力的丰富，在《离骚》里表现得最突出，其中自“女嬃之婵媛兮”以下，绝大部分都是想像的境界。而写得尤为超妙的，如：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阍阖而望予。……

把日、月、风、雷、云、霓、凤鸟都拉成关系，替他服务。下面接着更写了济白水、登阍风、游春宫、追求宓妃之所在、想见有娥之二女等等；之后，又来了一番大游历：驾着飞龙，转道昆仑，发轫天津，至于西极，更涉流沙，遵赤水，经过不周山，想到西海去。像这样高超雄伟的想像，我想，在我国任何古典文学作品中都是不易找到的。此外，像在《招魂》里所描写的上下四方、天堂地狱中各种可惊可愕的事物，当然也是他驰骋着丰富的想像力的表现。

第五，具有民歌的风格。《九歌》是屈原就楚国流行的祭歌加工而成的，基本上是民歌，固不消说；即屈原其他的作品如《离骚》、《九章》、《招魂》，也具有民歌的风格。

我们知道，《诗经》里的《国风》、《小雅》有许多是民间的创作，这部分屈原是接受过来并加以发展和变化的（屈原所接受的当然不止这部分），可是，自《诗经》以后，屈原作品出现以前，其间有二百年的光景，在中国诗歌史上简直是一段空

白。这一段空白，有人认为给散文填充了。我觉得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文化发展的过程看，是可以这样说的。但诗歌和散文毕竟是两条路线。文人的作品和民间创作也不能等同看待。由于先秦诸子文章的发达，就会影响到乃至阻遏了民歌的产生，那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在爱好民间文学而又“博闻强记”的屈原的脑子里，对这二百年间的民歌必然是很熟悉的，吸取在他的作品里的《诗经》以外的民歌成分，可能也为数不少。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都用散文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抒写自己的心情与怀抱，而屈原独采取诗歌的形式，就这一点也可见出屈原对于诗歌有特别的素养。如果仅就接受《诗经》的优良传统看，也不易得到充分的说明。因此，我认为《诗经》以后屈原以前这一段时期的诗歌，在诗歌史上虽然是空白，但是在屈原作品里可能保存一些，可惜已没有足资对证的材料，已没有办法从屈原作品中爬梳出来以填充诗歌史上的这一空白了。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有一些和屈原作品比较联系得到的屈原以前的楚国的民歌（像《子文歌》、《楚人歌》、《接舆歌》之类，和屈原作品距离较远，这里不提出来）：

楚康王（熊招）时（公元前559年至545年），他的兄弟鄂君子皙游河，舟子是越人，用自己的方音唱了一支歌。鄂君子皙听不懂，就找人翻译成为楚国的歌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①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②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

这故事是楚大夫庄辛对襄成君说的，并且引出舟子所唱的原文，

① 《说苑·善说篇》作“誓中洲流”，此据《玉台新咏》。

② “烦”程荣校刊《汉魏丛书》本作“顽”。

确凿有据，应该是可信的^①。首唱这支歌的是越人，当然不能认为这就是楚国人民的创作，但是那位翻译的人用的是楚国民歌的音调，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楚国民歌的风格。这支歌因为是舟子越人唱的，人家就叫它做《越人歌》（又叫《越榜人歌》，榜人就是舟子）。

此外，还有一支歌叫《孺子歌》的：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据说是孔子听见一个小孩子这样唱的。^②有人认为沧浪是楚国的地名或水名，有人认为沧浪是形容水色^③。其实，水清水浊的色泽，都用“沧浪”来形容，是很难理解的，还是说它是楚国的地名或水名的较可靠。那末，这是一支地道的楚国的民歌了。

之后，我们看到的楚国的民歌，就是屈原加工过的《九歌》

① 见《说苑·善说篇》。原文是：“滥兮抃草滥予昌柎泽予昌州州馑州焉乎秦胥胥纒予乎昭澶秦嗣渗悝随河湖。”这简直没有办法读下去。郭沫若先生引此后称：“最近听人说，有人研究了出来，同于苗歌。其所研究，余尚未见。”（见《屈原研究》）

② 见《孟子·离娄》上，又见《楚辞·渔父》。

③ 酈道元《水经注》：“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叶梦得《避暑录话》：“沧浪地名，非水名。”阎若璩《释地云》：“沧浪盖地名也，汉水流经此地。”王鸣盛《尚书后案》：“张平子《南都赋》：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李善注引《左传》：屈完所谓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则是沧浪旋绕楚都，正当在江陵。”卢文弨《钟山札记》：“仓浪水色。在竹曰苍篴，在水曰沧浪。”周广业《孟子古注考》：“《文选·塘上行》，刘熙注沧浪之水清兮，沧浪水色也。”

了。《九歌》虽然经过屈原的加工，比以前楚国的民歌已有了变化和发展，但民歌的基调，已经是在民间流行着，大约是不会有很大变动的。我们看，里面像“沅有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这类句调，和《越人歌》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完全是一个样子。从这里，可以看出楚国民歌发展的线索，同时也可以看出屈原的作品和楚国民歌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当然，屈原作品中所具有的民歌风格，还限于楚国民歌这一条路线，楚国民歌的风格在他的作品所表现的民歌风格中虽然占了主要的并且是绝大的部分，但是楚国以外的民歌风格也出现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他《九章》里的《抽思》一篇，在“乱曰”之前并且有“少歌曰”和“倡曰”，这种体式，以前没有看到，以后也没有人仿效，只有比他稍后的荀卿《赋篇》俛诗之后有“少歌”。荀卿在齐国住得很久，屈原曾出使齐国，和齐国有相当的好感，这就可能不是单纯的楚调，而已是吸取了齐国民歌的风格。^①

第六，吸取大量的神话传说。楚人的宗教信仰特盛，神话故事很多，成为所谓“巫官文化”的代表国家。这一方面虽然是由于楚人像殷人那样“尚鬼”，^②而另一方面，也由于楚国的领域逐渐扩大，兼并了不少信重巫鬼的国家。《诗经》里《陈风》有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桤树之下的歌咏，说明了陈国是有信巫好祀的习俗的。《越绝书·外传》记载吴地有巫里、巫门、巫

① 饶宗颐《楚辞·地理考》附《抽思解》，认为《抽思》是屈原使齐将返时作。此说确否虽尚待深考，但这篇作品带有齐国民歌的风格这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就现存的史料看，屈原离开楚国的足迹，只有东齐国可以考见，而他这篇作品的比较特殊的体制，也恰恰在荀卿的作品里得到部分的证明。

② 《吕氏春秋·侈乐篇》：“楚之衰也作巫音。”《汉书·地理志》：“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

山等名，则当时吴国的巫风也很盛。后来吴并于越，陈、越又先后为楚所灭。这么一来，楚国便集了巫风的大成了。到了屈原时代，楚国的文化虽然已有高度的发展，但是信奉宗教已经成为民间的习俗，关于宗教的神话传说还是被保存下来，普遍流传着，而这一切，就恰好为爱好民间文艺的伟大诗人屈原所接受。又，当时已经是南北文化交流的时候，屈原是一个“博闻强记”的人，对于楚国以外的神话故事也很熟悉，也兼收并蓄起来，以丰富其作品的内容，以发抒其热情与伟抱。因此，我们在屈原作品里可以见到许多美丽可爱乃至惊心动魄的神话传说。

屈原作品中吸取神话传说最多的，是一篇带有总结性质的《天问》。《天问》里充满了神话故事的内容，有不少我们现在还看不懂的东西，大约都是属于远古流传的神话故事。其间可以明显看出是神话传说的，像女岐没有丈夫，为什么会生九个儿子？雨师怎么能够兴云雨？风伯怎么能够起风暴？雄虺九首，忽去忽来，究竟躲到什么地方去？说灵蛇能够吞象，究竟有多大？帝叫夷羿为夏民除害，为什么要射瞎河伯，又把洛神作为自己的嫔妃？浇到他嫂子的房门口，有什么要求？少康为什么放狗去咬倒浇，砍下了他的头？简狄在台上，帝啻怎样和她交好？为什么她吞下了鸟卵就有喜事（生契）？等等，都是有其他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的。《离骚》里像令义和弭节，望舒先驱，凤鸟飞腾，丰隆乘云，求宓妃之所在，见有娥之佚女，等等，也是从神话传说中吸取题材。至于《招魂》里的“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土伯九约，其角鬻鬻些。”之类，是神话传说中的东西尤其明显。此外，在《九章》中，像《惜诵》里的厉神之占，《涉江》里的驾青虬、骖白螭，《哀郢》里的凌阳侯之泛滥，《思美人》里的寄言浮云、致辞归鸟之类，也还或多或少渗透着神话传说的因

素。由于他对神话传说太熟悉了，因而在这篇和那篇重复提到同样的神话传说的也不少。

第七，运用楚国的方言。方言就是当时的口语。运用口语来写作，春秋、战国的散文家都有，“焉”、“哉”、“乎”、“也”这类语助辞的出现，都是当时口语的运用^①。但用得最多的是屈原的作品。屈原作品中所惯用的“兮”字和《招魂》里的“些”字，是属于口语，这是历来都承认的了^②。此外屈原作品中使用楚国方言的地方很多，郭沫若先生曾考出 24 条：

（一）汨——《离骚》“汨余若将不及兮，”《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

（二）拏——《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说文》云“拔取也，南楚语。”

（三）莽——《离骚》“夕擘洲之宿莽，”《方言》云“莽、草也，南楚曰莽。”

（四）冯——《离骚》“冯不厌乎求索，”王逸注云“满也，楚人名满曰冯。”

（五）羌——《离骚》“羌内恕己以量人，”王逸注云“羌楚人语辞，言卿何为也。”案（郭先生案）此字在屈原作品中凡

① 郭沫若先生说：“凡用焉哉乎也为语助的这种文体，在今天看来虽然是文言，而在春秋、战国时却是白话。周人的台阁体的文字如《诰》、《命》、《雅》、《颂》以及金文，焉哉乎也的语助几乎是绝对不使用的，到了春秋、战国便猛然一变。”（见《屈原研究》）

② 郭沫若先生引孔广森《诗声类》说兮字古音当读阿。又说兮字在古时北方的文字中每每用乎字来代替（见《屈原研究》）。闻一多说：“兮之用犹其也，之也，夫也，而也。”（见《楚辞校补》：《九歌·大司命》“君回翔兮以下”条注）

十三见，用“卿何为”意，多讲不通。据余所见，有些地方等于乃，有些地方等于而，有些地方只表示感叹。又有謇或蹇字用于语词者凡八见，与羌字相等，而口气略轻。

（六）诮——《离骚》“谣诮谓余以善淫，”《方言》云“诮，诉也，楚以南谓之诮。”

（七）鬻僚——此二字连语凡五见。《离骚》“鬻郁邑余鬻僚，”王逸注云“楚人名住曰僚。”又《惜诵》“心郁邑余鬻僚，”注云“楚人谓矢志怅然住立为鬻僚。”《方言》亦云“僚、住也，南楚谓之僚。”

（八）闾阖——《离骚》“倚闾阖而望予，”《说文》云“闾、天门也，楚人名门曰闾阖。”

（九）箐——《离骚》“索菴茅以鞿箐，”王注云“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箐。”

（十）鞿——《离骚》“齐玉鞿而并驰，”此鞿言鞞端辔也。《方言》云“关之东西曰鞞，南楚曰鞿。”又“轮，韩楚之间谓之鞿。”

（十一）遘——《离骚》“遘吾道夫昆仑，”王注云“楚人名转曰遘。”

（十二）灵——《云中君》“灵连蜷兮既留，”王注云“灵、巫也，楚人名巫为灵子。”

（十三）坛——《湘夫人》“荃壁兮紫坛，”高诱云“楚人谓中庭为坛。”

（十四）褠——《湘夫人》“遗余褠兮澧浦。”《方言》云“褠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褠，关之东西谓之褠衣。”

（十五）哈——《惜诵》“众兆之所哈，”王注“哈、笑也，楚人谓相调笑曰哈。”

（十六）悼——《抽思》“心震悼而不敢，”《说文》“悼、惧也，陈楚谓惧曰悼。”

(十七) 箴——《怀沙》“凤皇在箴，”《方言》云“笼、南楚江沔之间谓之箴，或谓之箴。”

(十八) 诌——《惜往日》“或诌谩而不疑，”《说文》“沅州谓欺曰诌。”

(十九) 娃——《惜往日》“妒娃冶之芬芳，”《方言》“娃、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秦晋之间曰娥。”

(二十) 闲——《招魂》“去君之恒干，”注云“干或作闲，闲里也，楚人名里曰闲。”

(二十一) 爽——《招魂》“厉而不爽，”注云“楚人名羹败曰爽。”老子《道德经》“五味令人口爽，”同此意。《老子》为战国时楚人环渊所辑录，也足以证明爽为楚国方言。

(二十二) 蔽——《招魂》“蓖蔽象棋，”《方言》“博谓之蔽，秦晋之间谓之博，吴楚之间谓之蔽。”博蔽一音之转。

(二十三) 瀛——《招魂》“倚沼畦瀛，”注“瀛、池中也，楚人名池泽中曰瀛。”

(二十四) 梦——《招魂》“与王趋梦，”洪兴祖补注“楚谓草泽曰梦。”

屈原作品里运用方言的地方当然不止这些，如“蹇”、“纷”、“扈”、“婁”、“潭”、“款”、“嚙”等，都经前人指出是楚国的方言，这里都没有列入。但就这些例子看，已可以看出屈原是多么喜欢运用方言的情况了。

第八，采用楚国的特殊名物。楚国是战国时代一个最大的国家，疆域广阔，物产丰富，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屈原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对祖国的山川地理、物产情俗乃至一草一木都觉得十分可爱，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总是取材于楚国的特殊名物，形成

了一种特异的色彩。例如九疑、北山^①、江、淮、沅、湘、澧、夏水、庐江、洞庭等都是楚国的山水；郢、夏首、夏浦、鄂渚、枉纛、辰阳、溱浦、苍梧等都是楚国的地名；荃、荪、兰、蕙、药、蘋、萧、艾、申椒、留夷、揭车、江离、芰荷、薜荔、芙蓉、杜蘅、辛夷、菖蒲、蓼茅、猿齋、鹈鴂等都是楚国的特产；灵氛占卜，巫咸降神，以及巫阳招魂等都是楚国的情俗。这样，就使得他的作品对祖国人民更具有亲切之感，更获得祖国人民的爱好。

第九，运用楚国的声调。屈原的作品，是《楚辞》的最主要的部分，《楚辞》的编者，把有些非楚国人的作品也归入《楚辞》里面去，这原因，可能就是以“楚声”为依据。“楚声”是以楚国的音调诵读作品，是《楚辞》的基本特质，是基于楚国的方言加上富有音乐性的诵读法的表现。《史记·项羽本纪》载：“楚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军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你）楚歌。”可见“楚声”是楚国特殊的音质和声势构成的。诵读《楚辞》，必当按照它特有的声调才成，并不等于普通的口念。所以在后来能够诵读《楚辞》的人算是一种专长。在汉武

① 《抽思》“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这北山，王夫之认为是指襄邓西北楚塞之山（见《楚辞通释》），刘永清先生认为是指纪山（见《九章通笺》），饶宗颐认为是泛言汉北之山，不必指定何山（见《楚辞·地理考》）。王逸章句：“北山一作南山。”戴震《屈原赋注》因作“南山”。因此，这作为一个山名看，还是有问题的。这里只肯定它是楚国的山，像江南一样。

帝时，朱买臣因为能够“言《楚辞》”，便博得了主子的欢心^①。在汉宣帝时，曾特意征召一个九江老人被公来诵读《楚辞》^②。直到隋唐时代还依然保存着用“楚声”诵读《楚辞》的方法。《隋书·经籍志》载隋代一个和尚名叫道骞的，能够用“楚声”读《楚辞》，到了唐人读《楚辞》都依照他的读法。这就充分说明了“楚声”是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充满了楚国的风谣土乐的气息的。至于“楚声”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声调？是否就是像今日的汉剧、湘剧的唱腔一样？我们已无从知道。就一些记载看，例如《隋书·经籍志》所说：“僧道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宋黄伯思《翼骚序》所说：“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都就一般的音质声势说，很不具体，对我们了解“楚声”没有多大的帮助。（最近有人运用古代的音调读《楚辞》的，不是今音那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否就是“楚声”，当然还成问题。）

以上略为介绍屈原的艺术成就。这是从他的艺术成就的独创性和独特性着重指出的，如果全面地来谈他的艺术成就，当然还不止于此。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的诗人，同时又是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是中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古典文学的奠基人。他具有戛戛独造的精神，然而却爱好以民间文学来哺育自己，丰富自己，同时又提炼它们，美化它们。可以说，他的文学作品兼有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有的优秀传统，而他对待文

① 《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和朱买臣同邑的人叫邑子，朱买臣是会稽人）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

② 《汉书·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学作品的态度，则是可以作为一个优秀文学作家的楷模。

屈原的辉煌的艺术成就，永远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学遗产！

七 九歌

《九歌》是我国古代最美丽的诗篇。

《九歌》共十一篇，计：《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排列次序依王逸本）。它是楚国人民（包括民间艺人）所创造而为屈原所接受并作过艺术上的加工的。由于它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所以和屈原的身世很难联系得上；由于它是经过屈原的加工，所以和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有类似之点。现在流传下来的《九歌》，是屈原加工后写定的，因而也应该看成是屈原的作品。

为什么说《九歌》是楚国人民所创造的呢？因为《九歌》里面各种神，都是和楚国人民的生产和生存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和楚国人民的现实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云中君是云神，湘君、湘夫人是湘水之神，大司命、少司命是主宰命运、子嗣之神，东君是太阳神，河伯是河神，山鬼是山神（或鬼），这些都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存有关；《国殇》虽不是神名，但祭那为国牺牲的英勇战士，也是和当时的人民群众的生存斗争有直接关系的。至于《东皇太一》和《礼魂》，前者为迎神曲，后者为送

神曲，当然没有什么意义^①。

九歌的具体内容是神话传说，它是作为祀神的歌曲出现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论》里说：“任何神话都在想像里并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柯洛尼茨基在其所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宗教》一文里也曾这样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宗教也和任何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在实际生活本身有其深远的根源。宗教不是偶然的误解，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一定条件的必然结果，是这些条件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特殊形态。”因此，民间创造出来的东西，不管里面所说的怎样出神入化，不管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也不管它的作用怎样，总是为了生产劳动的需要，为

① 闻一多在《什么是九歌》里考察《汉书·礼乐志》“赵代秦楚之讴”句，把《九歌》里诸神的产生，都结合在赵代秦楚的地域中。他认为只有湘君、湘夫人是楚地的神，《国殇》不敢确定是秦地还是楚地产生的，其他都是非楚地的神——云中君是赵地的神，东君是代地的神，河伯本是秦地的神，大司命、少司命本是齐地的神。这种由于某一种书上看到有某种说法（如《风俗通祀曲》篇有“司命……齐地大尊重之。”的说法），或者神名和某一地名偶合（如云中君的“云中”和云中郡的“云中”相同），即作为产生这神的产地的根据的考证，纵然持之有故，也只能说明某地曾祀过某神，并不能说明某地的人民为什么要塑造这种神。而且，一种神已经出现了以后，也可以在这地或那地都被人作为祭祀的对象。我们已肯定《九歌》是楚产，像这类的考证都不能对我们说明问题有多大的帮助，因此，有许多关于这类的考证文章，我都没有提及。只提出闻先生这种说法供参考。

了生活上（包括审美上）的需要，是有其目的性的，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九歌》里所有的神（或鬼），都是以想像的超现实的方式反映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反映着在现实生活的一定条件下所产生的思想、情感和愿望的。这是一种诗歌的形式。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情况一样，它所反映的，也可能已经是神话传说，或者是渗透在人们的风俗习惯中的、为人们所迷信的一种神秘力量。这些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和诗歌的创作，往往是互相关联的。部分的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可能在诗歌创作之先而为诗歌创作所吸取，也可能在诗歌创作之后掺入了诗歌创作的因素。如《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就其名称和歌辞内容看，分明是以配偶神出现的，而掺入了舜妃的传说；而后来有关湘神的传说，就往往涉及配偶的情事。这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不论他们的产生或先或后或同时，它们的内容全同或不全同或有部分互相抵触，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因此，我们主要的是要看它的中心环节，是要反映哪一类的现实生活，是用什么方法在什么程度上反映现实生活。照我的看法，《九歌》是按照楚国人民的生产劳动、生存斗争的现实生活及其所爱好的神话传说的艺术形象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思想和创造方法都不会出自贵族文人之手。因为楚国的贵族文人根本就没有楚国人民的生产劳动、生存斗争的生活实际。当然，贵族文人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或者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也是利用宗教迷信来愚惑人民，但总得相应地注入若干的毒素以期收得应有的效果。而在《九歌》里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却是相当纯洁、健康的，并不像后来许多贵族文人所制定的歌颂统治阶级同时又诬蔑人民大众的祭祀乐章一样。有人认为《九歌》里的神具有大小神的等级观念，从而肯定它是贵族文人所创制。姑无论这种把后来统治者利用人民爱好的“九歌”这名称或歌辞来配合自己的乐章的情况来说明《九歌》的产生和形成的说法，

已经不能使人信服，即《九歌》里面有大神小神之分，也不能就说明是贵族文人所创制。《九歌》里被认为最尊之神的东皇太一，根本就没有活动过，看不出他的发号施令、高高在上的痕迹；其他诸神则充满了自由活泼的气氛，并没有什么贵贱尊卑的地位观念；我们从整个作品里也找不到有统治与被统治之间“自然合法”的思想意识的表现。这样，要说成是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的创作，是不容易理解的。因此，我认为《九歌》的产生，是楚国人民的集体创作（或通过民间艺人的创作），而这种创作正适合于楚国人民的需要，因而就成为民间祀神的歌曲。

为什么说《九歌》为屈原所接受并经过他作艺术上的加工呢？因为屈原是一位热爱祖国、接近人民和最爱好民间艺术的伟大诗人。民间文艺（包括楚国以外的民间文艺）对于他，已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可以说，已成为使他作品里的想像部分特别丰富的主要因素之一，使他作品里的神话故事特别丰富的主要因素之一，使他作品里的艺术语言特别美妙生动的主要因素之一。那末，对于这种为祖国人民所爱好的祀神歌辞——《九歌》，当然尤其值得他重视，并乐意接受它。不但接受它，在原有的基础上来提高它，使它在具体内容上更加充实，在艺术形式上更加美丽，使得处处具有动人的力量，成为祖国人民的瑰宝，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楚国人民创造出作为祀神用的《九歌》，在当初，我们可以推想得出，它必然是比较粗糙的东西，即使通过民间艺人写出来，也还是比较粗糙的。这不但和艺术素养有关，也和生活实践有关。到了屈原的时代，一切都比较进步了，提高了，人民对这种比较粗糙的东西，就可能感到不满足。毛主席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

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①在屈原，是一位爱好民间文艺而又有很高的艺术素养的人，他为了满足祖国人民的要求，把比较粗糙的东西进行艺术上的加工，即使是被动，也还是合情合理的事。

因此，我认为《九歌》的来源，是楚国人民所创造，它可能产生在屈原以前若干年代（当然不是“启《九辩》与《九歌》”），而流传下来的《九歌》，则是屈原加工后的作品。

由于流传下来的《九歌》是屈原加工后的作品，它里面就不可避免地要渗透着屈原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观点。我们只要不对它作不应有的夸大或不恰当的附会，从作品和作者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出发，从“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完全是特定的个性”^②这一原则出发来看问题，那末，过去的注家作出许多牵合屈原和楚王的事件的说法，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屈原的一生的过程和具有怎样的思想感情，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而封建贵族出身的屈原，是有他的生活方式和与他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美学观点的。尽管他接近人民，尽管他爱好民间的创作并受到民间创作的影响，他的美学观点和人民大众的美学观点总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九歌》里的神（除开《国殇》）都有华贵的气息，和人民大众的简单朴素的生活作风联不起来。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屈原歪曲了人民所创造的神的形象，也不能因此就怀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863页。这和以前单行本文字已有不同，以前是有加工后的文艺比自然形态上的文艺更好的说法的。

② 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26页。

疑它不为人民所爱好。因为把人民创造出来的神的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明、突出，并且披上了美丽的服饰，添上了曲折生动的情节，只要里面不含有毒素，不但不会被拒绝，正相反，是可能更加满足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以上是我对《九歌》产生和形成的一些初步的看法。以下我想对它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九歌》的具体内容是神（或鬼），不用说，这些东西是人们想像出来的，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可是，高尔基早就这样说过：“神话底创造在自己的基础上乃是现实主义的”^①。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愿望等来创造神（或鬼）的。这样，在《九歌》里的神（或鬼）和创造这些神（或鬼）的楚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愿望就总会有共通之点，总会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反映出他们在当时的某些生活情况。

我们从流传下来的《九歌》的具体内容看，可以这样说：《九歌》是写生活，绝大部分写爱情的生活，有一小部分写战斗的生活。

这样说，同上面《九歌》的产生是反映生产和生存斗争的生活这一说法，会不会发生矛盾呢？我想是不会的。原因是：当在“筇路蓝缕，以启山林”^②的时候，自然界对楚国人民的威胁是相当大的。楚国人民接受了先代的传统，在坚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造自然而又不能不受自然的威力所胁迫的情势之下，才创造

① 《苏联的文学》，新文艺出版社6页。

② 见《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筇路柴车，蓝缕敝衣。”孔颖达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筇门，则筇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筇路为柴车。方言云：楚谓凡人贫衣破丑敝为蓝缕。蓝缕谓敝衣也。”这两句话是说，驾着柴车（路通辂，辂就是车），穿着敝衣去开辟山林。

出神（或鬼）来作为抵抗自然和达成愿望的标志。这时候，神（或鬼）的表现，主要的就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到后来，经过楚国人民不断的改造，以前威胁生活的大自然，已经可以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有利条件了，已经能够给予改善生活以莫大的恩惠了，威胁的对象一变而为亲爱的对象，神（或鬼）的精神面貌也就不能不跟着改变。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被剥夺，只有从理想化的创造中来满足生活上的要求最为现实。美满的爱情生活，应该是当时楚国人民在生活上要求达到而不可能达到的想望之一。那末，把这种想望寄托在在在当时已属于可亲可爱的自然山川的神（或鬼）的身上，也是极其自然的事。这么一来，《九歌》中初期的神（或鬼）和后来的神（或鬼）的具体内容虽然有所不同，而从结合生活需要和反映生活情况（包括美学观点）来看，精神实质还是一致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理由只能说明《九歌》里《国殇》以外的神鬼，而不能把它来说明《国殇》。我认为，就《国殇》这一作品的产生原因说，当然和其他各篇不能一律看待，但它也是《九歌》里的歌辞之一，这并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国殇》是歌颂战士的，是战斗生活的反映。人民歌颂战士，为的还是要保卫和平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并不是存着“好勇斗狠”的意图，这是我们最优良的民族性格的表现，在过去和现在乃至将来都是这样。所以在反映生活的比重上来说，这种生活的反映和爱情生活的反映，就不等于“一半对一半”。把它放在人们最爱好的歌辞——《九歌》里面而又只有很少的分量，人民这样的安排，还是合情合理的。

《九歌》的艺术形式是经过屈原加工过的，它里面（《国殇》除外）神奇变化的动作，真挚曲折的爱情，珍贵华丽的服饰，美妙芬芳的景物以及铿锵和谐的音调，处处都达到了美学的高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迷人的世界。读《九歌》的人，不

管理解它或不理解它，总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觉得美丽芳香，缠绵悱恻，在莫名其妙中捕捉住自己的心灵。一种文学作品，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作者就不仅要有丰富的生活内容，同时也必当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并运用极其巧妙的表现手法。在这里，我们把《九歌》看成屈原加工后的作品，就有足够的理由。而屈原把民间文学——《九歌》提到很高的地位，也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另一种巨大的贡献。

《九歌》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它刻志着深厚的爱情，具有高超的想像，同时处处都呈现出美妙的境界。现在，我想从这几方面约略谈一谈：

首先，我们谈谈它里面所刻志着的深厚的爱情。爱情的描写，是《九歌》的主要内容，因此有人认为它全部都是写“人神恋爱”。其实，这只是一种宗教仪式的表现，更正确地说，这是把人的恋爱生活寄托在神的身上，而这些神的恋爱生活即反映了人的恋爱生活。爱情的活动是相当复杂、曲折的，其表现方式是多样性的，然而深厚的爱情，就必然是植根于纯洁健康的基础上。《九歌》里的关于爱情的描写，就是从纯洁健康的基础出发而包蕴着各式各样的表现方式。概括说来，有这么几种表现：有互相追求的，有互相思慕的，有殷勤投赠的，有反语指责的，而有个别地方也描写了相将游乐的情况，洋溢着欢欣愉快的心情。这一切，都显示着此方对彼方的十分真挚的、天真活泼的爱，真实地反映了人间世上所具有的深厚的爱情。举例来说，如《湘君》里这一段：

驾飞龙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悱恻（悱恻）！

写决心追求的情况，多么具体、明朗！写追求不得时的痛苦难堪

的心情，又是多么深切！《九歌》里像这类的描写虽然也不很多，但另一方面，写互相思念的却处处可以看到。如“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云中君》）“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系一种乐器——排箫）兮谁思！”（《湘君》）“沅有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等等，都是表现相思眷恋的情怀的。至于像《山鬼》里的：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这种从自己的思念爱人而联想到爱人也必然在思念自己的写法，尤其刻挚而深透。

从体会对方的心情出发，希望连结对方的爱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殷勤的投赠。如《湘君》里的：

捐余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崑（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湘夫人》里的——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裸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崑（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大司命》里的：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老冉冉兮既极，不寔（渐）近兮愈疏。

愿把贴身珍贵的东西，或者平生爱好的东西，赠给所爱的人乃至所爱的人的“下女”，来表示他（或她）的深挚的爱。尽管具体内容各有不同，在《湘君》、《湘夫人》里最后是自宽情怀的表现，在《大司命》里最后是越发愁思的表现^①。但期待会合的心愿是一致的；为了固结对方的爱，使爱情的火花能够永远燃烧着，才把自己爱好的东西赠送对方，并说明时光年华的可贵，这

^① 《大司命》在“不寔近兮愈疏”的下面是“乘龙兮骖辚，高驼（驰）兮冲天。结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

些也没有什么差别。为了爱情而赠送东西的情况，在《诗经》里已有，如《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是明显的例子。虽然《木瓜》里所写的是互相投报，和这里所举的例子只是单方投赠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可是为什么要把东西送给爱人这一点，这里没有说到的而《木瓜》篇却很明白地说出来了，那就是“永以为好也”^①。

在《湘君》里还有运用指责对方的语气来表现她（湘夫人）的喜爱的，如：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又如：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这从表面看来，好像双方的爱情已经破裂了似的，实则这样的说法，正是越发体现出她对湘君的爱情的深厚和热切。打个比方，像后来陆淞（陆游的兄弟）有一首《瑞鹤仙》词，里面这么说：“待归来，先指花梢教（叫他）看，欲把心期细问，问因循过了青春，怎生意稳？”这种质问的口吻和上面的指责比较起来是温婉得多了，但都是从迫切期待的心情出发，从深厚的爱出发，却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关于写欢欣愉快的爱情生活的，《九歌》里只《河伯》一篇最精美动人。《河伯》一篇可以说完全以游乐的姿态出现。其中如：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

这种纵情游乐、流连忘返的写法，在《九歌》里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归结处写到

^① 《诗经·卫风·木瓜》凡三章，每章的结句都是“永以为好也”。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兮媵（送的意思）予。

这种热闹的场所，深长的情思，也具有高度的吸引力。这是祭河神的歌辞。有人认为这是歌咏河伯娶妇的情事，当然不可靠，河伯娶妇，人民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如果剔除河伯娶妇的传说中的不合理的成分，而专节取娶妇时最热烈的一个场合，那也是很可能。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就往往在于能够吸取神话传说中最精彩的一段来表现自己的主题思想。《湘君》、《湘夫人》和《山鬼》等篇的题材，都可能从旧有的神话传说中加以适当处理后作为自己描写的一部分资料的，不仅是对《河伯》一篇可以从这个角度看。

以上是就《九歌》里描写爱情的各个方面的表现手法说。如果单从这些地方看作者的表现手法，也许有人会感到割裂破碎，因为诗歌虽不一定有情节结构，而《九歌》是有情节结构的。《九歌》在《楚辞》里是比较短的诗篇，它里面各篇的情节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不像《离骚》一样，因此，我想对《离骚》的情节结构多说些，而在这里，只提出《少司命》一篇作为一个例子略说一说。

《少司命》是主管人们的子嗣、掌握孩子们的命运的神。按照原来人们对这种神的愿望来说，主要的意义应该是在结尾一段“抚彗星”、“拥幼艾”、“为民正”等。可是作品的本身是作为反映悲欢离合的实际生活而出现，而取得持久的生命力的，人们从这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也和在其他一些作品如《湘君》、《湘夫人》中所感受到的一样，是爱情的生活，而不是原来的祀神求福的意义。因此，我们固不必要否定它在当时的主要作用，但也不能把原来祀神的主观意图作为整个作品的主题思想，而应该从作品本身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和它所产生的客观意义出发来看它的主题思想，从而看出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一切曲折复杂的情节结

构。

作品一开首是这么写着：

纒（秋）兰兮麋（靡）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一作华），芳菲菲兮袭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从美妙动人的氛围中引出愁苦，不该有的愁苦。接着又这么写道：

纒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再从美妙的氛围中引出愉快，出乎意外的愉快。由于这愁苦，这愉快，都是在特殊环境中茁长起来的，因而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读者心眼中也就不会把它等同于一般的悲乐。以下便合写引起悲思和回想快乐的情景：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从点滴细节的活动中，推演出古往今来的人千言万语倾吐不尽的悲乐的大道理来，把典型的性格体现在个别性格里面，使特殊的现象成为人所共有的特征，应该说，这是一篇中最集中的表现，最重要的内容。这里已经把来去的情况和悲乐的心情勾画出来了，下面更将这种情节逐步展开，更具体生动地写，使生活内容更加丰富，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荷衣兮蕙带，儵（倏）而来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谁须（等待的意思）兮云之际？

写来时和去后的具体情况，和上面的“入不言兮出不辞”两句是相照应的。而用“儵”、“忽”和“谁须”这些感觉和意念，就越发具体地表露出自己爱恋对方的内心活动。因为一个人当爱恋对方到了入迷（达到最高度）的时候，即使双方经常来往，

也会产生“去便不来来便去”^①的感情的。比方，你所爱恋的人分明说明天再来，但当你等待的时候，焦迫的心情会使你觉得她（或他）“去便不来”；你所爱恋的人分明是自早到晚都和你在一起，但当她（或他）要去的时候，依恋的心情会使你觉得她（或他）“来便去”。这在有恋爱经验的人都能够体会到的。因此，这里所写的虽然只是对方的动态，但却深刻地体现着爱恋者共有的心情。

与女（汝，下同）沐兮咸池^②，晞女发兮阳之阿。望媿（美）人兮未徕（来），临风恍兮浩歌。

写想望对方来时共同游乐和想望对方未来时的独自悲歌的情况，更具体、更形象地来充实上面所指出的悲乐的内容。

孔盖兮翠旌，登九天兮抚彗星。怱（挺拔的意思，一作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

这是提出了最后的要求，作为祀神歌辞的主要的作用。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篇作品的情节结构是很完整的。作品中所描写的悲欢离合的情景，都是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是从实际生活中体会出来的一种结论。就两千多年来人们的普遍使用，已经肯定了和证实了这种结论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固不消说；就是前前后后写出悲乐的产生和发展，也作合情合理的安排，使人感到每一个句子，都成为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构成了整个作品的

① 欧阳修《玉楼春》词：“湖边柳外楼高处，望断云山多少路？栏干倚遍使人愁，又是天涯初日暮。轻无管系狂无数，水畔花飞风里絮。算伊浑似薄情郎，去便不来来便去。”

② 普通的本子在这句上面有“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二句。古本无此二句，王逸无注，洪兴祖补注说：“此二句《河伯》章中语也。”这是对的，现在不引它。

完整性，使得所要表现的主题越发突出地涌现在读者的眼前，具有极其高度的艺术魅力。

应该指出：篇中虽然是悲乐并提，也悲乐分写，但主要的一面是在悲愁，通篇都贯串着不能达到恋爱目的的悲愁情绪。《九歌》里写爱情生活的绝大部分是如此。就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看，就渗透屈原个人的思想感情看，也应该绝大部分是如此。这是完全符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其次，我们来谈谈《九歌》里所具有的高超的想像。《九歌》里所出现的脚色虽是想像中的神，而这些神的精神动作、意志性格、思想感情等等却都是现实生活里有血有肉的人的化身。因此，作者虽渗入了一些神化了的和美化了的情节和境界来作娱神的歌曲，而仍具有真实的现实生活的内容，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爱好。又，《九歌》里所表现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比之实际生活中的现象应该是更高的，更能够给人以新鲜的感觉的。在这里，想像力就可能发生更大的作用。当然，任何想像力的运用，都应该有其现实的基础，才可能为人们所接受。例如《云中君》里的：

灵皇皇兮既降，焱（焱）^① 远举兮云中。

《大司命》里的：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澆尘。

《东君》里的：

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蛇）。……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酒浆。

《河伯》里的：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

这一类对神的描写，都不是现实社会所能有的情况，然而读者并不因为这是“向壁虚构”的东西而感到有什么隔阂。到后来像

① 这个字朱熹本作焱。注：“焱、卑遥反，其字从三火。”王逸本作焱。洪兴祖补注：“焱、卑遥切，群犬走貌。《大人赋》曰：焱风涌而云浮。李善引此作焱，其字从火，非也。”按《说文》焱部：“焱、火华也，从三火。……以冉切。”犬部：“焱、犬走兒（貌），从三犬，甫遥切。”又《尔雅·释天》：“扶遥谓之焱。”注：“暴风从下上。”这里的“焱远举兮云中。”分明是急起直上到云里去的意思。洪氏补注指出李善引《大人赋》作焱的错误。朱氏《楚辞辩证》引《大人赋》作焱，并且说“其字从三火，盖别一字也（不是《说文》从三犬那一个字）。此类皆当从三火。”朱氏已经看过洪氏的补注，也应该明白《说文》有音以冉切的焱字，“当从三火”的说法，不知何据。既从三火，在注文里又注“卑遥切”，和从三犬的焱字同音，尤不易理解。照我看，在没有找到作焱的充分证据之先，还是从王逸本作焱为是。因本书引原文都从朱本，故仍作“焱”而夹注“焱”。

李白的“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①张孝祥的“尽挹（一作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②之类，在现实生活里写自己的胸襟怀抱，也把这一类的材料自由使用了。这原因就在于，《九歌》的作者在写这些神的时候，都给予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从现实社会中的人物的基础出发，以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来刻画神，使这些神的一切活动及其所处的环境都和他们特定的身份地位相吻合。这样，就不会使人读了产生虚伪之感。又，神是人的理想中的东西，这观念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着的，因而写神比写人就越发可以驰骋其高超的想像力，发挥其高度的艺术技巧，神化他们，美化他们，把作品引带到美学的顶峰，使得更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再次，我们来谈谈《九歌》里面呈现出来的美妙的境界。

《九歌》里除《国殇》一篇以外，我们在每一篇中都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情景，其中使人历久不忘的尤其是那美妙的境界。美妙的境界是一切诗歌中吸引人的主要的因素。它不但表现在色彩的明丽、景物的新奇、材料的丰富等等这些占有着空间地位的表面现象上，一切形象的塑造，登场人物的活动，乃

① 李白《短歌行》：“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麻姑垂两鬓，一半已成霜。天公见玉女，大笑亿千场。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

② 张孝祥《念奴娇》：“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银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一作吸）西江，细斟（一作倾）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一笑（一作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至一片叶子的降落，一个声音的发出，一次眼光的投射，都能够引起人们的美妙之感。似乎可以这样说：凡是人们已经仿佛感觉到或者意想到的一种美妙的东西，但是还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甚至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的机缘，一旦在作品里亲眼看到了，这就自然而然地会引起自己的美妙之感。而具有这种引起人们的美妙之感的東西，都可以说是该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美妙的境界。当然，由于各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观点种种的不同，有些某甲认为美妙的东西，在某乙看来却并不美妙，甚至还会相反地认为是丑陋。可是，也有一些美妙的东西，其本身就不和“社会意识”相结合，能够感动一切时代的各个社会集团的人们的；也有一些美妙的东西，其作者虽然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创造出来，而读者却抛撇了作者的立场观点而从另一方面——和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共通之点这方面去接受它的。

《九歌》中凡叙述祭时的歌舞的丰盛，祭者服饰的华贵等，当然也能够引起人们的美妙的感觉，对后来也有相当的影响，像民间祭神的装设和仪式，统治阶级的祭祀的堂皇华丽的排场以及演出这一类的戏剧的舞台艺术，都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可是，这一切只是属于场面的点缀和形象的罗列，艺术价值不高。真正美妙的境界，应该是含有饱满的情绪、深长的意致的，应该是建筑在深厚的感情上面的。因为只有这样的美妙的境界，才具有更大的感人的力量，才具有很高的美学的价值。如历来所传诵的《湘夫人》里的这一段：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湘君呼唤湘夫人说：“高贵的公主啊，你快些降临来这‘北渚’吧！我已是望眼欲穿，满怀愁绪了。那秋风又阵阵吹来，洞庭湖

里起着微波，树上的黄叶片片飘落。”^①从这里，我们仿佛看到遥远的地方隐现着一个美丽华贵的公主，许多侍女簇拥着；这边有个装束漂亮的佳公子，仰着头儿在怅望，伸出手儿在邀请，旁边是一片渺茫的湖，湖上波纹绉起，湖边有不少的树，树上的叶儿纷纷坠地。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又是多么美妙的画面！又如上面所举的《少司命》里“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那一段，由于情景配合得很好，也是极其美妙的境界，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因而也传诵千古。写得尤其淋漓尽致的如《湘夫人》里这一段：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粲（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罔（网）薜荔兮为帷，擗蕙榜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②，缭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为了要跟“佳人”过着美好的生活，就把一切芳香怡情、精巧

① “帝子降兮北渚”句，一般都作帝子已降临到北渚解。我觉得作为当帝子未降临时邀请她降临的语意解释，和下面联系得更紧密。

② 闻一多《楚辞校补·九歌·湘夫人》在“芷葺兮荷屋”条旁注“一本葺下有之字”，下面案语说：“案当删芷字，从一本於葺下补之字。（此因之先倒在葺上，文不成义，读者以篆书之止形近，遂改之为芷，即成今本。一本又据未倒之本于葺下仍补之字，则成“芷葺之兮荷屋。”）‘葺之兮荷屋’与上文‘葺之兮荷盖’句法文义并同。屋，古幄字。荷屋犹荷盖，（《独断》下“黄屋者盖以黄为里也。”《汉书·陆贾传》注“黄屋谓车上之盖也。”）皆谓荷叶耳。‘葺之兮荷屋’又与下‘缭之兮杜蘅’文相偶俪。……”闻先生这说法，我认为是很正确的。

悦目的东西收拾在一起，构成一个最适合于“偕逝”的场所。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从侧面的描写来显示出湘君对湘夫人的爱情的深挚，期待的殷切。在这样的美妙的境界中，便包蕴着无比深厚的情味；而“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的盛大场面的出现，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了。

从《九歌》里所表现的深厚的爱情，高超的想像和美妙的境界看，都可以说明《九歌》是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的作品，而这高度的艺术性和作者的高度的思想性分不开的。因为思想性是艺术性的核心。只有作者具有丰富的人生体验，从深广的现实基础出发，才会深刻地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并创造出许多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愿望的人物形象和美妙情景。自然，作者的艺术修养也是必要的条件。像《九歌》这么美丽的诗章，如果没有很高的艺术素养的人是决然写不出来的。

最后，试谈谈我对《九歌》里的《国殇》一篇的看法。

《国殇》是《九歌》里最特殊的一篇，它的主题思想、具体内容和表现方法都和《九歌》里其他各篇不很协调。因此有人认为这篇不该和《九歌》里其他各篇搁在一起。这种看法我不同意，我在上面已经提及了。可是，《国殇》这一篇，确有其独特的风格。我们固然不同意把它扔出《九歌》以外，但也不能不把它和《九歌》里其他各篇分别对待。如果我们说《九歌》里其他各篇是“优美”，这《国殇》就该说是“壮美”；说《九歌》里其他各篇是反映爱情生活，这《国殇》就该说是反映战斗生活；说《九歌》里其他各篇是歌颂自由恋爱的精神，这《国殇》就该说是歌颂英勇的战士，具有爱国主义的精神。这些区别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国殇》里的：

操吴戈（一作科）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这是多么剧烈的战斗情况！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一作身）离兮心不怨。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这种坚强杀敌的意志，凌厉无前的气概，十足是为国牺牲的战斗英雄的高贵品质的表现。这是一篇祭歌，也是一篇颂辞。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应该是一致的。作者既然要歌颂战斗英雄，就必然要运用适当的语言、色彩、声调等，通过人物的性格、感情、动作等等的描写，在作品中造成强烈的气氛，惊险的局势，使读者纵然在细节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出活动人物的英雄本质，而从整个作品看来更感到确是产生英雄人物的特殊的伟大的场面。这样，就当然不像那描写爱情生活一般，可以从“一波三折”的语言和“缠绵悱恻”的情调中体现出来。因此，《国殇》这篇的写法就和《九歌》里其他各篇的写法不一样，作者是用了极其沉着的笔触、极其亢奋的情调来进行创作的。内容方面，只是吸取现实中的材料加以提炼和集中，没有运用高度的想像力创造出华丽美妙的境界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因为美好的恋爱生活，在当时的人民群众中还是一种幸福生活的理想的追求；而惨烈的战斗生活，在当时已成为极其普遍的现象，就当前的战争事实，已足够作为表现的题材了，况且，人民群众本来就不是愿意战争扩展下去的，因而就不必要也不应该把战争作为爱好的对象而加以夸张。至于表现不同的主题思想，应该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这当然是《九歌》的作者能够掌握的原则。因此，《国殇》既然不必抛出《九歌》之外，同时也必应具有和《九歌》中其他各篇不同的独特的风格。

总之，《九歌》的真实性，是在于它能够深刻地反映当时楚国人民一部分生活的真实情况。楚国在当时，已是生产力相当发展的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水平，在这种情势之下，楚国人民对于生活方式的改善有进一步的要求，是极其自然的事。可是，这种要求，是不容易达到的。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被

统治阶级的劳动果实是一贯地被剥夺的，被统治阶级的幸福生活，是一贯地没有实现的可能的。这样，劳动人民对于有利于自己进行生产的自然界发生爱慕，而对于剥夺自己的幸福生活的统治阶级满怀憎恨，也是极其自然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九歌》的意义，在人民借着自然界的现象来体现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歌颂自己的自由恋爱的另一面，也就或多或少含有反抗统治阶级的意识，也就是说，是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一种表现。在封建社会里，歌颂自由恋爱精神的作品，多少都含有打破封建枷锁的意味，我们对《诗经》里许多表现自由恋爱的诗歌是这样看，对《九歌》也可以这样看，不过《九歌》尤其曲折地通过自然山川的神（或鬼）表现出来罢了。

八 离骚

屈原的作品，最早被提出的是淮南王刘安给它作传的《离骚》^①。在屈原作品中，最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斗争过程和政治理想，以及最突出地标志着他的文学的独创性和特殊性的也是《离骚》。从《离骚》里不仅可以看到屈原的伟大的精神、高贵的品质，可以看到当时楚国的真实面貌，同时在一定限度内也可以看到那个特定时代的矛盾斗争的社会现实。

《离骚》共 373 句，2477 字^②，是屈原作品中一篇最长的带有自叙性的抒情诗，也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诗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

关于《离骚》这一篇名的解释：司马迁解作“离忧”，班固

① 《汉书·淮南王安传》（在《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内）：“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武帝）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② 一本在“夫惟灵修之故也”的下面，有“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两句 13 字。洪兴祖补注：“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九章》（按指《抽思》篇）曰：‘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与此语同。”现在不把这两句计算在内。

解作“遭忧”^①，王逸解作“别愁”^②。梁章钜《文选旁证》引项安世的《项氏家说》：“《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迓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又引王应麟《困学纪闻》：“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扬雄为畔牢愁，与楚语注合。”近人游国恩先生认为楚国有劳商之曲，离骚和劳商的声音相近，可能也是楚国古代一种歌曲的名称^③。文怀沙先生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加以引申，认为离字的真义是离间，《离骚》正是写的谗邪离间的忧愁幽思^④。在这许多说法中，我认为用楚国的方言来解释《离骚》，可能更切合实际。把方言来命题，尤其是作为这么伟大的诗篇的命题，一般看来，会觉得很不相称的，然而在爱好民间文艺同时又喜欢运用楚国方言的屈原看来，这可能就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题目。

屈原作《离骚》的时期，有人主张在楚怀王时^⑤，有人主张

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② 王逸《楚辞章句》：“离、别也，骚、愁也。”

③ 见《楚辞概论》和《屈原》。

④ 见《屈原离骚今绎·附录三》。

⑤ 刘向《新序·节士》篇，班固《离骚赞序》，王逸《离骚章句序》，应劭《风俗通六国篇》，王夫之《楚辞通释》等。

在顷襄王时^①。我同意后一种说法。理由是：楚怀王曾经和屈原密谋变法，重用屈原为左徒，任屈原为三闾大夫，又曾叫他两度出使齐国，基本上是肯定屈原的才干的人，虽然受群小和秦国间谍的包围而疏远他，有必要联齐时还会起用他的。楚怀王对屈原既然不是完全断绝了念头，则屈原当楚怀王的时候，应该也不至于动自杀之念，而《离骚》里已经很明显地表示着他回朝无望，决心自杀了。这种表示，我认为是在顷襄王时才有可能。

《离骚》的具体内容很复杂，因而各人的说法不同，现在就我的看法作如下的说明：

（一）先叙述自己的世系、名字、性格、才能和修养，表示他有可能很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然后说出自己愿引导楚王，为国效忠。（自开首至“来，吾导夫先路！”）

（二）指出应走的道路和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自“昔三后之纯粹兮，”至“伤灵修之数化。”）

（三）说明要培养干部以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要和敌党作斗争，至死不变。（自“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至“愿依彭咸之遗则。”）

（四）申述为人民、为祖国而斗争，虽然遭遇到一切的阻力，也只有容忍坚持，直至贡献出最后的生命，怎样也不肯委曲投降，同流合污。（自“长太息以掩涕兮，”至“固前圣之所

^① 这里又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在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未立时，如龚景瀚的《离骚笺》；有的主张是在楚怀王客死时，《离骚》始作的，如王茂元《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有的主张在顷襄王元年至四年初放未召时作，如王闾运《楚辞释》。近人游国恩《楚辞概论》、《屈原》，郭沫若《屈原研究》都主张作于顷襄王时。游先生并引《四库提要》所载顾成天“《读骚别论》”，主张《离骚》作于顷襄之世。

厚。”)

(五) 抒写或进或退或去国的复杂矛盾的心情，而归结到必须按照本来的意志做去，怎样也不能变更。(自“悔相道之不察兮，”至“岂余心之可惩？”)

(六) 假托女嬃的责备和自己和重华的申诉，来显示出自己的品质的高贵和主张的正确。(自“女嬃之婵媛兮，”至“沾余襟之浪浪！”)

(七) 为了实现自己根本改造楚国的理想，从各方面作重大努力，但终于不能实现；叩帝阍见阻，求宓妃不得，想要见“有娥之佚女”，恐已落在“高辛”的后面，寻“有虞之二姚”，又“理弱而媒拙”。这样以最大的努力来企图理想的实现，而仍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感到内心的矛盾极为难堪，下面不能不转而问卜求神了。我们只看里面“忽反顾而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和“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这些说法，就可以体会到，他写的虽是天上，还是由楚国的现实基础出发的，写天上仍是写人间，天上的情形正是人间的影子。(自“跪敷衽以陈辞兮，”至“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八) 假托灵氛、巫咸占卜中的说话——灵氛劝他去楚求合，巫咸劝他留楚求合，他表示自己的意见，因而极其深刻地写出楚国一班坏人的为非作歹的情况，连自己所培养出来的青年也

变了质，降附敌党。（自“索蓂茅以鹭筭兮，”至“周流观乎上下。”^①）

（九）由于灵氛的劝告，就打算远行了——“吾将远逝以自疏”：转道昆仑，周流四方，由天津到西极，涉流沙，遵赤水，经不周，指西海，听《九歌》，看舞《韶》，真正作了一番神游。可是，一回头看到楚国，又悲从中来，连赶车的人和挽车的马，都眷恋楚国不忍前进，那又怎么可以离开祖国和人民而偷安取乐呢？他情愿牺牲个人的利益而忠诚救国的坚强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对比之下，已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来了。（自“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顾而不行。”）

（十）全篇的总收束：国内那班人（指执政权，和下面莫足与为美政的人一样）既然没有一个是知己了，又何必苦苦怀恋故都？正确的政治理想已经没有人理会，没人合作了，只有准备以身殉国。（自“乱曰”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我们对《离骚》这一伟大诗篇的具体内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才可能进一步来研究作者在这一作品中所表现的创作思

① 这里面对巫咸说话的看法，各人不同：朱熹（《楚辞集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方苞（《离骚正义》）、林云铭（《楚辞灯》）、龚景瀚（《离骚笺》）、谢无量（《楚辞新论》）等认为截至“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句；李光地（《离骚经注》）、梅曾亮（《古文词略》）、马其昶（《屈赋微》）等认为截至“恐嫉黷而折之”句；吴汝纶（《点勘史记》）认为截至“莫好修之害也”句；姚鼐（《古文辞类纂》）认为截至“周流观乎上下”句。近人文怀沙（《屈原离骚今绎》）同意朱熹等的看法；刘永济（《音注详解屈赋定本》）、郭沫若（《离骚今译》）同意李光地等的看法。我也认为李光地等的看法比较正确，“时缤纷以变易兮”以下，应系屈原的说辞。

想，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

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一文中研究俄国古典文学的特点时曾着重指出，俄国每一个作家都具有深奥的独创性，但是所有一切古典作家都有一种共同的愿望：百折不挠地力求体会、觉察国家和人民未来的命运，预测这一命运^①。高尔基这些说法，对我国伟大的古典作家也是完全适用的。屈原的《离骚》的创作思想，主要就是从他“百折不挠地力求体会、觉察国家和人民未来的命运、预测这一命运”这一主导思想出发的。屈原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未来的命运而斗争的精神，在《离骚》里充分地表现着。“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是他不能不向一切危害国家人民的反动力量作斗争的最大的动力。这斗争是整个国家人民交付给他的任务，也可以说是在当时作为一个伟大文学家的历史任务。这任务，只有屈原肩负起来。在这以前，就没有一个文学家（其实，连一个文学专家也没有）肩负过这么神圣而重大的任务。正因为他和国家人民未来的命运有密切的联系，对国家人民未来的命运寄予无比迫切的愿望，对当时国内外的情况经过细心而深入的研究，他才下了最大的决心，坚持正直的主张，和那班投降派斗争到底：“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才愿受一切的委曲，希望争取楚王的信任来挽救这个危机，怎样也不离开乡土：“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鬪；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才惋惜楚王受奸党的包围，自告奋勇，要领导他前进：

^① 见缅斯尼柯夫《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所引。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导）夫先路！”很明显，他是在他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因而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也就是他热爱祖国和同情人民的伟大思想的具体的同时也是集中的表现。创作方法是和创作思想分不开的。作者既然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创作，与之相适应的创作方法，也就不会停留在仅仅描写“客观的现实”这方面，而要透过联想和想像，塑造出许多美丽的形象来标志着他的革命的、进步的精神。因此他虽以社会现实为基础，但已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氛，富有幻想、神秘的色彩，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对以前的《诗经》，是一个大大的革命，也是一个飞跃的进步。他是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进一步要干预现实、改造现实的基础上来发挥他的浪漫主义的精神的。这就使得他所表现出来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具有足够的反抗性和战斗性，而不是虚伪和粉饰，颓废和空虚。例如他在作品里面所描写的女嬃对他的责备和自己向重华的申诉：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菘菘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茷独而不予听？……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精细地观察人生的途径）。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陆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鉴而正衲兮，固前修以蒞（蒞）醢。

这正是说明他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和惟一正确的主张。又如他所假设的灵氛之占：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曰（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汝）？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

劝他离开楚国，到处都有人需要他，不必老是眷恋故乡；巫咸之告：

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

亦犹其未央。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菱然而蔽之？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劝他勉强求合，正当有为的年岁，楚国也还是可以有为的时候，不必太过于倔强，来招受党人的迫害。这一切，也还是从各式各样的想法和做法中来更加有力地表现他热爱祖国的无比忠诚的思想感情。至于他描写了一番大神游之后把笔触转到瞻睨旧乡，是他的爱国思想的表现，那更不消说了。所以他尽管写了许多超现实的现象，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氛，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地围绕着他的爱国爱民的主题思想来生发的。而要实现他这种爱国爱民的心愿，就当时的楚国来说，是需要通过坚强的反抗和战斗的力量的，因而在他所创造出来的超现实的境界中，也即是在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氛中，都具有积极的斗争的精神。从危机四伏的现象和光明美好的前途的对比中，从卑鄙无耻的做法和贞洁高贵的品质的对比中，从其他种种的对抗性的矛盾冲突中，极其深刻地体现出这种精神。他这一类的描写，都是通过现实，加以想像和夸张，从而批判现实，指导现实的。在作品里，他用种种的表现手法揭露了当时黑漆一团的祸国殃民的统治集团的丑恶面貌，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抨击；同时他还塑造出各式各样的形象来体现并确定应走的途径。他在里面虽也表露着悲苦的情绪，但直到最末了，“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也还是坚持斗争到底以身殉国的精神。他这样的来表现悲苦，是能引起人们的同情的，在唤醒并加强人们“对现实及现实的一切的压迫的反抗心”^①上，是具有积极的作用的。事实也证明了，它给楚国人民在反抗和推翻暴秦方面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屈原这种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基本上就是他热爱祖国、同

^① 见缅斯尼柯夫《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所引。

情人民以及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密切联系的具体表现。如果只看它里面流露着悲苦的情绪，就认为是抒写屈原个人的身世之感，而忘却了这种情绪虽包含着屈原个人的身世之感，但更重要的是包含着他对国家人民事业具有无比高度的爱念，忘却了它对人民群众具有莫大的教育鼓舞的力量，这是封建士大夫纯由个人出发的对屈原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布罗茨基主编的《俄国文学史》在论述莱蒙托夫的抒情诗时说：“莱蒙托夫写了许多悲歌。俄罗斯的现实环境使诗人陷于忧郁的沉思，并且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①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观点去理解屈原诗篇中的悲苦的情绪。

由于《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篇伟大的抒情诗，篇幅很长，具体内容很复杂——它反映了屈原的生活、斗争、内心活动和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又由于屈原具有丰富的经验、广博的知识、高超的想像力和杰出的创造天才，这一切都在这篇作品里充分表现出来，即使在一些小节的描写上，也具有吸引人的魅力，给人以极其难忘的印象。因此，历来的读者，虽然根据各人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作出种种的评价，但对它的伟大的意义还是肯定的。就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些对它的看法来说，给与最高评价的是刘安，说它兼有《国风》、《小雅》的长处，

^① 见《俄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 1955 年版，中卷 473 页。

可“与日月争光”^①。班固虽不同意刘安肯定屈原的人格的说法，但也称赞《离骚》是“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效法）其从容”^②；王逸尊它为经^③；萧统《文选》除尊它为经外，还把它当成一种特殊的文体^④；刘勰在《文心雕

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以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据班固《离骚序》，这段文字，是刘安所作《离骚传》的序文，给司马迁引用的。

② 班固《离骚序》：“然其文（指《离骚》）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

③ 见王逸《楚辞章句》。

④ 萧统《文选》首列赋，次诗，再次就是骚。

龙》里专写一篇《辨骚》来论述《楚辞》^①。后来涉及《离骚》的论调虽还不少，大约也不会超出这几种论点之外。总之，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是可以指出的，那就是：在我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除《诗经》以外，没有一种作品的位置会比它高，没有一种作品对后来的影响会比它大。我国古典文学，历来都是“风骚”或“骚雅”并称的，“风”和“雅”指的是《诗经》的《国风》和《小大雅》；是代表《诗经》的；“骚”指的就是《离骚》，也代表《楚辞》。

屈原作品所具有的艺术特点，在《离骚》里都可以找到，因而它代表《楚辞》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它的思想内容上，也体现在它的艺术形式上。正因为它是一篇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互相结合的作品，才真正是伟大的作品，才真正能够给予后代以巨大的影响。关于《离骚》里面的人物性格的鲜明突出，想像力的丰富高超这方面，我在上章已经举例说明了。关于语言的精炼和声韵的和谐这方面，比较容易理解，因而也就众口一辞地加以肯定，这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例如：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

①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在论述屈原的作品时，指出有四项是“同于《风雅》”的，有四项是“异乎经典”的。之后，作出这样的评价：“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鯁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依孙诒让所校唐写本有许多不同的字，而对于其中“体慢”作“体宪”，“风雅”作“风杂”，认为应据唐写本，“体宪于三代”，即体法于三代，指同乎风雅的四项；“风杂于战国”，指异乎经典的四项。）”

之败绩。

只 26 个字，把那班贵族当权派的苟且偷安、只图享乐的生活情况，愚昧无知、鼠目寸光、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只知结党营私的认识能力和做人态度，以及他自己和他们作斗争的艰巨性和不能不坚决斗争的目的性，都很扼要而又明确地表现出来，这是何等精炼的语言！又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导）夫先路！

谁读起来都会觉得口腔是很舒服的。这原因不仅在于作者调配音节很齐整，尤其在于齐整中有错综变化。假如作“日与月其不淹”和“春与秋其代序”对称，或者把“来，吾道夫先路”作“吾愿道夫先路”，那就觉得比较平板单调，没有这么灵动活泼了。不但如此，音节的调配，和思想感情的表达是息息相关的，运用一个字，配置一个字，都不能不顾到这一点，这例子中的“忽”字和“来”字的运用和配置，都可以说明这个理由。所谓“声情之美”，声和情是应该融合起来的。我们读古典诗歌，不能不注意这点。过去的熟练的作家，对这种道理没有不加以研究的。在我们今天看来觉得不易理解的问题，在过去的作家看来，已经是不成问题了，因而对这点没有什么解说。

《离骚》里还成问题的，照我看，怕还在于题材方面和结构方面。

屈原写《离骚》，为什么从许多花草树木中来吸取题材？为什么从许多神话故事中来吸取题材？他上下古今、人间天上，无所不谈，才说这，又说那，说来说去，他的主题思想在哪儿？他这作品是怎样组成的？这些属于题材和结构的问题，是最易引起人们的怀疑的。现在我就从这两方面提出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从吸取题材方面说。《离骚》是抒情的诗篇，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可是，屈原在这诗篇中的抒情成分，绝大多数是通过生动而美丽的形象表现出来，并且这些形象，不少是取材于自然界的花草树木。这就使人不易理解。甚至有人对这点认为只可以供童蒙的掇拾^①。这是值得注意的。过去的人，大都是用《诗经》里的“比兴”的传统方法来说明这问题。王逸、朱熹等就是用“比兴”去说明它^②。“比兴”这种表现手法，在《诗经》的《国风》、《小雅》里用得最多，用得最好，可以说是一种优秀传统。但是《诗经》中的《国风》、《小雅》，一般说是短小的抒情诗，较长的如《七月》之类就不用“比兴”了。较多长篇的《大雅》和《三颂》，基本上就不运用“比兴”这种表现手法。《离骚》是一篇 2477 字的长诗，照《诗经》的传统看，是不宜于用“比兴”体的。干吗屈原老是“比兴”下去呢？这就可见，用“比兴”的传统观念来说明《离骚》这类的写法，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我初步的看法，认为这应该联系到屈原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感情去说明它，才能够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屈原虽是一个政

① 《文心雕龙·辨骚篇》：“故才高者苑（范文澜注：疑苑即挽之假字，《集韵》挽取也。）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② 王逸《离骚经·章句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朱熹《离骚经序》注：“其为赋则如《离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托物与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属也。然《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

治斗争的战士，但同时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这是应该首先肯定的。作为一个诗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并不是稀罕的事。我国历来的诗人，常从事游山玩水，坐花对月，关于题咏花草树木的诗章，也为数很多。我们就单看明王象晋编纂的《群芳谱》和清玄烨（康熙）敕撰的《广群芳谱》^②里面所录出的就有惊人的数量。可是，问题不在于仅仅吸取了一些花草树木作为题咏的题材，问题是在于采取什么态度来运用这种题材和运用这种题材来抒写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如果为了玩弄花草树木而题咏花草树木，那就和屈原《离骚》里的吸取花草树木作题材不能等量齐观了。屈原是采取认真严肃的态度，利用花草树木的形象来抒写自己的斗争的经过、悲愤的心情和远大的愿望的。（后来也有个别的篇章学习屈原这种写法，但像《离骚》这样大量运用花草树木来表达深厚而伟大的思想感情的就不易见到。）把花草树木的形象作为抒写具有政治内容的题材，这首先必须要从可以应用它们在政治意义、社会力量上发生什么作用这方面去理解它们，然后才把它们吸取到作品中来，赋予它们以政治意义，而不是把它们当成无聊欣赏的对象。因此，我认为屈原的这种写法，正是他热爱祖国的一种标志，正是他接近人民大众具有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白。如果对祖国没有热爱，就不会对祖

① 《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② 明王象晋编纂《群芳谱》三十卷，内分天谱、岁谱、谷谱、蔬谱、果谱、茶竹谱、桑麻葛芋谱、药谱、木谱、花谱、卉谱、鹤鱼谱12种。清玄烨就王书删并增添为一百卷，叫《广群芳谱》。里面在考释各种名物之后，都录有历来对各种名物的题咏。

国土地上的山川景物乃至一花一草都赋予一定的政治意义，对它们发生爱好或憎恶的感情；如果不是具有人民性的倾向，就不必取那楚国人民所经常接触的、深切了解的东西作为描写的资料。屈原把他正确而远大的政治主张和理想，和他为这主张和理想而坚决斗争的过程以及自己的变化复杂的心情，都通过这作品体现出来，我想，他主要的意图是要向楚国人民申诉的，并不是很简单地像后人的“陈情表”一样，只向楚王陈述冤苦（当然他是愿意给楚王看的），因而他所采取的事物的名称、形态、色泽和特质种种，就不能不是楚国人民所惯见的东西，以博得他们的爱赏和玩味，从而引起普遍的共鸣。所以，我认为屈原的《离骚》里充满了花草树木的形象，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的。

日丹诺夫说：“不是一切能理解的东西都是有天才的，但是一切真正有天才的东西，都是能理解的，而且它们愈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就愈是有天才的东西。”^①《离骚》这一诗篇，是否为当时的广大民众所理解，我们还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证明。但就屈原写这篇长诗的取材看，就屈原在这诗中表达了和广大民众有许多共通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看，就屈原这诗是他的最伟大的代表作品看，它是有被当时的广大民众所理解甚至于爱好的可能的。我们看，先秦诸子尤其是像墨子这类人，他们向广大民众宣传自己主张的文章，应该是广大民众易于理解的，然而绝大多数却是长篇大论，在后代的文人看来，有不少地方也是格格不入，不易理解的。那末，为后代文人所不易理解的《离骚》，在当时能够被广大民众所理解，也并非不可理解的事情。

《离骚》里运用花草树木的地方相当多，举例来说，写自己

^① 日丹诺夫《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的发言》，中译文，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119页。

高洁的品质，不忍同流合污的，如：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擘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𦉳𦉳。”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写时机不可坐失，应该及时效力祖国的，如：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擘洲之宿莽。”

“恐鸱鸒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写培养青年，希望共同救国的，如：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畷（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埃时乎吾将刈。

写敌党的倒行逆流，专权误国的，如：

“户服艾以盈腰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苏粪壤以充帙兮，谓申椒其不芳。”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慝兮，楝又欲充夫佩帙；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祇？……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写辛勤培养的青年，后来变质附敌的，如：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像以上这些例子，屈原都是把所要表达的事状和心情，“花草化”地描述出来的。这就可见他这样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后来一些唯美派或象征派的作者的滥用花草的写法截然不同。

屈原在《离骚》里面运用了许多神话故事，这也和他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感情分不开的。我们知道，神话故事是人民大众所创造同时也为人民大众所喜见乐闻的。屈原是爱好民间文艺的

人，因而也就懂得什么是民间所爱好的东西。他既然要向广大人民诉说他自己的一切——和国家人民有关的一切，又怎么会不迎合他们的口胃呢？因此，他一方面把楚国人民所熟悉的花草树木作为描写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把楚国人民所爱好的神话故事作为描写的资料。我们看《离骚》里所出现的，如“鲧”、“启”、“羿”、“浞”、“夏桀”、“汤、禹”、“羲和”、“望舒”、“飞廉”、“雷师”、“丰隆”、“宓妃”、“高辛”、“少康”、“摯、咎繇”、“傅说”、“武丁”、“吕望”、“周文”“宁戚”、“齐桓”等等，或者是神话中的人物，或者是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在当时都可能是人民经常听到的。至如“女嬃”、“灵氛”、“巫咸”是“信鬼好巫”的楚俗中时常出现的人物更不必说。

正因为历来士大夫阶层中的文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跟人民大众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有很大的距离，而屈原写离骚的取材却处处从后者出发，因而他在当时认为最容易引起广大的读者的亲切之感的极其鲜明具体、生动活泼的形象，而在士大夫阶层中人看来，反而格格不入，不甚了了。士大夫阶层中人埋头钻研它里面所充满着的花草树木、神话故事，已觉日不暇给，又怎么不对屈原这样的写法发生怀疑呢？

其次，从结构方面说。由于《离骚》的篇幅太长了，里面的形象太丰富了，情节太复杂了，而且有不少回环往复、一再申述的地方，就很可能使一般读者觉得结构松散，不易找出一贯的线索。可是，《离骚》的作者的爱楚国、爱楚国的人民、爱楚国的君主以及他自己心情上的许多曲折变化，一般的读者却总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体会得到。也就是说，一般的读者，对它的主题思想，是有相当明确的认识的，对它的结构则很模糊，甚至于不理解。其实，主题思想，是一篇的骨干，是在篇中起着核心作用的。主题思想表现得明朗而突出，正是篇中各个方面都能够围绕着主题思想来发挥力量的结果，也正是篇中的结构紧凑的说

明。我们如果抓住了全篇的主题思想，再寻绎它的具体内容，就可以看出它的结构是很完整的。这是诗，不是论文。诗，尤其是抒情诗，是容许回环往复的。过分直线化，会陷于单调、无味。有时为要使复杂的事状和深厚的感情传达出来，能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使读者受到更深刻的感动，还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申说。问题在于怎样申说也不能脱离主题思想。

《离骚》虽然是一篇篇幅很长的抒情诗，从自然到社会，从人间到天上，形形色色，兼容并包。但是由于屈原要把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忠诚的热情，和为此而奋斗牺牲的精神贯串在全诗里面，作为全篇的主题思想，因之他就处处围绕着这一主题来进行这一长诗的创作。我们看他在每一段的抒情或描写中，毫无例外地要把他的主题思想显示出来。如第一段中的“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第二段中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第三段中的“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这几段显示主题思想的地方，都写得很明白，固不待说。即自“女嬃之婵媛兮”以下几段很多运用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地方，也一样可以看得出来。如“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一类说法，都是屈原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以及和敌党斗争到底的精神的表白。直到“乱曰”以下，还是把自己为什么要奋斗牺牲的理由一总倾吐出来。像这样来安

排章节，我认为系统性是相当严密的，也就是说，在结构方面是相当完整的。

当然，《离骚》里面的抒情或描写部分，都不少重复的地方。例如：表示自己的决心，既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又说“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又说“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又说“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指斥敌党的罪行，既说“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又说“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讎。”又说“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讎。”又说“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慝兮，櫝又欲充夫佩帙。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此外，关于楚王的轻信内奸，关于自己的悲愤郁结等等，都不止一次地说着，说着。像这样的反复申说，是不是繁冗拖沓的表现呢？我认为不该这样看。屈原之所以不惮词费地一再申说，是有其必要的，尤其是抒情的长诗，更有这样说的必要。他必须反复地这样说，才能够使当时矛盾斗争的客观现实和自己的内心活动更加明白清楚地呈现出来，才能加深感染人和说服人的力量，才能够使作品中的伟大的主题思想更加明朗而突出。而在实际上，他这样的反复申说，也已在一定限度内达成了他所以写这一伟大诗篇的主要意图了。这就是上面说过的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离骚》里领会到屈原爱楚国，爱楚国的人民，爱楚国的君主以及他的心情上的许多曲折和变化。不过，也必须指出：像这类的一再申说的句子，必须安放在最合适的地位上，才能够显示出每一个句子的力量——使主题更加突出、结构更加完整的力量，才不会使人感到篇中有一些多余的句子，才能够避免繁冗拖沓的毛病。

由于屈原在《离骚》里明确地提出了他的伟大的主题思想，基于这一个主题思想，他把许多含有丰富感情的、深刻意义的曲

折复杂的情节连结起来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又基于这一个主题思想，他把许多为中国人民所爱好的东西塑造成各式各样的艺术形象；因此，《离骚》就具有完整的结构和活生生的形象。益以深刻的描写，鲜明的色彩，精练的语言以及和谐的声韵，遂使《离骚》成为我国文学历史上第一伟大的诗篇，即在全世界的文学历史上也有其卓越的地位！

九 天问、九章及其他

(一) 天问

《天问》在屈原作品中，是一篇最奇创的长诗。它和屈原其他作品的风格完全不同，全篇都是问题的提出，包括天地自然的现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等，总共提出了170多个问题，用的虽然是诗歌的形式，具体内容却是提出了在自然科学上、哲学上和历史上所存在的问题。以这样的形式来写这样的内容，不但是我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不易找出同样的例子。

“天问”二字的意义，原来都解作问天。据我的看法，全篇内容，都是问题的提出，首先提出的是天的问题，就命名“天问”，正不必认为本来是问天，因为天尊不可问，才倒置其辞叫“天问”^①。

《天问》中首先谈到的是天地开辟以前的问题，其次谈到天文，其次谈到地理，其次谈到人事。人事的部分最多，占全文的三分之二以上。而属于神话传说的，又占人事部分的半数以上。

^① 王逸《天问章句序》：“《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游国恩先生认为：“‘天问’就是天的问题。……天统万物，无所不包，一切天文地理人事的纷然杂陈，变化莫测的现象，都可以统摄于天象天道之中，所以名曰‘天问’。”（见《楚辞论文集》，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291~292页），此说也可通。

由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多数已经失传，而古代的历史故事的记载，又残缺不全，因此，虽经过历来不少注家的努力，仍然有些地方不易理解。还有一些地方可能是编简错出的，例如“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和“延年不死，寿何所止？”语意是相连贯的，“雄虺九首，儵（倏）忽焉在？”和“靡萍九衢，泉华安居？灵蛇吞象，厥大何如？”语意是相连贯的，而现在的本子上，上面四句分隔在两处，下面六句被上面四句中的前两句割裂了；又如关于鲧、禹、夷羿的故事有几个地方提到，都可能是编简上的颠倒错乱。几十年来，发现了许多地底的新资料，经过了学者的考究，有些可以和《天问》互相印证的，例如王国维的《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考出“该秉季德”的“该”即王亥，“恒秉季德”的“恒”即王亘，其名均见卜辞，就足以纠正历来的误解。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诸先生对《天问》中个别问题的解释，也多发前人所未发。以前屈复的《楚辞新论》，曾做过一些移置错简的工作；郭先生翻译《天问》时，更注意错简的整理，把许多原来凌乱的神话故事都串成片段，对研究屈原这篇长诗的贡献尤大。我认为屈原这篇作品在我国古代文化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它的接触面很广阔，提出的问题又很具体，如果能够把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弄得清楚明白，那不仅关系《天问》本身的问题，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史都有莫大的帮助。因此，注释考证的工作固然还需要继续做，就是整理错简的工作也还值得再做的。（当然，整理错简的工作，要很认真严肃，如果因为它对古代传说的排列次序，和一般古书的排列次序不同，就任意编插，那是很不妥当的。）

屈原为什么要写《天问》呢？王逸和后来很多注家都认为是屈原放逐后看到楚国的先王、公卿的神庙的画壁，因而写这首诗题在壁上的。说屈原放逐后写《天问》是可信的，因为里面大量吸收了民间流行的神话故事，而屈原是放逐后才和广大人民

更加接近。但说他因为看到画壁，才写这诗章题在壁上，却有待于资料的证明，看看楚国的神庙是否有这么多的壁画。我的意见，《天问》里的问题，可能是当时广大人民中存在着的问題，通过屈原的主观意识总结性地提出来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的思想的开展、知识的广博和想像力的丰富；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和人民一道并为了人民而热切地探求真理的精神。

《天问》的形式，基本上以四字为一句，四句为一节。但由于提出问题的性质的复杂，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也不能不有所变动。如“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如“简狄在台，岂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之类，都不限于四字一句；又如提到鲧、禹、启、羿等传说，都不限于四句一节。在整齐中寓错综变化，写来就更为生动灵活；加以内容的充实，形象的鲜明、突出，又富有民间文学的色彩，遂成为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篇最奇创的长诗。

（二） 九章

《九章》的名称，现在可考的，最早是见于刘向的《九叹》。《九叹·忧苦》章有这样的句子：“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殫于《九章》。”把《九章》和《离骚》并提，显然把《九章》看成是一个专名了。他的《九叹》的写法，里面分九章，每章独立，结尾都来个“叹曰”，和屈原的《九章》，章章独立的结构也大致相似。但比他稍前的王褒，写《九怀》的方法就有点不同，它虽然也分章写，但最后才来一个“乱曰”收束（有人认为“乱曰”是属于《株昭》章的，这和《九章》的写法就更加不同了）；比他稍后的扬雄，曾把屈原的《惜诵》至《怀沙》

若干篇作品辑为一卷，名叫“《畔牢愁》”^①，也还不是用《九章》的名字。可见，《九章》这名称，在刘向时还不流行，可能是刘向纂辑《楚辞》时才按照篇数替它安上的，在他自己的文章里，就作为一个专名提出来。到班固、王逸以下，就完全把它作为屈原作品的专名了^②。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这看法是对的。

《九章》既然是出于后人的辑录，因而编排的次序是否和写作时期的先后相符合，也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现在看到的最早的本子是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是认为这九篇作品都是“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时所写的^③。他对这九篇作品排列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朱熹《楚辞集注》虽不同意王逸所说的写作时期，但排列的次序并没有变动。后来林云铭和蒋

① 《汉书·扬雄传》上：“（雄）又旁（颜师古注：“旁，依也，音步浪反。”）《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② 班固《离骚赞序》：“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讽）谏。”王逸《九章章句序》：“《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壑（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

③ 见王逸《九章章句序》。

骥都有不同的编排法^①，都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

近来研究屈原作品的人，对《九章》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有人根本认为《九章》里只有《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橘颂》五篇是屈原的作品，其余四篇都是伪作，当然不必计较他的排列的次序（如陆侃如先生等）；有人虽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只是按照最古的本子排下去，当然也不必计较他的排列的次序（如文怀沙先生等）。提出自己排列的意见而自成一种排列的次序的，据我所见到的有游国恩先生的《楚辞概论》和郭沫若先生的《屈原研究》^②。但后来他们的看法又有不同了，游先生在其所作《屈原作品介绍》一文中，“依照时代的先后，把《九章》各篇分为五组。”即：甲、《惜诵》；乙、《抽思》；丙、《思美人》、《哀郢》、《悲回风》；丁、《涉江》、《橘颂》；戊、《怀沙》、《惜往日》。郭先生在《屈原赋今译》里的《九章》的《解题》中，把《悲回风》放在《思美人》下面，把《涉江》放在《哀郢》上面，成为：《橘颂》、《惜诵》、《抽思》、《思美人》、《悲回风》、《涉江》、《哀郢》、《怀沙》、《惜往日》。

《九章》里各篇著作的先后最难判断的是《思美人》和《悲

① 林云铭《楚辞灯》对《九章》排列的次序是：《惜诵》、《思美人》、《抽思》、《涉江》、《橘颂》、《悲回风》、《惜往日》、《哀郢》、《怀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对《九章》排列的次序是：《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橘颂》、《悲回风》、《惜往日》。

② 游国恩《楚辞概论》里确定《九章》的次第是：《惜诵》、《抽思》、《悲回风》、《思美人》、《哀郢》、《涉江》、《橘颂》、《怀沙》、《惜往日》。郭沫若《屈原研究》里确定《九章》的次第是：《橘颂》、《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

回风》两篇，但郭先生把它们放在《抽思》之后，《涉江》之前，我认为还是相当合理的。就篇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看，《思美人》篇，在徬徨怨恨中，还有较多的考虑，有怅惘不甘的心境，“欲变节以从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凭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广遂前书兮，未改此度也。命则处幽吾将罢兮，愿及白日之未暮也。”都可以说明遭放逐不久，但又不得不“独茕茕而南行兮”的情况。《悲回风》篇的悲感的气氛就很浓厚了，“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失望决绝的心情，比《思美人》强烈了很多。到了《涉江》篇的表现，就把这种心情沉静下来了，“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这样的思想感情转变的经过，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不过是我个人的看法，要判断这两篇作品的写作时期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此外七篇中，郭先生把《橘颂》排在第一，我也同意。《涉江》应该在《哀郢》之前，我在上章已经说过了。郭先生以前是把《涉江》排在《哀郢》后面的，后来倒掉过来，虽然没有说明理由，可能也是因为屈原的卒年的关系。如果认为屈原是在楚襄王二十一年投水身死，就没有理由把《涉江》放在《哀郢》的后面，因为《涉江》谈到秋冬的事，而屈原是在那年夏天自杀的。因此，对《九章》的次序，我完全同意郭先生在《屈原赋今译》中的说法：

《九章中》，《橘颂》一篇，体裁和情趣不同，这可能是屈原早期的作品。

《橘颂》以外的八章，便都是失意以后的自述，和《离骚》是一脉相通的。其中有很多十分沉痛的话。著作的先后不易判断。大抵《惜诵》较早，可能是初受疏远时所作。《抽思》、《思

美人》次之，《悲回风》、《涉江》又次之。《哀郢》毫无疑问是顷襄王廿一年，郢都破灭于白起时所作。《怀沙》、《惜往日》，大抵就是蝉联而下的作品了。

1 橘颂

《橘颂》是屈原比较早期的作品。由于篇中有“生南国兮”的说法，有人就认为是屈原在江南途中所见，是他放于江南时候的作品。这理由是不充分的。有人根据篇中“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的句子，说明是屈原早年的作品。这也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更有人认为固然可以看成是他早年的作品，也可以从“归绚烂于平淡”的角度看成是他晚年的作品。这种说法，对文学创作的活动过程，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都成问题，更不能成为一种主张。我是同意第二种看法，认为这是屈原早年的作品的，但理由不光在“嗟尔幼志”和“年岁虽少”这些句子上。仅仅摘作品中个别的句子，是不能说明问题的。要认清作品的总倾向后，个别句子的引用才有助于说明问题。我认为，从《橘颂》的具体内容看，没有表露出一些悲郁愤恨的情思，从《橘颂》的艺术形式看，还是沿用四字句的整齐式的诗体，屈原自己特有的从四字句解放出来的诗歌形式的创造性还未有充分发挥出来，这无论在他一生的生活实践上，在他整个的创作过程上，都体现着这是他的初期的产物。虽然如此，但我们在这作品里面，也可以看出屈原的高贵品质和一生的动向。“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他这样地赞美橘树，已定下了他不肯同流合污，坚持斗争到底的意志；“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尤其明确地提出了他平生所最崇仰的人物。

这篇的主题思想，是歌颂一种坚贞不移的高贵品质。朱熹注引《汉书》江陵千树橘，说楚国正是产橘的地方。这应该是屈

原看到了橘树，就借题发挥，把它来寄寓自己对待人生的认真严肃的态度的。

2 惜诵

《惜诵》这篇名，有几种不同的解释^①，我认为这是很紧缩的写法，解开来说，即是可惜多发言论谏诤楚王的意思。这是屈原被谗见疏时的作品，大约是作于楚怀王时。例如作品里这些句子：“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讎。……”在进言方面，还存在着这样的看法：“欲颺颺以干谏兮，恐重患而离尤。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女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盖坚志而不忍。”在进退方面，还作这样的考虑。又如有这些句子：“怨热羹而吹竅兮，何不变此志也？欲释

① 王逸注：“惜、贪也，诵、论也。”洪兴祖补注：“惜诵者、惜其君而诵之也。”朱熹注：“惜者、爱而有忍之意，诵、言也。”近人游国恩先生的解释是：“喜欢谏诤的意思。”（见《屈原作品介绍》）刘永济先生注“诵”字：“诵、箴谏之语也。”解“惜诵以致愍兮”句；“自惜忠谏以致困穷。”（见《音注详解屈赋定本》）文怀沙先生的《惜诵题解》：“案诵假为颂，惜即爱惜。惜诵乃是不喜欢歌功颂德的意思。”（见《屈原九章今绎》）考《九章》中用“惜”字凡几处：《思美人》的“惜吾不及古之人兮”，《惜往日》的“惜往日之曾信兮”、“惜壅君之不昭”、“惜壅君之不识”，都是可惜的意思，不作别种解释。我认为这“惜”字的原义应该保留。“诵”字作为可惜的对象，则言论、谏诤、忠谏都可通，但不能假为颂扬功德的颂解。至于洪氏惜君的说法，虽也有人同意（如王邦采的《九章笺略》），但这样解释，语意未免太曲折了。

阶而登天兮，犹有曩之态也。众骇遽以离心兮，又何以为此伴也？同极而异路兮，又何以为此援也？”刻志着这么鲜明的创伤和严重的教训；“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疣。忘僂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恐情质之不信（伸）兮，故重著以自明。”怀抱着这么热切的期望，一再要表明自己的心迹。这都足以证明他这篇作品，不是被放逐后所写的。至于“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等句，尤其明显地说明了他才真正了解忠言被谗的来由，对以前蒙在鼓里的情况作批判。这当然不能看成是被放逐后的说法。

这篇的主题，是表现自己忠心为国而被谗见疏，不得亲近又不忍远离的矛盾冲突的心情。“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余闻。申齟齬之烦惑兮，中闷瞀之眈眈。”屈原当时是陷于这样的苦境了。可是，忠君爱国，坚信自己正直的主张的屈原，又不能为了遭受挫折就消极沮丧，不表白自己的光明磊落的心迹以争取他认为还不是完全绝望的胜利（他当时是有相当坚强的胜利信念的）。因此，他发誓赌咒，“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极力洗刷自己的冤枉，“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兑（貌）其不变。”一再表明自己的“情质”，“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这篇作品，就很深刻地体现着这样的思想感情。

3 抽思

《抽思》这篇名，是从作品的少歌里“与美人之抽思兮”这句中节取出来的。但这种节取，并不是可以随便。“抽思”二字的本身，就含有刻意抒写自己的情思的意义，这意义和作者写这篇的情况是相符合的。陆机《文赋》里有“思乙乙（读轧轧）其若抽”的说法，正好作它的注脚。《九章》中的篇名，像《涉江》、《哀郢》、《怀沙》、《橘颂》，都缀有地方或名物；像《惜诵》、《思美人》、《悲回风》、《惜往日》都是用作品中开头二字

或三字。只有这篇《抽思》的命名，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在《九章》中是最奇特的。

这篇的写作地点和时间，都有不同的说法。写作的地点，有人认为是屈原在汉北写的^①；有人认为是屈原被放江南后追叙他在汉北时的情事^②；有人认为是屈原第二次出使齐国时所作^③。写作的时间，有人认为是楚怀王时^④；有人认为是楚襄王时^⑤。又关于作品里，“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看法也各有不同：一般都认为“有鸟”是屈原自比。姚鼐、饶宗颐却认为“有鸟”

① 王夫之（《楚辞通释》）、屈复（《楚辞新注》）、林云铭（《楚辞灯》）、蒋骥（《楚辞注》）、方晞原（戴震《屈原赋注》引）以及郭沫若、游国恩、陆侃如诸先生都认为是屈原放逐汉北时候写的。（蒋骥认为或者屈原谪官汉北，不一定是放逐。）

② 王逸在《九章章句序》中既说明《九章》是屈原放于江南之作，则这篇当然是追叙，但王逸并没有屈原放于汉北的看法。刘永济先生认为这是屈子放被江南之后，追叙屏弃汉北时的情事。（见《音注详解屈赋定本》）

③ 饶宗颐在《楚辞地理考》附《抽思解》中，根据篇中“低𦏧夷犹，宿北姑兮”句，认为北姑即齐国的薄姑，因而判定《抽思》作于屈原第二次出使齐国时。

④ 王夫之、黄文焕（《楚辞听直》）、林云铭、蒋骥以及游国恩、陆侃如先生等均主张写于楚怀王在位时（林、蒋主张在怀王十八年后，游先生主张在怀王二十四年，陆先生主张在怀王十六年）；姚鼐（《古文辞类纂》）、饶宗颐等主张写于楚怀王入秦时。

⑤ 王逸、洪兴祖和郭沫若、文怀沙先生等均主张写于顷襄王时。

系指楚怀王。王夫之、屈复、林云铭、蒋骥和郭沫若、游国恩、陆侃如、文怀沙诸先生都认为汉北是屈原被放逐的地点，但以前有关屈原的史籍和《楚辞》的注家都没有这样的说法。刘永济先生认为怀王疏远屈原时，“闲置之汉北，不令任职中央政府”^①。

我个人的理解，《抽思》这篇的写作时间是在楚怀王在位时，很可能是楚怀王在位的后期；写作的地点是汉北，但不是他放逐在汉北，很可能是像刘永济先生所说的被怀王疏远了屏居在汉北。因为从具体作品看，“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它志。飡吾以其美好兮，览余以其修夸，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愿承间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犹而冀进兮，心怛伤之憺憺。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这一大段里所指的对象，是曾经信任过他的怀王。怀王信任他而中途变卦，不但变卦，反而疏远他，是显然的事实；言而无信，容易动怒，也是怀王的性格。屈原愿“承间而自察”的更应该是对怀王才有可能；顷襄王时，他根本未曾在亲近左右，这话便无从说起。至于“荪详聋而不闻”的“荪”字指怀王，尤其明显。分明是对曾经“闻”过自己的话的人说，这次才能指责那个人是“详（佯）聋”，如果对方从未听信过自己的说话，怎能说他是“详聋”呢？下面说到“愿荪美之可完”，更可以看出这时楚怀王还是在位的，才会产生这种热切的愿望。以后虽然说了许多心情忧郁难堪的话，主要的对象并没有转变，“敖朕辞而不听”的怀王的性格，“愿自申而不得”的愿效忠的心情，也还时时流露出来。我们从未见过记载顷襄王

① 蒋骥先有这种说法，但不像刘先生这么肯定。钱穆主张屈原放居汉北同时为三闾大夫。（见《屈原放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

听信屈原的史实，因而就很难把这作品所表现的情况套到顷襄王身上去。如果作为他在顷襄王时追述他和怀王时的情况，在作品中也找不出明证。有人以为“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就是被放江南时事^①，实则“狂顾”和“娱心”已说明了是他闷极无聊，故意做出这种举动来。至把“道思作诵”作“追思作诵”^②，也只能说明是追思过去的事，不能说明在顷襄王时。因此，我认为这篇作品是屈原当楚怀王在位时作，因为里面有多次谏诤不听的辞意，就可能是楚怀王在位的后期。写作的地点一般都认为在汉北，我同意这种看法。屈原这作品既然写到汉北，那么他曾居汉北是可信的。但他写这作品是在楚怀王时，就不是在被放逐之后。我不相信他在楚怀王时会被放逐，在上章已经谈过了。所以我同意刘永济先生的屈原被疏远屏居在汉北的看法。

这篇的主题是：热望楚王成为一个美德的君主（“愿荪美之可完”）而一再被谗，无从提出自己的意见（“愿自申而不得”），陷于非常悲痛的境地（“望北山而流涕，临流水而太息”），但又无时无刻不关怀家园（“魂一夕而九逝”，“烦冤瞿容，实沛徂兮。愁叹苦神，灵遥思兮”），因而写了这篇诗来解除自己矛盾痛苦（“道思作诵，聊以自救兮”）的心情。由于要解除自己的矛盾痛苦的心情，就不能不叙述所以会产生这种心情的经过，这里面就深刻地描写了楚王怎样受蒙蔽而疏远他的人物性格，同时也表现出自己怎样为祖国不恤牺牲个人利益的正大光明的心境和措施。通过他这一系列的描写与表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当时他和敌党的冲突斗争是多么尖锐，而楚国的危机又是达到多么严重的境地。所以这虽是一篇抒写自己情思的诗章，却极其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① 见刘永济先生《音注详解屈赋定本·抽思篇》。

② 同上。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九章》中，如《橘颂》、《惜诵》、《悲回风》、《思美人》、《惜往日》五篇结尾无“乱曰”，《涉江》、《哀郢》、《怀沙》三篇结尾有“乱曰”，《抽思》这一篇，不但结尾有“乱曰”，在“乱曰”以前，并且有“少歌曰”和“倡曰”。这种体式，以前没有看到，以后也没有看到，是这篇作品所独有的。（说见上章“辉煌的艺术成就”。）

4 思美人

《思美人》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也有许多争论：有人认为是楚怀王时屈原居汉北时作^①；有人认为是顷襄王时屈原被放江南时作^②。这问题不易搞清。但有一点可以从作品中看出的，他对当时楚国的君主已感到失望，他极力在抑止自己的忧思，他创造了许多理想的境界作为抑止忧思的方向，因而在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都不像《抽思》那么沉重和迫切。从这样的具体内容来看问题，说他在顷襄王时作，是很可能的。“车既覆而马颠兮”，“登高吾不说（悦）兮”，“命则处幽吾将罢（疲）兮”，在楚怀王时，老是要争取怀王信任的屈原，怕是不至于说出这样的话的。可是，他又这样说：“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吾且鸢鷗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他想趁着春光明媚的时候，向南进发，来看看一切的情态，里面又有“指嶓冢”、“遵江夏”等说法，如果说这作品是他被放江南时写的，那也不容易理解。关于屈原的史料实在太缺乏了，他在什么时候被放江南？他在顷襄王初立时是否还住在或再屏居汉北？都还不能确实指出。因此，写这作品的时间和地点还不易确定。我只能从作品出发提出一点我个人的

① 林云铭、蒋骥、方晞原等。

② 王逸、王邦采、游国恩先生等。

意见。

这篇的主题和《抽思》不同，《抽思》是刻意抒写忧思，而这篇却是要尽可能地排遣忧思。篇中虽提到不愿意“变节以从俗”，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主要的还是希望解除思虑，“荡志”“娱忧”，因而在意图“荡志”“娱忧”中描绘出许多动人的画面。当然，矛盾冲突的心情，还是贯串在整个作品里。这是屈原入世以后的生活的真实。自己的生活的真实，在自己的任何作品里都必然要流露出来，是掩饰不了的。

5 悲回风

《悲回风》是一首极其悲愤的诗篇，几乎完全是抒写激动的情感，叙事的成分特别少，而且有些是后人从别处错误窜入的句子（如末两句“心绪结而不解，思蹇产而不释”，并王逸的注文都是从《哀郢》那里移过来的，陆侃如、闻一多先生已经指出了）。照闻一多先生的看法，末尾本来有二句，而今本脱去^①；照郭沫若先生的看法，有些过于拙劣的句子，不像屈原的文字^②。因此，要根据篇中个别的字句来判定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不仅不容易，同时也是比较危险的。

① 闻一多先生在《楚辞校补》中，对于“心绪结而不解”两句，旁注云“一本无此二句”。下面的注文是：“然以二进韵例推之，此处盖本有二句，而今本脱之，后人姑以《哀郢》语补入耳。”

② 《屈原赋今译·悲回风》章末句注：“最末二句乃《哀郢》文，即注文亦同。陆侃如、闻一多均谓当删去，是也。但其前四句亦当是抄书者所窜入的别处文字。因文意相反，而语句亦犯复，如‘悲申徒之抗迹’与‘见伯夷之放迹’，相隔只数行，而句同韵同，屈原无此拙劣文字。”

在《九章》中大都是抒情和叙事参用的，虽着重在抒情，仍不少叙事的成分。《悲回风》这一篇却充塞了悲愤的情绪，对造成这么悲愤的原因、经过，都似乎来不及提出或不愿意提出的样子。由于作者要抒写这样的具体内容——火热般的激情的具体内容，这就决定了他用另一种和这内容互相适应的表现方式。他运用了回环往复的写法，如既说“夫何彭咸之造思兮”，又说“昭彭咸之所闻”，又说“托彭咸之所居”，单只彭咸就说了三次；既说“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以自覩”，又说“惟佳人之独怀兮，折芳椒以自处”，不嫌调子的重复；说过“登石峦以远望兮”，再说“上高岩之峭岸”，再说“冯昆仑以澄雾兮”，不厌再三说登山。他运用了许多双声叠韵的连绵字，如“仿佛”、“踊跃”、“惆怅”等都是双声字；“相羊”、“歔歔”、“周流”等都是叠韵字。他运用了许多包含叠字的句子，如“曾歔歔之嗟嗟兮”、“涕泣交而凄凄兮”、“终长夜之曼曼兮”、“路渺渺之默默兮”等。他更重叠地运用了包含叠字的句子，如“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穆眇眇之无垠兮，莽芒芒之无仪”，“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缥绵绵之不可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娱。”这么一来，一方面就使得作者的回荡起伏的心情表现得更加明朗而突出；而另一方面，在音调上也就更加动听，更加富有感染人的力量。

6 涉江

关于《涉江》这篇作品写作的时间和地点，我在上章介绍屈原的生平时已经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了。这篇作品叙述行程非常明白，具体描写的部分也特别多，反映面比较广阔，随着自己的生活实践的转变而转变了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也很鲜明地展示出来，给人以极其明确的认识。我们读了这篇作品，对屈原晚年的生活情况，就可以找到一条比较清楚的线索。毫无疑问，这

是一篇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品。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是篇中的主题思想。正因为屈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驰）而不顾”，“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所以不愿意也不可能“变心以从俗”。正因为处在那腐败的贵族——“党人”掌握国家政权，势焰方张，一切正直的人士受到迫害，不得过问国家大事的时候（“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他观察了许多历史上的事实，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受到的教训，所以不能不感到必然要走向“愁苦而终穷”这条路上去（“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整篇作品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风物景色的描写，都离不开这个中心思想。

由于屈原出身贵族阶级又曾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前期过着极其优越的生活，和他中年以后受敌党的连续打击的生活情况截然不同，他为了坚持要导致国家于美好的前途的政治主张，竟使自己陷于极端危苦的境地，不能挽救国家的厄运。这种两极般的转变，体现在作品里，就成为极其鲜明的两种现象的对照。如开首一段，自“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至“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显示出极其高贵的身份和极其高亢的意志。但经过许多波折之后，自“入溁浦余鼃鼃兮，迷不知吾所知。”至“霰雪纷其无垠，云霏霏其承宇。”就变成一个徬徨无谁告语的人，终日只对着一片荒寒的景象；“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更包蕴着无比悲苦的心情。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如果仅仅为个人利益着想的人，到了危难的关头，未有不“苟合取容”，后悔以前的做法的。可是，屈原就不是这样，他对国家人民的事业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他不能因为个人的利害

而牺牲了有利于国家人民的正直的主张，他归结出这样的一个论点：“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并且从历史上找到了许多事实来证明他这一论点的正确性。这就很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是一个多么不合理的社会，而和这样的社会作斗争的人物是多么值得同情和敬爱。这在一定时期内就具有典型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教育力量。

7 哀郢

我对于《哀郢》这篇作品写作的时间和地点的意见，和《涉江》一样在上章介绍屈原生平时谈过了，在这里，我只就作品本身略加分析。

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取洞庭、五湖、江南等地，烧毁楚王的祖坟，楚国君臣仓皇出走，楚国人民奔窜流离，这是楚国受到秦国一次非常严重的迫害和摧毁。屈原一向是愤恨秦国侵略楚国和楚国内部一班亲秦派的人的，一旦亲眼看见祖国和祖国的人民遭受到敌国这么巨大的压力，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关头，其无比哀痛的心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他就写了《哀郢》这一首极其沉痛的哀歌。

篇中一开首就冲激出呼天的情调，而且首先提出的是百姓人民的灾难[“皇天之不纯命兮（纯作常解，不常命，即反其常道，翻天覆地的意思），何百姓之震愆（受罪）！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在屈原的作品里是第一次看到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祖国的人民是多么的关切！

这是一首抒情诗，通篇都刻志着满怀着悲痛的心情不得不出走而又不忍出走的情况。“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很深刻地体现出他出走时极端矛盾的心情已达到了无可奈何的、不能自主的境地。以下写若干次依恋沦陷的地区，如“望长楸而太息！”“顾龙门而不见”，“背夏浦而西思兮”，“登大坟以远

望”等；写若干次找不出归宿的处所，如“眇不知其所蹠（音只，解作践踏，即立足地的意思）”，“焉洋洋（无所归貌）而为客？”，“忽翱翔之焉薄？”“淼南渡之焉如？”等：都是这种无可奈何的、不能自主的心情的具体表现。

标题是《哀郢》，主要的意义，当然是哀痛郢都的沦陷，如果郢都不沦陷，这作品根本就无从产生。但郢都沦陷，为什么值得这么哀痛呢？他首先提出的“百姓”、“民”，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其次是“国门”。因为郢都是楚国的首都，国家的主要根据地，失掉郢都就失掉国家的主要根据地，热爱祖国的屈原，对此当然是很觉难堪的，所以说“出国门而轸怀”。其次是君主。因为当时君主是代表国家的首要人物，掌握最高的统治权，君主不能安其位，就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政权已经很难维持下去，国家整个濒于解体，因此，过去的爱国人士，总是不能不通过爱君这一环的。（要推翻现政权的当然除外）屈原的爱君，也正是他爱国的表现，所以说“哀见君而不再得”。再次是对故乡和故都的怀念。故乡观念固然不等于国家观念，但爱祖国的人物没有不爱故乡的，何况屈原的故乡正是国都的所在（或在离国都不远的地方）！“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篇中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深切。“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忧其相接，惟郢路之躋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触动了诗人积郁了多年的忧愁，家国之感和身世之感一时奔迸出来，具体而真实地写成诗篇，这就成为作品中最动人的场面。这才合乎“通过个别的东西体现一般的东西”的写作规律，才真正是写生活的本身而不是写抽象的概念。最后，带说那班敌党误国的情况，这在其他一些作品里是主要的内容，但在这里，却不能成其为主要内容了。祖国和人民已经惨遭这样

的浩劫，那班坏蛋已经造成了这样的恶果，现在已来不及追究罪魁了。不过，这班罪魁是屈原一生斗争的对象，在任何时候都是忘不掉的，因而在这里也不能完全放过。“众龄蹶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韵迈”，这是祖国和人民所以陷于危难的境地的主要原因，仍应明确指出。“乱曰”以下，是结束语，很概括地表明他惟一的愿望和眷恋的心情。

《哀郢》的具体内容一般说来是如此。

8 怀沙

《怀沙》的意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屈原抱着沙石自沉。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说：“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东方朔《七谏》说：“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自此以后，同意这种说法的很多；一种是说屈原怀念长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怀沙》之名，与《哀郢》、《涉江》同意。‘沙’本地名，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欲往而就死焉耳。”^①以前很少人同意这种说法，但近来研究屈原的人如郭沫若、游国恩、文怀沙先生等均从此说。我个人同意怀念长沙这种解释。

《怀沙》这篇写作的时间是四月，作品里分明有“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的句子，这是不成问题了。问题是在那一年份上。我认为是在顷襄王二十一年，是紧接《哀郢》而来的，理由已见上面介绍屈原生平章。写作地点是长沙境内。这是屈原自沉以前不久的写作。他快要离开人世了，就把最后的居留地作为怀念的对象，题名《怀沙》，是可以理解的。

《怀沙》的主题，是表示自己最坚决的意志，不但不变节从俗，甚且矢死靡它，要留下很好的榜样给人效法。不变节从俗，

^① 游国恩先生《楚辞概论》说：“这说本为李陈玉所创。”

是他一贯的做法，在他的作品里随处可以看到，如《思美人》的“欲变节以从俗兮，媿易初而屈志”，《涉江》的“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这一类的句子，都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意志。矢志靡它的决心，也时时流露在他的作品里，单在《离骚》一篇里就提过几次：“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尸首分裂）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阼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可是，认为自己不能不死，要牺牲自己，留下榜样，给人效法，这意见却是在这篇作品里才提出来。“惩远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愍（遭受忧患）而不迁兮，愿志之有像（有人效法）。”“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王注：“明白告诸君子，宜以我为法度”）”。^① 这说明了屈原认为不得不死的时候才毅然决然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这并不是懦弱消极的举动，他还是希望有人本他的意志，为祖国为人民继续奋斗下去的。

由于他立下了这种主意来写这一诗篇，他一方面就把自己的悲痛情怀极力抑止着，不把它作为抒写的主要内容，虽然也说到“冤屈”、“曾伤”和“永叹”，并不像《抽思》、《哀郢》等篇里所表现的那么凄怆动人。一方面对待敌党的态度却特加严厉，痛斥怒骂，毫不留情：“玄文处幽兮，覆睭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笱兮，鸡鹜翔舞。”“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

^① 朱熹在“曾伤爱哀……人心不可谓兮”的下面注：“按此四句若依《史记》移著上文‘怀质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承‘余何畏惧’之下，文意尤通贯。”这看法是正确的。近人闻一多、刘永济先生均从朱说校正。

把他们比做“覆瓿”，比做“瞽”，比做“鸡鹜”，乃至比做“邑犬”。而另一方面明确而切实地叙说自己的光明正大的做法：“鮪方以为圜（圆）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①，君子所鄙。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内厚质正兮，大人所譱（盛）。巧颯不斫兮，孰察其揆正？”“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橛兮^②，孰知余之从容^③？”按照正直的主张，忠诚老实，尽力以赴。他这样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快要离开祖国和人民走上自杀的途径了，再也没有什么写作的机会了，他不能不把自己一生的光明磊落坚强斗争的生活实践写上诗篇，作为典范，留给后人。正因为如此，他就不能过分地示人以沮丧的意志和悲哀的情绪，有必要分清黑白，明辨是非。他用较多的篇幅述说自己的主张和举动，揭露“党人”许多胡作非为的不合理现象，是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和写作规律的。

与这种思想内容相适应的艺术特点，就是：有什么话都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什么想像的成分，很少用修饰的语词，文字朴素

① 闻一多先生《楚辞校补》“易初本迪兮”条：“案本疑当作变。变卞古通，（《书尧典》“于变时雍，”《孔宙碑》作卞。《顾命》“率循大卞，”《庄子·天下篇》作“惟循大变。”）此盖本作‘易初卞迪’卞迪即变道。（道迪古亦通。《书君奭》“兹迪彝教，”《史记》作道。又“我道唯宁王德，”马本作迪。）卞与草书本相似，故误为本。‘易初变道’与下文‘章画志墨’语例同，皆二词平列，上一字动词，下一字名词，而义各相同。……”

② 橛，洪兴祖《楚辞补注》：“当作燧，音忤，与讎同。《列子》‘燧物而不惧，’是也。”燧，即遇的意思。

③ 从容，王逸注：“举动也”。朱熹注：“举动自得之意。”

明朗，句法简短有力，读起来，在音节上也比较急促。

9 惜往日

《惜往日》是屈原的绝笔，这是可以肯定的。篇中有“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和“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以赴渊兮，惜顛（壅）君之不识”的说法，不仅可以看出他写这篇作品之后就投水身死了，还可以看出当时的环境驱使他不得稍留几日才投水，使他有些要说的话，迫不及待，不能够完全说出来。可是，尽管如此，他一生中有部分极其重要的话，在其他作品里没有也是不便说出的，在这里明白说出来了，那就是：他和楚怀王密谋变法这一重大的事件。

他和楚怀王密谋变法，是对楚国的兴衰存亡起着关键性作用和关系屈原个人事业成败的重要事件，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才明白说出呢？第一，这是楚怀王的秘密，楚怀王是不容许把它泄露出来的，我们看上官大夫谗譖屈原时，把“众莫不知”作为主要条件之一，而屈原也因此不得不被怀王疏远，可见当怀王在位时，屈原是不可能把这事件在作品里表露出来的。第二，顷襄王是和屈原的敌党串同一气的人物，对屈原和楚怀王密谋变法这件事当然是很明白而且是极端反对的。如果屈原把这事件泄露出来，就正好给他们加上一个“诽谤先王，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的罪状，屈原无论怎么忠直不怕死，总不至于甘心冒犯这样的罪过的，他只有忍受“冤屈”，把事件“郁结”在心里。因此，屈原在这以前的一切作品里，虽然有些隐约影射这一事件的句子，总没有把这事件明白说出来。到这时候就完全不同了，临到了死亡的前夕，他还有什么顾虑呢？这一个关系楚国的兴衰存亡和他个人的事业成败的大谜，终于不能不被揭开了。这一个大谜之被揭开，就有力地说明了这篇作品是屈原的绝笔。

追述他和楚怀王密谋变法的事件，是一篇的起点，也是一篇

的要点，这是我们应该首先指出的。他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喙（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庞（厚的意思）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他任左徒时，是曾经和楚怀王密谋变法的，关于变法，虽然在先代已有成规，也有富强的事实可以证明，但是这次变法还在秘密进行中，时机还未成熟，在还没有达到可以明令公布的时候，是不许泄漏出去的。他当时并没有泄露过这秘密，而上官大夫就抓住这个要点诬陷他泄漏了这秘密（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上所说的“王使屈原为令，众莫不知”，就是指这事件），因而激起怀王的盛怒，怀王不查明事件的底细，听了一面的虚妄之辞，全无确实的证据，就疏远了他。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屈原任左徒时，楚怀王和他亲密到什么程度，他当时最重要的政策是什么，贵族当权派用什么东西来陷害他（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主要的捏造事件之一，可能还有这里没有明白说出的其他捏造的事件。照司马迁所说的，就还有诬陷屈原自夸其功一件事，我在上章介绍屈原生平时已经提过了），他怎样得罪楚怀王而受到“远迁”。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那班陷害屈原的贵族当权派所运用的手段是多么毒辣，楚怀王的性格是多么急躁，又是多么容易受人包围。这对我们理解屈原和当时的情况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料。遗憾的是，屈原“不毕辞以赴渊”，不能把他要说的话较多地说出来，使我们对屈原和当时的情况有更多的理解。

其次，我们应该指出的是他对待楚王的态度。屈原在其他一些作品里，对楚王虽也有所责难，但语气总是比较含蓄，而且总还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称谓，如《离骚》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伤灵修之数化”、“哲王又不悟”之类。但这篇对楚王的

责难就不同了，“惜顛（壅）君之不昭”、“惜顛君之不识”，把楚王看成“顛君”——壅塞的君主^①，这简直是指斥了。并且，篇中陈述经过的情况时，主要是归咎于楚王的信谗，对谗人包围楚王的丑态为其他一些作品所着重提出的反而偶然涉及而已。篇中自“弗参验以考实兮”以下，几乎全是指责楚王之辞，所援引的历史事实，也就君对臣的态度而言。例如：“或忠信而死节兮，或咽谗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芳与泽其离糅兮，孰申旦而别之。……谅聪（作听字解）不明而蔽顛兮，使谗谀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黥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黥人以自代。愿陈情以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很明显，谗人所以能够陷害他，他所以不见容于政府，都是由于楚王听信谗言，嫉忌贤者，厌恶佳冶和西施，喜欢嫫母和谗黥。像这样尖锐地指责楚王的说法，在屈原其他作品里是找不到的。这是屈原最英雄的表现，最忠爱的表现，也是他对国家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表现！

其次，我们应该指出的是他对楚国政治失败的一种看法。屈原在其他作品里谈到楚国危败的原因不出两种情况：一种是满朝都是坏人；一种是不能效法尧舜汤禹等的好榜样，而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这篇里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这种提法在屈原其他的作品里是看不到的，那就是“背法度而心治”。作品里说：“乘骐驎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汜嚙^②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

① 顛君，王逸注：“怀王壅蔽不觉悟也。”又：“哀上愚蔽心不照他。”把“壅”字形容“君”，是正确的。篇中“谅聪不明而蔽顛兮，使谗谀而日得。”正是把蔽壅的责任放在楚王身上。自朱注以下，多解作谗人壅君之罪，总不敢归罪君主，未免曲解。

② 王逸注：“编竹木曰嚙。楚人曰嚙，秦人曰拨。”

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譬）与此其无异。”^① 骏马飞奔，竹筏下滩，如果没有控马的缰绳，驾驶的橈片，那是很危险的。不守法度，而只凭主观办事，和这些情况有什么不同？在这里，屈原明确指出楚国政治失败的原因是不用法治而用心治。《韩非子·用人》篇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是一个巧工的名字）不能半中（读众）。”语意正和屈原这种说法一样。可见屈原是具有法家的法治精神的，并不局限于墨守儒家的成规。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上篇《怀沙》的主要意图是写给为国尽忠的臣子做模范，而这篇的主要意图是写给治理国家的君主做鉴戒。苏轼在《屈原庙赋》说：“吾（指屈原）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独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这看法我认为是正确的。正因为希望楚国的君臣“感发而改行”，屈原才不能不死；正因为痛心“宗国之颠覆”，他才不能不舍生。我们单就这两篇的写作动机和具体内容看，就可以证明屈原是一个忠心耿耿至死不改变初衷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一生的创作活动和他一生的战斗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三） 招魂

《招魂》的作者是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里赞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把《招魂》和《离骚》、《天问》等并提，分明

^① 这段话是指楚王说，各家注可考。文怀沙先生译作屈原自述，是不恰当的。

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但王逸在《楚辞章句·招魂章句·序》里却这么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又认为是宋玉的作品（从《楚辞》的编列看，《招魂》在《九辩》后面，王逸篇目是依据刘向的，应包括刘向的看法）。后来的注家，有同意前说的，也有同意后说的。近人郭沫若、游国恩、刘大杰诸先生都同意前说^①。我也同意《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的看法。

《招魂》是招谁的魂呢？王逸认为是宋玉招屈原的魂^②，林云铭认为是屈原招自己的魂^③，吴汝纶认为是屈原招楚怀王的魂^④。近人郭沫若、刘大杰先生同意屈原招楚怀王的魂这一说^⑤，我也同意这一说。

① 郭说见《屈原研究》，载《历史人物》32页，游说见《楚辞论文集》303页，刘说见《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78页。

② 王逸《招魂章句序》：“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懣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③ 林云铭《楚辞灯》：“是篇自千数百年来，皆以为宋玉所作。王逸茫然无考据，遂序于其端，……后世相沿不改，无非以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无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则原被放之后，愁苦无可宣泄，借题寄兴，亦不嫌其为自招也。……玩篇首自叙，篇末乱辞，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吾’字，断非出于他人人口吻。”

④ 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怀王为秦虏，魂亡魄失。屈子恋君而招之，盛言归来之乐，以深痛其在秦之苦也。”

⑤ 郭说见《历史人物》，32页；刘说见《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78页。

《招魂》这篇作品的作者的主名和所招的对象，虽还不容易作出结论，但它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是杰出的，值得我们重视的。

《招魂》篇中的主题，是要把所招的人的涣散放佚的魂魄招回来。针对这个主题，就必然要从别地方的坏处和故居的好处的具体情况细说一番，才具有感召游魂的力量，使它不至于再到别的地方去，回返故居来，以达到其招收游魂的目的。作者就从这方面着眼，假托巫阳的说话，创造了许多鲜明突出的形象，具体表明东、南、西、北方和天堂、地狱的险恶的情状，来吓唬灵魂，使它不敢乱跑；同时无微不至地显示出故居的高堂邃宇、层台累榭一切布置的精工华丽，周围景物的美妙动人，以及歌姬舞女的盛丽，饮食服御的奢侈，群从游猎的愉快等等，来招引灵魂，使它乐于归来。这样通过各式各样的形象来表现主题，尽管所创造的形象有一部分不是人间世上所有的真实，而展示了许多丑恶可怕的东西使人戒惧，许多美好可爱的东西使人喜悦；这是按照作者所掌握到的美学的原则来创造形象的，是和人们在生活中所畏惧和所追求的东西相关联着的，是和人们的爱憎感情相贯通的，因而也是符合于现实生活的规律的。例如写东、南、西、北方的险恶时，有这些情状：“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东方）“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肉酱）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南方）“赤螭（蚁）若象，玄蠹（蜂）若壶些。”（西方）“增（层）冰峨峨，飞雪千里些。”（北方）写上天（天堂）、幽都（地狱）的险恶，有这些情状：“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圉狼从（纵）目，往来埒埒些；悬人目媮（媮），投之深渊些。”（上天）“土伯九约，其角鬻鬻（锐利的样子）些。敦（厚）邛（背）血拇，逐人撻撻些。参（三）目虎首，其身若牛些。”（幽都）像

这类可怕的东西，难道只是局限于个别的形象而不能体现出一般的意义么？又如写故居的美好时，有极其华贵妍媚的装备、美人和景物：“砥室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室中之观，多珍怪些。兰膏明烛，华容备些。二八侍宿，射（厌的意思）递代些。……媠容修态，嫫（巨）洞房些。蛾眉曼靡，目腾光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有极其丰富豪奢的饮食：“肥牛之腱，鸕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魮鱓炮羔，有柘浆些。鹄酸醢煎鸿碁些，露鸡鹍鹑，厉而不爽些。焞蜜餌，有鸕鷀摇浆鸕（读鸕）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耐清凉些。”还有许多歌姬舞女：“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鸞（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娱酒不废，沈日夜些。……”春天到了，又可以纵情游猎：“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葦鷀齐叶兮白芷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像这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在阶级社会里，贪图享乐的人们，谁都会神魂颠倒的，不仅是勾引楚王的灵魂。

《招魂》这篇作品最成功的地方，我认为是在这些方面，而这些方面的表现，是和作者喜爱民间的神话传说和习惯于宫廷贵族的生活互相联系的。作品中许多险恶形象的塑造，是从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中吸取得来；许多美丽环境和豪华生活的描绘大概是根据他的经历的，如果完全没有这种生活实践，也不易凭空结撰。从这个角度来看谁招谁的魂，那末，认为是屈原招楚怀王的魂，这种说法就比较接近实际。

精密完整的结构，也是这篇作品的特点。他首先从“四方”，作个总招，其次从东、南、西、北各方面分别招，其次从上天、下地招，然后招他“入修门”，然后招他“反故居”，接

着就淋漓尽致地说出故居怎样华美和怎样足以娱心意悦耳目的景象情态，叫他不要乱跑，应该回来。极其夸张地写，同时又极其具体地写。这种精密完整的结构，在《楚辞》里很难找出第二篇来，自汉魏以下的长篇辞赋，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学习这种写作方法的。

此外，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就是这篇作品，除了开首一段叙述和最后的乱辞以外，每隔两句都用“些”字做语尾。这在别处没有看到，是《楚辞》中一种特殊的表现，因之就有人把楚声叫做“楚些”。“些”是楚国的方音，禁咒语中的末尾惯用它。沈括《梦溪笔谈》里有这样的话：“《楚辞·招魂》尾句皆曰‘些’。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僚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郭沫若先生认为“些”字和《周南汉广》与《周颂鷖》的“思”字是一个系统，“些”、“思”是一声之转^①。

（四）远游、卜居、渔父

《远游》、《卜居》、《渔父》这三篇作品，王逸《楚辞章句》都把它们归入屈原作品里面，但后来不少的人怀疑这几篇不是屈原写的。近人如郭沫若、游国恩、陆侃如、文怀沙诸先生都认为这不是屈原做的（游先生在《屈赋考源》里对《远游》一篇又加以肯定。）；何其芳同志在《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中也有否

^① 见《历史人物》，35页。

定是屈原的作品的说法^①。丁力同志在《关于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一文中则肯定《卜居》、《渔父》是屈原的作品^②。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三篇作品的真伪问题，只谈谈它们的特征。

《远游》这篇的特色，是以文学的形式，发挥作者超尘出世的人生观。开首的“悲时俗之迫鸷兮，愿轻举而远游。”是“远游”篇名的来源，也是一篇的总方向。由于要轻举远游，就“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③因而这篇中的具体内容，充满了神仙家的气息和一些神仙活动的情况。如“神儵（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内惟省以端操兮，求

①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里说：“《远游》整钞《离骚》和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地方太多，而结构与《大人赋》亦相同，我疑心就是《大人赋》的初稿。”何其芳同志在《屈原和他的作品》注九里说：“《远游》、《卜居》、《渔父》不是屈原的作品，为近人研究《楚辞》者所公认。《远游》里面的思想，比如‘无为’、‘至人’、‘登仟’、‘道可受兮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等等，和屈原的思想根本不同。如果屈原的思想是这样，大概就不会自杀了。这显然是后来的一个有道家思想的人写的，不过在文学上模拟屈原的作品而已（它里面大段大段地模拟《离骚》也是后人所作的重要证据）。……《卜居》和《渔父》显然是后人以屈原为题材写的两篇短赋。”何文载《人民文学》1953年第6期。

② 丁力同志的《关于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提出四点意见反驳原来认为《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品的说法，并提出不少自己的看法来说明这两篇是屈原的作品。见《文学遗产增刊》一辑，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22~39页。

③ 王逸《远游章句序》中语。

正气之所由。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与化去而不见兮，名声著而日延。奇传说之托辰星兮，羨韩众之得一，形穆穆以侵（渐）远兮，离人群而遁逸。”一类的写法，篇中到处可以看到，这就充分说明了作者是一个具有超尘出世的神仙思想的人。里面虽然也有些表现悲郁情绪的句子，如“遭沉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涉青云以汎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思旧故以想像兮，长太息而掩涕。泛容与而遐举兮，聊抑志而自弭。”之类，但这类在篇中所占的成分太少了，而且是重复用了《九章》、《离骚》里这类的句子，勉强用来说明篇首的“悲时俗之迫鸷”的，似乎不能看成是作者的真情实感的表现。

《卜居》里面深刻地描绘了两种对立矛盾的心理，同时，表现了作者是站在正义的立场。是一篇很好的作品。“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鸷（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鸷訾粟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糴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驎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这一大段说话，把当时一般士大夫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心理，很形象、很生动地刻画出来，使人可以清清楚楚看出那班阿谀逢迎以取得高官厚禄者的丑恶情态，一些正直人士所以不能见容于统治集团的主要原因；同时还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集团的互相勾搭的一般情况。坚持正义斗争的屈原，在心理上是否有一个时期经过这样的活动，我还不肯判定。可是，这一类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和深刻的描写，却反映了一定社会的现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意义。至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

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这一段说法，毫无疑义，是真正体现了屈原愤世嫉俗的心情和卓立耿介的性格的。

《渔父》是叙述屈原和渔父的问答，从中说明了屈原是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举世皆浊”而他能够“独清”，“众人皆醉”而他能够“独醒”。正因为如此，他才“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这对于屈原的人物性格和自杀的来由，说来虽简单但是很明确。里面运用清浊、醉醒、弹冠、振衣这类明白易晓的具体事象来说明问题，也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关于屈原任“三闾大夫”事，就现在的材料看，是在这里首先提及的，司马迁把它全文都录入屈原本传里，实为我们研究屈原的重要资料。

《卜居》、《渔父》两篇同样用问答体，句法比较参差，用韵也很自由（不限于隔句韵，甚至有数句不用韵的），散文的意味特别浓厚。可以说，比之《离骚》、《九章》等的句法、韵式已有进一步的解放。

十 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

热爱祖国，坚持真理，关心人民疾苦，反抗暴力侵略，这是屈原的高贵品质的表现，这品质象征着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上，成为教育和鼓舞后代的巨大力量，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在这里，我想谈谈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大家知道，屈原是中国文学的奠基人，同时又是“骚”体文学的首创者。可是，过去的人对于他作为奠基人和首创者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估计不足。应该指出，在屈原以前的《诗经》，基本上是群众性的创作。其中虽也有个人的创作，如《小雅·节南山》里所说的“家父”，《巷伯》里所说的“孟子”，《大雅·崧高》里所说的“吉甫”，以及《左传》（闵公二年）里指出而我们在第一章里曾引用到的“许穆夫人”之类，然而都是在某一个场合里偶然的写作。把一生的具体实践、思想感情、要求愿望等都在作品里表现出来，把一生的精力忠实于创作活动的，在屈原以前就没有看到过。而屈原，把他自己英勇斗争的过程，自己的热望，自己的悲愤，自己的全部生命，写下了许多优美壮丽的诗篇，这就深深地感动了同时也教育了一切倾心文学的人们把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专门的事业，作为一种斗争的武器，不断地从事文学的创作，从而大大地丰富和灿烂了中国文学的园地。也应该指出，《诗经》中虽然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虽然也有曲折生动的篇章，一般说来，内容是比较单纯的，句子和篇幅也比较简短，尤其是抒情诗，绝大部分要若干章叠用，才能够更充分地表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思。屈原的作品即所谓“骚”体文学，虽也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

统，然而它已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面貌出现，它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的气氛，它尤其深刻地反映了客观现实生活，尤其明朗地体现出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里面除了个别作品如《橘颂》以外，句子较长了，篇幅扩展了，表现能力加强了，组织形式更加多样化了，因而就更加适宜于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多方面的、丰富而复杂的本质和面貌。这是《诗经》以后的一个很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就“衣被”了一切时代的“词人”，在中国文学历史上起了莫大的作用。除此以外，如吸收、提高和发扬民间文学（指《诗经》以外的）的优秀传统，以身作则地展示着个人为国家服务，文学为政治服务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第一个带路人，指示了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方向。

我们的诗歌，远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像《离骚》这样的高度的成就，我们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会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屈原作品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给中国文学历史，主要是诗歌历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屈原在中国文学上，固然有其永久的、崇高的地位，即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其一定的、不可磨灭的地位。

屈原的作品，是历来从事文学工作者不断学习的榜样和追攀的顶峰。几乎两千年来著名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人不学习它并或多或少受它的影响。西汉时，就有人说屈原的《离骚》兼有《国风》、《小雅》的长处^①。东汉班固虽然不理解屈原伟大的人格，说他“露才扬己”，但对他的作品，还是称赞的^②。王逸《离骚经·章句序》更加肯定地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

① 见班固《离骚序》。

② 同上。

取其要妙，窃其华藻”。到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就说得更加全面而具体了，他在其所著的《文心雕龙·辨骚篇》说：“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①，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②，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又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乘）贾（谊）追风以入丽，马（司马相如）扬（雄）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从屈原作品中各篇具有的特点和他所运用的各种表现手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自此以后，评论屈原作品的文字不少，大抵不出这类的看法。

也有凭着自己读了屈原作品以后的感受，着重从它的动人的力量作出评价的。这类的评价文字常见于诗文的选本里，尤其是明清两朝的选本最多这类的评语。一般说，这是比较空疏无据，不足为凭的。但也有写来很形象、很生动的评语，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屈原的作品。例如明末蒋之翘读了《楚辞》之后曾这么写道：“予读《楚辞》，观其悲壮处，似高渐离击筑，荆卿和歌于市，相乐地，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凄惋处，似穷旅相思，当西风夜雨之际，哀蛩叫湿，残灯照愁；幽奇

① 王逸《九辩章句序》：“《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

② 通行本作“招隐”，误。范文澜《文心雕龙·辨骚篇注》：“冯云，‘《招隐》，《楚辞》本作《大招》，下云屈宋莫追，疑《大招》为是。’孙云，‘唐写本，《招隐》作《大招》。’铃木云，‘洪本立作《大招》。’”后面范先生案语：“《招隐》唐写本作《大招》，是。”

处，似入山径无人，但闻猩啼蛇啸，木魅山鬼习人语来向人拜；艳逸处，似美人走马，玉鞭珠勒，披锦绣，佩琳琅，对春风唱一曲‘杨白华’；仙韵处，似王子晋骑白鹤，驻缙山最高峰，吹玉笙作凤鸣，挥手谢时人，人皆可望不可到。”^①这种把具体事象作比喻，即用这比喻来说明屈原作品所具有的特殊的情味和境界，虽然主要的还是写出读者本身感受的情况，对作品未必是恰当的评价，但从这里多少可以看出屈原作品是具有何等的艺术魅力，是如何捕捉住了人们的心灵。而事实上，由于受了屈原作品这种力量的感动而爱好它，从而学习它并受它的影响的，还是为数不少的。

除了上举各种对屈原作品的评价可以说明屈原作品对历来的作家和作品有很大的影响外，还有一些情况同样可以作为说明的依据的。如《汉书·艺文志》所载，从屈原起到西汉末年（约公元前310年至公元5年）300多年间，作赋^②的有66家，771篇，又杂赋12家，133篇。王逸的《楚辞章句》，除屈原的作品外，有宋玉、景差^③、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后来宋晁补之又编《续楚辞》20卷，

① 从《听雨斋》本《楚辞集注》的《总评》里录出。

② 屈原的作品，汉朝人或叫做“辞”，或叫做“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又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又《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

③ 王逸《大招章句序》：“《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朱熹在《大招序》里则肯定为景差所作。

收 28 家，计 60 篇，《变离骚》20 卷，收 38 家，计 96 篇。朱熹更把王逸、晁补之两人所编的加以增删，成《离骚》25 篇，《续离骚》16 篇，统名《楚辞集注》；又编《楚辞后语》52 篇。像这类的做法，都可以看出他们对屈原作品的优秀传统的重视。我们如果再就历来的辞赋考察一下，除上列一些著录已选出的不计外，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扬雄的《长杨赋》，张衡的《思玄赋》，曹植的《九愁赋》，陶潜的《闲情赋》，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直至汪中的《哀盐船文》等，都可以说是从屈原的作品一脉相传下来，直接受到屈原作品的影响的。

《招魂》一篇，我们已看成是屈原写的，那末，它里面所描写的天堂地狱以及东南西北各种怪异的形象，也给中国文学以不小的影响。顾炎武曾这么说过：“或曰：地狱之说，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长人土伯，则夜叉罗刹之伦也；烂土雷渊，则刀山剑树之地也；虽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魏晋以下之人，遂演其说而附之释氏之书。”^① 这种看法，我认为是正确的。中国本来有这种神话传说，屈原把它吸取到《招魂》里，《招魂》已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榜样之一，这些神话传说也就更加普遍流传着，后来印度佛教思想流入中国来，里面所有的天堂地狱的说法，才和它合流起来，扩大了它的影响。我们探本溯源，不能不认为后来有许多涉及天堂地狱的神怪小说如《齐谐》、《搜神记》、《西游记》、《封神传》之类，都和《招魂》这类写法是有承传的关系的。把民间的东西吸收了加以提高，再给后来以影响，这也是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了。

以上是就屈原作品对后来文学作家和作品比较直接的影响这

^① 见《日知录》卷三十《泰山治鬼》条。

方面说。这方面的影响虽然是比较直接的，然而却是比较局部的，更重要并且影响更巨大的是屈原作品中现实主义的精神。

关于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我想从两方面来说明：

第一是正视现实，批判现实，坚持正义的斗争和合理的理想。屈原所有的作品，都贯串着这样的精神，我们在分析他的作品时已经分别说过了。这种精神，曾给我国历来的古典文学家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然，我们不能采取简单的机械的看法，具有这种精神的作家，也还是因其具体情况的不同——时代环境、文学修养、写作方法以及各人对待现实的态度等等的不同，而各有其不同的表现，表现的深度和广度也不一样。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有不少地方是暴露统治集团的丑态、歌颂正义斗争的人物的，但作者是以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更具体，更翔实。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是写得很坦率了，《东平赋》也有人认为“有楚《骚》之遗则”^①，但他的《咏怀诗》却写得很闪烁，若隐若显，不易捉摸。李白虽也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的统治集团，但他更多的是运用讽刺的手法；并且由于他曾经看过了唐朝的光明的一面，因而更富有追求事业前途和精神解放的强烈的愿望。杜甫、白居易的反映面是更其广泛和深入了，他们极为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的不合理社会，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劳动大众的痛苦情况，但他们主要的是在揭露对立阶级的尖锐矛盾，从对立阶级的尖锐矛盾中看问题并提出自己合理的主张，热烈要求合理社会的出现。苏轼主要的虽也在于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表现了个人精神解放的要求，但没有一贯的坚定的主张和坚持斗争到底的精神，要求精神解放也并不很强烈，往往陷于消

^①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里张溥在《阮步兵集·东平赋》后的评语。

极。这一切，都和屈原对现实的态度和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精神并不完全相同：屈原主要是揭露楚国和秦国的矛盾和楚国贵族内部的矛盾，并明确提出自己的合理的主张和理想，为自己的主张和理想斗争到底；而在文学创作方面，是完全以诗歌（更正确地说是韵文，包括辞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尽管屈原以后这些杰出的古典文学家，接受了屈原的优秀传统而又和屈原的表现有所不同，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学习是多方面的，他们的种种具体情况也各自不同。例如他们相互之间，有些是时代很接近的（如李白和杜甫之类，尚且不能尽同，更何况他们和屈原是处在不同时代？他们和屈原之间的距离自然就会更远些。可是，尽管如此，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和屈原之间，却都有共通之点。至少我们可以这样指出：他们都是古典文学家，他们都注意过屈原的身世和他的作品，他们对屈原的身世和作品都有过惋惜

(同情)或赞美的表示^①；他们都和屈原一样对当时的统治集团很不满，关心或同情人民，并意图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都和屈原一样接受过以前的优良传统，具有杰出的创造天才并忠实于文学创作的活动。因此，我们说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过屈原的影响，是不会陷于主观猜测的。司马迁、阮籍、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是如此，其他不少古典文学作家也是如此。

第二是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把民间文艺和文人写作相结合。屈原的作品是有其现实的基础的，然而它比之以前《诗经》的现实主义已经大大地跨进了一步，它的浪漫的色彩和神话故事的意味很浓厚，已经是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把民间文艺和文人写作相结合了。这不仅是使他自己的创作获得

^① 司马迁为屈原作传，惋惜屈原的遭遇，称赞屈原的才能，并录他的一小部分作品外，在《太史公自序》里还提到“屈原放逐著离骚”，在《报任安书》里又提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阮籍不满当时统治政权虽然和屈原一样，但他的人生观根本和屈原不同，他曾惋惜屈原说：“三闾悼乖离”（《咏怀诗》）。李白曾赞美屈原作品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江上吟》）。杜甫曾表示过要攀登到屈原、宋玉文学创作的顶峰，说“窃攀屈、宋且方驾”（《戏为六绝句》），又称美屈原的英俊说：“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白居易曾同情过屈原的遭遇说：“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偶然》）苏轼曾写过《屈原庙赋》，又曾以《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评价来驳斥扬雄“雕虫小技”的说法（见《与谢师民推官书》），对屈原的作品也表示过极端的仰慕：“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见王邦采《离骚汇订序》引，原出处待查。）

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给后来的作家们指出了创作上一个明确的方向。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国古典文学才奠定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才走上一条最宽广的道路。我国古典文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从这条宽广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着（中间当然也走了许多弯路），才能够取得巨大的成绩。这是屈原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也是我国古典文学最优秀的传统。我国每一个时期的杰出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不是创造性地接受这种优秀传统然后获得了自己的卓越的成就的。就以上面所列举的杰出的作家来说，除了司马迁因为写作的体例是历史事实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之外，其他各家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屈原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他这种精神，体现在他一生的战斗生活中，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的作品里，因而对我国历来具有爱国思想的作家的影响也最为巨大。

总的来说，屈原的传统，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传统，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在两千多年来的悠久年代中，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它在全人类的文化上，也具有了一定的荣誉，赢得了很高的评价。这是我们民族献给人类文化总宝库的一种奇珍瑰宝，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我们应该创造性地继承它并发展它，使它在我们创造今天的乃至明天的人民文学中能够发挥着更加巨大的作用。

后 记

屈原是我们祖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自从 1953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之后，他又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我们祖国以有屈原这样一个伟大诗人而感到骄傲。我们全国人民对他的生平和作品都有比较真切认识的必要。我着手写这本小书，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愿望出发的。因为要作为一般性的读物，而又想给读者以较深的印象，所以里面不能牵涉到许多考证的问题，但又不宜过于简略，有时也提出一些新问题和自己对这问题的看法。这样，就使得这本小书写成“非驴非马”的样子：既然不像游国恩先生的《屈原》那么精简，初中学生的程度就可以看得懂；又不像郭沫若先生的《屈原研究》那么博大，专家学者也得参考它。

由于有关屈原生平事迹的材料很缺乏，空白的地方很多，就仅有的材料看，又往往互有出入。我们要介绍屈原的生平，是有很大的困难的，正如何其芳同志在《屈原和他的作品》里所说的“越简单就可靠性越大，越详细就难免推测之词越多”。可是，像屈原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而有关他的生平的可靠资料又这么少，我们如果因为一时找不到“铁证”，就连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初步意见也不敢提出，那就很难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并引起人们研究他的兴趣。因此，我这里有关屈原生平事迹的部分，除根据已有的历史材料之外，还联系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略加疏说，冒了“主观推测”的危险。

关于屈原一部分作品的真伪问题，有不少不同的看法，这在今天还是不易解决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除非是一般都认为不是屈原的作品的可以暂不理它，如果疑信参半的作品，与其弃置

不理，宁可都提出来，希望在大家讨论中逐渐得到较为一致的意见。

我对屈原作品原文的引用，所根据的本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端平刻本朱熹的《楚辞集注》。据郑振铎先生在这集里的跋文说，“这是今日我们所见《楚辞》的最古和最完整的一个刻本”。里面有些用古体字写的，如“驰”字作“駝”，“秋”字作“穉”之类，我在引用时均用括弧注出。

过去有关屈原的论述不说它，现代不少研究屈原的专家写了不少有关屈原的著作，我接触到的都或多或少采用过，对我都有帮助；其中郭沫若、游国恩两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帮助更大。引用原文时我均注明出处；但也有一些不是完全引用原文因而没有注明出处。我谨在这里致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掌握的资料很少，理论水平又很低，成书的期间也很短促——只是七个月的期间（1955年8月至1956年2月），这期间内又正是肃反运动最紧张的时候，上课、开会相当忙，经常是写了几行就搁下去，有时间又再写几行。因此，虽然只是做些类似辑录的工作，并且有了旧编的讲义作底稿，对一些问题的处理还是很草率的，文字尤其是拙劣。其间错误的地方必然是很多。我诚恳地希望专家和读者们给以指正和批评。

1956年3月20日 詹安泰于中山大学寓所

离骚

· 上 编 ·

《离骚》笺疏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高阳”，颛顼（zhū n x）的别号，楚的先祖，也是屈原的先祖。《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王逸《楚辞章句》（以下简称“王注”）：“《帝系》曰：颛顼娶于腾隍氏女而生老僮，是为楚先。其后熊绎事周成王，封为楚子，居于丹阳。周幽王时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汉。其孙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俱出颛顼胤末之子孙，是恩深而义厚也。”朱熹《楚辞集注》（以下简称“朱注”）：“颛顼之后有熊绎者，事周成王，封为楚子，居于丹阳。传国至熊通，始僭称王，徙都于郢，是为武王。”按王注不标楚武王名，朱注及各家注《离骚》（直至马茂元《楚辞选》）均谓楚武王熊通，其源殆出《史记·楚世家》。今本《楚世家》：“鸩冒弟熊通，弑鸩冒而代立，是为楚武王。”正以“熊通”是楚武王名。但《左传·文公十六年》，《宣公十二年》，《昭公十六年》的孔颖达《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楚世家》都作“熊达”；《汉书·地理志下》、《淮南子·主术训》高诱注也都作“熊达”：可见古本《史记》和班固、高诱都以楚武王名“熊达”。

“苗裔”，指后代。王注：“苗，胤也。裔，末也。”朱注：“苗裔，远孙也。苗者草之茎叶，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余也，故以为远末子孙之称也。”按《说文·衣部》：“裔，衣

裾也。”无末义；王注又无衣义。《汉书·艺文志》：“亦六经之支与流裔。”颜师古注：“裔，衣末也。”以衣末合训，殆朱子所本。

“朕（zhèn）”即我。《尔雅·释诂》：“鹄、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蔡邕《独断》：“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贵贱不嫌，至秦天子独以为称。”《文选》吕延济注：“屈原自称也，古人质，与君同称朕。”

“皇考曰伯庸”，“皇”是光大的美称。《说文》：“皇，大也。”王注：“皇，美也。”“皇考”，《礼记·曲礼下》：“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王注：“父死称考。”大约是从这里来的。但后来却有不同的说法。叶梦得《石林燕语》一：“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曾祖之称也。（按陈直《楚辞拾遗》认为伯庸是屈原的曾祖，即同此看法。）自屈原《离骚》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故晋司马机《为燕王告鸛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遂因不改。汉议宣帝父称，蔡义初请谥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则皇考乃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然沿习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则肯定“伯庸”是屈原的父亲，但没有正确的依据。所谓“以皇考为父”，当然是王注“屈原言我父伯庸”以来相沿已久的看法。至吉诚《楚辞拾遗引》、王闳运《楚辞释》、闻一多《离骚解诂》、饶宗颐《伯庸考》才根据刘向《九叹·纷逢》篇“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句及《周颂·鸛》“假哉皇考”等认为伯庸是屈原的远祖。按《周颂·鸛》“皇考”虽作远祖解，但作亡父解的例证更多：如《周颂·闵予小子》：“于乎皇考”，“休哉皇考”之类。又如《虢叔旅钟》：“丕显皇考惠叔”，《叔夷钟》：“用孝亨于大宗皇祖皇妣皇母皇考”，均指亡父。因

此，王注“我父伯庸”的解说还是可信的。

“摄提”，《尔雅·释天》：“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李巡注：“言万物承阳而起，故曰摄提格。格，起也。”（见臧辅堂《尔雅汉注》卷中）郝懿行《尔雅义疏》：“摄提，星名，属东方亢宿，分指四时，从寅起也。”王注全录《尔雅》，朱注仅标星名（朱注：“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顾炎武《日知录》二十：“摄提，岁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正月为陬，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是也，或谓摄提星名，《天官书》所谓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者，非也。岂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据《尔雅》李注与郝疏，则摄提为星名又从寅起，王、朱说并不矛盾。历来的注家多认屈原的生年属寅。

“贞”是正、当的意思。王注：“贞，正也。”《广雅·释诂》三：“贞，当也。”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以下简称“姜注”）：“贞，古与鼎同字；鼎，当也。马融《洛诰》注曰：‘贞，当也。’”

“孟陬（zǔ）”，孟是开始，陬是边隅，孟陬即正月。王注：“孟，始也。……正月为陬。”按夏历建寅，正月是寅月，这句是说太岁在寅那年的寅月。

“降”读 jiàng，降生。

叙述世系和自己降生的年月日。

屈原降生的年月日，各家推算不同：邹汉勋、陈鹤、刘师培、曹耀湘等的考定年月日，已见游国恩《屈原·诗人的诞生》所引。游国恩肯定是寅年寅月寅日。郭沫若定为楚宣王之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屈原研究》）。林庚定为楚威王五年（前335）正月初七日（《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李延陵定为楚宣王八年（前362）正月初一日（《屈原的生辰与离骚的著

作时期》)。浦江清定为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我同意浦说。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皇览揆（kuí）余”，皇指皇考。览揆是观察考量。王注：“皇，皇考也。览，观也。揆，度（duó）也。”览，五臣本作鉴。文怀沙解“皇览”句作“据历书而查揆我的生日”（见《读骚拾遗》三），似太曲折。

“初度”，初生时的容貌气度。钱杲之《离骚集传》（以下简称“钱注”）：“度犹态也，初度谓幼时态度也。”林云铭《楚辞灯》（以下简称“林注”）：“初生时气象便与凡人不同。”刘永济《音注详解屈赋定本》（以下简称“刘注”）：“初度，初生时之容貌。”姜注：“初度谓始生之器宇。”均可通。王注：“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文选》李周翰注：“初生时日法度”，朱注：“犹言时节”，说均迂曲难合。

“肇锡余”句，肇，始；锡，同赐；嘉，美善。这句是说开始赐给我一个好名字。《尔雅·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鹈、落、权与——始也。”王注：“肇，始也；锡，赐也；嘉，善也。”闻一多解“肇”为“兆”的假借字（《离骚解诂》），也可通。

“名余”二句，正则，公正的法则，即“平”字的含义。灵均，灵的本义为神，引申为高；均的本义为均一，引申为平；合起来就是高平。《小雅·皇皇者华》“于彼原隰”句注：“高平曰原。”（《尔雅·释地》：“广平曰原。”）因此，灵均即“原”字的含义。钱注：“名余平者，谓其平正可法则也。字余灵均者，谓如原野之灵而均一也。”戴震《屈原赋注》（以下简称“戴

注”):“正则者平之谓,灵均者原之谓。”均确。郭沫若、姜亮夫均谓正则灵均系屈原的化名,难信。文怀沙谓正则灵均系巫者的名字(见《离骚拾遗》四),就文句解,也不可通,为什么名他的是一个巫,而字他的又是一个巫呢?

叙述得名的由来和名字美好的意义。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纷”,众盛貌。下文“纷独有此姱节”,“纷总总其离合兮”,义同。王注:“纷,盛貌。”

“内美”,指先天赋予的美好的品质。朱注:“生得日月之良,是天赋我美质于内也。”“修能”,能读若耐。修,长;能,才能;修能即长才。扬雄《方言》一:“修,骏、融、绎、寻、延——长也。陈楚之间曰修。”洪兴祖《楚辞补注》(以下简称“洪补注”):“能,本兽名,熊属,故有绝人之才者谓之能。此读若耐,叶韵。”朱注:“修,长也。能,才也。”钱注:“修,长也。能,材能也。”均确。龚景瀚《离骚笺》(以下简称“龚注”):“修,《说文》曰:饰也,《玉篇》曰:治也,其义当与大学修身同训为修饰俱可。下文‘修名’、‘好修’皆因此。”也可通。王逸解修作远,似太曲折。能一作恣。

“扈”,披在身上。王注:“扈,被也,楚人名被为扈。”被同披。

“江离与辟芷”,江离(一作藜)、辟芷皆香草名。辟一作薜。《北堂书钞》一二八引、《文选·思玄赋》注引、《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说文系传》十二引均作薜。王注:“辟,幽也。”朱、钱、戴等均从其说。阎简弼注(以下简称“阎注”):“辟芷犹言生长在幽辟的芷草。”(见《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姜注：“辟，读为《孟子》‘妻辟鹮’之辟”，似太曲。“江离”与“薜芷”和下句的“秋兰”均双字名词对称更合，不必解辟为动词。

“纫（rèn）”，用线索贯穿叫纫。洪补注：“《方言》曰：续，楚谓之纫。”续是一个接上一个的意思。按今本《方言》六：“擘，楚谓之纫。”注：“今亦以线贯针为纫。”“秋兰”，秋天开花的兰草。王注：“兰，香草也，秋而芳。”

“佩”，指佩带的东西。朱注：“佩，饰也。记曰‘佩帨兰’，则兰芷之类，古人皆以为佩也。”

叙述自己既具有美德，即高贵的品质，又具有长才，即做事的本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讲求整饰，善自约束，那就表里如一，通体芳洁，成为一个最完美的人了。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搴洲之宿莽。

“汨（a）”，跑得很快的样子。《方言》六：“汨、遥，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或曰遥。”王注：“汨，去貌，疾若水流也。”

“不吾与”，与，等待。不吾与即不等待我。王注：“又恐年岁忽过，不与我相待，而身老耄也。”

“搴（jiān）”，拔取。《说文》引作“鷖”。王注：“搴，取也。”朱注：“搴，拔取也。”

“阰（p）”，南楚的山名。王注：“阰，山名。”《史记·叔孙通传》索隐引《埤苍》：“阰山在楚，音毗。”戴注：“南楚语：小阜曰鷖，大阜曰阰。”

“木兰”，一种木名，去皮不死。王注：“木兰去皮不死。”洪补注：“《本草》云：木兰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高数仞。”

任昉《述异记》云：木兰在浔阳江，地多木兰。”“搯”，采。一作揽，又作擘，义同。王注：“揽，采也。”

“洲”，水中可居之地。《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王注同。

“宿莽”，莽古音母。宿莽，一种冬生不死的草。王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尔雅·释草》：“卷施草拔心不死。”郭璞注：“宿莽也。”《方言》十：“𦵏（凶位反）、莽（媯母反），草也。东越扬州之间曰𦵏，南楚曰莽。”

叙述恐怕时光易逝，汲汲自修的情况；并把去皮不死的木兰和经冬不死的宿莽来表明自己志尚的坚贞。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淹”，久留。《尔雅·释诂》：“曩、尘、伫、淹、留——久也。”王注同。《左传·宣公十二年》：“二三子无淹久。”注：“淹，留也。”

“代序”，更代次序。一说即代谢。王注：“代，更也。序，次也。”阎注：“代序犹言代谢（按古谢与序通，见顾炎武《日知录》及清末人李详《文选拾瀋》）。”

“零落”，飘零坠落。王注：“零落皆坠也，草曰零，木曰落。”《广雅·释诂》：“零，堕也。”

“美人”，指理想中人。王注：“美人，谓怀王也。”《文选》吕延济注：“美人，喻君也。”朱注：“美人，谓美好之妇人，盖托词而寄意于君也。”洪补注：“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迟暮’是也。”阎注：“按此句之‘美人’，自王逸、朱熹以来，皆以为喻人君，即指楚怀王；清朱冀则以为屈原自喻（《离骚辨》）；朱骏声、马其昶则以为泛指贤士（朱说见《离骚约

注》);戴震又以为喻壮盛之年。以下文观之,疑自喻之说近是。”按,就下文看,仍以喻楚怀王为是。下文用责备的语气,接着又要求他“乘骐驎以驰骋”(委任贤良治理国家),然后毅然以前导自任,则这句所指的理想中的美人,非楚怀王莫属了。屈原自喻或泛指贤士之说,似不可信。

“迟暮”,晚岁暮年,指年岁衰老。王注:“迟,晚也。”

岁月匆匆,年华易逝,自己既有这种感受,看到草木的零落,更念及所想望的人。再不发奋图强,等到精力衰老,可就无能为力了。承上文自叙转到下文所想望的楚怀王。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

乘骐驎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不抚壮”二句,“抚”有三种解释:一、按照、依据的意思。《礼记·曲礼》:“国君抚式,大夫下之。”注:“抚犹据也。”钱注从此说;《文选》刘良注作“持”,义与此近。二、安慰、抚循的意思。《说文·手部》:“抚,安也。一曰循也。”姜注从此说;文怀沙译文作“抚惜”,义与此近。三、及时、当、乘(趁)的意思。洪补注:“谓其君不肯当年德壮盛之时……”,朱注:“言君何不及此年德壮盛之时……”,林注:“君不肯乘壮岁而除去恶行……”,郭沫若译文,高亨等《楚辞选》注(以下简称“高注”)从此说。我同意第一说。一本无“不”字。“壮”,美盛的意思,不限于壮年。王注:“年德盛曰壮。”历来注家多从其说。闻一多《离骚解诂》:“案王说未谛。壮有美盛诸义。……抚壮与弃秽,相偶为文。”按闻说是对的,因而上面的“抚”字应作按照,依据解。“壮”,刘本作“庄”,注:“庄本草盛貌,此作盛美解,以与下文蕝恶对言之也。”“秽”,一作“蕝”,是秽草,指一切坏人坏事。王注:“秽,行之恶也,以喻

谗邪。百草为稼穡之秽，谗邪亦为忠直之害也。”“此度”，即指“不抚壮而弃秽”的态度。钱注：“今何久不能改此态度乎？”王邦采《离骚汇订》（以下简称王邦采注）：“抚壮弃秽，即所谓改乎此度也。‘何不’与上句互文，上‘不’字已含一‘何’字而又带起下文之词。”

“骐驎”，良马。王注：“骐驎，骏马也，以喻贤智。”

“驰骋”，是马跑。驰和骋一样的意思，这是同义词连用。《唐风·山有枢》：“弗驰弗驱。”疏：“走马谓之驰。”《左传·定公八年》：“林楚怒马，及衢而骋。”注：“驰也。”

“先路”，王注：“路，道也，言己如得任用，将驱先行愿来随我，遂为君导入圣王之道也。”历来注家多从此说。吴景旭云：“按先路，车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传》：郑赐子展先路，子产次路。”（《历代诗话》七）取义甚古，录备一说。

承上诘问楚怀王：为什么总不亲近好人摈斥坏人，这态度老是不改变呢？如果能够任用贤智之士，自己是愿为前驱，引导走上正确的道路的。

以上一段，叙述自己的世系、名字、人格、才能和修养，为服务祖国（和楚怀王结合一起的）和人民提出自己优越的条件，然后才说到自己愿作引路人为国效忠。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

“三后”指什么人，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王注：“后，君也。谓禹、汤、文王也。”《文选》张铣注、朱、钱、林、高等注同。《后汉书·冯衍传·显志赋》：“昔三后之纯粹兮”注：“三后，夏殷周也。”亦同此说。朱在《楚辞辩证》里又自疑其注，说：“三后若果如旧说，不应其下方言

尧舜，疑谓三皇，或少昊，颛顼，高辛也。”一说是指楚国的先王。这里又有三种不同的见解：一、王夫之《楚辞通释》（以下简称“王夫之注”）：“三后，旧说以为三王，或鬻熊、熊绎、庄王也。”二、戴注：“在楚言楚，其熊绎、若敖、郢冒三君乎？”三、逯钦立《屈原离骚简论》附注：“三后，应指楚三王，即楚成、楚穆及楚庄，他们三个人是楚国王中的佼佼者。就在春秋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他们合起来称为‘三王’。如《左传·成公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按《离骚》所谓‘三后’，当即指此‘三王’。”刘注、姜注、文怀沙《屈原离骚今绎》附注（以下简称“文注”）同意王夫之、戴震的见解。一说是指伯夷、禹、稷。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下简称“蒋注”）：“三后，见《吕刑》，谓伯夷、禹、稷也。”阎注：“疑蒋说近是。按，此三人皆尧时贤臣。”按“三后”当指贤明君主的统治时期，故有众芳萃集，大小的人才都得到任用的情况，蒋说阎注均未合，谓楚先君先王，也似过分夸张，旧说指禹、汤、文王，可信。但当时就时代言，不单指个人，这和下文的“尧舜”就有所区别。朱熹一概从个人看，怀疑不应把禹、汤、文王摆在尧、舜的前头，因而有少昊、颛顼、高辛之说，也是不恰当的。

“纯粹”，精美没有杂质的东西叫纯粹。王注：“至美曰纯，齐同曰粹。”

“众芳”，芳草比贤智之士，众芳，即众多的贤智之士。王注：“众芳，喻群贤。”

“杂”，多种集合的意思。《国语·郑语》：“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注：“杂，合也。”

“申椒”，椒之一种。王注：“申，重也。椒，香木也。”姜

注：“洪补引《淮南子》‘申椒杜蘅，美人之所怀服。’又下文有‘谓申椒其不芳。’申椒皆连言，朱熹以为申或地名，或其美名云云，或已见及此，然亦疑不能定也。按申椒，大椒也。《尔雅》：‘檄大椒。’郭注云：‘今椒木丛生实大者名为檄。’《本草》陶注：‘秦椒今从西来，形似椒而大，色黄黑，味亦颇有椒气，或呼为大椒。’申字本有大意（王训重，亦大也），故大椒得名申椒也。”按，姜说是对的。

“菌桂”，一种香木。《文选》李周翰注：“椒、菌桂皆香木。”《本草》：“桂有三种：菌桂、牡桂、桂是也。”嵇含《南方草木状》云：“桂有三种：如枸叶皮赤者为丹桂，叶似柿叶者为菌桂，叶似枇杷者为牡桂。”洪补注：“《本草》有菌桂，花白蕊黄，正圆如竹。”菌，一作筭。戴注：“以其似筭竹，故名。讹作菌，非。”阎注：“菌桂应作筭桂，即肉桂。”按《汉书·司马相如传》“桂、椒、木兰”注：“师古曰：桂即药之所用其皮者也。”即肉桂之说，但是否即菌桂，仍属疑问。

“蕙、茝”，都是香草名。王注：“蕙、茝皆香草，生下湿地。……又《广志》云：蕙草，绿叶紫花。陈藏器云，此即零陵香，生零陵山谷。”有 ch i、zh 二音，这里读 ch i。《玉篇》：“蕙，齿改切，香草也。”《广韵》：“蕙，香草。《字林》云：‘麋芜别名。又昌待切。’按今读依《玉篇》。

举历史事实说明，在贤明君主统治的时期，贤智之士就会为君国效力，不但较突出的贤才（蕙、茝）乐于见用，有一技之长的（申椒、菌桂）都会贡献出他们的力量来。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昌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

“尧、舜”，相传系古代圣明的君主。尧名放勋，舜名重华。

《史记·五帝本纪》：“帝喾（kù）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又：“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王注：“尧、舜，圣德之王也。”

“耿（a na）介”，光明正大。王注：“耿，光也；介，大也。”顾炎武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谓之耿守；反是谓之昌披。”（《日知录》卷十三）

“遵道”，遵，循着，沿着；道是大道，正路。王注：“遵，循也。”《文选》吕延济注：“循用大道。”

“桀、纣”，夏桀，殷纣是残暴的君主。桀名履癸，纣名辛。《史记·夏本纪》：“帝发崩，子（按《世本》作弟）帝履癸立，是为桀。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一在“武”字句）伤百姓，百姓弗堪。”又《殷本纪》：“帝乙崩，子辛立，是谓帝辛，天下谓之纣。帝辛……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王注：“桀、纣，夏、殷失位之君。”

“昌被”，王本作“猖披”，本义是穿衣不系带，引申为猖狂邪乱。王注：“昌披，衣不带之貌。”《文选》刘良注：“昌披，谓乱也。”林注：“言放纵而无检束，不成其德也。”

“捷径”，捷是快速、乱跑；径是邪出的小路。王注：“捷，疾也。径，邪道也。”钱注：“捷，速行也。”

“窘步”，窘、困迫。窘步是举步困难，即“寸步难移”意。《小雅·正月》：“又窘阴雨。”注：“窘，困也。”

再举尧、舜光明正大的做法和桀纣的狂乱失足相对照，给怀王作取舍的榜样。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惟党人”二句：“党人”，指那结党营私的小人，也即是“谗人”。王注：“党，朋也。”“偷乐”，苟且偷安。王注：“偷，苟且也。”“幽昧”，昏暗不明。王注：“幽昧，不明也。”“险隘(ài)”，危险狭窄。朱注：“险，临危也；隘，履狭也。”这二句是指斥那党人苟且偷安走着黑暗危险的道路，也就是说，使国家的前途既黑暗又危险。王注：“言己念彼谗人相与朋党，嫉妒忠直，苟且偷乐，不知君道不明，国将倾危以及其身也。”

“岂余身”二句：“惮(dàn)殃”，惮是忌惮、畏难。殃是祸咎。王注：“惮，难也；殃，咎也。”“皇舆”，本义是指帝王的车子，这里比喻君国。王注：“皇，君也；舆，君之所乘，以喻国也。”“败绩”，本义专指打败仗，这里通指君国灭亡。洪补注：“《左传》曰：大崩曰败绩。”这二句是说，并不是我自己怕受灾祸，怕的是君国要遭受灭亡之祸。王注：“言我欲谏争者，非难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

明白指出党人走错了路，陷国家于倾危，并表明自己所以不避灾祸反对他们，完全是为了君国。上面列举的尧、舜、桀、纣和这里指出的党人，他们成败得失的关键，都从走的方向路数看，这是最根本的看法，用今日的话说，就是方针政策的问题，就是走哪一条路线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屈原的政治观点。说到为了君国而牺牲自己，尤其可以看出他的忘我精神和爱国思想。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齟怒。

“忽奔走”句，是说在楚王的左右做事。承上“皇舆”说，所以用奔走先后来形容为君国出力。王注：“奔走先后，四辅之职也。”按《礼记·文王世子》：“设四辅之公。”疏引《尚书·大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可志而不志，责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四辅即四邻，是服务统治君主的亲近臣子。

“踵武”，即足迹。朱注：“踵，足跟也；武，迹也。”

“荃（quán）”，一作荪，又音荪，一种香草，同荪。这里比喻楚怀王。《玉篇》：“荃、趋缘切，香草也。”王注：“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芳香，故以香草为喻。恶数指斥尊者，故变言荃也。”洪补注：“荃与荪同。……陶隐居云：东间溪侧有名溪荪者，根形气色极似石上菖蒲，而叶正如蒲无脊，诗咏多云兰荪，正谓此也。”

“揆”，见前注。一作察，义同。

“中情”，犹本心，真意。

“驩（jī）怒，驩的本义是猛火炊东西，和怒字连文，作暴怒、盛怒解。《说文》：“驩，炊铺疾也。”王注：“驩，疾也。言怀王不徐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谗言而疾怒己也。”钱注：“驩怒，盛气而怒也。”按钱注更确。驩一作齐。李善注《文选》、五臣注《文选》正文并王注均作“齐”。吕延济注：“齐，同也。言君不观察我之中诚，反信谗人与之同怒于我。”实则“齐”亦有疾速义。《尔雅·释诂下》：“肃、齐、遄、速、亟、屡、数、迅——疾也。”《史记·五帝本纪》：“幼而循齐。”《集解》：“速也。”闻一多《楚辞校补》谓《匡谬正俗》七、《太平御览》九一三又九八一、《事类赋》注二四、《合璧事类续集》四一引此文并作“齐”。刘永济所据本作“齐”，注：“齐，急速也。齐怒，急怒也。”按“驩”、“齐”二义均可通，这里据宋端平刻朱

熹《集注》本。

紧接上文申说自己拱卫“皇舆”，是希望赶上前王（三后和尧舜）的足迹，即踏上光明的大道。不料楚王全不了解，反而信谗怒己。正面提出他和楚王与党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篇中的主要线索。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謇謇(ji n)”，本义难于说话，引申为忠贞。《玉篇》：“謇，居展切，难也，吃也。”王注：“謇謇，忠贞貌。”朱注：“謇謇，难于言也。直词进谏，己所难言而君亦难听，故其词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然也。”龚注：“朱说为本义，王训为忠贞，则转义也，兼之始备。”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阶级社会里所谓“忠贞”之士，都是在不易说话的情势之下来说话的，在当时都是和统治君主有矛盾的，因而都是具有或多或少的正义感的人。当然，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说话的内容。

“忍而不能舍”句，“忍”是忍耐、容耐。即忍耐着自己的祸患，与《怀沙》里“冤屈而自抑”的意义一样。《广雅·释言》：“忍，耐也。”《论语·八佾》：“是可忍也。”皇侃疏：“犹容耐也。”“舍”，停止，止息。王注：“舍，止也。”洪补注：“颜师古云：舍，尸夜切，训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义皆同。”这句是承上句说，我心里还是忍耐祸患不能停止而不忠谏。王注：“言己知忠言謇謇谏君之过必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对“忍”字未释，尚未尽符原意。《文选》刘良注：“言我固知直言之为己患，恐君之败，故忍此祸患而不能止。”较王注更确。

“九天”即高天。传说天有九重，故用“九天”。朱注：“九天，天有九重也。”

“正”读证，证明的意思。龚注：“正，证也，指天誓日之意。”按“指九天以为正”和《惜诵》的“指苍天以为正”的意义完全一样。

“灵修”，楚人叫神做灵；修是修明。灵修连文，像神明连文一样。这里作为君主的代称，即指楚怀王。王注：“灵，神也；修，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喻君。”《汉书·扬雄传》：“灵修既信椒菌之嗛佞兮。”注：“服虔曰：灵修，楚王也。”

承上说我明知忠言直谏对自己不利，但为了君国，又不得不忍受祸害仍然不断地进谏。我敢对天发誓，我完全是为了楚王。古代的国君是国家的领袖，爱国往往要通过爱君。屈原的爱国思想和爱君思想是结合在一起的。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各本《文选》、钱注本无此二句。洪补注：“一本有此二句，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按见《抽思》）与此语同。”按洪说可信，应删。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成言”，即定言，彼此约定的话。《国语·周语》下：“听无耸成也。”韦昭注：“成，定也。”洪补注：“成言，谓诚信之

言，一成而不易也。”按一成不易，也是定的意思。

“悔遁”，悔改逃避不依成言去做。《文选》张铣注：“悔改遯（遁）移也。”

“数（shu）化”，“数”，屡屡，不止一次；“化”，变化。“数化”，屡次改变主意。《汉书·汲黯传》：“上尝赐告者数。”注：“如淳曰：数者非一也。师古曰：数音所角反。”王注：“化，变也。”

这是说，怀王当初已经和我约定要走正确的路线了，后来又悔改而有别的做法。我并不是不能离别远去，最难堪的是，怀王时常变化，没有定见。

以上引古帝王的事给怀王作镜子，表明自己忠心耿耿为君国的坚决态度，并指出不能顺利走正确道路的原因。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滋”，栽植。洪补注、钱注引陆氏《释文》作：“葢”，音栽。栽植花草也叫葑。王注：“滋，葑也。”刘逵注《魏都赋》：“《方言》曰：葑，植立也。”“畹（wǎn）”，《说文·田部》：“畹，田三十亩也。”刘逵注左思《魏都赋》引班固说同。王注：“十二亩曰畹。或曰，田之长为畹也。”《玉篇》不引《说文》而引王注，又另出一说：“秦孝公二百三十步为亩，三十步为畹。”姜注、阎注均谓班固说畹是二十亩。按四部丛刊缩印宋刊本六臣注《文选》，胡刻本《文选·魏都赋》“下畹高堂”注引班固说均作“畹，三十亩也。”姜、阎注恐误。

“树”，种。王注：“树，种也。”

“蕙”，香草，见前注。蕙和兰并提，黄庭坚有兰、蕙区别的说法。黄庭坚《兰说》：“《离骚》曰：‘予既滋兰之九畹，又

树蕙之百亩’，《招魂》：‘光风转蕙泛崇兰’，以是知楚人贱蕙而贵兰矣。兰蕙丛出，蒔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

“畦”，本义是田五十亩，这里作种植用。《说文·田部》：“畦，田五十亩曰畦。”王注：“畦，共呼种之名。”

“留夷”、“揭车”都是香草。“揭车”《尔雅》作“藹车”。《说文》作“藹”。王注：“留夷，香草也，揭车，亦芳草，一名芎藭。”《尔雅·释草》：“藹车，芎藭。”注：“藹车，香草，见《离骚》。”《说文·草部》：“藹，芎藭也。”戴注：“《广志》云：黄叶白华。”“杜衡”，一种香草。王注：“杜衡、芳芷，皆香草也。”《尔雅·释草》：“杜土卤（鲁）”注：“杜衡也。似葵而香。”疏：“《本草》唐本注云：杜衡叶似葵，形如马蹄，故俗云马蹄香。生山之阴水泽下湿地，根似细辛、白前等。《山海经》云：天帝山有草，其状如葵，其臭如麝茝，名曰杜衡，可以走马食之已瘦，是也。”

自叙培植出许多青年；最优秀的如兰、蕙，固然是培养的对象；就是较次的如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也没有遗弃。培养人才的面是很广的。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冀”是希望。王注：“冀，幸也。”《汉书·灌夫传》：“幸得召见。”注：“师古曰：幸，冀也。”《后汉书·鲍永传》：“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注：“幸，希也。”可见“冀”、“幸”、“希”是可以互用的。

“峻茂”，高大茂盛。《说文·山部》：“陵，高也。”又

“峻，陵或省。”又《草部》：“茂，草丰盛貌。”“峻”《文选》五臣本作“蔭”。吕向注：“蔭、茂盛貌。”

“刈(yì)”，割、收获。王注：“刈，获也。草曰刈，谷曰获。”

“虽萎绝”二句，“萎绝”是草木黄落，也指人的病态，这里是比喻所培植的人一无所用。《文选》张铣注：“萎绝，黄落也。”王注：“萎，病也；绝，落也。”按释元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五“萎黄”条：“诗云：‘无草不死，无木不萎。’笺云：‘草木犹有萎槁也。《声类》云：‘萎，木草菸也。’《律文》作‘痿’。痿痹，谓不能行也。”则“萎”、“痿”也得互用。“众芳”，即上文“兰”、“蕙”、“留夷”、“揭车”等，比喻所培植的人。“芜秽”，刘据本作“芜葳”。异文同义，就是荒芜。《说文·草部》：“芜，葳也。”又：“葳，芜也。”比喻所培植的人改变节操，同流合污。这二句都指所培植的人说，谓即使枯萎无用也不足惜，变了节操而同流合污，才真正使人痛心啊！王注：“虽蚤萎病绝落何能伤于我乎，哀惜众芳摧折，枝叶芜秽而不成也。”未尽符合原意。“不成”和“萎病”实在没有什么区别。这只解得一半。屈原最痛心的是他亲手培植的人变成罪恶的人这一层，王注及许多注家都没有提到。龚注：“萎绝，得正而毙者也，如屈子是也，故曰何伤。芜秽，则随俗变化矣，下文‘兰蕙变而不方，荃蕙化而为茅’是也。”这是比较正确的解释。但如钱注、林注等认为“萎绝”是指屈原自己（郭沫若译成“我自己就萎谢也不算什么”，也是同意这一说的），那又恐怕失却原意了。

自己总是希望培植的青年长大成材，到时可以为国家出力。不料这希望都成泡幻，培养出来的人一无用处。这还不算什么，最可哀痛的是，他们都变成了坏蛋，倒向敌对方面去，祸国殃民。这正是下文所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的意思。屈原曾为三闾大夫，那年纪较轻的附从敌党的人（如子兰等）可能有不少是经他教导过的，所以感到特别伤心。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贪婪（lán）”，贪得无厌。王注：“爱财曰贪，爱食曰婪。”钱注：“婪亦贪也。求得不已曰贪，未得而固得之曰婪。”

“凭”，满的意思，楚国方言。王注：“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

“索”，索和求连文同义。《易·系辞》：“探赜索隐。”疏：“索谓求索。”“吹毛求疵”（《汉书·中山靖王传》）也作“吹毛索疵”（《汉书·杜林传》）。读作“素”，与下文“妒”字叶韵。陈音义：“索音素。《释名》：索，素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徐邈音素。皋鱼引古语云：枯鱼衔索，几何不蠹！”

“羌”，楚国方言，发语词，义近“乃”字。王注：“羌，楚人语词也。”《广雅·释言》：“羌，乃也。”

“恕己以量人”，是说宽恕（不责备）自己的贪婪求索，认为（量度）别人也和自己一样。钱注：“恕己，不责己也。量人，轻度人也。”

“兴心”，即生心，动了念头。王注：“兴，生也。”

“嫉妒”，猜忌、苛毒的意思。王注：“害贤为嫉，害色为妒。”按《说文·人部》：“嫉、妒也。从人，疾声。一曰，毒也。”又：“嫉，嫉或从女。”《女部》：“妒，妒也。从女，介声。”又：“妒、妇妒夫也。”《尔雅·释言》：“苛、妒也。”注：“烦苛多嫉妒。”“嫉”本不从女，而“妒”为妇妒夫，或即王注区分“害贤”、“害色”之意。但苛毒为嫉妒之实质，也应该揭出。阎注：“嫉妒字从女，本专属女性，此篇多以男女喻君臣

关系，故以众女喻群小，此处‘嫉妒’正切女子而言。”似非作者原意。细味原文“众”字与“各”字以及下文的“驰骛以追逐”，这“嫉妒”是揭露权奸们的内部矛盾，指的都是权奸们活动的丑态，和下文的“众女嫉余之蛾眉”，似乎性质不同。

进一步刻画那班人卑鄙恶浊的心理活动和矛盾冲突。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忽驰骛”句：“忽”是急急忙忙，忽来忽去。《文选》刘良注：“忽，急也。”“骛”，乱跑。《说文·马部》：“骛，乱驰也。”“追逐”，是同义字连用，意即钻营。《说文·辵部》：“追，逐也。”又：“逐，追也。”这句是说，“众”急急忙忙只是奔走钻营权位财利。王注：“言众人所以驰骛惶遽者，争逐权贵、求财利也。”

“急”，先急之务，首先。《吕氏春秋·情欲篇》：“邪利之急。”注：“急犹先。”

“冉冉”，渐行渐下的样子。王注：“冉冉，行貌。”《文选》吕向注：“冉冉，渐渐也。”“修名”，廉洁的名声，和上面指出众人的“贪婪”是相对的。《卜居》中的“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廉贞”，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其志洁，其行廉”，正是这“修名”很好的注脚。洪补注：“修名，修洁之名也。”逯钦立说：“诗人这种好修和重视修洁的特殊志向，就当时新旧社会力量日益矛盾来说，这正是封建贵族贪婪风气的强烈反响，是诗人的反对贵族生活的思想感情的升华。”（见其所著《屈原离骚简论》）这看法是对的。一说修名是长远的声名，亦通。朱注：“修名，长名。”

由众人亟亟于追逐权位财利非自己的先急之务，转到自己的

修洁的志尚，以下就说自己如何如何，这是一个转折点。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齿頔亦何伤。

“坠露”，掉下的露水。王注：“坠，堕也。”

“落英”，“落”解作始。“英”，即花。《尔雅·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鹇、落、权舆——始也。”《诗·访落》：“访予落止。”传：“落，始也。”周必大说：“注《诗》者释访落为谋始，然则《楚辞》‘餐秋菊之落英’，其指初落无疑。”（《省斋文稿》卷十八）一说落即陨落。王注：“暮食芳菊之落华（花）。”一说落即掇取。洪补注：“秋花无自落者，当读如‘我落其实而取其华’之‘落’。”按王说不妥，洪已指出。但洪解掇取亦未允，“落英”与上文“坠露”相偶成文，这句于餐字外不应再出一个动字。英，古音央，与下文“伤”叶韵。朱注：“英，叶于姜反。”陈音义、戴注并作“古音央”。

“信姱（ku）”，实在是美好。洪补注：“信姱，言实好也。”钱注：“姱，盛美也。”“练要”，即精要。朱注：“练要，言所修精练，所守要约也。”

“齿（k n）頔（hàn）”，因饥饿而黄瘦的样子，即《渔父》里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说文·页部》：“齿，饭不饱面黄起行也。”又：“頔，面黄也。”洪补注：“齿頔，食不饱面黄貌。”

把饮露餐英来说明修洁自持。并以高度的信心——如果我的心愿很好、很对，就是憔悴黄瘦也不足惜，来表示操守的坚定。

擘木根以结兮，贯薜荔之落蕊。
 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馡馡。

“擘”，同揽，持取。一作麩。王注：“擘，持也。”

“木根”，当系一种草木的名称，未详何物。洪补注：“《荀子》云：兰槐之根是为芷。注云：菌名兰槐，根名芷。然则木根与，皆喻本也。”陈本礼《屈辞精义》（下文简称“陈注”）：“木根，木兰之根须。”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麩木根’即‘拿根木头’。”“擘木根”与下文“矫菌桂”相偶成文，“菌桂”既系一种香木（见前注），则“木根”当为一种名物的称谓，谓系根、须或木头之类，均望文生义，不可信。

“贯”，贯串。王注：“贯，累也。”钱注：“贯，穿连之也。”

“薜荔”，香草。按《尔雅·释草》无“薜荔”，而“薜”凡五见：“薜、山蕲。”注：“《广雅》曰：山蕲，当归。当归今似蕲而粗大。”又：“薜、白蕲。”注：“即上山蕲。”又：“薜、庾草。”注：“未详。”又：“薜、牡薺。”注：“未详也。”又：“薜、山麻。”注：“似人家麻生山中。”疏：“麻生山中者名薜。”均不同薜荔。阎注据朱骏声说，“或即今之当归。”不确。《本草》不言当归，名薜及山蕲，当归又非缘木而生，《尔雅》疏和吴仁杰《离骚草木疏》（以下简称“吴疏”）已加辨正了。王注：“薜荔，香草也，缘木而生。”洪补注：“《山海经》：小华之山，其草多薜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注云：亦缘木生。”吴疏：“《山海经》：小华之山，其草萆荔。郭注云：萆荔，香草也。……或以扬雄《反骚》言‘卷薜芷与若蕙’，《汉书·房中歌》言‘都荔遂芳’，疑薜与荔本二物。……按《离骚》云‘令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则薜荔固一物耳。《广雅》以山蕲为当归，非缘木而生者也。”戴注：“薜荔，蔓生，缘木

石墙垣。大者谓之木连，小者谓之络石。”

“落蕊”，“落”义同“落英”的“落”。“蕊”，花心。“蕊”，读里，与下文“馘”叶韵。陈音义：“蕊，音里。沈约《撰类》，蕊在纸韵，见六朝时犹有古音也。”

“矫”，举起。《文选》刘良注：“矫，举也。”

“菌桂”见前注。

“索”，本义是绳索，这里作动词用，和《诗经·七月》“宵尔索麋”的索字用法一样，就是搓成的意思。

“胡绳”，一种香草，茎叶可作绳索。朱注：“胡绳，亦香草，有茎叶，可作绳索。”

“馘馘”读洗，连串起来很好看的样子。王注：“馘馘，索好貌。”钱注：“馘馘，索绳条理之貌。”洪补注：“馘，所绮切。”（《文选》六臣本“馘”下注“所绮”。）陈音义：“音洗，亦音徙。”

在饮食之外，再以服饰的芳洁比喻自己品质的美善，志操的高尚。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謇”，五臣本《文选》作“蹇”，楚国方言，发语词。一说作“乃”字解。姜注：“謇疑为语词，即羌一声之借。《九歌》‘謇谁留兮中洲’，亦即蹇（？）之异声。又变为庆，扬雄《反离骚》‘庆夭悴而丧荣’是也。羌训乃，此亦作乃义用。”一说作“竟”字解。王泗原说：“屈赋里謇（蹇）字这样用的凡九见，都作竟讲，有终的意思。謇竟古同音，所以通用。蹇当是楚人的习惯写法。”（见其所著《离骚语文疏解》）都可通。至于王逸、吕向、洪兴祖、朱熹等把“謇（蹇）”解作“难”，钱杲之解作

“不阿世貌”，都是把它和上文“謇謇之为患”的“謇謇”一样理解，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前修”，前代具有美好品质的人。王注：“前修，谓前代修习道德之人。”

“服”，习用、惯用。读逼，与下文“则”叶韵。王注：“服，用也。”又《橘颂》“橘徕服兮”注：“服，习也。”朱注：“服，叶蒲北反。”陈音义：“服，音逼，《诗》及《易》、秦汉古辞，无有不读逼者，故《仪礼·戴冠辞》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德读的，与服韵。此其当世之音，毫无所假借者。唐贾公彦疏《仪礼》曰：服叶蒲北反。失之矣。”

“周”，合。王注：“周，合也。”

“彭咸”，是屈原所仰慕的殷代人。究竟是指什么人，有几种说法。王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死。”洪补注：“颜师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戴注：“一说，即《论语》所称老彭，依鼓咸，亦窃比之意耳。”姜注：“按彭咸当为两人，彭即《论语》‘窃比于我老彭’之彭，咸即下文之巫咸。”逯钦立附注：“彭咸指巫彭巫咸两个创始巫祝的殷代大臣。”文绎附注：“疑彭咸即比干，彭、比双声，咸古音干。”诸说都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有一个共通之点，都认为是殷代人。（《论语·述而》：“窃比于我老彭。”包咸注：“老彭，殷贤大夫。”）

“遗则”，留下的法则、榜样。王注：“遗，余也；则，法也。”

说明自己这样做是取法前贤的。虽不合于世俗的做法，但要坚持到底，不易节操，依照殷代彭咸留下来的榜样做事。

以上是叙说为了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培养了许多青年，以及自己如何坚持这主张，加强锻炼，奋斗到底的具体情况。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掩涕”，“掩”，遮蔽、覆盖；“涕”，涕泪。“掩涕”，即流涕被面。《文选·潘岳 怀旧赋》：“夕雪皤以掩路。”李善注：“《埤苍》曰：皤，白也。掩，覆也。”洪补注：“掩涕犹皤泪也。”

“艰”，艰苦，读如姬，与下文“替”叶韵。戴注：“艰、读如姬，盖方言。”按“艰”古文作“𨾏”，从喜得声，故可读姬。刘注：“音近喜，去声。”一说，“艰音斤，与下文‘替’叶韵。（陈音义）这两句，姚鼐说：“二句疑倒误，盖涕与替为韵。”（见《古文辞类纂》）显然，这是不恰当的。

“余虽好修姱”句：“好”，喜欢。“修姱”，修洁美好。“鞿羈（j）”，马缰绳和马络头，比喻自己约束自己。洪补注：“修姱谓修洁而姱美也。”王注：“言自绳束不放纵也。”钱注：“己虽好美修洁，又盛美而自羈束。”按句意与《悲回风》的“心鞿羈而不开”、《哀郢》的“心结结而不解（并见《悲回风》）”正同，朱、钱注是正确的。王注“言为人所系累”，吕延济注“而为逸人所衔勒”，恐非原意，受人系累的情况，下句才指出，这句是说自己的具体情况。姜注引王念孙《读书杂志》谓“‘虽’与‘唯’同”，可通；引臧庸《拜经日记》谓“‘修’上不宜有‘好’字”（阎注同），则仍须加以研究。“好”字在这句里是主要动词，似不宜删去。

“謇”，见前注。

“諝（suì）”，进谏。王注：“諝，谏也。”《诗》曰：“諝予不顾。”按《说文·言部》：“諝，让也。从言，卒声。《国语》：諝申胥。”又：“让，相责让。”责让与进谏，义近可通。《广雅

·释诂》：“黼、证、讷、诤、谏、谄——谏也。”又，与讯同，即告。《尔雅·释诂》：“命、令、禧、畛、祈、请、谒、讯、诘——告也。”“讯”，一本作“谄”。朱注：“《诗》曰：谄予不顾。今《诗》作‘讯’。讯，告也。”又，郭沫若解作卒业的“卒”字。（见《离骚今译》附注）

“替”，废弃。《尔雅·释言》：“替，废也。”（王注同）陈第谓“替”音侵，注引作“黄”。（见《屈宋古音义》）闻一多说：“谄当为龄，两替字（按并指“既替余以蕙鬋兮”的替字）并当为鬋，皆字之误也。……今本作替，即鬋之省。谄鬋并训缚束，‘朝龄’‘夕桐’，谓朝夕取芳草自缚束其身以为佩饰也。”（见《楚辞校补》）

这是说，我哀念人民生活的艰难痛苦，不觉长长地叹息乃至涕泪倾泻出来！我虽以修洁美好力自约束（意思是说非常谨慎地防止产生错误），乃竟早上说的话，晚上就被废弃掉（这主要是指楚怀王，和上面“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初、后”和“朝、夕”时间观念没有什么分别。当然中间具有党人谗譖的意思，但这里没有指出）。在这里，就标志着屈原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也显示出谗言的厉害和怀王的反覆无常。

既替余以蕙鬋兮，又申之以揽。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蕙鬋（xi na）”：“鬋”，本义是佩带，这里用作佩带的东西，香囊之属。“蕙鬋”是里面装着蕙的香囊。王注：“鬋，佩带。”“申”，再加的意思。《文选》刘良注：“申、重。”重是重复，即再加。

“揽”，钱注本作搯，即持。《文选》刘良注：“揽，持也。”

这两句是承上说他所以遭受废弃（替）的内容，即是既然废弃我因为我佩带蕙鬋，再加废弃我因为我引持芳。这是加重自己无端受人陷害的说法，都不是简单的句子。一本下无“以”字，因而有人认为“以”字是衍文（阎注），有人认为这句不当有“以”字（王泗原疏解），怕还值得研究。

“亦余心”句：“亦”这里作实在、真正解。“善”，美善。《后汉书·窦融传》赞：“亦称雄才。”注：“亦犹实也。”王注：“言己履行忠信，执守清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这句是说，实在我心中认为是美善的（最好的、应该做的）。

“虽九死”句：“九”是极大的限度，不是实数。“九死”和万死一样。《文选》刘良注：“九，数之极也。”“悔”，悔恨。读喜，与上“ ”叶韵。王注：“悔，恨也。”陈音义：“悔音喜。”这句承上说，虽然付出了我的生命也毫不悔恨。

申说“夕替”的情况，无所不用其极。蕙鬋既然是“替”的一种对象，“揽 ”又是“替”的一种目标。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投降妥协，自己真正认为问心无愧、应该做的，虽然极端危险、牺牲性命也不后悔。明确地表示自己和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灵修”，见前注。

“浩荡”，本义是大水横流的样子，这里比喻怀王骄傲放纵，一塌糊涂。王注：“浩犹浩浩，荡犹荡荡，无思虑貌也。”钱注：“浩荡犹放纵。”林注：“放纵于规矩之外，如水之横溢，即上文‘昌披’之意。”

“民心”，人民的心情。王注：“终不省察万民善恶之心。”

《文选》张铣注：“终不察众人悲苦。”朱注：“民谓众人也。”钱注：“怨王以灵修之德，纵放不自守，故于人心不能察。”林注：“民以恶贪婪、好修姱为心，跟上‘民生多艰’句。”龚注：“好美而恶恶，民之心也；劝赏而畏威，亦民之心也；故举直错枉则民服，而能使枉者直。”这从王逸一脉相承的说法，都认为“民心”是指人民的心情。王夫之、蒋驥、戴震等都从屈原自己的用心来加以说明。如果从屈原和人民一致的心情这个角度来看，是可以通的。但必如姜注认为“王逸以为万民，殊肤浅不足为训。蒋驥以为原自谓，为说较确。”则十分不妥。考屈原自谓，一般都用“余心”。别的不引，即以本篇为例，如“非余心之所急”、“亦余心之所善兮”、“岂余心之可怨”等都是。而这里独用“民心”。有什么理由可以说它等同于“余心”呢？和“余心”类似的属于自谓的用法，如“余情”（“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苟余情其信芳”）、“余之中情”（“荃不揆余之中情”、“孰云察余之中情”），都冠以“余”字（也有用“朕”的，如“怀朕情而不发”之类，“朕”和“余”一样）；即或省去“余”字如“苟中情其好修兮”之类，也明确是自谓，不至于引起误会。这里屈原分明说“民心”，而必欲作“自谓”解，那就是解者的歪曲，作者是不负这种责任了。篇中用“民”字的有四处：“哀民生之多艰”、“民生各有所乐兮”、“民好恶其不同兮”和这里的“终不察乎民心”，王逸都解“民”作“万民”，我认为是确当的。（有的本子以“民”为“人”，是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洪补注已经指出了。）

“众女”，比喻谗人。《文选》李周翰注：“众女，喻谗臣也。”

“蛾眉”，蚕蛾的眉，细长而曲，比喻女人的眉毛长得很美。《卫风·硕人》：“螭首蛾眉。”这里指美好的人，屈原自比。王注：“蛾眉、好貌。”《文选》李周翰注：“蛾眉，美女，喻忠直

也。”

“谣诼(zhuó)”，“谣”一作𧇧，又作谗。“谣诼”是造谣谮毁。王注：“谣谓毁也；诼音啄，犹谮也。”（据李善注本《文选》，章句本与洪补本均无“音啄”二字。李本多有音切，反切后出，显系李注加入，此举一例，余略。）《尔雅·释乐》：“徒歌谓之谣。”郭注：“《诗》云：我歌且谣（按见《魏风·园有桃》）。”王注：“毁”，应作谣言解。《方言》十：“诼，𧇧（诉）也，楚以南谓之诼。”郭注：“诼、谮亦通语也”（按《广雅·释言》：“诼，谮也。”）诼又可作“毁”解。原本《玉篇》零卷“诼”字注引《广雅》：“诼，责也。诼，毁也。”（《古逸丛书》本，《大广益会玉篇》无引文。）刘永济所据本“𧇧诼”，注：“𧇧、毁古通。楚以南谓谗诉之言为诼。”姜注：“按《御览》四八三引此作谣作谗，引注同，疑本作谗。”

“淫”，邪乱。王注：“淫，邪也。”《文选》李周翰注：“谗邪之人，谓我善为淫乱。”

我所怨恨的是，怀王荒唐无主见，看不到人民的心情怎样，而那班坏人又嫉忌我的美好，一味造谣谮毁，说我怎样淫乱。

固时俗之工巧兮，糺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固”，刘本作“何”。

“糺(mi n)”，违背，又有毁灭意。王注：“糺，背也。”东方朔《七谏·谬谏篇》引用这两句作“灭规榘(矩)”;又《沈江篇》也作“灭规榘而不用。”

“规矩”是圆和方，指法度。王注：“圆曰规，方曰矩。”

“改错”，错即措字，是措施。改错是改变措施。

“绳墨”，匠人引绳弹墨打直线，也指法度。朱注：“引绳墨

以取直者，今墨斗绳是也。”

“追曲”，追求邪曲，和正直相反。《战国策·秦策》：“以曲合于赵王。”高诱注：“曲，邪。”

“竞周容”句，“周容”，苟合取容。“度”，常法。指那班坏人，没有正确的主张，经常的做法，都是逢迎苟合来讨好人家。朱注：“言争以苟合求容为常法也。”

承上文指斥那班坏人只是耍花招，违背法度，胡作非为，一味逢迎谄媚。从这里可以看出屈原是有法治思想的。

齟郁邑余齟𦣻兮，吾独困穷乎此时也！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齟（tún）”，烦闷。洪补注：“齟、徒浑切，闷也。”

“郁邑”，“郁”是积滞、凝结；“邑”同悒，忧念。“郁邑”是滞结了许多忧念。《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郁湮不育。”注：“郁，滞也。”《大戴记·太子立事》：“君子终身守此悒悒。”注：“悒悒，忧念也。”

“齟（chà）𦣻（jì）”，呆站在那边叫“齟𦣻”，这里是形容失意的人进退不得、茫无适从的样子。《方言》七：“𦣻、𦣻（chì），逗也。南楚谓之𦣻，西秦谓之𦣻，逗其通语也。”逗就是顿住。王注：“齟𦣻，失志貌。齟犹堂堂之貌也；𦣻，住也，楚人名住曰𦣻。”钱注：“齟𦣻，进退无所据之貌。”

“溘（kè）”是奄忽、忽然。王注：“溘犹奄也。”洪补注：“溘，奄忽也。”

这是说，我心里的忧愁真把我呆住了，我竟受着这样不幸的环境所困厄！可是，我宁愿死无葬身之地，也不肯同流合污作那种丑态。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鸷(zhì)鸟”是一种品性刚烈、不肯与众鸟为群的大鸟。屈原把它比喻自己有硬骨与别人合不来。王注谓“能执伏众鸟，鹰鹯之类。”比屈原为凶残之鹰鹯，固不恰当；说能执伏众鸟，更离事实。姜注谓“当为执之讹，执与鸷为古今字，执者诚信忠贞之义”，则与“不群”也很难贯通。我认为应该从鸷鸟的刚强性格和不与众鸟为群的行径来说明作者自比的意义。

“何方圜”句，“圜”一本作“圆”，字同。“方圜”是指方枘(ruì)圆凿。枘是刻削装进凿孔的木头，凿是凿成受枘的孔。周是容、合，见前注。这句是说，要把方的木枘装进圆的凿孔，是格格不入的，比喻他和一班坏人的意见不可能相合。宋玉《九辩》：“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默默而难入。”《文选》吕延济注：“若凿圆穴，斫方木内(纳)之，而必参差不可入。”

“异道”就是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主张。

这是说，性情刚强(有硬骨头)的人不肯同流合污，向来都是这样。方和圆怎能配合？走的路数不同，又怎能相安无事？明确指出他和当时的贵族当权派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抑”是按下、压下的意思。王注：“抑，案也。”

“尤”，过失，罪过。王注：“尤，过也。”

“攘詬(a u)”，攘是含、忍受的意思。詬是耻辱、谩骂。朱骏声《离骚约注》：“攘犹含也，注训除，失之。”王注：“诟、耻也。”案《玉篇》：“诟，许黠、胡遘、居候三反。《左氏传》：

廉诟之。杜预曰：诟，骂也。《礼记》：孔子曰，常常以儒相诟病。郑玄曰：诟病犹耻辱也。野王案：《左传》不忍其诟是也。又龠、《说文》亦诟字也。《声类》或为黜字，在口部。”（见《古逸丛书》本原本《玉篇》零卷。《小学汇函》本在诟字下注：骂也，耻辱也二义。涵芬楼本二义分注在诟、龠中。）

“伏”即服，与“孰非善而可服”的“服”字同义。跟伏罪的“伏”字意义不同（林注：“伏、伏众也。”不对）。东方朔《七谏·劝世篇》：“服清白以逍遥兮”，正作“服”字，“清白”指芳洁的言行，廉贞的节操。林注：“清白与贪婪相反。”

“死直”就是死于忠直，死于正义。钱注：“人有自安于清白而死于忠直者。”林注：“直与周容相反。”

“厚”是厚礼、重视。洪补注：“比干谏而死，孔子称仁焉，厚之也。”钱注：“固前圣所厚礼也。”都作厚礼、重视解，这是对的。王注和《文选》吕向注作“乃前世圣人之所厚哀”，实误。屈原愿守廉贞、为正义而死，怎么会说成为前圣之所厚哀呢？这关键仍在于对“伏”字的理解。王逸虽然没有注出“伏”字的意义，照他对“厚”字的解释推测，他是把“伏”字当成“伏剑”、“伏罪”的“伏”来理解的。

这是说，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我只有压制自己的心情和志意，忍受一切的罪责和耻辱。因为抱负贞洁的节操而死于正义，向来是圣人所称许的。

以上是申述自己为人民、为祖国的无限忠诚，揭露楚王的听信谗言和敌党们的为非作歹；同时表示自己坚持正确主张的决心，虽斗争失败，只有为正义而牺牲，终不肯“降心以从俗”。

自开篇到这里，概括地叙写当时的实际情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质和面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的来历、主张和操守，可以看出楚王对待屈原的态度和党人们的丑态行为，同时，也可以看出屈原和楚王与党人们之间存在着多么深刻的矛盾。以

下，作者的思想感情便逐步开展，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上驰骋他的高度的想像力，从各个方面来发挥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和坚持真理的壮怀伟抱，塑造出许多正面的和反面的人物形象加以赞扬或抨击来抒发自己的爱憎的感情，开辟了许多奇创的境界，作为自己理想的标志。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悔”是忏悔、悔恨。下面一段，都是屈原意想中忏悔之辞。王注：“悔，恨也。”

“相道”，“相”读去声，辅佐的意思。《论语·季氏》：“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注：“包曰：言辅相人者，当能持危扶颠。若不能，何用相为？”“道”是大道、正道。

“不察”是不蒙明察。

“悔相道”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屈原自己悔恨辨认道路不清楚，一种是说屈原追悔以道辅佐楚王而不蒙明察。从屈原一贯的坚定的意志看，不会自己悔恨走错了路，后一种说法更妥。

“延伫（zhù）”，延是引长；伫是站住。“延伫”是站在那儿延颈怅望的意思。朱注：“延，引颈也；伫，踟立也。”

“反”，是“归真反璞”的“反”，即下文“退将复修吾初服”意。

“复路”是回复旧来的路子。朱注：“以后于昔来之路。”

“行迷”，走上迷惑的道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是令人大惑不解的“迷”字的真义。张纵逸以这两句是“希望国君赶快认识不变法的错误”（见《屈原与楚辞》），似与上下文不相联属。

上面既然是以死自誓，决不消极逃避了。这里忽一转念，觉

得杀身无益，不如回复原来的本真。显然，这是从极端痛苦与矛盾的心情出发的。这是一种假想，并不是事实。我们只能从屈原中体会出他具有多么深刻的矛盾冲突的心情，不能认为他是走上消极逃避的道路。

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步”是慢慢地走。王注：“步，徐行也。”

“兰皋”，皋是泽畔、水边。兰皋是生着兰草的泽畔。王注：“泽曲曰皋。”朱注：“泽曲曰皋，其中有兰，故曰兰皋。”

“椒丘”，《文选》吕延济注：“椒丘，丘上有椒也。”

“且焉”有两种解释：一种“且”作“此”字解。王引之《经传释词》：“且犹此也。”吕昌莹《经传衍释》：“《史记·李广传》：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言此乃命也。”“焉”是助辞。“且焉”就是此焉，指此地。一种“且”作“于”字解，“焉”作“是”字解。《经传衍释》：“于犹其也，且也。昭四年《左氏传》：亡于不暇，又何能济？言亡且不暇也。”又，“焉犹是也。《诗》：于焉逍遥。于焉嘉宾。言于是也。”二说均可通。

“离尤”，“离”同罹，是遭遇；“尤”，罪过。“离尤”就是获罪。洪补注：“离，遭也。”“尤”见前刘良注。

“初服”即洁白无暇的本真。用服饰作比叫“初服”。王注：“初服，清洁之服也。”

就上文回车复路引出，缓步兰皋，止息椒丘，避免灾祸，退修初服的一些情况。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

“芰荷”，王注：“芰，魏也，秦人曰藜藿。荷，芙蓉也。”《汉书·扬雄传》载《反离骚》：“衿芰茄之绿衣兮，被夫容之朱裳。”注：“应劭曰：芰，魏也。（按应劭注司马相如《子虚赋》：“魏，芰也。”）师古曰：茄亦荷字也，见张揖《古今字谱》。”都以芰荷为二物。《尔雅·释草》：“荷，芙蓉。”注：“别名芙蓉，江东呼荷。”《说文·麤部》：“芰，魏也。”又：“荷，芙蓉叶。”则“芰荷”为二物，其中一物又与下句“芙蓉”混，殊不相配称。芰荷与芙蓉对举，则芰荷应该是一种物名，洪补注：“《本草》云：其叶名荷，其华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蓉。芰荷，叶也，故以为衣；芙蓉，华也，故以为裳。”这种看法是对的，但引《本草》仅言“荷”，而不及“芰荷”，则仍不明确。按《本草》：“嫩者荷钱，帖水者藕荷，出水者芰荷。”则芰荷已经是指出水生花的大叶，所以可以把它剪裁做上衣。

“芙蓉”即莲花。王注：“芙蓉，莲华也。”《尔雅·释草》：“荷，芙蓉……其华菡萏。”疏：“郭璞云……今江东人呼荷华为芙蓉。”《说文·麤部》：“麤，菡萏，芙蓉华。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蓉。”（惠栋《读说文记》：当作夫容。）《汉书·司马相如传》：“外发夫容魏华。”注：“应劭曰：夫容，莲华也。”

“裳”，下衣叫裳。王注：“上曰衣，下曰裳。”

承初服说。从上衣下裳的芳洁来标志着自己内心的芳洁，并表示只要内心真正芳洁，没有了解也就算了。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

“岌（jí）”，本来是山高的样子，这里叠用，形容很高。王注：“岌岌，高貌。”

“陆离”，美好分散貌，即光彩四射。洪补注：“许慎云：陆离，美好貌。颜师古云：陆离，分散也。”许、颜都只解释一个方面的意义，合起来就是光彩四射。

“芳与泽”，芳是芳香，泽是腐臭。旧注都就上句的佩玉来说明，认为泽是指佩玉的润泽，这是不对的。芳字既不承上面的冠说，泽字也就和上面的“佩”无关；并且和下面的转折的语意也不合。就下句的“唯”字来看这句的“杂糅”，根本和《橘颂》里的“青黄杂糅”不同，分明是指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郭沫若注：“今案毛诗《秦风》：‘岂曰无衣？与子同泽。’郑注：‘泽，褻衣也，近污垢。’即此泽字之义。”（《屈原赋今译·离骚注》）高亨等注：“泽当读做黧，指腐臭的东西。”姜亮夫注：“按泽古作黨，读若浩。疑《离骚》本作臭，字形讹误作黨，王逸以今文定之，又误作泽也。”三说均从和芳香相反的意义来说明泽，是对的。郭说不改字，尤为允当。

“杂糅”就是混杂，糅也是杂的意思。王注：“糅，杂也。”

“昭质”，明洁的本质。王注：“昭，明也。”戴注：“昭质，谓明洁之质。”

“亏”是亏损。《说文》：“亏，气损也。”

仍是承“初服”说。用冠、佩来标志自己特立不群的性格，并表示虽然处在美恶不分、是非不明的环境里，但自己明洁的本质并没有受到损伤。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游目”，“游”是放纵。“游目”，放眼纵观的意思。《诗·郑风·山有扶苏》：“隰有游龙。”注：“龙、红草也。笺云：游龙犹放纵也。”疏：“隰中有放纵之龙草。”

“四荒”是四方荒远的地方。王注：“荒，远也。”钱注：“四荒，四方荒远之处。”蒋注：“四荒，举天下而言。”戴注：“往观四荒，犹言无往而不自得也。”

“缤纷”，盛多的样子。王注：“缤纷，盛貌。”钱注：“缤纷，多貌。”

“菲菲”是香气勃勃。王注：“菲菲犹勃勃，芳香貌也。”王夫之注：“菲菲，香远飘也。”

“弥章”是越发昌明显著。王注：“章，明也。”钱注：“章，显也。”

由于信心很强，不觉心神旷荡，悠然自得。旧注如“终不以远故改其行”（王注）或“犹未能顿忘此也”（朱注）之类，都不恰当。惟戴震“无往不自得”的看法是对的。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体解”也叫“支解”，是古代一种最残酷的刑法。钱注：“体解，支裂之也。”

“惩”是伤害、创伤。洪补注：“谓惩创也。”“常”和“惩”叶韵，有二说：陈音义谓惩音长，与常叶。江有诰《楚辞音读》（以下简称“江音读”）谓常本作恒，与惩叶。

这是一个小结。各有所乐是说或乐邪（贪婪之类），或乐正（修洁之类）各有不同。而自己呢？是独好修洁的。即使把我支解了，也只能残害我的肉体，而不能变更我的意志，创伤我的心灵。

以上是抒写或进或退的复杂矛盾的心情，是一种设想。设想自己退修“初服”，也必按照本来的意志去做，怎样也不肯同流合污。

女媧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
曰：“黜鬻直以亡（忘）身兮，终然黜乎羽之野。”

“女媧（x）”是楚国女巫的一种名称。一说是贱妾之称；一说是女伴。旧注认为是屈原的姐姐；又认为是屈原的妹妹。王注：“女媧，屈原姊也。”《说文·女部》：“媧，女字也。楚词曰：女媧之婵媛。贾待中说，楚人谓姊为媧。”段玉裁注：“王逸、袁山松、郦道元皆言女媧屈原之姊，惟郑玄注《周易》：屈原之妹名女媧。《诗》正义所引如此。”《汉书·广陵王胥传》：“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颜师古注：“女须者巫之名也。”张云雷《选学胶言》引《文选》集解：“媧者贱妾之称，比党人也。”（梁章钜《文选旁证》引朱氏绶说同此）周拱辰《离骚拾细》十：“女媧之申申，以女媧为原姐，旧矣。按《归妹》三爻曰：‘归妹以须。’注：‘须，女之贱者。’似因其不爱原以大道，徒为申申之詈而贱称之，未必原姐也。杂说，秭归乡有女须庙，捣衣石犹存。大属附会。后人因掺入《水经注》，更可笑。按《汉书·广陵王胥传》：‘胥迎李巫女须，使下神祝诅。’则须乃女巫之称，与灵氛之占卜，同一流人，以为原姐，缪矣。”郭沫若《离骚今读》注：“女媧旧以为人名，或说为屈原姐，或说为屈原妹，均不确。今姑译为‘女伴’，疑是屈原之侍女。”高注从屈原姐说，姜注从贱妾说，文注、马茂元《楚辞选》（以下简称“马注”）均从女伴说，刘注从女巫说。我认为就篇中的设辞看，女媧和灵氛、巫咸应系同一类型的人物，如果突出一个姐、妹、贱妾、女伴之类的人物，反觉不伦不类。其实，这一系列的假设人物，都是屈原为了表明心曲而提出的。用具体人物来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把思维活动形象化，正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特征。既然是假说的人物，从人物的一致性来理解，

似乎解作女巫比较恰当。

“婵(chán)媛(yuán)”，原作婵媛，牵引的意思，这里引申作缠绵眷恋解。朱注：“婵媛，眷恋牵持之意。”陆时雍注：“婵媛，眷顾流连之意。”（见陆本《楚辞》，以下称“陆注”。）王夫之注：“婵媛，婉而相爱也。”阎注：“婵媛是甲由的假借字……即喘息之意，此指呼吸急促而言。”也通。

“申申”，重复再三的意思。《尔雅·释诂》下：“从、申、神、加、弼、崇、重也。”王注：“申申，重也。”又说，宽舒和缓的样子。《论语·述而》：“申申如此，夭夭如也。”集解引马（融）注：“申申夭夭，和舒之貌也。”朱注：“申申，舒緩貌也。”

“詈(lì)”是责备。《韵会》：“正斥曰骂，旁及曰詈。”王夫之注：“詈，责也。”

“鯀(gǎn)”，同鯀，相传是尧的臣子，禹的父亲。

“鬻(yù)直”是刚愎硬直。洪补注引东坡说：“《史记》：殛(jì)鬻于羽山以变东夷。《楚辞》：鬻鬻直以亡身。则鬻盖刚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以变四夷之族哉！”楚人对鬻的传说，必和儒家的传统看法不同而和东坡这种看法一样，所以女媭才用他来比拟屈原。

“黻(fú)”，一作夭，未终天年就死去叫黻。王夫之注：“不以考终曰黻。”蒋注：“不尽天年谓之黻。”闻一多《楚辞校补》：“黻当从一本作夭。夭之为言夭遏也。……夭遏双声连语，二字同义，此曰‘夭乎羽之野’，犹《天问》‘永遏在羽山’矣。”也是一种看法。

“羽之野”，指羽山的原野。相传鯀不顺帝命，被杀于羽山之野。《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鯀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鯀于羽郊。”《水经注》引连山：“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洪补注：“羽山东裔在海中。”陈音

义：“野音暑。”

这是假托女嬃关怀他，指责他，先引故事证明他前途的危险。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蓱蓫蒺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博謇(ji n)”，博是多、广；謇是直谏。“博謇”是多量的谏诤。朱注：“博謇，谓广博而忠直。”蒋注：“博謇，博学而好直言也。”

“姱节”，美好的节操。朱注：“姱节，姱美之节也。”朱骏声谓“节”字当为“饰”字之讹。姜注、闻校均从其说，也通。

“蓱(cí)蓫(lù)蒺(sh)”，“蓱”和茨同。王注：“《诗》曰：楚楚曰蓱。”《毛诗·小雅·楚楚》作“楚楚者茨。”又《尔雅·释草》：“茨，蒺藜。”《释文·尔雅音义》：“茨，或作蓱同”可证。“茨”是积聚的意思。《诗·甫田》：“如茨如梁。”传：“茨，积也。”《广雅·释诂》：“茨、累、穴……积也。”徐锴《说文系传》：“蓱犹积也。”《广雅·释诂》三：“茨……聚也。”旧注把“茨”解作“蒺藜”，系据《尔雅》，在这里不合用。照文义，这蓱字应作动词解。“蓫”和“蒺”都是恶草。《尔雅·释草》：“蓫，王杅。”王注同。王夫之注：“叶似竹，开碧花，俗呼竹叶菜。”“蒺”，王注：“蒺，𪔐(x)耳。”洪补注：“形似鼠耳，诗人谓之卷耳，《尔雅》谓之苓耳，《广雅》谓之𪔐耳，皆以实得名。《本草》：𪔐耳一名蒺。”王夫之注：“𪔐耳，苍耳也。”

“判”是别异。王注：“判，别也。”

“服”，佩带。《吕氏春秋·孟春纪》：“衣青衣，服青玉。”高诱注：“服，佩也。所衣服佩玉皆青者，顺木色也。”王注：

“女嬃言众人皆佩薜藜荆耳……”也是以佩解释服。

女嬃再就他的品性行为指出：你为什么要那么修洁保持自己的节操；在这个满是佩带恶草的环境里，老是与众不同而不肯佩带它？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茷独而不予听！

“户说”是家家户户去说服。

“余”，这余字是女嬃和屈原共有的代名词，作复数用，像现在用“咱们”一样，表示亲切的称谓。郭沫若《离骚今译》注曾引《诗经》“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母民圣善，我无令人”的“我”字作“我们”解，来说明古人有这种用法。一说，“余”是“尔”的错字（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但无确证。

“并举”，相与荐举，即互相勾搭的意思。王注：“相与朋党，并相荐举。”

“茷（qióna）独”，原义：“无兄弟叫茷，无子叫独。这里是孤独的意思。王注：“茷，孤也。”

女嬃再劝说他：人多了是不可能个个去说服的，谁真能了解咱们的内心呢？一般人都是勾勾搭搭，成群结伙，你为什么老是孤零零地一个人而不肯听信我。

以上假托女嬃的责备和劝说来证实他和“党人”之间已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可以加强上面各节所说的真实性，也为下面许多离开人间世的远游找到了现实的根据，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节中”，节是适切；中指中情。《吕氏春秋·仲春纪·情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注：“节，適也。”又：“不过其适。”这是“节中”二字很好的解释。这正是屈原自信自己的做法完全合理的表示。由于自信是合理的，而不断地受委屈，受打击，所以不能不叹喟。旧注以节为节度、节制（王、钱等注），中为中和、平正（王逸、王夫之、林云铭等注）等，似均脱离上下文和屈原的思想实际而孤立地从字面解释。

“喟（kuì）”是叹声。王注：“喟，叹也。”“凭心”，十分难堪的心情。《方言》二：“凭、恚盛貌。”《说文·心部》：“恚，恨也。”又：“怨，恚也。”又：“怒，恚也。”可见凭、恚、恨、怨、怒在心情表现上有共通之点。洪补注：“故叹息愤懣而行泽畔矣。”又引《说文》云：“冯，懣也。”以“凭”解作“愤懣”，也通。

“历兹”，经历至此，竟遭到这样的境地！洪补注：“喟凭心而历兹者，叹逢时之不幸也。”朱注：“历，经历之意。”一说：“兹，年也。”（阎注引张渡《然疑待征录》）

“南征”即南行。王注：“征，行也。”

“重华”就是帝舜。王注：“重华，舜名也。《帝系》曰：瞽叟生重华，是为帝舜。葬于九嶷山，在沅湘之南。”

“陈词”，陈说自己的言词。《文选》古诗“欢乐具难陈。”李善注：“陈犹说也。”

这是说，我的做法，是按照前代圣贤的言行而又适切于我自己的心愿的（这就概括上面所述的一切了。有人认为“前圣”即重华，似不可从），乃竟给歹人排挤、打击到这样的境地，这是使人多么叹息和愤怒的啊！我一定要渡过沅、湘，向帝舜的神灵来控诉。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炤。

“启”是夏禹的儿子。《世本》：“启，禹子。”张澍注：“按《纪年》，启名会，《连山易》，名余，《年代历》，名建。”

《九辩》，古代的乐曲。王注：“《九辩》、《九歌》，禹乐也。”姜亮夫有驳议，疑本来是“舞韶”二字（见《屈原赋校注》）。王夫之《宋玉九辩》注：“辩犹遍也，一阙谓之一遍。”

《九歌》，古代的乐曲。洪补注：“《山海经》云：夏后开上三嫫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乐名，启登天而窃以下用之。（按见《大荒西经》）《天问》亦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王逸不见《山海经》，故以为禹乐。”

“夏康娱”，“夏”是大的意思；“康娱”是欢乐。《诗·秦风·权舆》：“夏屋渠渠。”毛传：“夏，大也。”（《尔雅·释诂》同）《尔雅·释诂》：“康，乐也。”疏：“康者，安乐也。《唐风·蟋蟀》云：无以大康。”王注：“娱，乐也。”王逸以夏康连读为夏之太康，后来注家多从其说，不可信。戴注：“言启作《九辩》、《九歌》，示法后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娱自纵，以致丧乱（康娱二字连文，篇内凡三见）。”姚鼐《古文辞类纂》（以下简称“姚注”）：“启《九辩》下十六句，皆言失道君之致祸；汤禹四句，皆言得道君之致福。启之失道，载逸书《武观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以与浇并斥为康娱，王逸误以夏康连读，解为太康，伪作古文者遂有太康尸位之语，其失始于逸也。”郭沫若据此更明白地加以说明（见《离骚今译》注）。一说，夏是上下的下，指启下返人间。不确。原文上句并无上天意，此句自不必用下返。

“纵”是放纵。王注：“纵，放也。”

“不顾难”，不顾后来的患难。王注：“不顾患难，不谋后世。”姜注：“《天问》‘启代益作后，卒于离寐。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竹书》‘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战国策》‘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不足任天下，传之益，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此事又见《韩非·外储》、《史记·燕世家》。盖战国所传启益争立之故事也。‘不顾难’者，言启既为天子，不回顾其得天下斗阅之不易，即指此事为说，且与《天问》相应。‘以图后’者，言启谄谋不善，子姓奸回，至有五子失于家斗之事，即所以引起下文一句而言，为下句‘用’字设辞也。”按姜引史实说明启非贤主，足以打破儒家的传统看法，这是很好的。但把这些史实来说明“不顾难”的含义，就值得考虑。照这样说，“难”字要读平声作“困难”解释了。“难”字洪、朱、钱等均注乃旦反。我们从下面所举的“羿”、“浇”、“夏桀”、“后辛”几个事例看，都是指日后的患难，没有回顾以前的困难的意思，显然，这里也应该作不顾异日的患难解释。就辞义说，王注是正确的。

“五子”即武观，启的儿子。郭注：“武观即《书》逸篇《五子之歌》（今存者乃梅賾伪本），亦即本节所出之五子。《国语·楚语》士媿曰‘启有五观’。五武音同字通，实一人，非五人。五子误为五人，其事甚古。《周书·尝麦解》‘昔在启（原注：“原误为殷，今正。”泰按惠栋说作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史记·夏本纪》‘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劓，作五子之歌。’均以五子为五人，且以为启子。揆其所由，盖即出于误读《离骚》此节之故，以‘夏康’既误于前，而‘五子’复误于后也。（今本《竹书纪年》详纪武观事，然系杂采诸书而杜撰出之，不足信。可参看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姜注引《史记·夏本纪》、

《周书·尝麦解》、《楚语》之外，更引《春秋传》“夏有观扈”、《汉书·古今人表》“启兄弟五人号五观”、王符《潜夫论》“夏后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须洛劓，是谓五观”等说，作出这样的结论：“按五子指太康兄弟五人言，五观应作武观，乃启之季子。诸书皆误为一，非也。”把“五子”和“五观”分别开来，来说明五子系启的五个儿子，也即是把旧说加以证实。但所引据的有指出“兄弟五人”的《汉书》和“潜夫论”，均出《史记》之后，仍不足以破郭说。

“用失乎家巷”，烝一作巷。失字系夫字的讹误，乎字系多余的。原文当作“用夫家烝”。“用夫”是因而，家烝（巷）即内哄（h na），内部战斗。王念孙《读书杂志·志余说》：“失字因王注而衍，注内失国失尊位，乃释‘家巷’二字之义，非文中有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乎家巷者’，用乎之文，与用夫用之同。下文云‘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后卒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是也。若云：‘五子用失乎家巷’，则是所失者家巷矣，注何得云兄弟五人，家居里巷失尊位乎？扬雄《宗正箴》曰：‘昔在夏时，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降与巷古同声通用，亦足证家巷之文为实义，而用夫之文为语词也。巷读《孟子》邹与鲁哄之哄，家犹内也。”近人闻一多、郭沫若、姜亮夫均信此说。闻先生更据班固《离骚序》引淮南王刘安本作“五子以失家巷”与后文“厥首用夫颠陨”的句法，认为“夫”误作“失”，衍文不是“失”字而是“乎”字。（郭先生和姜先生的结论同，不过没有引用《离骚序》。）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陈辞首先征引故事，从夏启说起，说夏启放情纵乐，不顾后患，因而引起内哄，闯出了大祸。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以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羿（yì）”，有穷国的君主，善射。洪补注：“《说文》云：帝誉（kù）射官也，夏少康灭之。贾逵云，羿之先祖也，为先王射官。帝誉时有羿，尧时亦有羿，羿是善射之号。此羿，夏时诸侯有穷后也。”

“淫游以佚畋（tián）”，“淫”，浸淫不止，即沉迷下去。《尚书·无逸》：“嗣王则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注：“淫者浸淫不止。”“佚”读逸，即超出范围之外，是泛滥的意思。《国语·越语》：“淫佚之事。”注：“淫佚，放滥也。”“畋”是打猎。王注：“畋，猎也。”《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对晋悼公曰：“昔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默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髯、龙圉而用寒浞（案《古今人表》作韩浞，《水经·巨洋水》注同，古寒、韩同音通用）。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正义：寒是国名，伯明，寒君之名也）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娱）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注：杀之于国内）。靡（注：夏遗臣事羿者）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浇，《说文·豕部》引作敖，《论语》、《古今人表》均作嘒。豷，《潜夫论·五德志》作預）。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夏本纪》作戈）及斟寻（哀公元年传作杼）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注：少康子。案《墨子·非儒》作扈，《三代世表》作予，《夏本纪》作宁，《索隐》引《世本》作伧，《初学记》引《世本》作輿。都因形音相近

而变异)灭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关于羿的传说,《天问》、《竹书纪年》、《帝王世纪》、《归藏》、《山海经》、《穆天子传》、《论语》、《左传》、《淮南子》、《史记》、《汉书》、《潜夫论》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而《左传》最详,因过录于此。

“封狐”是大狐。王注:“封狐,大狐也。”闻一多、姜亮夫均疑“封狐”系“封猪”之误,说详《楚辞校补》和《屈原赋校注》。

“乱流”,横行胡搞叫“乱流”。王夫之注:“横流而渡曰乱流,言不顺理也。”

“鲜终”,很少有好结局。《诗·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笺:“鲜,寡;克,能也。”正义:“鲜克为少有之称。”《论语·尧曰》:“天禄永修。”皇侃疏:“终犹卒竟也。”

“浞又贪夫厥家”,“厥”即其,他的。“家”是妇、妻室。王注:“妇谓之家。”这是指寒浞贪取羿的妻室做自己的妻室。见上注“浞因羿室。”“家”与“狐”叶韵,古音姑。陈音义:“家音姑。”

再说羿、浞因荒淫乱政,胡作非为,以致亡国亡身,无好结局。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隕。

“浇(ji o)”,寒浞的儿子,见上注。

“被服”作动词用,披上、穿上,即身上具有的意思。王夫之注:“被服强圉,负强捍众也。”解“被服”作“负”,即自恃具有意。卫瑜章《离骚集释》引《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被服儒术”的颜师古注:“被服,言常居家其中也。”因

而解作好勇斗狠，居之不疑。文怀沙解被服为“负矢”，义可通，但必以服为“矢服”，似更狭窄。

“强圉(y)”即强壮多力。王注：“强圉，多力也。”

“纵欲而不忍”，纵欲是放纵自己的情欲；不忍是不能忍耐自制。朱注：“纵放其欲，不能自忍也。”

“厥首用夫颠陨”，“厥首”，他的头。王注：“首，头也。”“用夫”，因而。“颠陨”，坠落。《说文》：“颠，顶也。”这里作动词用，作自顶而下。王注：“自上而下曰颠。”“陨，落也。”《释诂》下：“陨，坠也。”《说文》：“陨，从高坠也。”这句意思是，他的头因而掉下来。

再说浇因负强纵欲，逸乐无度，以致被少康杀掉。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

“夏桀”，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史记·夏本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余见前注。王注：“夏之亡王也。”

“常违”，常常违背天理人心。《文选》李周翰注：“言常背天违道。”一说，违是邪僻。

“遂焉”，终究的意思。《周书》：“遂巡而退其不遂。”注：“遂，终也。”《广雅·释诂三》：“遂，竟也。”朱骏声谓遂是地名，言桀在遂地遇到祸殃。恐不可信。

“逢殃”，“逢”是遭逢；“殃”是祸咎、灾祸。王注：“殃，咎也。言夏桀上背于天道，下逆于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终为殷汤所诛灭。”

“后辛”，“后”，君主；“辛”，纣名，商朝最后一个君主。《史记·殷本纪》：“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

野。甲子日纣后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白旗。”余见前注。王注：“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纣名也。”

“菹(z)醢(hài)”，“菹”，酱腌过而细切的菜叫菹。《说文》：“菹，酢菜也。”王注：“藏菜曰菹。”“醢”，肉酱。《尔雅·释器》：“肉谓之醢。”注：“肉酱。”王注：“肉酱曰醢。”“菹醢”二字连用或对用，都没有酱菜的意思，是说把人杀了再细切捣成酱。《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鬼侯即九侯，这记载和《史记》微有不同。）高诱注：“肉酱为醢，肉熟为脯。”杀后为酱为脯以告宗庙，燕飨诸侯，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

“殷宗”，殷相的宗祀，即殷相的国家。

“用之”，同“用夫”。

再说夏桀、殷纣，作恶多端，以致身丧国亡。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汤禹”指殷汤、夏禹。《史记·殷本纪》：“主癸辛，子天乙立，是为成汤。”《索隐》：“汤名履，《书》曰予小子履是也。又称天乙者，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汤，故曰天乙。”《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屈原作品，禹汤并称的凡三见，而皆称汤禹。除此句外，下文有“汤禹严而求合兮”句，又《怀沙》有“汤禹久远兮”句，毫无例外，似乎他对古代帝王先后次序的观念，和先秦诸子一般的看法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先秦诸子一般是把禹排在汤的前头作“禹汤”的。虽然《吕氏春秋·审分览》有“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的说法，《韩非子

·五蠹》有“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先慎注“汤武禹”当作“禹汤武”是毫无实据的，只是按照儒家传统的看法）的说法，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作者在其他许多地方都作“禹汤”。姜亮夫对此点有怀疑，认为“古无倒称汤禹之例”，举《墨子·公孟》篇为证，并断言“他如《左传》、《荀子》、《韩非》、《吕览》诸书皆然，而决无倒言汤禹者。则此汤必不指商汤言，明矣！”因而把“汤”字解作“大”，说“汤禹”即是“大禹”。由于在别处找不到同样的例子，在同书中又找不出例外的说法，就从字义本身找出路，取消了一个帝王的名字，也不问在屈原作品中有没有以汤作大用的内证。这作法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即使没有《吕览》、《韩非》的例证，也不能不让屈原具有独异的想法，何况在《天问》中已有不少对古代历史传说和一般的看法不同的例子。

“俨（yǎn）而祗敬”，俨是庄严的样子。《礼记·曲礼》：“俨若思。”注：“矜庄貌。”祗和敬意义一样，祗敬就是敬。王注：“祗，敬也。”“周”，王注：“周，周家也。……言殷汤、夏禹、周之文王。”《文选》刘良注：“言汤、禹、周文。”洪补注：“言周则包文武矣。”姜注：“周论道句，正是祗敬之事。周乃论之疏状字，《说文》：周，密也。”按姜说难信。就下句“举贤才而授能”和下文“遭周文而得举”看，指周文更确。林注这两句：“三后之所以纯粹者。”也是认为是指周文。

“差”读磋，与“颇”叶韵。陈音义：“差音磋，今之蹉跎，古作差沱。”

“颇”，倾斜、偏差。王注：“颇，倾也。”钱注：“颇犹偏也。”

这是举出殷汤、夏禹、周文敬天命、论正道、举贤能、守法度以兴隆国家的例子，和上举的淫恶不得善终的君主作鲜明的对照。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私阿”，偏爱不公叫“私”；徇私叫“阿”。钱注：“偏爱曰私，徇私曰阿。”

“览民德”，观察人民共认为有德行的人，即是看看有德于人民的、为民心所归纳的君主。林注：“见为民所德者。”

“焉”，于是、乃。吴昌硕《经传衍释》：“焉犹于是也，乃也，则也。”《国语·晋语》：“子犯知文公之安齐，而有终焉之志。”“焉”作于是解。《吴越春秋·阖闾传》：“楚子期将焚吴军。子西曰：吾国父兄，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焉”作乃解。（两例均见《经传衍释》引。）

“错辅”，“错”同措，措置；“辅”，辅佐。王注：“错，置也；辅，佐也。”这两句即《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

“茂行”是美好的德行。钱注：“茂行，美行也。”

“苟得”是乃得、才得的意思。钱注：“乃庶几得。”王夫之注：“苟，乃也。”

“用此下土”，“用”，享用、拥有。“下土”对“皇天”言，即天下。“用此下土”是说拥有这个天下，承上面好的君主说。王注：“下土谓天下也。”闻注：“案用，享也。……‘用此下土’，犹言享此天下耳。”

就上举的事例作出结论：皇天是没有偏私的，看看民心所归的人才置立辅助他。因此，只有明智而具有美行的人们，才能够拥有天下。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相观”，“相”去声，读 xiàna，也是观看。相观连用，意义一样。王注：“相，视也。”钱注：“相亦观也。”

“民之计极”，计是谋划、计算，极是究竟、穷极。“民之计极”就是计算人民的终极的意思，也即是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人民所遵循的法则。王注：“计，谋也；极，穷也。”一说，计极犹纪极、容极。又说，极是标准。义均可通。

“夫孰非”二句，是说哪有不义的人而能够用人？哪有不善的事而可以服人？

再从人民的愿望要求看，不义的人行不善的事是不可能用人和服人的，也就是说，是不可能得民心的。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阽(diàn)”，临危的意思。《说文》：“阽，壁危也。”洪补注：“临危也。《小尔雅》曰：疾甚谓之阽。《前汉》注云：阽，近边欲堕之意。”“危死”就是险些儿死去。朱注：“危死，言几死也。”

“不量凿”句，凿是凿孔，枘是木楔，见前“何方圜”注。不量度凿孔的方圆大小来削正枘的形状，是必然不能相容的。这是比喻人臣不审察君主的贤愚而一味忠谏，就必然招来祸殃。王注：“言工不量度其凿而方正其枘，则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贤愚，竭其忠信，则被罪过而身殆也。”

“前修”即前贤。《后汉书·冯衍传 显志赋》：“纂前修之夸节兮”注：“前修犹前贤也。”

“菹醢”见前注。

这是说，我明知自己是很危险的，但是为了实践我的初衷，

我却没有翻悔。不顾恶劣的环境而坚持正义的斗争，前代有许多贤者都因此而惨死。从这里可以看出屈原忠心耿耿、自我牺牲的精神。

曾歔歔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
揽茹蕙以淹（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曾”，不止一次。王注：“曾，累也。”

“歔（x）歔（x）”，叹泣的声音。王注：“或曰：哀泣之声也。”

“郁邑”，内心忧郁，和“歔歔”发出声音的有内外之别。王注：“郁邑，忧也。”

“哀朕时”句，自哀生不逢辰。王注：“自哀生不当举贤之时，而值蒞醞之世也。”

“茹蕙”，茹是柔软。茹蕙是柔软的蕙草。这是比香软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用柔软的蕙草来拭泪。王注：“茹，柔软也。”

“襟”同衿。《尔雅·释器》：“衣衿（音渍）谓之襟。”注：“交领。”

“浪浪”犹汪汪，眼泪下流的样子。王注：“浪浪，流貌也。”

这是承上说，我不只一次地叹息和忧郁，哀念自己生不逢辰。我以香软的东西拭泪，泪珠汪汪地流下，沾湿我的衣衿。说明了他并不是不悲痛，但是终不肯变易其初衷。

以上是假托“女嬃”的责备和自己向“重华”的申诉，来显示出自己品质的高贵和主张的正确。其实就是设为问答之意。“女嬃”的责备是一般人的看法，是提出问题；对“重华”的陈辞是解答，是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解答那些问题。在解答问题之先，说明自己的做法是依据“前圣”而又切合实际的，在这样

的前提条件下，再提出许多历史上生动的事实来证明，并且作了一个具有善恶的因果关系的、带有真理性的判断，这就很有力地说明了自己这样做的动机和效果都是应该肯定的了。这么一来，还有什么值得悔恨呢？虽然明知是“危死”，也应该这样做。不过当时异常恶劣的环境阻碍着这正确主张的顺利进行，不能不使自己感到叹息流涕而已。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驰玉虬以昵（乘）竝兮，溘埃风余上征。

“敷（f）衽（rèn）”，敷是布、铺的意思；衽是衣的前衿。“敷衽”，跪下时把衣的前衽铺在地面。王注：“敷，布也。衽，衣前也。”戴注：“衽谓衣裳旁幅交裂者。”

“耿（gǎng）”，明。王注：“耿，明也。”

“中正”，中正之道，指上面陈辞中应该肯定的合理的东西。王注：“乃长跪布衽，俯首自念，仰诉于天，则中心晓明得此中正之道。”

“驰（chí）”，驾上四匹马拉的车。《玉篇》：“驰，四马一乘也。”这里作动词用。

“玉虬（qiú）”，“虬”，龙类，无角。王注：“有角曰龙，无角曰虬。”“玉虬”，玉色的虬。

“竝（yì）”，凤皇之属，身有五彩。王注：“竝，凤凰别名也。《山海经》云：竝身有五彩，而文如凤，凤类也。”这句是说，以玉虬为马，以竝为车。洪补注：“言以竝为车，而驾以玉虬也。”

“溘埃风”句，“溘”，奄忽。洪补注：“按溘，奄忽也。”“埃风”是夹着尘埃的风。自下而上，又很突然，故卷起埃风。王注：“埃，尘也。”《庄子·逍遥游》：“尘埃也。”成玄英注：

“扬土曰尘，尘之细者曰埃。”“上征”是到天上去。洪补注：“征，行也，言忽然风起而余上征，犹所谓忽乎吾将行耳。”钱注：“溘然尘埃风气之表，上行于天。”指离开地面说，也通。王夫之注：“埃当作埃，传写之讹。嘉谋已定，惟俟君之用，则可以远征而高举。”闻、姜、马均从其形讹之说，闻校引《文选·吴都赋》注，江淹《杂体诗》注等作“啲风”，谓“其字本作埃，故一本得以声近误为啲。”姜注引例同闻，谓“以声近字易之”，不云误。但姜注又云：“淹忽埃风之起，余因以上征也。”既言“淹忽”，又云“埃”，则殊费解。刘永济所据本作“啲风”，注：“啲音思，风高之名。”

陈辞之后，越发认清自己的主张和行动的正确性和正义性，乃进一步扩开境界，更详尽地叙写通过事君求贤为国为民不懈奋斗的过程。这四句是承上开下的写法。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发轫（rèn）”，“发”，拨开、举起。《释名·释言语》：“发，拨也，拨使开也。”《广雅·释诂》：“发，举也。”“轫”，放在车前的横木，是阻止车轮转动的。王注：“轫，啗轮木也。”“发轫”是拨开支撑车轮的横木，这就是意味着要启程了，故借作启程用。

“苍梧”，山名，在湖南省宁远县东南，舜南巡，葬于此地，即九嶷山。《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一说，苍梧在广西境。洪补注引如淳说：“舜葬九嶷，九嶷在苍梧冯乘县，故或曰舜葬苍梧也。”按此与下句“县圃”同指山。“灵琐”，“灵”指神灵，神仙；“琐”指刻着花纹的门。“灵琐”是神灵所居的琐门。王注：“一云，灵，神

之所在也。琐，门有青琐也。言未得入门，故欲小住门外。”蒋注：“《山海经》，昆仑山帝之下都，面有九门，百神之所在，故曰灵琐。”闻注：“案琐、啣并当为藪，声之误也。……灵藪即上文之县圃。”姜注：“灵琐、余以为即玄圃之门，不用洪、朱、钱、戴诸家之说，盖句中留此二字，不以指玄圃，则无所属也。”案旧注也没有把灵琐推出县圃之外。

写行程，以别苍梧为起点，与前就舜陈辞时“济沅湘以南征”是同样的写法，线索分明。别了舜，就到那神仙所居的县圃了。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羲和”，神话中的人物，日的母亲，又是日的驾车人。这里只作日的驾车人解。《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据毕氏灵岩山馆本，洪补注引征有不同。）王注：“羲和，日御也。”

“弭（m）节”，弭是停止，按住；节是鞭、策之类。弭节是停止加鞭的意思。王注：“弭，按也，按节徐步也。”

“崦（yān）嵫（zī）”，神话中的山名，太阳从那儿进去。《山海经·西山经》：“（鸟兽同穴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注：“日没所入山也。”王注：“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渊。”

“迫”与“索”叶，读薄。陈音义：“迫音薄。”

“曼曼”即漫漫，长远的样子。《文选》吕延济注：“漫漫，远貌。”

“索”，见前注。

承上日暮说，命日的驾车人羲和按节缓行，不要迫近崦嵫，使白日拉长些，因为路途很长远，我要到处搜寻我的对象（理想中的人物）。以下是搜集对象的具体情况。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咸池”，神话中的地名，日出时在那儿洗澡。王注：“咸池，日浴处也。”

“总余辔”，总是结上；辔是马缰绳。总余辔是结上我的马缰绳。王注：“总，结也。”“扶桑”，神话中的树名，生在日出的地方。一说，扶桑是地名。《山海经·海外东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注引《淮南子》：“日出汤谷，浴于咸地，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为鷲明。”《说文·木部》：“恩桑神木，日所出也。”姜注：“扶桑宜为地名。”

“若木”，神话中的树名，生在日入的地方。洪补注：“《山海经》：南海之内，黑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日所入处，生昆仑西，附西极也。然则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欤？”按《西山经》：“槐江之山……其阴多梲，木之有若。”注：“梲木，大木也，言其上复生若木。大木之奇灵者为若。见《尸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盖若木即扶桑，扶若字即恩腴字也。”一说，若木即扶木，扶桑所产。（见姜注）一说若木即扶桑，扶桑系云霞。（见李嘉言《扶桑为云霞说》）

“拂”，挡住、遮蔽。王注：“拂，击也；一云蔽也。”

“逍遥以相羊”，相羊即徜徉。逍遥相羊是自由自在地游玩。洪补注：“逍遥犹翱翔也。相羊犹徘徊也。”

饮马咸池，总辔扶桑，折木拂日，是先停顿然后起步，聊逍遥句是游行的意念，其实还未游行。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

“望舒”，月神的驾车人。王注：“望舒，月御也。”

“飞廉”，风神，叫“风伯”，又叫“风师”。王注：“飞廉，风伯也。”《吕氏春秋》：“风师曰飞廉。”

“奔属”是奔走相属，即跟着跑。钱注：“奔属，奔而相连属也。”属与下“具”叶韵。读如注。钱注：“属叶韵，音注。”陈音义同。“鸾皇”，一种灵鸟，即雌鸾。洪补注：“《山海经》：女床山有鸟，状如翟而五彩毕备，声似雉而尾长，名曰鸾，见则天下安宁。《瑞应图》曰：鸾者赤神之精，凤皇之佐也。”钱注：“案《尔雅》：翬凤其雌皇。此鸾皇亦鸾之雌也。”案《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皇、鸾、凤显加区别，因而王、洪、朱等以鸾与皇分开注释，成两种鸟。但就前后文看，似指一种灵鸟，钱注更确。

“先戒”，先行告诫诸神。刘注：“先戒，先行告诫也。”

“雷师”，雷神，又叫“丰隆”。钱注：“雷师，雷神也。”洪补注：“一曰雷师，丰隆也。”

“未具”即未准备好。王注：“严装未具。”蒋注：“具，备也。”

想使月御为前驱，使风伯做后卫，使鸾皇告诫诸神，而雷神却说一切还未准备妥帖。开始作游行的调遣。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其来御。

“凤鸟”，一种大鸟，古人把它比喻有全德的圣人，这里作灵鸟解。《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皇（洪补注引作“曰凤鸟”）。……是鸟也，饮食自然（洪引作“则”），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洪引作“大康宁”）。”朱注：“凤，灵鸟也。”

“飘风”即回风，旋风。《尔雅·释天》：“回风为飘。”注：“旋风也。”

“屯其相离”，屯是聚会。洪补注：“屯，徒昆切，聚也。”屯其相离是写飘风的动态，忽合忽离。王注谓不与己和合，朱骏声谓离同丽，作附着解，似均执其一端。

“帅”读率，即率领。

“云霓”，“霓”，通作鸛，虹类，色较暗微。《尔雅·释天》：“鸛为挈贰。”（挈贰是鸛的别名，见《尸子》。）注：“鸛，雌虹也。”疏：“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虹；暗者为雌，雌曰鸛。”

“御”读迓（yà），即迎接。

写游行的情况。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闾阖而望予。

“总总”，群聚的样子。王注：“聚貌。”钱注：“总总，俱至之貌。”

“斑”是杂乱的文采。洪补注：“斑，隐文也。”钱注：“斑，杂文也。”

“陆离”，见前注。

“帝阍(h n)”，“阍”，守门的人。守门的人在黄昏的时候闭门，故叫“阍”。“帝阍”，给天帝守门的人。王注：“帝谓天帝，阍，主门者也。”《说文·门部》：“阍，常以昏闭门隶也。”

“阍(ch na)阖(hé)”，天门。王注：“阍阖，天门也。”洪补注：“楚人名门曰阍阖。”

这是说，所有的仪从——月御、风伯、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之属纷然俱来，乍离乍合，光辉灿烂，或上或下。到了天门，就叫守门的人开关，他倚在天门注视着我。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暧暧(ài)”，昏暗的样子。王注：“暧暧，昏昧貌。”

“罢”，有三说：一说是罢散、终了意，从时光的角度看。钱注：“将罢，谓日昏暮人将罢散也。”高注：“罢，终了。时已昏黑，一天过完了。”一说，罢读疲，作疲惫解。王注：“罢，极也。”又：“言时昏昧，无有明君，周行罢极，不遇贤士。”一说罢读为霸，即魄的假借字，也是从时间看。姜注：“按罢当读为霸，即魄之假借字。魄，月初生也。此借言月光继日而生，则上下文义，皆相次矣。”三说似以第一说为长。第三说很有创见，但罢、魄通假，于古无征，仍难确信。

“结幽兰”，兰指兰佩，结幽兰是把幽兰的佩作为结好之物，即要赠给理想中人。闻注：“结兰者，兰谓兰佩，结犹结绳之结。……盖楚俗男女相慕，欲致其意，则解其所佩之芳草，束结为记，以诒之其人。”姜注：“结幽兰句，言以幽兰之佩，以为结好之物，与下文‘解珮觿以结言兮’意同。此盖意有所求也。”

“延伫”，延颈伫立。这种形象是刻画心里在盘算要赠给谁的神态。钱注：“延引伫立。”

“溷（hùn）浊”句，溷也是浊。“溷浊不分”，指一味混乱，不能分清是非善恶。《说文·水部》：“溷，乱也。一曰水浊貌。”

“好”读去声，作爱好、喜悦解。《荀子·解蔽》：“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注：“好，喜也。”《诗·小雅·彤弓》：“中心好之。”传：“好，说（悦）也。”

“蔽美”，蔽是隐蔽；美是指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品质、言论、行为等）。蔽美是隐蔽掉美好的东西。《文选》吕延济注：“蔽，隐也。”

“嫉妒”，见前注。

这是写到了天门口时的内心活动。时日已暮，与谁结好？世界是这么恶浊，美德善行，不但不受表扬，反而遭到猜忌呵。世溷浊两句，是当时楚国实际情况在屈原心目中的映现。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鼯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白水”，《文选》刘良注：“白水，神泉也。”洪补注：“《河图》曰：昆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国，名为河也。”

“阆（lǎn）风”，神山，在昆仑山上。王注：“阆风，山名，在昆仑之上。”《文选》刘良注：“阆风，仙山也。”王夫之注：“或云即县圃。”（姜注从此说加以考证。）

“鼯（xiè）马”，“鼯”亦作继。《左传·僖二十四年》：“臣负羁继从君巡于天下。”注：“继，马缰。”这里作动词系字解。王注：“鼯，系也。”“马”读母，与“女”叶韵。陈音义：“马音姥。”

“高丘”，楚国的山名。一说，在阆风山上。一说，高丘楚地名。王注：“楚有高丘之山。”《文选》吕向注：“高丘，楚山名。”洪补注：“或云：高丘，阆风山上也。……旧说：高丘，楚地名也。”按从“忽反顾”的语意看（与下文“忽临睨夫旧乡”、《涉江》的“乘鄂渚而反顾”用法相似，反顾的对象都是现实的境界）。从《楚辞》中其他提到高丘的例子看（如《九叹·逢纷》篇的“声哀哀而怀高丘兮”，《惜贤》篇的“望高丘而叹涕兮”，《思古》篇的“还顾高丘泣如洒兮”），从《文选·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鹤”，把高丘和巫山对举看，似解作楚山更确。高丘是比喻楚国的朝廷。

“女”，神女，比喻居高位的贤者。对这“女”字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认为是比喻贤臣。王注：“女以喻臣。”《文选》吕向注：“女，神女，喻忠臣也。”洪补注：“《离骚》多以女喻贤臣，不必指神女。”钱注：“女喻贤臣，可配君者。”王夫之注：“高视远望，冀遇卓然超远之士，与相契合，同心效国。”二、认为是比喻贤君。朱注：“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于此又无所遇，故下章欲游春宫求鸚妃、见佚女、留二姚，皆求贤君之意也。”陆注据此。蒋注：“女，神女，喻贤诸侯也。”三、认为是比喻贤后。林注：“是时郑袖专宠，缘君不明其德相配，故以古贤后为感讽之微词。”高注从此说。我觉得第二说最不合实际，屈原只有“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的意图，决无别求贤君之心，所以贾谊以“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吊屈原赋》）来替他开刀设法。热爱祖国的屈原，除楚王外，还有什么贤君可求呢？其余两说均可通。但贤臣可以包括贤后，古代后妃对君主都自称臣妾，而贤后不能包括贤臣，则贤臣比贤后的范围更广。不过如钱杲之与王夫之的解说，一则在“贤臣”的下面申说“可配君者”，一则在“卓然超远之士”的下面申说“与相契合，同心效国”，看贤臣的角度也自不同。因此，我以

为以女比喻居高位的贤者，较为圆通。“无女”是没有理想中的人物，即所谓“朝中无人”的意思。

这是说，等到天明我就要渡过白水、登那阆风山了，忽然反顾一下，不觉掉下眼泪来。可怜祖国的朝廷（高丘）没有理想的人物呵！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春宫”，东方青帝所居的宫殿。王注：“春宫，东方青帝舍也（《太平御览》六九二引舍作宫）。”

“琼枝”，琼树的枝子。洪补注：“琼，玉之美者。传曰：南方有鸟，其名为凤，天为生树，名曰琼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围，以琳琅为实。《后汉》注云：琼枝玉树，以喻坚贞。”钱注：“琼枝，琼树之枝。”

“继佩”，继续佩带。上言结幽兰，故这里言继。王注：“继，续也。”

“及荣华”句，指琼枝说。荣华，比颜色。句意是说，趁琼枝还鲜艳未衰落的时候。王注：“荣华，喻颜色。落，堕也。”

“相”读去声，见前注。

“下女”有二说：一说指春宫中的下女，即神女的侍女。一说指下鸚妃、简狄等人。朱注：“下女，谓神女之侍女也。”蒋注：“下女，指下鸚妃诸人，对高邱言，故曰下。”闻注：“下女者，谓鸚妃、简狄及有虞二姚。此皆人神，对帝宫高丘二天神言之，故曰下女耳。”按闻说最精，可信。

“诒”，同贻，遗赠。王注：“诒，遗也。”

高丘虽然无女可求，但求女之心仍切。再到青帝的春宫，折美好的琼枝给“下女”以通情。

吾令丰隆昵（乘）云兮，求鸩妃之所在。
解佩觿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

“丰隆”，雷神。一说是云师。王注：“丰隆，云师。一曰雷师。”朱注：“丰隆，雷师。”

“鸩（fú）妃”，“鸩”一作“宓”，同伏，是神女。王注：“宓妃，神女。”洪补注：“《洛神赋》注云：宓妃，伏牺氏女，溺洛水而死，遂为河神。”

“佩觿”，见前注。

“结言”是结好通言，即打交道，通言语。

“蹇修”，媒人的美称，疑楚国方言。王注：“伏羲氏之臣也。”不见他书记载，恐系从“宓妃伏羲氏之女”推想出来的，不可信。章炳麟谓“蹇修为理，谓以声乐为使，如《司马相如传》所谓以琴心挑之。《释乐》：徒鼓钟谓之修，徒鼓磬谓之喙，此喙修之义也。”（《榘汉闲话》）说甚新，但从上句“解佩觿以结言”看，似即为喙修的任务，别出声乐，未免太过曲折。闻一多《楚辞校补》：“案《路史·后纪》注一引《文选》五臣本蹇作謇，最是。謇，吃也。……盖令謇吃之人为媒。”按此句“吾令”与上“吾令”均出自动遣使，为什么要叫口吃的人作媒呢？这是很难理解的。戴注：“蹇修，媒之美称。”似较妥善，今从其说。“蹇”和“修”都系楚国方言，蹇修连辞作媒人的称谓，疑也系楚国的方言。

“理”，做媒的意思。《左传·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杜注：“行理，使人通礼问者。”下文“理弱而媒拙”，理和媒对举，是理即做媒的明证。《广雅·释言》：“理，媒也。”郭沫若认为“理”是提亲人，与媒人有别（《离骚今译》注）。说也可通。

承上申说，叫雷师找鸩妃，更解了佩囊，使蹇修做媒。

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氲其难迁。

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

“纷总总”句见前注。钱注：“总总离合，鸩妃始至仪从之盛也。”

“纬氲（huà）”，乖违的意思。王注：“纬氲，乖戾也。”钱注：“张揖《博雅》云：唯鸩，乖刺也。”按《广雅六·释训》同。《广韵》：“氲，徽氲，乖违。”

“难迁”，难以迁就、转移。朱注：“其意难移也。”

“次”，止宿。王注：“次，舍也。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穷石”，地名。《左传·襄公四年》：“后羿自默迁于穷石。”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穷石，即穷国地。”按《淮南子·鹵形训》：“弱水出自穷石。”高诱注：“穷石，山名，在张掖。”朱注引此谓“即后羿之国也。”

“洧盘”，水名。王注：“洧盘，水名。《禹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之山。”

鸩妃仪从很盛，忙乱了一阵，忽然闹别扭，坚决不肯迁就。她晚上到穷石去过宿了，早上又到洧盘洗头发。

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

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保”，恃，自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保君父之命。”注：“保犹恃也。”《汉书·广陵厉王胥传》：“扬州保嘏。”注：“李奇曰：保，恃也。”

“骄傲”，分开来说，自高自大叫“骄”，看人不起见

“傲”；合起来说，“骄”和“傲”是一样的意思。王注：“倨简曰骄，侮慢曰傲。”《说文》：“傲，倨也。”

“虽信美”句，虽然长得美丽，但一味胡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嫫？”洛嫫就是指鸛妃。则古代是有后羿和鸛妃通淫的传说的。上面说她在穷石过宿，指的就是这件事，所以说她“无礼”。

“违弃”，弃去。王注：“违，去也。”

“改求”，另找别人。钱注：“更求他人。”

鸛妃自恃美丽，骄傲淫乐，当然不是理想的人物，所以舍弃她另找对象。这是一种不遂所愿的事。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

“四极”，指四方边远的地方。《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劓国，南至于濮鹑，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注：“皆四方极远之国。”

“周流”，周是鸛，流是行。周流是鸛行的意思。《诗·大雅·崧高》：“周邦咸喜。”笺：“周，鸛也。”《荀子·议兵》：“刑罚省而威流。”注：“流，行也。”

“瑶台”，瑶是美玉。一说是美石，仅次于玉。《说文》：“瑶，玉之美者。”王注：“石次玉曰瑶。”“瑶台”，指以瑶玉筑成的台。

“偃蹇”，原义是天桥，这里引申作特出、高耸。《广雅》：“偃蹇，天桥也。”王注：“偃蹇，高貌。”

“有娥之佚女”，“有娥”，一个小国（部落），如有穷之类。“佚”，美而荡。释元应《一切经音义》十六“慙佚”注：“《苍颉篇》：佚，荡也，亦乐也。”《诗·商颂·长发》：“有娥方将，

帝立子生商。”笺：“有娥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榘卵而生契，尧封之于商，后汤王因以为天下号，故云：‘帝立子生商。’”《吕氏春秋》：“有娥氏有美女，为之高台而饮食之。”《淮南子》：“有娥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注：“姊妹二人，在瑶台也。”

写决意到处追求对象。到了瑶台，看见有娥氏的美女。

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
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

“鸩（zhèn）”，毒鸟，大如鹳，紫绿色，羽有毒。《说文·鸟部》：“鸩，毒鸟也。从鸟，聃声，一名运日。”洪补注：“《广志》云：其鸟大如鹳，紫绿色，有毒，食蛇虺，雄名运日，雌名阴谐，以其毛沥饮卮则杀人。”这里是把它比喻坏人。王注：“以喻谗佞贼害人也。”

“雄鸩”，鸟名，似山鹊而小，喜欢歌唱。《说文·鸟部》：“鸩，鹳鶖也。”《尔雅·释鸟》：“彊鸩，鹳鶖。”注：“似山鹊而小，短尾，青黑色，多声。今江东亦呼为鹳鶖。”

“鸣逝”，边叫边飞。钱注：“鸣逝，鸣而逝也。”

“佻（ti o）巧”，轻佻巧利，形容多嘴不可信任。王注：“佻，轻也；巧，利也。”

叫鸩来做媒，鸩存心破坏，说有娥的女子不好。叫会说话的雄鸩去，我又讨厌它轻佻多嘴，不可信任。写追求对象有种种的阻障，一方面反映当时的坏人多，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

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
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犹豫”，旧有三说：一说是从犬的举动借用过来的。洪补注：“《颜氏家训》曰：《尸子》云：五尺犬为犹。《说文》，陇西谓犬子为犹。吾以为人将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此乃豫之所以为未定也！故谓不决曰犹豫。”一说是从犹的举动借用过来的。洪补注：“或以《尔雅》曰：犹如麋，善登木。犹，兽名也，既闻人声，乃豫缘木，如此上下，故称犹豫。”一说是从犹和豫的举动借用过来的。洪补注：“《礼记》曰：决嫌疑，定犹豫。疏云：犹是豸属，豫是虎属。《说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则犹与豫皆未定之辞。”按三说的内容虽然不同，意义却是一致的。不过，从下面对举的狐疑看，则后说以豫为兽名，殊不相称，不若前二说为长。姜注以犹豫、狐疑皆联绵字，不能以字义凿求。说也可通。

“狐疑”，是狐性多疑的借用。一说，惑疑的声转。洪补注：“《水经注》引郭缘生《述征记》云：河津冰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按《风俗通》云：里语称狐欲渡河，无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说，未必一如缘生之言也。”姜注：“狐疑者，惑疑之声转，亦双声联绵字。”

“适”，往。王注：“适，往也。”

“凤皇”，闻一多、郭沫若、姜亮夫诸先生据《天问》的“简狄在台誉何宜？玄鸟致诒女何嘉（姜作喜）？”《思美人》的“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和《商颂》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等例，认为凤皇即玄鸟（闻说更详）。可从。

“诒”，这里作名词用，是馈送礼物。《文选》吕延济注：“诒、遗也。……言我得贤人如凤皇者，受遗玉帛，将行就聘。”

“高辛”，帝誉的别号。王注：“高辛，帝誉有天下号也。”

承上说，鸩、鳩都不足为使，心里就惶惑起来，想要亲自出马，自己又不便做媒。在这样盘算的当儿，不觉就联想到高辛有玄鸟致诰的传说，怕他的玄鸟之使已在我先了，因而停止进行。这又是一种不遂所愿的事。

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集”是就的意思。《广雅·释詁》：“集，就也。”

“浮游”，义同周流。《后汉书·班彪传（班固）》：“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注：“浮游谓周流也。”

“少康”，夏后相的儿子，夏代中兴的君主。王注：“少康，夏后相之子也。”

“未家”，是未有家室，即未聚妻。钱注：“未家，未有室家也。”

“有虞之二姚”，有虞，国名，姓姚，舜的后代。“二姚”，有虞国君的两个女儿。少康受寒浞所迫，逃到有虞，有虞国君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王注：“有虞，国名，姚姓，舜后也。昔寒浞使浇杀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于纶。”

既然失了简狄，想要远就，又找不到归宿的地方，就暂且到处游览一番，趁那少康还未结婚，留下有虞国两个闺女的时候。

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理弱而媒拙”，说亲做媒的辞令不巧妙，劣弱钝拙不动听。王注：“弱，劣也。拙，钝也。”

“导言”，即做媒的传达（导引）自己的心里话。《文选》

张铎注：“而媒无巧辞导引，不能坚固，使君回移。”

“世溷浊”两句见前注。王注：“再言世溷浊者，怀、襄二世不明，故群下好蔽忠正之士而举邪恶之人。”

承上说，虽然有意于二姚，又怕提亲做媒的不善辞说，不能表达自己的心里话来固结她们。而世上的人又是一味妒忌贤良和专讲人家坏话的，还有什么希望呢？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怀联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闺中”，宫内相通的小门叫“闾”，比闾更小的叫“闺”。《尔雅·释宫》：“宫中之门谓之闾（注：谓相通小门也），其小者谓之闺，小闺谓之胜。”“闺中”，女人所住的地方，总指上文诸美女说，暗中影射楚宫郑袖之属。朱注：“闺中深远，盖言鸩妃之属不可求也。”林注：“总上求女一段。”

“邃（suì）远”，深远。王注：“邃，深也。”

“哲王”，明智的君主，尊称之辞。王注：“哲，智也。”总上文求帝说，暗指楚王。朱注：“哲王不寤，盖言上帝不能察习闾壅蔽之罪也。”林注：“总上求见帝一段。”

“寤”，觉悟。王注：“寤，觉也。”

闺中既然很深远，明君又不觉悟改悔，我抱着这样的真情而无从表达，怎么能够长久这样忍受下去呢？

自“跪敷衽以陈辞”至此，是把自己根本改造楚国的政治理想从上下四方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塑造出许多理想的人物，开辟了许多理想的境界，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使读者由一连串的人物活动中来分辨谁是谁非、谁善谁恶，引起爱憎的感情，从而体会到作者是多么热切地追求理想的实现，他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而不避一切的艰难险阻的精神，是

多么值得人们的敬仰和爱念。其中所描写的对象是包含着多方面的：有九重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间的佚女——即包括了天神和人神，我们固不能以某一种神就是影射某一种人机械地一一对比起来，但总可以说，楚王、朝臣以至宫中的后妃们都接触到了。这些人物都是有连带关系的，都是组成楚国统治集团的一个成员，因而都是希望他们成为理想中的人物。可是，结果怎样呢？叩帝阍见阻，求鸞妃不得，想要见“有娥之佚女”，“恐高辛之先我”，寻“有虞之二姚”，又“理弱而媒拙”。这样地以最大的努力来企图理想的实现，而仍然没有实现的可能，当然会感到内心的矛盾是异常难堪的，再下，就不能不转而问卜求神了。

索蓍茅以鷲筭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索”，索取。王注：“索，取也。”

“蓍茅”，一种灵草。“蓍”一作琼。王注：“蓍茅，灵草也。”

“以”作与用。《诗·召南·江有泛》：“不我以。”笺：“以犹与也。”

“鷲”音廷，小竹枝。王注：“小折竹也。”《文选》吕向注：“鷲，竹筭也。”

“筭”音专。旧说，楚人把茅草和竹枝占卦叫做“筭”，恐不可信。这里的“鷲”和“筭”是平行词，疑“筭”和“鷲”一样是占卦的东西。王注：“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筭。”姜注谓鷲当作挺，与上索对，动字。

“灵氛”，神巫，能占吉凶。王注：“灵氛，古明占吉凶者。”闻一多谓疑即是巫盼。（见《离骚解诂》）姜注同。

“孰信修”句，“信”作真正、实在解。“信修”，真正信

美、修洁。这句的意思是，有谁是真正的修美而值得爱慕呢？旧说“楚国孰有能信汝之修洁而慕之者？”（朱注）把句意的主宾颠倒过来，恐不可信。我们从上下文连串起来看，上文说屈原求女无合，下文说不单是楚国有女，则这里针对屈原求女说更为恰当。“慕”字不叶韵，是一个问题。朱注：“两之字自为韵。”张德纯谓“篇中惟此韵（指慕字）不知所从，考古亦无据，朱熹以为两之字自相叶，又无此例，今仍缺之。”（《离骚节解》）郭注谓“慕字意难通，与上句占字亦不合韵。余以为当是“莫心”二字误合为一也。”闻校谓当作“莫念”二字。文怀沙谓“占当为卜字之误”（见《读骚拾遗》九）。姜注则谓“占”字为卜字之误，“慕”字为莫字之误，莫、卜叶韵。我认为作慕，意义是可通的。叶韵方面仍值得研究。

取了占卜的东西叫灵氛占卜。卜辞这样说：男女双方，只要是美，是必然可以互相配合的。可是孰是真正的美而值得爱慕呢？这所谓两美，当然和上来所说的贤臣和明君的暗示。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

“九州”，《禹贡》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尔雅》九州从殷制，《周礼》九州从周制，和《禹贡》所列的略有不同。）

“有女”，指有美女，上文指出“两美其必合”，下文举出传说像武丁一类的故事，都是就君臣相得立论，则这里的“女”，指的是理想的人物，主要是君主。朱注：“美女以比贤君。”

“释女”，释，舍掉、放弃。“女”读汝，“释女”就是舍掉你。《国语·晋语》：“君其释申生也。”注：“释，舍也。”

想想天下是多么辽阔呵，岂但这楚国才有美女？努力跑到远

方去，不要迟疑，哪有求美女的人会舍掉你？这一方面从他求美女说，一方面从人家求美女即求他说，正是“两美其必合”的注脚。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

“何所”，何处，什么地方？释元应《一切经音义》二：“所，《三苍》：处也。”

“故宇”，旧居。在这里，旧居的范围是楚国。王注：“宇，居也。”“宇”一作“宅”。

“幽昧”是幽深暗昧，即黑暗。《尔雅·释言》：“幽，深也。”《说文·日部》：“昧，爽旦明也，从日，未声。一曰闇（暗）也。”

“眩（xuàn）曜”，“眩”是看不清东西；“曜”是光曜。“眩曜”是眼光迷乱。洪补注：“眩，日光也，其字从日；眩，目无常主也，其字从目。”王注：“眩曜，惑乱貌。世一作时，眩一作眩。”阎注：“‘眩’音义同‘炫’，从日不从目；‘眩曜’本指日光强烈，此处解为‘惑乱貌’。”也通。

“余”作我们、咱们解，见前注。“恶”读污，与“宇”叶韵。陈音义：“恶音污。古读美恶之恶多如好恶之恶。赵王友幽歌：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

哪个地方没有芳草（美女）呢？你何必留恋你的旧居？这里既然是这么黑暗和迷乱，还有谁能辨别我们的善恶？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民”一作人，指一般人。王注：“言天下万民。”

“好恶”就是爱憎。《文选》吕向注：“好，爱；恶，憎也。”

“党人”，见前注。

“服艾”，“服”，服用、佩带，见前注。“艾”，一种野草，即白蒿。“服艾”，佩带艾蒿。王注：“艾，白蒿也。”

“盈要”，“盈”，满；“要”同腰。“盈要”，满腰间。王注：“盈，满也。”

人们的爱憎固然各有不同，但这班党人却最为特异：他们要家家户户佩带艾蒿满腰间，反说幽兰不可佩带。很明确地指出那党人特别恶劣的本质：一方面鼓励人家做坏事，一方面又阻止人家做好事。

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琤美之能当？

苏粪壤以充帙兮，谓申椒其不芳？”

“琤美”，“琤”音呈，美玉。“琤美”是像琤玉的美。王注：“琤，美玉也。”高注：“琤，当作程，品评之意。”意可通，但不见所据。

“苏粪壤”，“苏”，解作取；“粪壤”即粪土。王注：“苏，取也。”

“充帙”，“充”，充满、填满；“帙”，单帐。王注：“充犹满也。”钱注：“帙，单帐也。”王夫之注：“充帙，填满帙中。”按王注以帙是香囊，后人多从其说，似不可信。上文已说佩带的事物了，这里指帙帐更合。那班党人对草木尚缺乏辨别的能力，又怎能鉴赏美玉？他们总是与人不同嗅味的，取粪土填满帙中，反而说申椒没有香味。

以上假托灵氛劝说屈原：天地之大，到处可以求合，不必留

恋楚国。楚国是党人在把持一切，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不辨香臭的。纵有很好的“内美”和“修能”，也不能为他们所赏识。这正是贾谊《吊屈原赋》中所谓“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的意思。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

“巫咸”，古代的神巫。王注：“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洪补注：“说者曰，巫咸，殷贤臣。一云名咸，殷之巫也。”

“椒糈(x)”，“椒”，香物；“糈”，精米。王注：“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糈”或作“稭”。《汉书·扬雄传》：“费椒稭以要神兮。”注：“孟康曰：椒稭，以椒香米饌也。《离骚》云：怀椒稭而要之。”

“要”通邀，即邀请，迎接。《荀子·儒效》：“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注：“要，邀也。”

想要从灵氛的劝告，但心里又踌躇不决，听说巫咸晚上要降临，就怀着椒香和精米去迎接他。这是从求灵氛再转到求巫咸，又开辟一个境界。

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

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

“翳(yì)”是遮蔽，这里是遮天蔽日，形容多。王注：“翳，蔽也。”

“九疑”，山名，见前注。这里指九疑山的神。

“缤”，很多很盛的样子。王注：“缤，盛也。”钱注：“缤，

多貌。”

“迎”，迓，古音寤。陈音义：“迎，音寤，迓也，吴才老读。或谓恐是迓字之误。”

“皇”，辉煌光大的美称，承上众神说。朱注：“皇谓百神。”钱注：“皇，美称。”

“剡剡”，音炎，光焰四射的样子。王注：“剡剡，光貌。”王夫之注：“剡剡犹冉冉，仿佛之貌。”也通。

“扬灵”，显扬灵异。王注：“扬其光灵。”

“吉故”，好的故事。龚景瀚《离骚笺》（以后简称“龚注”）：“故者已然之迹也，下文传说、吕望等是也。吉故，前事之吉者也。”这“吉故”是巫咸告诉他的。

迎接的众神都来了，都显扬他们的灵异。于是乎巫咸就告诉他一些吉利的故事。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

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勉升降”句，勉强上升下降，迁就些，不要太固执。联系下句看，似就屈原的性格主张说。旧注：“上谓君，下谓臣”（王注），“经营四方，周流六漠”（洪补注），“升而上天，下而至地”（朱注），“即前上下求索之意”（蒋注）等，恐均不符合原意。

“矩矱（hu）”，法度。王注：“矩，法也。矱，度也。”

“同”，姜注引孙诒让说，“同”应作“周”，与下文“调”字叶韵。按古人“调”、“同”叶韵的例子不少，如《诗·小雅·车攻》：“弓矢既调，射夫既同。”东方朔《七谏·缪谏》：“不量凿而正枘兮，恐矩矱之不同。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均“同”、“调”叶韵。洪校《七谏》，虽云“同一作

周”，但《车攻》之“既同”，则从未看到作“既周”的。

“汤禹”句，见前注。

“摯、咎繇”，“摯”，汤臣伊尹名。“咎繇”即皋陶，禹臣。王注：“摯，伊尹名，汤臣也。咎繇，禹臣也。”

“调”是调和、相合。朱注：“始能调和而必合也。”“调”古读“同”。陈音义：“调音同。”

巫咸告诉他，不必太固执，可以融通望以求合乎法度，以前汤和伊尹、禹和皋陶就是很协调地治理天下的。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说操筑”句，“说”即傅说。“操”是操持。筑是筑墙的捣杵。傅岩是地名，因傅说得名。《墨子·尚贤》：“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于傅，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尚书·序》：“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史记·殷本纪》：“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索隐：“旧本作险，亦作岩也。”集解：“孔安国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护筑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以供食也。”

“武丁”，殷代的君主，即殷高宗。王注：“武丁，殷之高宗也。”

如果自己的内心真正是美好，又何必要媒人作线索，像傅说是一个奴隶，在傅岩给人家筑墙，殷王武丁就起用他，信任他。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而该辅。

过媒人做引线而得到君王的信用的。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未晏”，未晚，未老。朱注：“晏，晚也。”这句是说，要趁这年纪尚未老的时候。

“犹其”，闻注：“犹其二字当互乙。”可信。

“未央”，未尽。王注：“央，尽也。”这句是说，楚国的时势也还有可为，未至衰尽。

“恐鹈鴂”两句，“鹈鴂”，鸟名，一名伯劳，秋分前鸣。鹈鴂一鸣，表示秋天到，百草就要凋萎了。《广韵》：“鴂，鹈鴂，鸟名。关西曰巧妇，关东曰鹈鴂。春分鸣则众芳生，秋分鸣则众芳歇。”“鹈”一作“鹈”。《文选》吕向注：“鹈鴂，鸟名，秋分前鸣，则草木凋落。”这是比喻时间一过，则事情愈变愈不可为了。

劝屈原要趁这年岁尚未衰老，时势尚有可为的时候，努力求合。

何琼佩之偃蹇兮，众殒然而蔽之？
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

“偃蹇”，见前注。在这里一作“困顿失志貌”（阎注引朱冀说）解释，也通。

“殒然”，隐蔽的样子。《尔雅·释言》二：“殒，隐也。”注：“谓隐蔽。”

“不谅”，不诚信。王注：“谅，信。”一说是险诈莫测。王夫之注：“不谅，险诈不可测也。”辞气加重，意义还是一样的。

“折”是挫折、毁败。王注：“言楚国之人，不当忠信之行，共嫉妒我正直，必欲挫折而败毁之也。”“折”读制，与“蔽”叶韵。陈音义：“折音制。”

为什么你的琼佩这么好看，那班人老是要隐蔽掉？那班党人这么阴险莫测，看来怕是妒忌你要彻底挫败你的。

以上是巫咸对屈原的劝告。对巫咸的劝告截至哪一句，各人的看法不同：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方苞《离骚正义》、林云铭《楚辞灯》、龚景瀚《离骚笺》、谢无量《楚辞新论》等认为截至“使百草为之不芳”。文怀沙《屈原离骚今绎》、姜亮夫《屈原赋校注》、阎简弼《离骚注释》（见《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高亨等《楚辞选》、张纵逸《屈原与楚辞》、马茂元《楚辞选》等同意这种看法。李光地《离骚经注》、梅曾亮《古文词略》、马其昶《屈赋徵》等认为截至“恐嫉妒而折之”句；吴汝纶《点勘史记》认为截至“莫好修之害也”句；姚鼐《古文辞类纂》认为截至“周流观乎上下”句。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同意李光地等的看法，我们也觉得这一看法比较正确，现在就把巫咸的劝告截至这里。

时缤纷以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缤纷”作纷乱解。《文选》吕延济注：“缤纷，乱也。”

“茅”，茅草。《文选》刘良注：“茅，恶草，以喻谗臣。”

时代纷乱，变化无常，怎么可以久留呢？从前的兰芷变成没有香气了，从前的荃蕙都化成茅草了。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萧”，一种蒿草，和艾同类，都是贱草。洪补注：“萧，艾贱草，以喻不肖。”

“莫好修”句，“莫”是莫能、不肯。洪补注：“时人莫有好自修洁者，故其害至于荃蕙为茅，芳草为艾也。”这看法是对的，下文即从此申说。王、朱、钱等注以为莫有如好修之为害，恐非原意。

为什么以前的芳草，现在简直变成了萧艾呢？难道有别的缘故么？只因为他们不肯自爱（好修）的毛病。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
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实”，实质、真诚。王注：“实，诚也。”

“容长”，容貌好看。王注：“但有长大之貌。”

“委”是委弃。王注：“委，弃。”

“苟”，苟且。钱注：“苟且得列乎众贤之中。”

我以为兰是靠得住的（承上“滋兰”说），乃竟没有实质，只是表面好看。他弃掉自己的美质以追逐时俗，而苟且混在众芳之列。上文“兰芷变而不芳”的兰和“羌无实而容长”的兰都是针对好人变为坏人说，和屈原辛勤培养的对象——“余既滋兰之九畹兮”的兰都可能有关系，因而王逸说这里的兰是指“怀王少弟司马子兰”。（《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谓子兰是怀王少子，襄王时为令尹，与此不同。）大约影射他所培养的好人变成坏人，欲引为同气的人反归附敌党，是很可能的，专指子兰则很难说。

椒专佞以慢慝兮，櫛又充夫佩帙。

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椒”，见前注。和上面的“兰”一样，王逸认为是影射子椒。王注：“椒，楚大夫子椒也。”按东方朔《七谏·哀命》：“惟椒兰之不返兮，魂迷惑而不知路。”扬雄《反离骚》：“灵修既信椒兰之佞佞兮，吾累忽焉而又蚤睹。”（《汉书》注：“椒、兰，令尹子椒、子兰也。”）则椒兰暗指子椒、子兰的用法，汉人殆从骚体会出来的。王说实有所本。

“专佞（nina）”，专会谄媚巧辩。《论语·公冶长》：“焉用佞？”注：“佞人口辞捷急。”刘宝楠正义引《说文》：“佞，巧谄高材也。”

“慢慝（tō）”，“慢”，傲慢；“慝”，淫纵。一说，慢、慝同义。王注：“慝，淫也。”洪补注：“慝，它刀切。《书》曰：无即慝淫。注云：慝，慢也。”“慝”，一本作“谄”。

“櫛”，似茱萸而小，赤色。《尔雅·释木》：“椒櫛丑菜。”注：“櫛似茱萸而小，赤色。”疏：“释曰……丑，类也。……菜者实之房也。”蒋注：“《尔雅》云：椒櫛丑，亦香草也。”阎注：“櫛音杀，恶草名。”马注：“櫛，外形似椒而无香味，是茱萸一类的草。”

“佩帙”，可佩带的帙，是小囊，和上面“苏粪壤以充帙”的“帙”不同。王注：“帙，盛香之囊，以喻亲近。”

“干”是求的意思。王注：“干，求也。”

“祇”作振解。王引之说：“祇之言振也。”姜注：“《皋陶谟》曰：‘俨祇敬六德’，《夏本纪》‘祇’作‘振’。”

椒专会奸巧傲慢，櫛又混充香囊。这些既然是一味钻营，即有才能（芳香）又怎能自振呢？

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流从”，是随波逐流的意思。王注：“言时世俗人，随从上下，若水之流。二子复以谄谀之行，众人谁有不变节而从之者乎？”“流从”一本作“从流”。闻校：“按当从一本作从流。”

“揭车与江离”，揭车、江离比兰、椒较次的香草，已见前注。

时俗的人总是随波逐流的，又怎能没有变化？看那椒兰已经是这样了，更何况揭车与江离？屈原对这些变了质的人寄予无限的愤慨，似乎都是指他当初所培养的对象说，因为屈原曾为三闾大夫，“职掌王族三姓”，贵族集团中人，有许多可能是他亲身培养出来的。不然的话，这些人并没有经过好的培养而做起坏事来，就很难说他们是变质。

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委厥美”，“委”作见委、被弃解。洪补注：“上云‘委厥美而从俗’，言子兰之自弃也；此云‘委厥美而历兹’，言怀王之见弃也。”“委”字，高注：“似当作‘秉’，大概古秉字或写作委，因而错作委字。秉，把持。”就上下文看，这说法可以成立，但尚未有确证，录以待考。

“沫”是消失、减损的意思。刘注：“沫，衰歇、减损。”一说“沫”是终了。王注：“沫，已也。”

只有我所佩带的东西（赋予的品质）最可贵。它的美质一直被委弃，但香气勃勃，到现在还没有减损。

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以求女。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和调度”句，“和”，谐协、适切。《淮南子·鹖真训》：“治而不能和。”注：“和，适也。”“调度”，格调、法度，即风范、作风。朱注：“调，犹今人言格调之调；度，法度也。”这句是说，以适合自己的作风的做法来娱乐自己，即“吾行吾素”、“自适其适”意。

“及余饰”句，是说趁我的佩饰还在盛美的时候。“壮”，见前注。

“周流”句，“上下”指天上地下，即到处，和上文“周流乎天余乃下”的意义略同。洪补注：“‘周流观乎上下’，犹言‘周流乎天余乃下’也。”

把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东西来娱乐自己，暂且到处飘游求美女，趁我的佩饰正当漂亮的时候，上天下地来观览一番。这是结上开下的写法。

以上是一大段。假托灵氛劝他去楚求合，巫咸劝他留楚求合，来表现他在去留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苦闷心情，同时也对楚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处境作进一步的分析。之后，提出自己的意见，表明坚决的态度，从而极其深刻地描绘那些党人们为非作歹的情况，连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本来是可以有为的也变节投降敌党。这就说明了整个环境已十分恶化，尽管自己坚持正义的主张，已到了难以挽回局势的地步，不得不冲破这恶劣的氛围，暂时听从灵氛的劝告，“周流观乎上下”，“远逝以自疏”。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糜以为飧。

“历”，选择。《文选》李周翰注：“历，选也。”朱注：“历，遍数而实选也。”

“羞”，有广狭二义。广义：可供饮食的东西都叫羞。《周礼·天官·大宰》：“四曰羞服之式。”注：“羞，饮食之物也。”狭义：熟食叫羞。《方言》十二：“羞、厉，熟也。”注：“熟食为羞。”这里和兀相偶成文，应指熟食。王注：“羞，脯。”“脯”是干肉，属熟食类。

“精”，细切，凿碎。王注：“精，凿也。”《汉书·扬雄传反离骚》：“精琼靡与秋菊兮。”注：“应劭曰：精，细；靡，屑也。”

“琼靡(m)”，“靡”同靡，细屑。王注：“靡，屑也。”“琼靡”和上面“琼枝”的“琼”字都指珍美。朱注：“琼枝，琼靡，皆谓物之珍者。”

“兀(zh na)”，即粮。《扬雄传反离骚》注引晋灼曰和萧该音义，都作“精琼靡以为粮。”王注：“兀，粮也。”

这是说，灵氛已经把很好的占卜告诉了我了（这里不提巫咸，有人说巫咸和灵氛的意思一样——洪补注；有人说因为巫咸有上下求君之说，所以不提他——林注；有人说提灵氛可以包括巫咸——蒋注、姚鼐注），选择了好日子我将要出发。我准备了美味的熟食和干粮。

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为余”，这“为”字读上声，是呼唤“仆夫”给我、替我的语气。

“驾飞龙”，以飞龙为马，和上面“骝玉虬”以玉虬为马的语意相同。洪补注：“《易》曰：飞龙在天。”

“杂瑶象”句，“瑶”是美玉；“象”是象牙。一说，象指真的象，瑶象如玉虬之类。《说文·玉部》：“瑶，玉之美者。”王注：“象，象牙也。”这句是说，杂用美玉和象牙来做车的修饰物。朱注：“杂用象玉以饰其车也。”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龙是真的龙，象也是真的象。”也通。

“离心”句，是说自己 and 那班人心志距离很远，不可能合作。王注：“言贤愚异心，何可合同。”朱注：“谓上下无与己同心也。”

“吾将远逝”句，是说将自动远走。《文选》吕向注：“吾将远去自疏远也。”

给我把飞龙作马来驾驶，把美玉象牙来装饰这车。我怎能和不同心志的人合作，我将要到远方去和人家疏隔了。

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扬云霓之葳蕤兮，鸣玉鸾之啾啾。

“遭(zhān)”即转。王注：“遭，转也。楚人名转曰遭。”

“昆仑”，山名，在中国西北，古代传说是西方的神山，高一万一千里，和《括地志》所说“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者不同。王注：“《河图·括地象》言，昆仑在西北，其高万一千里。”

“扬云霓”，“扬”是举；“云霓”指旌旗。《文选》李周翰注：“扬，举也。云霓，虹也，画之于旌旗。”

“葳蕤(wēi ruì)”，郁茂阴暗的样子，形容旌旗蔽天。王注：“葳蕤，犹蓊郁，荫貌也。”《文选》李周翰注：“葳蕤，旌旗蔽日貌。”

“玉鸾”，装在车上的铃，像鸾鸟形。王注：“鸾，鸾鸟也。以玉为之，著于衡，和著于轼。”

“啾啾”，鸾铃的声音。王注：“啾啾，鸣声也。”

承上说远逝自疏的具体行动。转向昆仑山，在长远的道路中到处流连，举起云霓的旌旗，遮蔽天日，车上的鸾铃更啾啾地响起来。

朝发轷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凤皇翼其承夔兮，高翱翔之翼翼。

“发轷”，见前注。

“天津”，即天河。在东极箕斗二星之间。王注：“天津，东极箕斗之间汉津也。”戴注：“天津，天潢也。”

“西极”，指极西之地，没有确定的地名。洪补注：“《上林赋》云：‘左苍梧，右西极’，注引《尔雅》西至于豳国为西极。”按此引《文选》李善注，今本《尔雅》无“西极”之称。《文选》李周翰注：“西极，豳国也。”但吕向在“流沙”下又注：“流沙，西极”。可见地名是无定的。

“翼”，《文选》五臣本、钱注本均作“纷”。“翼”是辅翼，从作用言；“纷”是纷繁，从状态言。王注：“翼，敬也。”有夹辅意。《远游》篇有此句，王注：“俊鸟夹毂而扶轮也。”分明作夹辅解。刘注：“翼，本鸟翅名，此用作辅翼义。”

“承夔”，“夔”，《尔雅》：“有铃曰夔。”王注：“夔，旗也，画龙蛇为夔也。”“承”是举、奉。“承夔”，是举着画龙蛇的旗帜。王注：“言已动顺天道，则凤皇来随我车，敬承夔旗，高飞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怀有德也。”王夫之注：“凤翼承夔，其翱翔自得之状。”“翼翼”高飞时和谐整齐的样子，名词作副词用。王注：“翼翼，和貌。”《文选·王粲赠萧子笃》：“翼翼飞鸾。”李善注：“翼翼，飞貌也。鸾，喻子笃也。《楚辞》曰：高翱翔之翼翼。”

由东极出发直到西极，还有灵鸟扶卫着，自由自在。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

麾蛟龙以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流沙”，指我国西北部沙漠地带。王注：“流沙，沙流如水也。《尚书》曰：余波入于流沙。”洪补注：“《山海经》，流沙出钟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泽，《尚书》所谓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张揖云：流沙，沙与水流行也。颜师古曰：流沙，但有沙流，本无水也。”《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流沙之西”注：“流沙，沙自流行，故曰流沙。在塔煌西八百里。”

“赤水”，神话中的水名，相传源出昆仑山。王注：“赤水，出昆仑山。”洪补注：“《博雅》云：昆仑虚，赤水出其东南隅。”

“麾”，读挥，指挥的意思。王注：“举手曰麾。”

“蛟龙”，“蛟”，龙类。王注：“小曰蛟，大曰龙。”《说文·虫部》：“蛟，龙之属也。”《广雅·释鱼》：“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夔（洪引作虬）龙，无角曰穆（洪引作螭）龙。”洪补注引郭璞说：“蛟似蛇，四足，小头细颈，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龙属也。”

“以梁津”，“以”一作“使”。“梁”是桥，“津”是渡；架在水上的叫“桥”，从水面渡过的叫“渡”。“梁津”即是桥渡。《说文·木部》：“梁，水桥也。”又《水部》：“津，水渡也。”这句是说，我指挥蛟龙，使它们在水上做桥渡用。

“诏”，是告诉。王注：“诏，告也。”

“西皇”，西方的尊神，古帝少皞氏。一说泛指西方之神。王注：“西皇，帝少皞也。”洪补注：“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姜注：“此游行于西极之地，因命西极之神。‘西皇’实泛指也。”高注：“西皇，西方的神。”

“涉”就是渡过。王注：“涉，渡也。”

我忽然到了流沙，沿着赤水自在游行。我更指挥蛟龙做桥渡，叫西皇领我渡过去。

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腾”，传、传令、传告。《说文·马部》：“腾，传也。”《淮南子·缪称》篇：“子产腾辞。”注：“腾，传也。子产作《刑书》，有人传辞诘之。”

“径待”，洪补注：“待一作侍。”疑当作“径侍”。《远游》篇：“左雨师使径待兮”，正作“径侍”。王注：“从邪径以相待。”旧注多从其说，恐误；朱注：“待一作持”，更费解。张渡《然疑待征录》：“‘径待’，洪校云：‘待一作侍。’《远游》云：‘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以‘为卫’二字准之，则‘径侍’之义自显，犹径相侍卫耳。路修远多艰，故须腾驰众车，使其径相侍卫，以脱险也。洪于《远游》注：‘径，直也。’是其义。”（阎注引）按“径，直也”，见洪注《远游》“凌天地以径度”句。张氏解“径侍”之意，甚确。惟以“腾”作“腾驰”解，则仍惑于王注，不甚妥帖。既然路多艰险，众车又怎能腾驰而不颠覆。

“不周”，传说中的山名，在昆仑山西北。王注：“不周，山名，在昆仑西北。”洪补注：“《山海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按《山海经·西山经》：“（长沙之山）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汉书》注：“张揖曰：不周山在昆仑东南二千三百里。”和这里所说的截然不同，姜注引《西山经》不合。

“左转”，是向左行。王注：“转，行也。”

“西海”，传说中西方的海。洪补注：“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为期也。”

路很长远又多艰难，传告众车要小心侍卫。路过不周再向左转，那西海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屯余车以千乘兮，齐玉轸而并驰。
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

“屯”，是屯聚。《文选》刘良注：“屯，聚。”

“乘”，是车乘。《左传·隐公元年》：“具卒乘。”注：“步曰卒，车曰乘。”（四马一车叫一乘）

“轸（dài）”，即车轮。一说是辖辖。《方言》九：“轮，韩楚之间谓之轸。”钱注：“韩魏语车轮为轸。”王注：“轸，辘也。一云车辖也。”《方言》九：“辖、轸、榦。关之东西曰辖，南楚曰轸，赵魏之间曰榦。”

“蜿蜿”，一作婉婉，蜿蜒屈曲的样子，形容龙身的摆动。王注：“蜿蜿，龙貌。”钱注：“蜿蜿，曲折貌。”

“云旗”，是以云为旗。朱注：“云旗，以云为旗也。”

“委蛇”，一作透臈。蛇读移，又读驼。委蛇，弯长起伏的样子，形容云旗的飘动。王注：“载云旗委蛇而长也。”

聚集了千把车乘，饰着玉的轮子并驾齐驱。我驾上了八龙蜿蜒前进，车上的云旗不断地飘动。

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蘧乐。

“抑志”，“志”读帜，和上面“屈心而抑志”的“抑志”有别。“抑志”即抑止旗帜，承上载云旗说。《汉书·高帝纪》：

“旗帜皆赤。”注：“师古曰：史家或作识，或作志，音义皆同。”

“弭节”，见前注，承上驾八龙说。

“邈邈（mi o）”，辽远的样子。王注：“邈邈，远貌。”

“《九歌》”，见前注。

“《韶》（sháo），舜的乐名。王注：“《韶》，《九韶》，舜乐也。”

“假日”，是假借时日。钱注：“假，借也。”

“蘧乐”，有二说：一说，蘧读俞，即娱乐。洪补注：“颜师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闷，假延日月，苟为娱乐耳。”一说，蘧同偷，是苟且偷乐。戴注：“蘧，他侯切，苟且也；偷音俞，乐也：二者多错互。洪氏补注，蘧皆音俞，云乐也，非是。”

旌旗和车马都停止了，但心神还是邈邈然远驰。聊且借这时间奏《九歌》和舞《韶》来取点快乐。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陟（zhì）升皇”，“陟升”即上升。“皇”是皇天。王注：“皇，皇天也。”姜注：“陟者及也。”又“按升皇连文，皇字本有光芒之象，则升皇犹言升日，故下以赫戏状之也。”也通。一本无“陟”字。

“赫戏”，“戏”同“曦”，“赫戏”，赫赫然的日光的状态。王注：“赫戏，光明貌。”王夫之注：“赫戏，光明之盛也。”这句是说，当我升上天庭正是日光辉煌照耀的时候。

“临”，居高临下叫“临”。《论语·为政》：“临之以庄则敬。”皇侃疏：“临，谓以高视下也。”

“睨（nì）”，邪视、旁观。《说文·目部》：“睨，（邪）

视也。”朱注：“睨，旁视也。”

“旧乡”，指楚国。王注：“旧乡，楚国也。”“乡”，一本作“邦”。

“马怀”，“怀”是怀思、依恋。“马怀”是说马也怀思、依恋故乡，即古诗“胡马依北风”意。王注：“怀，思也。”《文选》刘良注：“怀归也。”《后汉书·吴汉传论》：“夫仁义不足以相怀。”李贤注：“怀，依也。”

“蜷（quán）局”，即拳曲，诘屈不伸的样子。王注：“蜷局，诘屈不行貌。”

“顾而不行”，是回顾不肯前进。《文选》刘良注：“蜷局回顾而不肯行也。”“行”音杭，与“乡”叶韵。陈音义：“行，音杭。”

当我升上天庭正是日光辉耀的时候，忽然看到了故国，连马夫也悲伤，马也恋旧，总是拳曲回顾不肯前进。

以上是说，由于灵氛的劝告作最后一次的神游：转道昆仑，周流四方，由天津到西极，涉流沙，遵赤水，经不周，指西海，听《九歌》，看舞《韶》，真正是取得了一时的快乐，解除了一时的苦闷。可是，一看到自己的祖国，又悲从中来，连那赶车的人和挽车的马，都悲伤眷恋，不忍前进，又怎么可以离开祖国和人民而偷安取乐呢？他情愿牺牲个人的利益、忠心耿耿地救国救民的坚强意志，虽然在这种幻想境界的描绘中也十分明显地表示出来。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
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乱”，可从两方面看：从音乐方面看，凡乐章最末一段叫

“乱”。《礼·乐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飭归。”都是“始”和“乱”对举，可见“乱”有卒章、毕曲的意义。朱注：“乱者，乐节之名。”蒋骥《楚辞余论》：“余意乱者，盖乐章之将终，众音毕会，而诗歌之节，亦与相赴，繁音促节，交错纷乱，故有是名耳。孔子曰洋洋盈耳，大旨可见。”郭沫若、文怀沙都译作“尾声”，就是从音乐这方面看的。从文辞方面看，凡辞赋的最后作个撮要式的或者总结性的收尾也叫“乱”，这是从“乱”反训为“理”的意义中得来的。古时“乱”也可以解作“理”。《礼·乐记》：“治乱以相。”疏：“乱，理也，言治理奏乐之时先击相。”《论语·泰伯》：“予有乱臣十人。”集解引马融注：“乱，理也。”因而旧注家一般都以“理”解释“乱曰”。王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愤懣，极意陈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国语》：“其辑之乱。”韦昭注：“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为乱辞。”就是从文辞这方面看的。郭沫若先生又认为“乱”即是“辞”之古字。

“美政”，指美好的政治，包括屈原一切的主张。

“从彭咸之所居”，“彭咸”，见前注。“所居”，所居住的地方，即从彭咸于地下的意思。钱注：“犹言相从古人于地下耳。”

这是一篇的归宿，概括全篇的主要内容——不可调和的矛盾，表明自己最后的意志和态度。算了吧！统治集团中（包括楚王）既然没有一个知己，又何必一定要依恋这“故都”？我的政治理想既然没人理会，没人合作，那末我就誓将以身殉国，依从彭咸于地下了。

· 下 编 ·

《离骚》通论

屈原的作品，最早被提出的是淮南王刘安给它作传的《离骚》。

关于《离骚》这一篇名的解释，司马迁解作“离忧”（《屈原贾生列传》），班固解作“遭忧”（《离骚赞序》），王逸解作“别愁”（《楚辞章句》）。项安世《项氏家说》：“《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韦昭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王应麟《困学纪闻》：“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扬雄为‘畔牢愁’，与《楚语》注合。”游国恩说：“我以为《离骚》可能本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西汉末年，赋家扬雄曾模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迭韵字，韦昭解为‘牢骚’。……所以‘牢愁’、‘牢骚’和‘离骚’三个名词在音韵上是双声迭韵的关系，可以互相通转。那么‘离骚’二字是不应该拆开来讲的。”（《楚辞论文集·屈原作品介绍》）浦江清说：“离是离别，骚是歌曲的名称，离骚就是离歌。”（《祖国十二诗人·屈原》）姜亮夫引《天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的王注“，忧也”的例子，认为离骚与离同。文怀沙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加以引申，认为“离”字的真义是离间，《离骚》写的正是谗邪离间的忧愁幽思（《屈原离骚今绎》附录三）。我认为用楚国方言来解释比较切合实际。方言是有其特定意义

的，这意义就是后来一般的所谓“牢骚”，和写《离骚》的动机并无不合。而在爱好民间文学、喜欢运用楚国方言的屈原看来，这可能就是一个最恰当的命题。

屈原写作《离骚》的时期，有人主张在楚怀王时，有人主张在楚襄王时^①。我认为是楚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初立时的作品。理由是：作品中指责楚王而犹给以美称，如“荃”、“灵修”、“哲王”之类，和以后一些作品指楚王为“壅君”的不同，应该属于曾经对屈原有认识并经重用过屈原的楚怀王。此其一。就作品总的精神看，抱怨楚王中还有热切的希望，对属望之人虽夹杂着怅惘之情，但并没有哀悼怀王的表现，这就似乎是在怀王已留秦而盼望他可以复返时写的。此其二。作品提到自己时有“老冉冉其将至”、“及年岁之未晏”等，都表示自己还不是晚年。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入秦，不久，昭睢等到齐国拉回太子横立为新君，即顷襄王，其时屈原正是40岁左右，一方面关怀楚怀王的安全，一方面受到顷襄王、令尹子兰等加重的迫害，而另一方面，以前每当楚、秦绝交时必联齐，联齐必用到屈原，而这次派人到齐国去又没有他的份：这正是使他感到万分痛苦难堪的时候，就把郁积着的许许多多的冤气趁这时候集中地而又尽情地倾吐出来，写成这大气磅礴、波澜壮阔的雄丽的诗篇，那是很自然的。此其三。因此，我认为在怀王入秦、顷襄王初立时的作品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当然，这样的众说纷纭的问题，还值得加深研究。

《离骚》共373句，2477字（除“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是屈原作品中一篇最长的带自叙性的抒情诗，也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诗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由于篇幅长，具体内容很复杂，因而各人的说法不同，现在就我个人的看法写出来，并加以简单的说明。

（一）先叙述自己的世系、名字、性格、才能和修养，表示

他有可能很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然后说出自己愿引导楚王为国效忠。（自开首至“来，吾道夫先路！”）

（二）指出应走的道路和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自“昔三后之纯粹兮”至“伤灵修之数化。”）

（三）说明要培养人才以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要和敌党作斗争，至死不变。（自“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至“愿依彭咸之遗则。”）

（四）申述为人民、为祖国而斗争，虽然遭遇到一切的阻力，也只有容忍坚持，直至贡献出最后的生命，怎样也不肯委曲投降，同流合污。（自“长太息以掩涕兮”至“固前圣之所厚。”）

（五）抒写或进或退或去国的复杂矛盾的心情，而归结到必须按照本来的意志做去，怎样也不能改变。（自“悔相道之不察兮”至“岂余心之可惩。”）

（六）假托女媭的责备和自己向重华的申诉，来显示自己的品质的高贵和主张的正确。（自“女媭之婵媛兮”至“沾余襟之浪浪！”）

（七）为要实现自己根本改造楚国的理想，从各方面作重大的努力，但终不能实现：叩帝阍见阻，求鸩妃不得，想要见“有娥之佚女”，恐已落在高辛的后面，寻“有虞之二姚”，又“理弱而媒拙”。这样以最大的努力来企图理想的实现，而仍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感到内心的矛盾极为难堪，下面不能不转而问卜求神了。我们只看里面“忽反顾而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和“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这些说法，就可以体会到，他写的虽是天上，还是由楚国的现实基础出发的，写天上仍是写人间，天上的情形正是人间的影子。（自“跪敷衽以陈辞兮”至“余焉能忍而

与此终古！”)

(八) 假托灵氛、巫咸占卜中的说话——灵氛劝他去楚求合，巫咸劝他留楚求合，他表示自己的坚强的意志，因而极其深刻地写出楚国一班坏人为非作歹的情况，连自己培养出来的青年也变了质，降附敌党。(自“索蓍茅以鞿筭兮”至“周流观乎上下。”^②)

(九) 由于灵氛的劝告，就打算远行了：转道昆仑，周流四方，由天津到西极，涉流沙，遵赤水，经不周，指西海，听《九歌》，看舞《韶》，真正作了一番大神游。可是，一回头看到楚国，又悲从中来，连赶车的人和挽车的马，都眷恋楚国不忍前进，那又怎么可以离开祖国和人民而偷安取乐呢？他情愿牺牲个人的利益而忠诚救国的坚强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对比之下，已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来了。(自“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蜷局顾而不行。”)

(十) 全篇总收束：国内那班人（指执政权的，和下面莫足与为美政的人一样）既然没有一个是知己了，又何必苦苦怀恋故都？正确的政治理想已经没人理会，没人合作了，只有准备以身殉国。(自“乱曰”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如上所述，《离骚》这一作品的巨大意义就很清楚地摆出来了。它集中地表现了屈原的性格、思想、斗争过程、政治倾向和远大理想，也曲折地反映了屈原时代新旧力量的矛盾冲突的社会现实，更鲜明地刻志着屈原的文学的独创性和特殊性。我们从《离骚》里可以看到屈原伟大的精神、高贵的品质和明确的主张；可以看到楚国的以至那个特定时代的真实面貌；可以看到屈原在文学上的辉煌的成就。毫无疑问，这是屈原作品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篇代表作。司马迁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③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④或者认为屈原有《离骚》，在历史上就不能不

给他作传，或者认为如果没有屈原，就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么辉煌的创作，他们都是把《离骚》看成是标志着屈原伟大的一生的。他们把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创作，完全归功于个人的作用，当然不是全面的看法。然而他们也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因为在我国古代文学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把一生的政治斗争的实践过程和自己的文学创作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写出一篇具有像政治论文一样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雄丽的诗篇可以和《离骚》媲美的。

屈原为什么会写出这么震古烁今的鸿篇巨制呢？这主要是因为他具有进步的世界观。世界观“不仅具有理论的认识的意义，而且也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⑤我们看屈原一生的思想意识和实践行动，如对历史时代和楚国现实的认识，对腐朽的统治集团的愤恨与斗争，对人民大众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对民间创作的爱好，对祖国的大地河山乃至一草一木的热爱等等，都说明了他的世界观在当时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屈原出身于贵族，受了贵族的教养，为什么会具有这么进步的世界观呢？这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就他个人的特点说。他是一个“博闻强记，明于治乱”的人^⑥，他熟悉历代兴亡得失的原因所在，对当时的各国情势有深切的了解，这就具有掌握客观现实的规律性的优越条件了。加以楚国当时贵族内部矛盾斗争很尖锐，屈氏历来在贵族内部的优越地位已处于下降期，处处感到受正在得势的贵族集团的压制（如昭氏、景氏等），而正在得势的贵族集团又“相妒以功，谄谀用事”^⑦，作为参加贵族内部斗争的一个成员的屈原，对于这些旧贵族集团的胡作非为会给祖国和人民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性，是了如指掌的，因而他不能不提倡修洁和坚贞以与他们相对抗，促使他自己成为贵族阶级中一个最进步的分分子，接受当时的先进思想。

其次，就接受传统说。楚国比起中原各国来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它是长期受到中原各国的歧视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⑧“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⑨，它成为中原各国讨伐的对象。它处于这样一个被侮辱、被压抑的地位，楚国人民为了争取生存和进一步取得美好的生活，就逐步锻炼成一种顽强反抗的精神。早在公元前 656 年齐桓公率领诸侯伐楚时，楚使屈完的答话^⑩，以及前 506 年申包胥的乞秦师^⑪，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楚族人民的顽强反抗的精神了。至于楚人“筇路蓝缕，以启山林”^⑫和自然作斗争的精神，尤其可以表现楚族人民的坚强的性格。正因为如此，楚国就发展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国家。这是楚族人民最优秀的传统，屈原是接受这一优秀传统的。

屈原在政治主张上，也承受了儒家和楚国的一种好传统而加以发扬光大。屈原的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用人观点和法制观点上。用人观点是从儒家的“选贤与能”^⑬、“为政在人”^⑭、“先有司”^⑮来的，是儒家的旧传统。法制观点，则是楚国固有的传统，也是当时一种进步力量的表现。楚悼王用吴起变法而国富兵强，楚威王想变法而见阻于昭^⑯，或者执行变法成功而不久废掉，或者意图变法而不能实现，但这是正确的方向，屈原是接受下来的。

再次，就吸取当时各国的先进思想说。上面提到，法制观点不仅是楚国固有的传统，也是当时一种进步力量的表现。除楚悼王用吴起外，魏文侯用李悝，秦孝公用商鞅，韩昭侯用申不害，都因变法而收到卓著的成效。据《韩非子·饰邪》篇说：“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慢，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悬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则赵和燕也曾用法治，并因此而一度富强起来。这一类的事实，

屈原必然是很熟悉的。以一个热爱祖国和人民，渴望祖国和人民走上富强幸福的道路的人，对这类分明有利于祖国和人民的措施必然不会无动于衷而不受其影响，吸取他们良好的经验作为自己努力的榜样的。

屈原的进步的世界观，就是在上述的各种因素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在他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来进行创作，就产生了许多不朽的诗篇，而《离骚》尤其是他许多不朽的诗篇中的代表作。

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一文中，研究俄国古典文学的特点时，曾着重指出，俄国每一个作家都具有深奥的独创性，但是所有一切古典作家都有一种共同的愿望：百折不挠地力求体会、觉察国家和人民未来的命运，预测这一个命运^①。高尔基这种说法，对我国杰出的古典作家也是完全适用的。具有进步的世界观的我国第一个伟大古典作家屈原，他的照耀百世的创作，就是从他“百折不挠地力求体会、觉察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预测这一命运”这种思想出发的。屈原为了祖国和人民的未来的命运而斗争的精神，最集中地表现在《离骚》这一宏伟的诗篇里。

《离骚》所包孕的内容虽然极其丰富而复杂，可是，作者肯定什么？反对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和意图？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在读者的眼前。作者的政治方向是很明确的，政治立场是很坚定的。尽管作者创造了在古典诗歌领域里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艺术形象，尽管作者表现了自己内心的、自己和敌党之间的、楚怀王的、以及自己所培养的人的前期与后期的各个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作者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还是这么明确而坚定！因此，他这诗篇在当时和后代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就不仅因为它具有巨大的艺术形象，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它的艺术形象标志着一种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体现出一个为祖国、为人民而坚强斗争、矢志不渝的爱国诗人的崇高的品质。

他肯定什么呢？作品说：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兰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又说：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之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像古代圣哲茂行的君主一样，举贤授能，遵守法度，公正无私，树德爱民，使国家达到统一太平的境地，这就是他所肯定的政治路线。这种政治路线，就是他的法治和德政同时并用的具体表现。在举贤授能方面，他更举些例子来说明：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在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是出身贵族的上层人物。这就更明确地表明了他对当时楚国贵族集团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出他打破阶级偏见的进步观点。

他反对什么呢？作品说：

何桀纣之昌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又说：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自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又说：

固时俗之工巧兮，糺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又说：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又说：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帙兮，谓申椒其不芳。

走邪径，从狭路，竞进贪婪，党同伐异，违法乱纪，嫉贤蔽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是他最痛心疾首，切齿愤恨的。而一些人变了质，竟同流合污，尤其使他异常难过：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慝兮，楹又欲充夫佩帙。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像这类的人，屈原认为必然是没有好结果的。他更引了许多历史故事，来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烝。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

种恶因，得恶果，这不是很明白么？在这里，也就深深刻志着他和楚国当时的旧贵族集团——党人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

肯定什么，反对什么，这一基本的政治态度，像一条红线一样贯串着这一伟大的诗篇，后半部的许多幻想的境界，也还是这种爱憎分明的精神的体现。可是，他表现着这么强烈的意志和感情，究竟为的什么呢？

作品中对他自己为什么要表示这么鲜明的政治态度的目的意图，曾很明确地指出来，为的是“恐皇舆之败绩”，为的是“哀

民生之多艰”。在当时，“明于治乱”的屈原，他已经预测到祖国有颠覆的危险了，他已经面对着民生的灾难了。为了挽回祖国的颓势，为了解除人民的痛苦，他就不能不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拿出自己最好的办法，不顾一切地进行大力的改革，和祸国殃民的贵族集团作坚强不屈的斗争，使祖国逐步走上像“三后”、“尧舜”那样的和平统一的大道，使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虽然在作品里更多的是黑暗现实的反抗和进步理想的坚持，然而他这种目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

正因为他和祖国和人民未来的命运有密切的联系，对祖国和人民未来的命运寄予殷切的愿望，经过对历代兴衰存亡的细心的分析和对国内外情势的深入的研究，他才充满了前进的信心，具备了改革的勇气，下了最大的决心，坚持正直的主张，和那班反动的贵族集团斗争到底：“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才愿受一切的委曲，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希望争取楚王的信任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鬪；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他才惋惜楚王反复多变，听信谗言，自告奋勇，要引导他向前迈进：“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齟齬。”“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他才执着依恋，怎样也不离开乡土（祖国）：“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一切，就鲜明地突出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爱国诗人的典型形象。

不但如此，屈原在热爱祖国、同情人民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同时，也注意到怎样达到目的意图的积极的做法，那就是个人的修养和锻炼以及对年青一代的栽培。因为只有不断坚持个人的修养

和投身火热斗争中受到锻炼的人，才能在“溷浊不清”的恶劣环境中贯彻自己的正直主张，自始至终以战斗的姿态出现，不至于中途退缩乃至妥协投降。只有培养年青一代的接班人，才能逐步充实和继续扩张力量，壮大队伍，扫除障碍，使自己正直的主张早日实现。这道理，屈原是十分明白的，何况在那“朝秦暮楚”相习成风的时代里，特别是在那竞进贪婪、蔽美称恶的楚国里，尤其不能不注意这种做法。因此，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始终保持着“内美”，丝毫没有放松“修”和“好修”，把许多香草、鲜花、良材、嘉木来比像自己的修养和锻炼：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搴洲之宿莽。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擘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𦉳𦉳。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对青年也认真负责栽培：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偃时乎吾将刈。

看到他们的变质和坏人一起，感到非常痛心：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既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慝兮，櫜又欲充夫佩帙。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察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我们结合全篇的具体内容来加以考察，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屈原的注意个人修养和锻炼，并不是为个人的孤芳自赏，钓名沽誉；屈原的培养人才和惋惜好人的变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攫取权利，植党营私。一切都是从他为祖国为人民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出发的，和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意图摧毁敌对的力量是起着互相配合的作用的。当然，作品中也透露出他的彷徨不安、进退两难的内心矛盾，他假托灵氛劝他去楚求合，巫咸劝他留楚求合，就是他这种矛盾心情的表现。但他最后还是表明自己的坚定的意志和态度，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是极其坚毅执着不可动摇的。

作品中有许多幻想的境界，假托的人物，这是作者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这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其实也表现在他强烈地反抗现实和坚持自己的正义主张来“加强人的生活的意志，唤起他心中对于现实、对于现实一切压迫的反抗心”¹⁸上。不过，从这种“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¹⁹中，塑造出许多超越现实的东西来标志着他的革命的、前进的精神，就更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积极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因为反抗现实和坚持正义这些特点，现实主义的诗人也是具有的。由于作者是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要进一步来指导现实、改变现实的思想基础上来发挥他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因而这种浪漫主义精神的表现，具有足够的反抗性和战斗性，具有足够的“帮助激起对于现实的革命态度，实际上改变世界的态度”²⁰。例如他在作品中所描述的女媵对他的责备：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蓺菘蕝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茷独而不予听？

他就重华的陈辞：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烝。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

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泥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隕。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实际上就是假托女媭的口中提出一般人的看法，而在假托向重华的申诉中来指出一般看法的错误，举出一些不顾国家前途、人民利益、只贪图个人目前享乐、骄奢淫纵的做法必然失败，一些举贤授能、守法度、得民心的做法必然成功，从而更有力地说明他为国为民的主张是惟一正确的主张，表示他为国为民而斗争的意志是不可转移的意志。又如他所假设的灵氛之占：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

劝他离开楚国，到处都需要他，不必老是眷恋故乡。巫咸之告：

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鸱鸒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何琼佩之偃蹇兮，众殒然而蔽之？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

劝他勉强求合，正当自己还可以有为的年岁，楚国也还是可以有为的时候，不必过于倔强而招受党人的迫害。仍然是从各种为个人打算的想法和做法中来证实他是一个忘却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坚持正义、热爱祖国的人。他并不是不知道“历九州而相其君”^②或者在国内苟合取容对自己有好处，他在这方面的心情是有矛盾和冲突的。可是，为了祖国，为了正义，他认为这种想法和做法，正无异那些“委厥美以从俗”的人，是不可容忍的，是卑

或听众的东西。我们说抒情诗有各种各样的风貌，如豪壮、雄奇、沉郁、和婉等等，是诗人思想感情的流露，也即是诗中的情调的基本表现。同样，我们看到某一诗篇所表现的某种情调，也即可以看出该诗的作者当时对某一事物的认识、态度及其所表露出来的思想感情。（有些诗的基本情调和作者的为人完全不相适应，如严嵩的《钤山堂集》里的诗篇，不少是具有壮美情调的，而作者竟是一个谗谄褊窄、猜忌凶狠的人；阮大伟的《咏怀堂诗集》，其中也有不少具有清隽的情调的，而其人乃堕落成为一个出卖祖国的奸贼：这是或者因为时间、条件、地点的关系，或者因为作者有意披着美丽的外衣来蒙混读者的耳目，是应该分别加以考察的。）读过《离骚》的人，谁都会感到它里面充塞着悲愤的情调。这悲愤的情调，是从矛盾冲突中产生出来的，也只是作者具有强烈的战斗性的标志。屈原是一个出身封建贵族的诗人，处在封建贵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其阶级出身说，是不该有什么悲愤情调产生的，何况他还一度得到楚怀王的信任？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悲愤呢？从社会发展史上看，封建贵族的统治比之奴隶主的统治虽有其进步的意义，但这意义是不会持久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条件的刺激，他们的享乐的欲望也会逐步加强和扩大以至于成为“无穷的欲壑”，因而他们也就和其他的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一样，必然逐步加甚对人民群众的剥削与压迫。这就不但会引起被剥削被压迫者的不断反抗，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比较有理想或者能够看到人民群众的疾苦分子，也必然会感到不满而引起感情的分裂，如果这些人具有进步的思想要革除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的话，那他们和腐朽的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面对着不合理的社会会不对这不合理现象的统治力量作斗争；我们更不能设想，当那统治力量还占上风的社会里，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和他们作斗争会不陷于失败的结局。和不合理

现象作斗争至于失败，不用说，在思想感情上是十分悲愤的。这悲愤的思想感情表现在作品里，就必然刻志着悲愤的情调。我们看，《离骚》里不但对现实社会中的贵族当权派尽情丑化和力加指斥，对楚王的混淆是非、听信谗言的举措，也忘却君臣的大限表现出抗愤的心情，即在征引历史传说和描写天上的情况时，对一些残暴失德、荒淫无耻的人物，如启、羿、浇、浞、夏桀、后辛、鸩妃之类，也毫无例外地予以抨击和批判。这就使得作者悲愤的情调流贯在整个作品中。悲愤是对现实社会不满加上愤恨的表现，在情调上是高亢的，激昂慷慨或者转为沉郁顿挫的，是蕴蓄着或明或暗的斗争力量的，和低沉而消极的悲观失望的表现截然不同。这种情调，在阶级社会里，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大致相通，因而在作品里越发具足这种情调，就越发表明它的战斗性和人民性。《离骚》之所以赢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和热爱，之所以具有巨大的艺术力量，应该说，它这种情调的表现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鲜明的人物性格 谁读过《离骚》，都可以看出里面有两种互相对抗的人物性格：一种是自私自利的，贪婪污浊的，干进务入、互相勾结以蒙蔽楚王、贼害善良的；一种是高洁廉贞的，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坚持真理要引导楚王走向美好光明的途径的。而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都通过了具体活动，通过了对抗性的矛盾斗争显示出来。其中还刻画了一些内心的矛盾冲突的情况以及一些在矛盾斗争中蜕化转变的过程。可以说，屈原这种表现手法，是符合于从人物的矛盾冲突和矛盾斗争中来显示出各种人物性格的特征这一客观规律的。这在抒情诗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屈原在其他作品中也有这样的表现，但没有表现得这么深入和细致。这主要是因为他深入生活，了解生活，能捉住各种人物的个性，从他们在现实生活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相互关系中加以观察、体会，把他们各种不同的生活面貌和思想

实质都艺术地描绘出来，才能使每一种人物性格及其发展过程都很鲜明地再现在作品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把所要描写的人物都安放在一定的斗争环境中，通过相互的对比，使得各自不同的性格更为突出。

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②的当时的楚国，现实社会中的正面人物只有屈原自己，此外就得求之于理想社会中，而反面人物则触目皆是；起转化作用的人物，也只有由好转坏，没有由坏转好的。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中，就使得惟一的正面人物性格极其明朗地贯串着全篇，通过这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的刻画，更加完整地构成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举例来说，如：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齟齬亦何伤。擘木根以结 兮，……索胡绳之𦉳𦉳。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𦉳兮，又申之以揽 。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种是贪污钻营，追求私利，原谅自己，猜忌别人；一种是美洁自修，不辞劳苦，以历史上的伟大的人物做典范，为国家人民的利益而热情奔赴，虽受尽挫折和打击，而坚持不悔，至死不变。从具体行为和内心活动中来刻画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性格，而这两种性格都是在矛盾冲突中显示出来的。篇中像这样的写法有好几处，而越写越深入，使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楚国王朝为什么会弄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③的症结所在，使人可以更透辟地认识到统治阶级内部的进步力量备受反动力量的摧残但又不可扑灭的真实情况。这是不知重复了若干次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冲突的历史事实，应该说是具有典

型意义的。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曾这么说过：“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②1}屈原在《离骚》里描写人物性格的成功，就是他不仅写两种不同人物“做什么”，而且写了“怎么做”；不仅描写得更加鲜明，而且“对比得更加突出”。

一个人物性格的形成是一个人的生活的最集中的表征，它并不是静止的，孤立的，它必然是在自己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尽可能地来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的。这不但那结党营私、祸国殃民的旧贵族当权派总是尽量拉拢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当时整个楚国王朝成为“溷浊”的世界；就是爱国爱民、修洁廉贞的屈原，也未尝不培养后进以充实自己的力量，来抗击当时的反动派，来实现福国利民的政治理想。把这类的实际行动加以精细的描写，就使得人物性格的表现越发深刻和完整。例如作品中“民好恶其不同兮”至“谓申椒其不芳”一段（见上引），写党人们不但自己喜欢佩带臭恶的东西，更硬说“幽兰”不能佩带；不但自己把污秽的东西充塞帟帐，更硬说“申椒”没有香气。这种对扩张坏影响的恶劣作风的刻画，就会使人感到党人们的为非作歹真正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从而加深人们对他们的丑恶本质的认识。又如作品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至“愿偃时乎吾将刈”一段（见上引），把自己如何热诚培育后一代，并如何恳切盼望他们早日成材为国家出力，这就使人在他本身之外，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人格的可贵与伟大。

关于人物性格的转化，《离骚》里也有深细的描绘。自“时缤纷以变易兮”至“又况揭车与江离”一段（见上引），把一些由好人变坏人的情状，以及他们转变的原因，都真切明朗地揭示

出来。说明在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里，在一个新旧力量的矛盾斗争中，被卷进恶势力的浪潮中去是很容易的，保持好的性格的人十分难得。这样一方面使自己的可贵的性格更加完美；另一方面对一些经不起风险的人也具有教育的意义。

至于楚怀王的急躁轻信、反复无常的性格，尤其是屈原感到最痛心的事。“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齟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作品中接触到楚怀王的只有这些句子，然而不但明确地画出了他的性格，造成他的多变的性格的气候氛围，都从中透露出来。而自己对他的性格的多变的“伤”与“怨”，更标志着彼此之间的关系之深切。

屈原的《离骚》，就是从各个方面的具体活动中描写各种不同的人物性格的。

第三，丰富的想像力 屈原的想像力是非常丰富的。他作品中洋溢着许多浪漫主义的激情，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氛。屈原成为一个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家，主要的就是因为他充分地运用了他的想像力。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丰富的想像力呢？这当然和他的卓越的天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长期的斗争生活实践。这和他一来对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的爱好，和他在主张遭受打击陷于极度苦闷的时候对精神解放的追求，对于事业真理的探索，对于美好生活的争取等等，都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民间歌谣和神话传说，绝大部分是标志着人民的意欲愿望的东西，绝大部分是从人民不满现实、反抗现实或向往未来的思想感情出发的，他们因为不满现实同时又有改造现实的信念，才创造出想像中的美好事物来符合自己的要求。我们更知道，一个人当没有力量对抗重重的压抑而又坚信自己的主张的时候，就往往会把超现实的即想像中的境界作为安慰精神、探索真理和满

足生活愿望的温床。屈原正是有这样的文学修养和生活实践的人，因而这一切对他的想像力的成长和壮大就成为相当重要的因素。自然，我们还是不能低估他的卓越的天才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离骚》中自“女嬃之婵媛兮”以下，就艺术构思的组成部分说，都是属于想像的。虽然屈原把许多现实社会的生活情况和自己的心情意愿安排在想像的境界中显示出来，如女嬃对他的责备，他向重华的陈辞以及灵氛、巫咸对他的劝告等，其中还列举了许多历史事实，如汤、禹、周文、吕望、宁戚等。但想像不等于空想，是从现实基础出发的，是通过想像来体现出作者自己认为应该肯定和否定的思想观点，来更自由地放射出自己的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感情的，它并不拒绝采用现实的事物和历史的陈迹。

虽然如此，屈原在这诗篇里的最超妙的想像境界，仍然是远非人间的“周流乎天”的令人惊奇的描写。如：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阍阖而望予。

又如：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阍风而鼯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鸧妃之所在，解佩觿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

以及最后“邅吾道夫昆仑”一大段神游（见前引），把日、月、风、雷、云、霓、凤鸟、蛟龙等都拉成关系，替他服务。饮马咸池，总辔扶桑，直叩天门；济白水，登阊风、游春宫，求鸩妃之所在，见有娥之佚女，想有虞之二姚。这样的以天上的行径表现不憚“奔走先后”的辛勤，以爱情的追求象征渴望理想的实现，已经使人震惊于作者特出的想像力了；最后还来了一番大神游：转道昆仑，发轫天津，涉流沙，遵赤水，经过不周山，想到西海去，来表示以最大的力量来求精神的解放而仍敌不过爱国爱民的热忱，尤其使人目迷神夺，去来无端，恍若脱空而出。像这样的高超奇伟的想像力，我想，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中都是不易找到的。

第四，丰美生动、明确精炼的语言 吸收民间句调，运用方言词汇，这是屈原作品在语言方面最成功的地方。毛主席曾教导我们：“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²⁵高尔基曾这么说过：“文化史教导我们，在人类社会活动精力最弃沛的时代里，语言随着新的劳动方式多样化和阶级矛盾尖锐化，而特别迅速地丰富起来。”²⁶屈原处在那语言“特别迅速地丰富起来”的时代，又能吸取民间语言，因而作品的语言是丰富多姿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它的鲜明的色彩、清新的词汇和富有情感的语调，都有吸引人的魅力。

作品中运用口语，春秋战国的一般散文家都有，焉、乎、哉、也这类语助词的出现，都是当时口语的运用。²⁷但用得最多的是屈原的作品，几乎成为后来考查楚国方言的总汇。而《离骚》由于篇幅长，包孕楚国的方言特别多。扬雄的《方言》，在里面刺取了不少的资料；郭璞注《尔雅》、《方言》也多所引用。经过扬雄、许慎考定，在王逸的《楚辞章句》和洪兴祖的补注中明确指出的就有“汨”、“搴”、“莽”、“冯”、“羌”、“啄”、“鬻”、“鬻”等十一条，此外如“麇”、“判”、“拂”、

“当”等也有人认为是楚语。

尽管如此，但方言并不等于文学语言，屈原在运用楚国方言时也是有所选择的。一篇两千多字的《离骚》，假如尽量运用方言写，那就会像《说苑·善说》篇所载的《越榜人歌》的原文一样，使人没有办法读得通。只有在表达情意的语气声调上能够更加生动活泼、美妙逼真而又不妨碍人们的理解的方言，才值得选用。我们细看《离骚》里所用的方言上的字眼和词汇，除个别是特殊名称（如“莽”）不得不用外，多是语助词或副词，则屈原选用方言的作用可见。当然，要使作品中的语言丰美生动，仅仅是选用方言词汇还是不够的，作者还必须在广大群众的语言基础上有所铸造。屈原铸造新词的工夫，在《离骚》里也有很突出的表现，如“反信谗而讪怒”的“讪怒”，“怨灵修之浩荡”的“浩荡”，“竞周容以为度”的“周容”，“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的“博謇”，“周流乎天余乃下”的“周流”，“不量凿而正枘兮”的“量凿”、“正枘”之类，都具有新的内涵，是在大众语言的基础上铸造出来的。至于配合新名物铸造出来的新词更不胜枚举。

关于语言明确精炼这方面，这是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的必要条件，《离骚》当然不能例外。精炼和明确是不能分裂开来的，明确是目的，精炼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不经过精炼，是不易得到明确的（“妙手偶得之”的现象是个别的，也许是诗人夸大的说法）。如果不结合明确、不从明确出发来讲求精炼，精炼就成为技巧的玩弄，专讲形式美，和内容不发生联系，那是形式主义者的作法，没有什么价值的。精炼有时也为了气格或韵律的关系，但毕竟不能削足适履，抛开了内容而专门讲求形式的精炼。因此，考察一种作品是否达到明确精炼的程度，仍然不能脱离它所包孕的具体内容。由于《离骚》是一篇气魄宏伟、包罗深广的诗章，人们往往惊其高奇瑰丽的“诡异之辞”^②，而

忽略它的明确精炼这方面，这是舍本逐末的看法，是不踏实的。一切好作品，都经过作者匠心独运的，尤其是诗歌，不管它篇幅多么巨大，都不能不讲求精炼。正因为经过诗人的极意精炼而仍然这么辉煌灿烂、丰美多姿，《离骚》才成其为震古烁今的鸿篇巨制。不信，我就举些例子来看看。如：

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共只 26 个字，把那班“党人”的苟且偷安、只图享乐的腐朽透顶的生活情况，愚昧无知、鼠目寸光、看不到国家前途、只知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认识能力和道德品质，以及他自己的冒犯艰险与他们作斗争和不能不坚决斗争的目的性，都很概括而具体地表现出来，这是何等明确精炼的语言！这是描写现实情况的。再如：

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这是在“见有娥之佚女”下面的一段，是想像中的境界，是要表现他不能达成求爱的目的的曲折复杂的关系和心情的。鸩是有毒的鸟，鸩是多嘴的鸟。有毒的鸟是破坏他的，当然是主动发言，就用“鸩告余以不好”；多嘴的鸟是不可信任的，尽管“鸣逝”也没有什么用处，就用“余犹恶其佻巧”。这关系交代得多么清晰，多么恰合分寸！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心里就不能不“犹豫而狐疑”，想要亲自出马。可是，无媒自去，既然不合惯例；并且听过“凤皇”已先替高辛通聘的传说，怕高辛已先达到目的了，去也无益。这心情又刻画得多么深入细致！姑无论屈原在这里有没有寄托自己争取怀王的信任，或者象征追求理想的实现而遭受到许多波折和委曲，即以求爱的本身说，这样的描写，也是非常精炼而明确的。

上面不过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其实，明确精炼的语言，在篇中到处可以看到。《离骚》的基调是四句一节的，共 90 多节。在每一节中都可以仔细地考察一下，只要辞义完全通解，多余的字和多余的句根本就找不出（有没有错简、倒置或讹误，那是另一回事）。这难道是偶然的么？屈原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有长久的斗争经验，又有杰出的创造天才，因而才能在艺术语言上获得了这么高度的成就，这和他在各个方面的艺术成就一样是不容忽视的。

第五，美妙的节奏声调 诗歌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同时又是最富于音乐性的，最能以节奏声调之美打动人心的。因此，一篇完美的诗歌，不仅表现在它的语言的精炼明确上，也表现在它的节奏声调上。

我们知道，《楚辞》以前的《诗经》，它的语言是很精美的，节奏声调是很和谐的，因而在徒歌、协乐以至往来交际的应用，都为人们所爱好。可是，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和发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文学是不能不跟着有所变化和发展的，虽然两者之间不一定平衡。到了屈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在诗歌方面，也就不能老是墨守《诗经》的常规，总得有改革和创造。屈原的作品，就节奏声调方面说，也和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一样，是为了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需要而产生出来的。自然，我们不能把《离骚》这么伟大的创作，简单地仅仅看成个人的天才或者归结为在那个时代必然会产生出来的创作。有了屈原的生活实践、思想感情及其卓越的艺术天才，才能创造出这么伟大的诗篇，这个人的因素是应该肯定的；假如屈原不是处在这种巨大变革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就不可能产生这么深刻地反映时代现实、标志着时代精神的诗篇，这时代的因素也是应该肯定的。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中的承传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作品的地方特点。《离骚》在节奏声调方

面的成就，我想就从承传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它的地方特点这几方面来略加说明。

就承传关系说，屈原作品中的《橘颂》，还是《诗经》的句型，节奏声调，还有接受《诗经》传统的痕迹；经过屈原加工过的《九歌》，基本上就是楚国的民歌，和楚国先代的民歌如《榜人歌》之类有关系也很明显。长篇巨制的《离骚》，却不易看出它和以前的《诗经》和楚歌的联系，但也并不是说它和前代的传统截然无关。它以四句为一个基调和用“兮”字为语助词，仍然在《诗经》中的国风和楚国先代的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就相互影响说，在《诗经》以后至屈原作品出现以前，其间有二百年的光景，各地产生的民歌必不少。（有人认为这期间的诗歌给文人的散文所代替了，这是不合理的。任何时代的民间诗歌都不会给文人的散文所代替，这是两条不同的传统，是不能混同起来的。）因为没有文人辑录起来，我们已不可能看到它们真正的面貌，从而对屈原的作品有无受到这期间的各地民歌的影响，也很难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看法。可是，从屈原对待诗歌的态度看，也可以得到一种可能性的推断。当时一般的文人，都是采取散文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抒写自己的心情与怀抱的。只有屈原所采取的是诗歌的形式。像《离骚》这样政治性很强的内容也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说明屈原对诗歌是有特别爱好的，以一个“博闻强志”的人而对诗歌有特别的爱好，对这两百年间各地的民歌是不会不熟悉的。这两百年间各地民歌的句型与声调究竟和《诗经》、楚歌有多大的距离，我们虽无充分的材料可供考查，但从荀卿的《成相》篇还是可以看出他所吸收的民歌的句型与声调，显然同《诗经》和楚歌已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我初步的看法，屈原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像《离骚》这么美妙的节奏声调的巨大诗篇，除和《诗经》、楚歌有承传关系外，和其他各国的民间歌唱都可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吸取各

个方面有益的东西来丰富自己的创作。自然，他最主要的还是运用楚声。

运用楚声，是屈原作品一个特殊的标志。后来楚辞的编者把一些非楚国人的作品也编进去，就是以楚声为依据的。楚声有它自己的特点，凡诵读《楚辞》必须按照它的特有的声调，并不等于普通的口念，所以后来能够诵读《楚辞》算是一种专长。汉武帝时，朱买臣因为能够“言《楚辞》”（这“言”字的含义当包括诵读声调）便得到主子的欢心。^⑳汉宣帝时，曾特意征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㉑。直到隋唐时代还保存着用楚声读《楚辞》的传统。《隋书·经籍志》载，隋代一个和尚名叫道骞（一作 𪛗）的能够用楚声读《楚辞》，唐人读《楚辞》都依照他的读法。可惜唐人李善注《文选》只转录王逸注；五臣注《文选》于王逸注外虽略加己见，间注音读，也无涉及声调；道骞的读法，到宋代已经失传了。朱熹《楚辞集注序》已说“今亦漫不复存，无以考其说之得失”。近人姜亮夫谓在巴黎抄到一本《骞公楚辞音》的残卷，也“只有音读，不见声调”^㉒。朱季海在《楚辞解故》里说：“今赖敦煌残卷，甫能窥见源流，其备载故训，兼出众音，信为有功，然求其所谓楚声者，亦已不可方物矣。”^㉓姜、朱本可能同出一源，而都不可考见声调。《隋书·经籍志》虽提到道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宋黄伯思《翼骚序》也曾说过“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的话，但都系一般的说法，对我们了解楚声没有什么帮助。总之，我们从历来的《楚辞》注解中可以看到的一点抽象的说法，楚声是楚国特有的声调；从作品本身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些特殊的语助辞如“些”、“兮”、“只”之类，而“兮”和“只”还是在《诗经》里和楚歌中已经看到的，这就使我们无法了解究竟怎样的声调才算是楚声。它是否和今天的汉剧、楚剧、湘剧的唱腔也有某些类似之点，还是值得专家们加深研究。（几年前在杂志上看

到有人写出用古代的音调读《楚辞》的文章，也看到报纸上登载湖北某校的教师在屈原的一个纪念会上用楚声读《楚辞》的消息，可见这问题已经有人注意到了。）

第六，完整的结构 由于《离骚》的篇幅很长，里面的形象很丰富，情节很复杂，而且有不少回环往复、一说再说的地方，这就可能使一般的读者感到它的逻辑性不强，结构凌乱或松散。可是，屈原的爱楚国，爱楚国的人民，爱楚国的君主，以及他自己的心情上的许多曲折变化，读《离骚》的人总可以从里面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体会得到。也就是说，有些读者尽管对它的结构不甚了了，但对它的主题思想还是有相当的认识的。主题思想是一篇的骨干，是在篇中起着核心作用的。主题思想表现得明朗而突出，正是篇中各个方面都能够围绕着主题思想来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的结果，也正是篇中的结构完整的一种明证。我们如果抓住了全篇的主题思想，再寻绎它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具体内容，就可以看出它的结构的完整性。这是诗，不是论文。诗，尤其是长篇抒情诗，是容许回环往复的。过分直线化，会陷于单调，乏味。有时为要使复杂的事状和深厚的感情明确而充分地表达出来，能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使读者受到更深刻的感动，还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申说。问题在于，说来说去，一说再说，都不会离开主题思想。

《离骚》虽然是一篇篇幅很长的抒情诗——从自然到社会，从人间到天上，形形色色，兼容并包，但是，由于屈原把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忠诚的热情，和为此而奋斗到底的精神，鲜明地贯串在全诗里面，作为全诗的主题思想，处处都围绕着这一主题来进行这一长诗的创作，因而在每一段抒写中，不管抒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毫无例外地要把主题显示出来。如第一段中的“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第二段中的“岂余身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第三段中的“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都明白地显示出主题思想，固不待说。即自“女嬃之婵媛兮”以下几段很多运用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的地方，也一样或多或少地显示出来。只要我们细意体察，还是可以看得出的。如“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美而可服？陆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世幽昧而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一类的说法，都是作者爱祖国、爱人民以及和敌党斗争到底的精神的表白。直到“乱曰”以下，还把自己这种热忱一总倾吐出来。像这样来安排章节，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出作者艺术构思的过程，我认为它的逻辑性是相当严密的，也就是说，在结构方面是相当完整的。至于各个小节之间的语意衔接的紧密，很易看出，在注释里也已经提到，这里就不再详说了。

显然，《离骚》里的抒情或描写部分，都不少重复的地方。例如：表示自己的决心，既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又说“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又说“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又说“陆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指斥敌党的罪行，既说“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又说“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又说“固时俗之工巧兮，糺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又说“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又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

恶。”此外，关于楚王的信任内奸，关于自己的悲伤郁结等等，都不止一次地说着，说着。像这样的反复申说，是不是繁冗拖沓呢？我认为不该这样看，应该联系作者所抒写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看看有没有这样说的必要。作者之所以不惮词费地再三申说，是这一诗篇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所决定的。屈原在这一诗篇中所接触到的各个方面都这样说，是有他的必要性的。必须反复地这样说，才能够使当时矛盾斗争的客观现实和自己的内心活动更加明白清楚地呈现出来，才能加深感和说服人的力量，才能使作品中的伟大主题思想更加明朗而突出。一篇这么巨大的抒情诗，如果不是采取这样的写法，就很容易使读者感到舒缓沉滞，很难收到应有的社会效果。事实上，他这样写，已经在一定程度内达成他写这一伟大诗篇的主要目的了，这就是上面说过的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离骚》里领会到屈原爱楚国、爱楚国的人民、爱楚国的君主以及他的心情上的许多曲折和变化。不过，也必须指出：像这类再三申说的句子，除具有深刻的和充沛的思想感情和丰富而复杂的具体内容之外，还必须安放在最合适的地方，才能够显示出每一个句子的力量——使主题更加突出、结构更加完整的力量，才不会使人感到篇中有一些多余的句子，才能够避免繁冗拖沓的毛病。

第七，新颖的表现手法和取材 《离骚》里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有两种现象：一种是运用了许多花草树木；一种是充满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

花草树木的本身是自然景物，一般是描写景物时才用得着。它能够为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服务，能够作用于情节结构的发展，能够渲染某种场合的气氛，能够增强人们的刺激、加深人们的了解和满足人们的美的享受等等。屈原在这一诗中简直以花草树木的性能代替人的写法，还是十分少见的。过去的人，大都是用《诗经》里的比兴的传统的表现手法来说明这问题。王逸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 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③③}刘勰说：“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③④}又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③⑤}朱熹也认为“《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③⑥}，并在《离骚》的注文中注明“比也”、“赋也”、“赋而比也”等，和他注《诗经》不同的只是没有“兴也”这一类，但他明言“兴少而比、赋多”，则并不是认为《离骚》里没有用“兴”的表现手法，没有明白标出或忘记标出而已。说《离骚》运用许多自然景物是“比兴之义”，这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但不十分充足。比兴这种表现手法，在《诗经》的国风里用得最多，用得最好，是劳动人民最喜欢运用的一种手法，是我国诗歌史上一种优秀的传统。但是，《诗经》中的国风，一般说是短小的抒情诗，较长的如《豳风·七月》之类，就不用比兴了。较多长篇的《大雅》，基本上就不用比兴这种表现手法。《离骚》是一篇2400多字的长诗，照《诗经》的传统看，是不宜于运用比兴的，干吗屈原采用比兴的传统来写长诗呢？可见用《诗经》的比兴的传统观念来说明《离骚》的表现手法，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

《离骚》中用许多自然景物来比喻人事是事实，但没有用兴的，说成“比兴之义”或“依诗取兴”，都不很恰当，当然更不能看成即是《诗经》的比兴传统。就比一方面说，《离骚》中用比，也自有特色：第一，即以比喻的东西来代替人，如“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众芳芜秽”、“芳草”变“萧艾”等等，和“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③⑦}一类的用法不同。第二，许多用来比喻的东西自成一个整体，如芳草香花比贤士，以种植芳草香花比培养英才，以佩带芳草香花比修炼高洁的品德，以芳草比美质，以百草不芳比失时，以众芳芜秽比好人

变节等，和“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有 济盈，有 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³⁸一类的用法也有别。因此，《离骚》中的比的表现手法，不能单纯看成一种对照，如“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³⁹之类，更多的是以自然景物的本身来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先秦的寓言所运用的表现手法有共通之点。其中有些片断，如“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鸩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可以明显看出是童话、寓言一类的写法。因此有人简直就把楚词看成“以寓言为文”，和《庄子》、《列子》一样⁴⁰。寓言的本身就是一种想像的境界，是具有战斗性和现实意义的。民间的寓言，和神话传说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就爱好民间创作并吸取它来丰富自己的创作的屈原来讲，应该是在他所爱好和吸取之列的。

继承《诗经》中比的传统并吸取寓言的表现手法的因素而成为一种新的表现手法，这是《离骚》运用自然景物的特征。这种新的表现手法，与其说是“比”，不如说成“象征”更恰当些。因为象征的涵义更为深广，更有完整性，是比的发展，而具有寓言的表现手法的因素。寓言的表现手法，其实也是比喻，但是以故事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就需要有一套足以表达思想感情的结构，即使是短小的结构也好。可是，寓言毕竟是一种文体，文体是不能看成表现手法的；并且《离骚》里所运用的比喻，也不是以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在连贯性和一致性上和寓言里的用法相类似。所以我们不能说《离骚》里运用自然景物不是比的表现手法，也不能说即等于寓言的表现手法，而是在运用比的传统的基础上加上寓言的表现手法的因素的一种新的表现手法。我们管叫它做“象征”，也还是因为这个名称的意义和影射、寄托都联系得较紧，（当然也不会抽掉比喻的写法）跟《离骚》的实际情况更符合，并不是很确定的名称，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屈原为什么要把许多花草树木作为象征人的题材呢？照我看，这和他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感情都有关系。

本来，作为一个诗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并不是稀罕的事，我国历来题咏花草树木的诗章，不胜枚数。可是，问题不在于仅仅吸取了一些花草树木作为题咏的题材，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态度来运用这种题材。如果为了玩弄花草树木而题咏它们，那就和屈原在《离骚》里的吸取花草树木作题材有根本上的区别。屈原是采取认真严肃的态度，利用花草树木的性能和形象来抒写自己在生活斗争和远大理想中的各个方面的人物的精神面貌的。也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吸取到作品中来，实际上是赋予它们以政治意义，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无聊欣赏的对象。因此，我认为屈原这种写法，也是他热爱祖国的山川景物乃至一花一草的一种标志，也是他接近人民大众、具有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白。屈原把自己正确的主张、远大的理想、坚决斗争的过程以及自己变化复杂的心情，都通过这篇诗篇表现出来，我想，他主要的意图是要向楚国人民申诉，并不是像后人的“陈情表”一样只向楚王陈述冤苦（当然，他是希望楚王看到的），因而他所采取的事物的名称、形态、色泽和特质种种，就不能不是楚国人民所习闻惯见的东西，以博得他们的爱赏和玩味，从而引起普遍的共鸣。假如这种看法可以成立的话，屈原的《离骚》里充满了花草树木的形象，是有其深刻的意义的。

《离骚》里以花草树木象征人事的相当多。例如写自己不断砥砺修洁的品格的，有“扈江离与辟芷兮”六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八句，“制芰荷以为衣兮”八句；写党人的倒行逆施、专权误国的，有“户服艾以盈要兮”六句，有“余以兰为可恃兮”十二句；写培养青年，希望共同救国的，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六句；写所培养的青年后来变节的，有“兰芷变而不芳兮”四句；写一切美好的才德的，有“固众芳之所在”三句。

此外，还有不少以花草树木比象人事的零星的词汇和句子。这就可见屈原的运用花草树木都有相当重要的内容的，和后来一些唯美派或象征派的作者滥用花草树木来掩饰贫乏空虚的内容的截然不同。

关于取材神话传统和历事故事这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我们知道，神话故事有许多是人民大众所创造，同时也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屈原是爱好民间创作的人，因而他就懂得什么是人民大众自己的并且为他们所爱好的东西。他写《离骚》，既然是要向楚国人民申诉和要表白他自己的一切——和国家人民有关的一切，又怎能不迎合他们的口胃？因此，他一方面把楚国人民所熟悉的花草树木作为描写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把楚国人民所爱好的神话故事作为描写的材料。我们看《离骚》里所出现的如魍、启、羿、浞、浇、夏桀、后辛、尧、舜、汤、禹、周文、羲和、望舒、飞廉、丰隆、鸩妃、高辛、少康、摯、咎繇、傅说、武丁、吕望、宁戚、齐桓等等，或者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或者是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在当时都可能是人民经常谈到、听到的。至于女嬃、灵氛、巫咸是“信鬼好巫”的楚俗中时常出现的人物，更不消说。

正因为历来士大夫阶层中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和人民大众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感情有很大的距离，而屈原写《离骚》的取材却处处从后者出发，为后者设想，因而他在当时认为最容易引起广大的读者的亲切之感的极其鲜明具体、生动活泼的形象，而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反而认为“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⑫，“诡异之辞”，“异乎经典”^⑬。这说明对待人民的态度不同，在评价作品上也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美学观点也应该注意到。花草树木是自然美的原料，用起来可以加强作品的美的气氛，这也可能是屈原在作品里多用花草树木的一种原因。

如上所述，《离骚》里所表现的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是十分

显著的。我们从整个作品看，虽然也真实地描写楚国的溷浊的社会现实，并且在写理想事物中也时时联系到社会现实，但更多的则是描写理想的境界。作者利用许多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的材料来塑造出美妙动人的形象，同时还选用活生生的楚国方言以及采取对照、譬喻、夸张等等的表现手法，而这一切，都是浪漫主义作家惯于使用的艺术手法。我们说，屈原的《离骚》是我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现的伟大的浪漫主义的诗篇，屈原是出现在我国文学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当然，这样的一个伟大诗篇的出现，不会是其来无端、孤立绝缘的，它和屈原个人的斗争实践、文学修养以及吸取民间创作等都有机地联系着。这种精神的充分发挥，在诗歌领域里，以前没有出现过。以前所有的只是这种精神的一点一滴的流露，也可以说，只是一种萌芽状态，如《诗经·硕鼠》里的“乐土”、“乐国”、“乐郊”之类。只有在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里，具有进步思想的屈原，才能够吸收了当时蓬蓬勃勃的时代精神配合着个人的深厚修养、丰富经验等等，以巨大的文学样式表现出来。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惊人的。他在所有的作品中都涂上了浪漫主义色彩，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和特别新鲜的感觉。而尤其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像《离骚》这样政治性极为强烈的诗篇，也放射出积极浪漫主义的光芒，以丰富动人的形象，给人以许多美的享受。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历史上是很难看到的。这就使得《离骚》这一巨大的诗篇作为积极浪漫主义的文人诗歌的开端的同时，也成为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的杰作，“金相玉振，百世无比”^①，达到了美学的高峰，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注 释

①主张屈原在楚怀王时作《离骚》的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指出年限

的，如王茂元谓在楚怀王客死时（见《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陆时雍谓在怀王初放时（见《读楚辞语》）；梁玉绳谓在怀王末年顷襄王世（《史记志疑》卷三十一）；龚景瀚谓在怀王入秦入返、顷襄王未立时（见《离骚笺》）；近人浦江清谓在怀王十九年至二十四年（见《祖国十二诗人·屈原》）；逯钦立谓在楚怀王二十四年（见《屈原离骚简论》）；李延陵谓在楚怀王十四年（见《屈原的生辰与离骚的著作时期》）；马茂元谓在楚怀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之间（见《关于离骚时代问题的商榷》）。此外一般都不指出年限。主张屈原在顷襄王时作《离骚》的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王闾运认为在顷襄王元年至四年初放未召时（见《楚辞释》）；近人游国恩的《楚辞概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都认为在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以后。

②这里面对巫咸说话的看法，各人不同：朱熹《楚辞集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方苞《离骚正义》、林云铭《楚辞灯》、龚景瀚《离骚笺》、谢无量《楚辞新论》等认为截至“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句；陆时雍《楚辞注》、李光地《离骚经注》、梅曾亮《古文词略》、马其昶《屈赋征》等认为截至“恐嫉妒而折之”句；吴汝纶《点勘史记》认为截至“莫好修之害也”句；姚鼐《古文辞类纂》认为截至“周流观乎上下”句。近人文怀沙《屈原离骚今绎》、姜亮夫《屈原赋注》、高亨《楚辞选》、马茂元《楚辞选》同意朱熹的看法；刘永济《音注详解屈赋定本》、郭沫若《离骚今译》同意陆时雍、李光地等的看法。我也认为陆、李等的看法比较正确，“时缤纷以变易兮”以下，应系屈原的说辞。

③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见《文心雕龙·辨骚》。

⑤罗森塔尔、尤金编《简明哲学辞典》。

⑥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⑦见《战国策·中山策》白起说的话。

⑧见《诗经·鲁颂·愷宫》。

⑨见《论语·八佾》，包慎言《温故录》：“夷狄谓楚与吴”。

⑩见《左传·僖公四年》。

⑪见《左传·定公四年》。

⑫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⑬见《礼记·礼运》。

⑭见《中庸》。

⑮见《论语·子路》。

⑯见《吕氏春秋·去宥》。

⑰见缅甸斯尼柯夫《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所引。

⑱见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

⑲同上。

⑳见高尔基：《苏联的文学》。

㉑见贾谊：《吊屈原赋》。

㉒《渔父》中的句子。

㉓《卜居》中的句子。

㉔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344页。

㉕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838页。

㉖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

㉗郭沫若说，见《屈原研究》。

㉘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㉙见《汉书·朱买臣传》。

㉚见《汉书·王褒传》。

㉛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序言》注。

㉜见《语言研究》1957年第二期。

㉝见王逸：《离骚经章句》第一。

㉞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㉟见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㊱见朱熹：《楚辞集注·离骚经第一》序后注。

㊲《诗经·邶风·凯风》，朱熹集传：“比也”。

㊳《诗经·邶风·匏有苦叶》第一二章，朱熹集传：“比也”。

㊴《诗经·邶风·柏舟》。

㊵刘师培在《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论》中说：“有以寓言为文者，如庄、列、楚词是也。”

㊶见《论语·阳货》。

㊷见班固：《离骚序》。

㊸并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④见《文心雕龙·辨骚》。

附 录

詹安泰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

黄天骥

詹安泰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一生勤恳地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努力耕耘。解放后，他除了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领导全室教师搞好教学，并以身作则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写出大量的学术论著，在国内学术界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詹安泰教授于1967年逝世。生前身后，他的论著被结集为《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屈原》、《李璟李煜词》、《古典文学论集》、《宋词散论》、《詹安泰词学论稿》、《离骚笺疏》等多种，计100多万字。这些论著，绝大多数是在1953年至1963年间写成的。1958年以前，詹安泰教授教学工作、社会活动极为繁冗；1958年以后，他蒙受凌辱，遭际极为坎坷。但不管处于顺境还是逆境，詹安泰教授孜孜不倦钻研学术的精神，则始终如一。捧读遗篇，想怀当日，倍感詹老师品格之可贵。

—

广州解放后，詹安泰教授曾立下决心：“三年不读线装书。”出于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他准备用三年的时间，认真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大量翻阅解放后出版的文艺论著，包括从苏联传入的文学理论。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学者，能够自觉地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力图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实在难能可贵。也正因为詹安泰教授旧学基础深厚，当他一旦试着运用新的观点方法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的

现象时，便能脱颖而出，在当时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产生强烈的影响。

1953年，詹安泰教授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一文，这是解放后第一篇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诗经》，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学术论文，是詹安泰教授学术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詹安泰教授在全面研究《诗经》的基础上认为，除了国风值得重视外，三颂与大小雅，虽然其中许多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作品，可是里面也包孕着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东西。这一分析，既注意作品表现的阶级性，又注意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詹安泰教授没有因为小雅、大雅、三颂多是出于统治阶级之手的作品，便一概抹杀。他发现其中包含着可贵的成分，“还可以有选择批判地吸收”。在解放初期，学术界深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詹安泰教授对《诗经》的分析，给人以清新的感觉。

詹安泰教授研究《诗经》最具创造性的意见，是认为雅、颂里有些诗篇，反映了“农业生产者在生产斗争和生活斗争中的愿望和要求”。他认为周颂《良耜》是农村社祭时的祭歌，社祭虽由统治者主持，祭歌却是以农歌为蓝本。这样的理解，和郭老对《良耜》的看法截然不同。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詹安泰教授给《良耜》重新翻译，生动雄辩地表明它确是一首生气勃勃的农歌，学术界中许多同志也接受了詹安泰老师的观点。根据《诗经》是古代民歌这一论断，詹安泰教授在论文中经常把历代和现代的民歌与之比较，说明古代和今天劳动人民思想上一脉相承的地方，说明艰深难懂的四言诗，其实与今天的民歌一样，充满着对剥削者憎恨的感情和对爱情强烈追求的愿望。詹安泰教授明晰地阐述了古代民歌的价值，把《诗经》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1953年，詹安泰教授又主编了《中国文学史》（秦汉部分）。此书共分12章，除个别章节由容庚、吴重翰教授撰写外，

统由詹安泰教授负责。它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高校交流讲义出版的解放后第一部文学史教科书。

在《中国文学史》（秦汉部分）中，詹安泰教授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各种文学现象。例如谈中国文学的起源，詹先生强调劳动创造文学，指出无论上古诗歌或古代神话，都直接或间接与劳动有关。与此相联系，詹安泰教授充分注意人民在文艺创作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强调民间创造促进了秦汉时代文学发展，是这部文学史教科书的一大特色。

古代作家，不可能出现于社会下层，詹安泰教授评价他们的成就，则以他们的创作是否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为标准。像屈原，他是出身于贵族的诗人，詹安泰教授详尽论述他的生平，对他的创作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和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具有丰富的感情，精炼的语言，高超的想像和美丽动人的艺术形象，它已达到了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统一”，认为屈原的成就，是他热爱人民，在流亡许多年后更接近人民熟悉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结果。詹安泰教授又认为，屈原与当时民间创作的关系密切，曾把劳动人民创作的《九歌》进行加工，并从其中吸收了养分。关于《九歌》产生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较多人认为这是祭歌，詹安泰教授则着重指出，《九歌》里面各种神，都和劳动人民的生产、生存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云中君是云神，湘君湘夫人是湘水之神，大司命、小司命是主宰命运、子嗣之神，东君系太阳神，河伯系河神，山鬼系山神，国殇是祭一般鬼魂，因此，詹安泰教授认为这是祀神的歌词。现存的置于屈原名下的《九歌》，十分精美，与民间作品一般比较粗糙的情况不同，“显系经过屈原的精心加工的《九歌》，处处都达到了顶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迷人的世界，读《九歌》的人，不管理解它或不理解它，总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美丽芬芳，怡神悦目。屈原把民间文学提到很高的地位，也

就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另一伟大贡献。”此外，对于楚辞的成就，詹安泰教授也注意从它具有民歌的风格，采用楚国的方言，运用楚国的音调，描写楚国的特殊名物，吸收大量的神话故事等角度予以评价。

在解放前，治文学的学者只注意纯文学问题，或者只罗列史料，不加分析，谈不上研究文学发展的规律。在解放初期，詹安泰教授学习了马列主义，注意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包括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力图划出一条中国文学发展的线索。正因为詹安泰教授在掌握了大量的史料，透彻地理解作品的基础上，以正确的观点去分析先秦两汉的文学现象，所以，即使过了几十年，他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秦汉部分）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二

詹安泰教授一生重视词学。解放前，他撰写《词学研究》，从声韵、音律、调谱、章句、意格、修辞、境界、寄托、起源、派别、批评、编纂诸方面，全面阐述词学问题。这部著作，散失过半。遗稿7章，载入《詹安泰词学论稿》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字，尽管已非完璧，但仍可以窥见詹安泰教授在词学方面的精深造诣。

《词学研究》首论声韵。詹安泰教授旁征博引，列举了前人对词韵的论点，指出习词者对守声之说，不可不知；研究词学，也必须洞悉词在形式上的规律。但是，詹安泰教授认为，声韵的规矩并非一成不变，像沈义父、万树等人严论上、去二声，入声字则不拘；况周颐、陈锐则兼论入声；李渔却专论上声的重要性。根据“以守四声说求之古人已不能尽合”的情况，詹安泰教授认为，“时至今日，词已不得协乐。所谓四声者，亦正可守，可不必守，倘必刻舟记柱，非真善用赵卒者矣。”显然，詹

安泰教授较早就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词的音韵和创作问题的关系。

《词学研究》还畅论“寄托”、“修辞”等问题。詹安泰教授以充分的论据，说明我国词坛向来重视“寄托”的艺术手法。他首先指出“寄托”手法产生的根源，“北宋真仁以降，外患亟，党派渐兴，虽汴都繁丽，不断歌声，而不得明言而又不能已于言者，亦所在多有；于是辞在此而意在彼之词，乃班秩以出。及至南宋，则国势陵夷，金元继迫，忧时之上，悲愤交集，随时随地，不遑宁处；而时主昏庸，权奸当道，每一命笔，动遭大纲，逐客放臣，项背相望，虽欲不掩抑其辞，不可得矣。故至南宋最多寄托，寄托也最深婉。”詹安泰教授注意把艺术手法的产生与社会条件联系起来，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有些作品，能于寄托中求其真意，“可当史读”。但又认为不能一味以“寄托”说词。一些词明明只描叙个人刹那间的感受，并无深意，有人却穿凿附会，以为别有寄托，弄得笑话百出。詹安泰教授的论断，纠正了向来治词者的偏颇，给寄托的手法以准确的诠释。

在《论修辞》中，詹安泰教授详审地列举了各种词的修辞现象，概括地把修辞作风归纳为拙质、雅丽、疏快、险涩四类。在分析词的修辞风格时，他尤其注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例如论“拙重”一派，抒情适如其情，叙事适如其事，“非有真情实感者不易下笔”。因此，詹安泰教授对这一派的评价是：“在修辞技巧而言，拙重最为初步，而以修辞效用而言，则拙重为最成功。”这一看法，鞭辟入里，也说明詹先生较早就能辩证地研究词学问题。

解放后，詹安泰教授发表了一系列词学论著，对宋代词家研究尤深。

怎样评价宋词的思想内容，这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詹安泰教授一生喜爱词曲，他所写的《无庵词》，峭劲清丽，功力深厚。

正由于他洞悉词的韵味和特点，因此能客观地公允地指出词的形式对创作的束缚。同时，詹安泰教授指出，词的具体内容，比诗更为难懂，它往往集合许多形象，压缩在简短的篇幅中，使人摸不清头绪。有时他言在此而意在彼，有时只从个人的偶然感受中寄托深广的意义。然而，词的这些局限，恰恰形成了词的特点，因此，对待词作，必须深入分析，切忌囫囵吞枣，粗暴从事，要把社会情况、作者思想以及词的形象联系起来，才能透彻了解其中蕴藏着的价值。总之，詹安泰教授不像有些学者那样，偏爱自己所熟悉的体裁，而是力求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综观两宋现存的两万多首词，詹安泰教授把它们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个人享乐生活和都市的繁荣面貌；政治境遇的风波和羁旅行役的劳顿；异族欺凌的悲愤和杀敌救国的雄心；身世乱离的感伤和家国沦亡的怆恻等等。詹安泰教授既明确提出宋词存在不少封建糟粕，同时又认为宋代的许多词作，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历来有几种说法，有以为出于古乐府的，有以为源于六朝诗的，有以为词由诗变，始于中唐的。詹安泰教授力排旧说，指出词的兴起，既与外来音乐有关，又与当时流行的民歌有关。他认为：“受了新的外来音乐的刺激，在传统的乐府民歌基础上创造了较为新颖自由、较多变化的体制来适应当时的生活需要，更吸取了一些流行民间的新东西（包括宗教迷信的东西），使它更带普遍性，这就形成了当时的一种新体诗——词。”詹安泰教授用充分材料说明词与燕乐的关系，并根据《敦煌曲》中许多无名氏的作品判定：词属人民首创，它在民间流行后才逐渐转到文人之手。他坚持人民是历史主人的观点，纠正了封建文人的传统看法。

对词人和词作，詹安泰教授的分析尤为独创深刻。

詹安泰教授论词，紧紧抓住词这一形式所特有的构思方式进行。例如温飞卿的词，喜欢选用色彩浓艳的字眼去创造艺术语言，有些作品，骤然看来只是一堆人物动作或自然景象的罗列，使人读来不得要领。但詹安泰教授根据“词意不贯”的特点，以鉴赏家的特有眼力，从温词里各种形象抽出内在联系的线，剖析它在浓艳词藻掩盖下的真实涵义，使人豁然开朗。像《菩萨蛮》“水晶帘里颇黎枕”，詹安泰教授从它写水晶帘、颇黎枕、鸳鸯被，看出作者在记述留宿的地方；从柳如烟、残月天的形象看出作者记述清晨别离的地方；从女子的衣饰打扮，从她双鬓被荷花隔开，玉钗摇动，看出作者写女子划着小艇，穿过花溪。经过一番抽丝剥笋式的分析，詹安泰教授让读者理解，这一首颇为费解的词，其实是一幅异常动人的完整鲜明的送别画。

詹安泰教授经常以比较的方法，研究词的形象，从而确切地阐明作家的艺术风格。例如指出孙光宪词的艺术特色时，就从《谒金门》“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说明。詹老师认为，这首词一开首就把抒情推到极点，在《花间集》中找不到第二例，既说“留不得”，心情自然非常难过，接下去自应写怎样难分难舍，可是，孙光宪却出乎意外地翻过来说：“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好似断了恩爱，毫无依恋，两句话说了两层相反的意思，说得直截了当，不留余地，里面却包蕴着许多情味，詹安泰教授认为：“这种突起、急转、既坦率又峭劲的写法，正是孙词气骨遒健的一种表征，温韦词中没有出现过的。”

在剖析词的形象时，詹安泰教授往往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读者的鉴赏力。像分析柳永《雨霖铃》“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两句，詹安泰教授指出它的好处是集中了许多触动离愁的东西来表现作者的愁怀，“离人饮酒，是作为麻醉剂来消减愁怀的，酒醒无异愁醒，”更难排遣，詹安泰教授说：李璟《应天长》的“昨夜更阑酒醒，春愁却过病”；周邦彦《关河令》的

“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都明显地说明这种情况。至于这词情景的联系，詹安泰教授从“杨柳岸晓风残月”，谈到温庭筠的“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韦庄的“惆怅晓风残月，相别”，由此及彼，让读者触类旁通。因此，他剖析词作的过程，也是使读者提高艺术鉴赏力的过程。

詹安泰教授论词最有影响的文章，是《李煜和他的词》。

20世纪50年代后期，学术界中曾就李煜词的评价问题，发生过一场热烈的争论。有人认为李煜的词具有爱国思想，有人强调他所写的爱情词的真挚感人，也有人认为李煜是荒淫腐朽的帝王，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毫不足取，因而在艺术上也不值一谈。

詹安泰教授对李煜的词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李璟李煜词》以清代沈宗畸刻《晨风阁丛书》王国维校补南唐词为底本，以明代吕远刻的《墨华斋》本、清代侯文灿刻的《十名家词集》本、光绪时金武祥《粟香室丛书》复刻侯本、《全唐诗》本，以及有关二主词的各专集，各选本、词话等互相比勘，周详精审，在这基础上，詹安泰教授对李后主的词，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

詹安泰教授对李煜的生平以及南唐政治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将李煜词分类加以论述，诸如写豪华生活和艳情生活的，写别离怀抱和其他伤感情调的，写囚徒生活和哀痛心情的等等，詹安泰教授条分缕析，指出这些词最大的特点，在于真挚地表达了作者的感情。他认为李煜词所表现的爱情固然不能等同于一般封建帝王的荒淫生活的表现，但也不能等同于人民的真正爱情生活的表现。人们欣赏这些词，不在于其中的具体内容，“而在于李煜的大胆真实的描写和描写的高度成就”。同样，詹安泰教授认为，李煜那些抒写愁情恨绪的词，之所以会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作者以自己的无可奈何的感受，向人们提出了真诚的诉说，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愁、恨，正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易感受到的愁、恨，最易引为同调的愁、恨”。在20世纪50年代

学术界普遍把人的阶级属性夸大到绝对地位，不承认不同阶级的人也存在共同的好恶，詹安泰教授却认为李煜词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意义和体现出人所共有的特征，能够感动不同时代的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这一论断，独具卓见，说明詹安泰教授能够不为时见所囿，能够较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处理古典文学问题。

如何评价宋词，是我国文学史研究难题之一，有关词的艺术性，尤难掌握，为此，詹安泰教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词的技巧研究上。他的《宋词风格流派略谈》、《温词管窥》、《李煜和他的词》、《孙光宪词的艺术特色》、《简论晏欧词的艺术风格》等论文，或从个别篇章入手，阐述词人的特色，或纵述不同词派的风格，为我们钻研词的艺术性问题作出了榜样。

* * *

詹安泰教授一生辛勤著述，他除了集中精力撰写论辩式的学术论文外，间或从事笺证和考据。1956年，詹安泰教授在授课之际，写了《离骚笺疏》一稿，汇集从王逸以来历代专家对《离骚》的注解，爬梳剔抉，从中阐释真微之义。就在笺注《离骚》的同时，他撰写了《屈原》一书，随后又写成《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长篇论文，充分显示出在考证方面的工力。詹教授一方面结合屈原的作品，雄辩地论证作者的身世；一方面以大量材料论述“左徒”的官职的发展，从而考证出屈原地位的变化。詹安泰教授学识弘富，目光四射，判断准确，他对屈原身世的考据，受到楚辞研究专家姜亮夫教授的推崇。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里，詹安泰教授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中山大学中文系为曾有这样卓越的学者主持古典文学教研室感到庆幸和骄傲。今天，由詹安泰、容庚、董每戡、方孝岳等老师亲手培育的人才，已在祖国的四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岭海芳型在，菁莪教泽长。詹安泰老师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永远活在后

辈学者的心中。

詹安泰教授已刊著述年表

本年表分 1949 年以前及 1949 年以后两个部分，按发表（出版）时间先后排列。安泰教授 1967 年逝世以后发表（出版）的著述，虽然成文（成书）的时间较早，仍以遗作发表（出版）时间为准。其中个别篇目因年代久远，一时查不到出版年月的，只注明刊期，放在适当地方。

一、1949 年以前

中国文学上之倚声问题

《中山学报》1 卷 1 期

孟浩然评传

国立广东大学文科学院季刊 1 期

论寄托

《词学季刊》3 卷 3 号，1936 年 9 月

无庵词

词作结集（线装），选词 100 首，1937 年

滇南挂瓢集

选诗、词各 100 首，1939 年

杨琏真加发陵考辨

《新中华》复刊 3 卷 6 期，1940 年 3 月

论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

《文史杂志》5 卷 1~2 期合刊，1945 年 1 月

无庵说诗

中山大学文学学院院刊《文学》

无庵说词

中山大学文学院院刊《文学》，1947年

二、1949年以后

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人民文学》1953年7~8期合刊

关于处理古典文学的一些意见

《长江文艺》1954年1期

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高等教育通讯》1954年20期

清除胡适反动思想对祖国文学遗产的毒害

《胡适思想批判》7辑，1955年

批判胡适所谓“科学的方法”及其它

《文学遗产》38期

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学上的作用

《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2期

对我国目前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光明日报》1956年6月16日

李煜和他的词

《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1期

读词偶记

《文学遗产》145期，1957年2月20日

谈柳永的《雨霖铃》

《语文学习》1957年4月号

略谈苏轼的《念奴娇》

《语文学习》1957年5月号

处理古典诗词的一点意见

——以曹植《野田黄雀行》为例兼及苏轼《念奴娇》

《语文教学》1957年5月号

屈原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初版

中国文学史（先秦西汉部分，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8月初版

李璟李煜词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初版

温词管窥（上、下）

《香港大公报》《艺林》1962年7月29日，8月25日

小谈《水浒全传》（《夜读偶记》之一）

《羊城晚报》《晚会》1963年1月2日

朱熹的《论文》及其它（《夜读偶记》之二）

《羊城晚报》《晚会》1963年1月4日

解释苏词的一些问题（《夜读偶记》之三）

《羊城晚报》《晚会》1963年1月11日

从《桃花源记》说起（《夜读偶记》之四）

《羊城晚报》《晚会》1963年1月15日

看古人改稿（《夜读偶记》之五）

《羊城晚报》《晚会》1963年1月17日

也有一些感想（《夜读偶记》之六）

《羊城晚报》《晚会》1963年2月1日

苏舜钦的“大小言”（《夜读偶记》之七）

《羊城晚报》《晚会》1963年2月11日

望文生义（《夜读偶记》之八）

《羊城晚报》《晚会》1963年2月26日

读毛主席诗词——有关艺术特征的一些体会

《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1~2期

从宋人的五部词选中看到的一些问题

《文学遗产》447期，1963年1月13日
简论《敦煌曲》中的普通杂曲

《学术研究》1963年2期

无庵说诗（四篇）

《香港大公报》《艺林》1963年4.5、4.7、6.30、8.4
革命的最强音（学习毛主席诗词专栏）

《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2期

孙光宪词的艺术特色

《香港大公报》《艺林》1964年5月3日

冯延巳词的艺术风格（上、下）

《香港大公报》《艺林》1965年2.14、2.21

谈范仲淹的两首词

《香港大公报》《艺林》1965年9月12日

清新含蓄

《香港大公报》《艺林》1966年1月16日

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上、下）

《香港大公报》《艺林》1966年2.20，2.27

简论晏欧词的艺术风格

《香港大公报》《艺林》（刊期未明）

本色略谈

《香港大公报》《艺林》（收入《艺林丛录》9辑）

谈文采

《香港大公报》《艺林》（收入《艺林丛录》9辑）

刘熙载论词品及苏辛词

《文学评论》丛刊3辑，1979年

宋词发展的社会意义

《学术研究》1979年3期

论意格——词学研究之五

《暨南大学学报》1980年3期

宋词散论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初版

离骚笺疏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初版

论章句——词学研究之四

《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4期

无庵词·鹤鹑巢诗合集

香港何氏至乐楼丛书第25种，1982年

古典文学论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初版

詹安泰词学论稿（汤擎民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版

论调谱——词学研究之三

《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2期

花外集笺注（蔡起贤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初版

詹安泰词学论集

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初版

（除上述已刊著述外，1987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詹安泰纪念文集》，除刊入海内外著名学者题辞及追思文章外，也录入安泰教授论文数篇及诗词作品100多首）